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秘密使命

 **E-BOOK**
网络资源 电子图书

一、哈里曼与马歇尔计划

——为重建欧洲而工作

六年战争使整个欧洲陷于瘫痪。德国的长期占领，盟军的轰炸和解放前夕的激战，几乎把这个大陆摧毁殆尽。一九四八年，笼罩着欧洲的气氛只是一片绝望。历届政府接踵倒台，持续不断几个严冬，特别是欧洲人深感不能从这个泥潭中自拔的心情，严重地动摇了欧洲各国人民复兴本国的决心。

欧洲工业设施被摧毁，大批熟练工人由于战争而四处分散；经历了六年紧张的战时生产，机器设备已经破料不过，而且缺乏零件；所有这些问题使欧洲各国无法自行补充机床，更新设施或生产足够的商品来偿付恢复工业所需要的原料。可以作为新的投资或用以重建工厂的资金少得可怜。大部分欧洲货币不是不能兑换，就是按完全不合理的汇率兑换。对货币流通实行财政限制的情况几乎普遍存在。各国都企图关起门来自己搞建设，对于邻国在干些什么都不很关心。战争已结束三年，食物还几乎到处都实行配给。

由于交通中断和分配制度失灵，农业机械化不足和肥料短缺，欧洲各国经济的生产率普遍下降。

美国一直以某种权宜的和紊乱的方式，直接或通过国际组织向欧洲提供食品、货物和金钱。在许多国家里，普遍存在的经济困难还引起一系列政治问题。在希腊，共产党人曾企图用武力夺取政权，建立一个共产党政府。希腊共产党这一企图，得到了邻近共产主义国家的支持。土耳其受到庞大邻国苏联的巨大压力，任他们在领土方面作出让步，并对苏采取更友好的态度。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根据遏制苏联扩张的政策，杜鲁门总统向国会提出了一项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方案。这两个国家既受到某种形式的军事压力，又面临很多经济上的困难。两党对杜鲁门总统这一方案的支持确保了它获得国会的批准。当时在美国，人们普遍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类自由不仅受到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威胁，而且还受到军事威胁。美国政府内部还从那个方案得出这样一种看法，即：如果欧洲要想复兴，就必须建立在一个宏大规划的基础上，这个规划要使欧洲各国更加团结，在美国密切配合下为其共同利益而努力奋斗。

一九四七年，由马歇尔将军首先在哈佛大学一次演讲中，提出了这个以后用他的姓氏命名的计划。该计划为美国和那些愿意参加制订一项援助计划的欧洲国家，提供了一个广泛合作的组织基础，通过这项援助计划，可以使我们的欧洲伙伴得以复兴和自立。

欧洲自由国家热烈地欢迎这个主张。苏联则阻止其盟国参加。为配合美国的欧洲复兴计划工作，成立了一个欧洲国家组织。美国在巴黎设立了一个总办事处，同欧洲国家一起来制定执行方案和分配美援。美国前驻苏、驻英大使、前商务部长艾夫里尔·哈里曼被任命为该办事处主任。他要求把我派到他那里去工作，我就被派去后

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活动即将展开。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一个国家，即美国，去资助它的竞争者，回过头来再同它竞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开始奉命执行马歇尔计划。

当我到达华盛顿时，我发现没有必要匆匆忙忙离开里约热内卢。事实上，我是被安排搭乘贾勒特·赫德尔斯顿号军舰赴欧洲。该舰原定十一天到达不来梅港，由于海上遇到风浪，十五天才到。到了不来梅，只见码头附近，乃至整个城市，到处满目疮痍，这使我感到非常吃惊。战争好象不是三年以前，而是前一天刚结束似的。我乘北方特别快车到巴黎，这是当时在欧洲很少几列国际列车之一。到了巴黎，在找到住处以前，我一直住在香榭丽舍大街附近的加利福尼亚饭店。

到了巴黎，我就向哈里曼先生和我新的顶头上司陆军中校查尔斯·博尼斯蒂尔报到。

查尔斯是无任所陆军武官。我们的办公室都在协和广场塔莱朗饭店的二层楼上。这是一座在某种意义上同广场那边的美国大使馆对称的楼房。这座具有历史意义的楼房过去是那位著名的法国外交部长塔莱朗的住宅，当时用来作为美国在欧洲执行复兴计划的总部，直到很多年以后，美国驻巴黎总领馆接收过去充当馆址。至今它仍归总领馆使用。

接着，我着手找一套住房，终于在拉纳大街找到一套很精致小巧的公寓，从这里可以俯瞰布洛尼公园。有了住所，我就返回不来梅去取汽车，把它开到巴黎。一九四八年七月那段漫长的炎夏日子里，我看到欧洲依然处于瘫痪状态。战争带来的破坏和冲击仍然到处可见。仅有的一线光明就是美国明确表示，它决心要帮助欧洲朋友依靠自己的力量恢复他们的经济，使之稳定，并协助欧洲朋友为他们本国人民提供一个比共产主义所许诺的一切东西都好的自由生活。我曾在许多非军事性的活动方面为哈里曼先生效劳。

常常同他一起进行广泛的旅行，走遍了所有的马歇尔计划国家。在他同各国政治和劳工领袖以及金融专家或其他高级人士会谈时，我经常当他的翻译。这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受教益、感兴趣和有收获的阅历。它开阔了我的视野，并使我得以接触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和金融等以前几乎没有接触过的问题。有时搞得我很紧张，因为我必须翻译某些比较复杂、而我并不完全理解的金融或货币兑换等问题，而要把你自己不明白的东西恰如其份地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是不大可能的。许多人认为搞这种翻译是一项单纯而机械的工作。如果你对某个人的意思不能完全掌握和理解，那么要用另一种语言来转达是办不到的。广泛的旅行使我有可能在德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法国和意大利等实际上所有西欧各国，亲眼目睹了那些战痕累累的断垣残壁。我看到许多城市依然是一片废墟，好多工厂不开工，寂静无声，机器有的已被毁坏，有的已不知去向。巴黎这个不夜城，由于没有原料，又搞不到石油产品，晚上一片漆黑。路灯只开一半，而且光线微弱。所有的商店橱窗戏剧院大门都不见灯光。但比利时的情况要好得多。有一次，我临时开车到布鲁塞尔去，越过边界时，我一下就被比利时境内蒙斯镇上万家灯火的景象怔住了。

我从一家面包店前面经过时，看到橱窗里摆着涂满奶油的蛋糕，这使我感到十分惊讶。

我刚从巴黎来，那里连面包都是配给的，奶油是不准用的。我走进去以试探的口气问一位面包师傅，橱窗里边的东西是不是配给的。他说不是，我就要了一份奶油蛋糕。蛋糕的味道真好，我又要了一份。那位比利时师傅面带讥讽的表情看着我，并对我说：“你刚从法国来？”我说是的，我以为他不过问问我刚从什么地方来。我忘了长期以来，比利时人一直是许多法国

人开玩笑的嘲弄对象，玩笑的内容不外是比利时人怎样愚蠢，又是多么土气。所以当我回答说刚从法国来时，他就露出得意的神情对我说：“比利时有点不一样了吧？”我不能不承认这是事实。那天晚上我到布鲁塞尔已是深夜，使我吃惊的是，布鲁塞尔全城灯火通亮。人们到处都在辛勤地劳动和进行恢复工作，比利时似乎正在带头使欧洲跳出战后的泥坑。我发现，在比利时，不论是食品还是肥皂，或者其他我在巴黎已习惯于用配给券购买的任何东西，都不是配给的。必须承认，在阴霾和黑暗笼罩下的欧洲，我发现比利时与欧洲各国截然不同，它是一座繁荣兴旺、一切正常并受人欢迎的孤岛。后来它成了欧洲共同市场的所在地和欧洲大陆的“心脏”。

现在，事隔多年以后，许多人都已经忘记，一九四八年是一种什么局面。他们忘记了我们当时从事了一项史无前例的事业，那就是资助我们的竞争对手，使他们复原以后再同我们竞争。马歇尔计划开始执行才短短几年，欧洲的工业机器重新转动了。在旧世界被战争摧毁了的国家面前，呈现出一派繁荣兴旺和生活水平空前提高的新气象。无论是我们的盟国还是我们的敌国，都在各个方面得到了我们的援助，这种援助的规模是人类历史有文字记载以来决无先例的。人的记忆是短暂的，但是作为一个当事者，我不能忘记，为了欧洲的自由和繁荣，我们曾不惜牺牲，并付出代价，首先在战争年代献出了我们的人，接着，在和平时期又拿出了我们的财富。虽然我说许多人已经把这一切都忘记了，但并不是到处如此。事实上，有些地方的人理解并感激我们。但不少人认为，整个复兴计划只是美国推销商品的一种巧妙办法。如果说大众牌汽车厂、菲亚特汽车厂、雷诺汽车厂都能很快恢复生产大批车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援助了他们，为他们提供了重新进行生产所必需的机床和设备，而这些东西当时在欧洲是搞不到的。

在荷兰，我在一家面包店看到一张荷兰政府关于马歇尔计划的招贴画，上面写着：“每天吃的面包有一半是靠马歇尔计划的援助烤出来的”。奥地利为旅游业添置的各种设施，也归功于马歇尔计划。但是总的看来，无论我们怎样努力，还是难以使一般欧洲人理解我们当时提供援助的规模有多大，以及我们在提供援助时所持的无私精神。不错，我们曾希望欧洲国家繁荣起来，并从我们美国购买东西，但这不是马歇尔计划的主要宗旨。它的主要宗旨是，给予我们在苦难中生活的朋友、盟国和先前的敌人以帮助，从而阻止共产主义乘人之危向前推进。

提供援助并不总是那么容易的。在受援国方面同样需要作出详尽的计划。他们必须向我们提出一个方案，说明他们准备怎样使用我们将向他们提供的美元。与此同时，他们必须在本国银行存入一笔价值相等的当地货币。在征得我们同意后，这笔款项可以用于他们国内复兴和改建项目中不需要使用外汇的部分。总之，这笔钱可以用两次——一次是以美元从美国或其他地方购买欧洲买不到的设备或原料，另一次是在受援国内部作为当地货币使用。每年都要做出详细的计划，这对某些小国是很困难的。法国、联合王国、德国和意大利有能力去做。至于其他国家，则一般不具备关于这方面的专门知识。

总之，对许多欧洲小国来说，马歇尔计划是一所经济计划的学校。这是把欧洲各国联合起来的一所学校和一次实验。很多欧洲国家至今还认为，美国反对或曾经反对过欧洲的统一。在那个阶段，我们对欧洲的全部援助几乎只有一个目标，即逐步达到欧洲统一。

当时在欧洲，是一个伟人辈出的时代。法国的罗贝尔·舒曼，出生于卢森堡，他曾作为一个德国士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服役，后来当了法国总理和外交部长。还有康拉德·阿登纳这位大人物，他领导德国从战败国的灰烬中挣脱出来，使它在世界文明国家中取得应有的地位。在意大利，有阿尔奇德·德·加斯贝利，他的政治生涯是从当一名奥地利议员开始的，那时他是奥地利帝国意大利少数民族的代表。在一些小国家里也有若干位大人物，如比利时的保罗·亨利·斯巴克。哈里曼同这些人物的关系都很密切。哈里曼善于处理各种问题，为人正直，有能力使美国政府了解当时的需要并往往能够办成，因而使人们对他充满信心。这的确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要做的事很多，但也出了不少伟人，并有坚强的意志。

我回想起有一次同哈里曼先生到埃森的情景。一路上，到处都是废墟，战争的破坏这么严重，使我十分吃惊。我们走访了一家德国人，他们住在地下室。我们同他们进行了简短的交谈，离开那里后，我对哈里曼先生说：“你看他们能重建家园吗？”他说：“能，他们作得到。”我又说：“什么东西使你这样肯定呢？”他说：“你看到那个地下室的桌子上放着什么东西吗？”我回答说：“我看到桌子上放着一盆花。”哈里曼先生说：“对！任何一个民族，当他们处在这样凄惨的境地，还能想到在桌上摆设一些花，就一定能在废墟上重建家园。”我必须承认，那时我曾认为，即使我能活到很大年纪，也不能看到欧洲的繁荣和重建。但是，不到十年功夫，人们已经很难发现战争的痕迹了。

大多数欧洲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工业瘫痪，生产几乎完全停顿。在一个国家，即希腊，实际上还在进行着军事冲突。那时的希腊正处于共产主义邻国和希腊共产党的内外夹攻之中。希腊的内战消耗着它的精力，并使这个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恢复得很慢。

一九四九年元旦，我曾同哈里曼先生一起到过雅典。他似乎有一种在假日旅行的嗜好。

无论在感恩节，还是七月四日国庆节，或者元旦，我们几乎总是陪他在某个地方旅行。

他是一个不知疲倦和富有献身精神的人。他满腔热情地致力于同我们友好的欧洲国家的自由、统一和复兴事业。有一次，我们乘飞机去雅典，到那里正遇到一个非常尴尬的时刻。就在我们到达前不久，希腊内务部长在雅典城里的闹市区被人暗杀了。因此，为我们采取了严密的安全措施。这时，白天在雅典城外走动需有警卫随同，夜晚则根本不能出城。希腊的许多领导人不会讲英语，但会讲法语，因此，当哈里曼先生同他们进行会谈时，我可以对他有所帮助。

在希腊，经济问题不是压倒一切的紧迫问题。紧迫的问题是，得到外国支援的共产党游击队在全国各地进行袭击，以及政府为对付这种袭击所需要的军事援助。对此，杜鲁门先生总是采取非常慷慨的态度，不仅运去了军事装备，而且还派了一批美国军官去援助希腊军队，抵御该国遭到的咄咄逼人的威胁。哈里曼先生同希腊经济协调部长斯蒂法诺斯·斯蒂法诺波罗斯先生会谈时，我替他当翻译。会谈结束后，斯蒂法诺波罗斯先生约我到离雅典城不远的普西希霍的彭泰利康饭店去见他，我同意了。当时，我和另一位执行马歇尔计划的同事住一个房间，他的名字叫格伦·穆尔豪斯。就在我即将出门应斯蒂法诺波罗斯先生之约，共进午餐之前一刹那，我突然想起一个美

国新闻记者在萨洛尼卡被人谋杀的案件，人们发现他的尸体在海湾上漂浮，脑袋后面还有一个子弹穿过的窟窿。于是我就问起一个念头：这次邀请，也可能是某种圈套。我有一枝手枪，我决定随身带着它，这样，如果我去的话，至少不至于象一只面对屠刀的绵羊那样任人摆布。

我在床上把手枪拆卸开来，擦干净。然后把它重新装起来，可是，装到最后道工序，也就是把枪管塞进手枪里边去时，我想不起来怎么装了。因为发现时间不早了，我就越来越着急，拼命想把它安装好。最后我知道已来不及把它装好，因为这时响起了敲门声，一个柔和的声音说：“我是乔治尤斯·达斯卡拉基斯。我是来接你出去的。”我对同屋的伙伴说：“仔细瞧瞧这个家伙。我们也许只能从他那里知道个究竟。”说完这句话，我就把还没有装好的手枪塞在枕头底下。达斯卡拉基斯先生把我带到楼下，我上了一辆旅行汽车，坐在司机旁边的座位上。后面坐着两名士兵，在我们驶出城外进入郊区后，我随时准备着一支手枪的枪口凉嗖嗖地抵着我的脖颈。但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走进彭泰利康饭店，同斯蒂法诺波罗斯先生一起喝茶并进行了长谈。他的真正意图是要我使哈里曼先生理解这样的事实：希腊是马歇尔计划国家中处境最困难的一个国家，事实上战斗正在希腊土地上进行，广大地区被控制在共产党游击队手里，因此，形势比其他国家紧迫。所以，在取得援助方面，希腊应该比其它国家享有更大的优先权，因为其他国家并不存在类似的情况。我离开这个饭店刚几分钟，就想起来怎样装好那枚手枪的最后一道工序，但已经无济于事，因为手枪在我房间里的枕头底下。当我回到寓所时，穆尔豪斯告诉我，旅店的女仆曾进来整理床铺，他指着我的床叫她先整理。当时，希腊正实行戒严令，照理，谁要是拥有武器，就要判处死刑。这位女仆已经走到我的床边，正掀开枕头准备收拾时，看到了手枪，她发出一声尖叫就飞快地跑了，再也没有回来收拾床铺。这件事现在听起来也许有点可笑，但在当时，情况就是如此，也就是说情况很棘手也很困难，因此，女仆显得那样激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哈里曼先生在希腊逗留期间，总有一批警卫或侦探跟随着他，所以，当他到机场准备乘飞机离开希腊时，他转过头向我小声说：“借我点钱给巡警。”我断定他这样说没有贬意。这是他想起来形容警务人员的第一个词。我问：“你要多少？”他哦了一声说：“不知道，给我五十万德拉克马吧。”这在当时折合美金一百五十元。我必须说，不管是什么钱，能借给哈里曼先生五十万元，我感到莫大的荣幸。后来，他把这笔钱还给了我。

希腊币名。——译者

有一次当我离开巴黎外出旅行时，我被推选为欧洲合作署的活动委员会主席。这样，我就需要进行大量的社交组织工作，并需要同已经成立的准备接受和沟通马歇尔计划援助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发生联系。当时我们搞过的一项活动，是为救济法国的小儿麻痹症患者组织一次庆祝罗斯福生日的舞会。为了寻找这类性质的慈善机关，我们作了大量调查，最后终于找到了。于是马歇尔计划部门的高级官员的夫人们，以及高级官员本人都纷纷亲自出马，同那些平时有事务往来的各界人士接触和联系，请他们捐献物品，以便义卖后充当该项救济的基金。史亚巴莱丽香水公司捐了一套服装，法国航空公司捐了两张飞机票，其他许多商业公司也都捐献了各种五花八门的東西。我们曾举行会议讨论如何办理这件事，会上一个为马歇尔计划工作的法国姑娘说，她父亲经营一个艺术品商店，他估计可能为我们搞到一件捐献品。下

次开会时，我问她搞到没有，她肯定地回答说已经搞到几件。她搞到了于特里约，马蒂斯，塞贡扎克和迪菲等画家的作品。我说，“你是指复制品罢。”她说，“不，是原作。”考虑到这些作品出自这样著名的法国画家之手，价值连城，我们决定，不用义卖的办法，而改为拍卖的方式出售。

一九六〇年改名为经济合作发展组织。

——译者

我到警察局去领取举办这种拍卖的许可证，这是法国法律规定的手续。我走到警察总局，我惊讶地看到那里竟然有一个专门办理这种事务的拍卖办事处。我走进去问那里的职员怎样办理许可证。他给了我一张表格，要我填明组织这次拍卖的是哪些人。我就在上面写上：罗斯福诞辰舞会的主席是旅居巴黎的一位美国律师，他名叫安布罗斯·钱伯斯，我是副主席。这位职员出去了几分钟，当他回来的时候，他告诉我说，在我八岁的时候，我曾因骑一辆没有挂车子牌照的自行车被拘留过。这种发生在十八年以前的事情，经过德国的占领和重新解放等事件之后，在法国的档案里竟然还保存着有关资料，实在使我惊讶万分。他还告诉我，钱伯斯先生的妻子在结婚前，曾同一个法国警察发生过争吵，还用她的手提包打过那个警察。我不能不承认法国人收集和保存这些资料的本领，确实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这位职员把许可证给了我，而且他还是被指定来监视抽签的官方人士。我很高兴现在能够告诉大家，他当时赢得一个小的奖品，而且这绝对不是事先安排的。

我在巴黎同哈里曼先生一道工作的年代里，他必须经常回华盛顿去参加国会的听证会，向批准马歇尔计划基金的各个委员会作证。有一次，当我陪他完成了一次返美旅行任务后，我到华盛顿机场，准备从那里飞往纽约去搭乘飞越大西洋的飞机。在那里，哈里曼先生遇到一位他认识的年轻国会议员，名字叫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肯尼迪议员的座位在机舱后面，我的座位紧挨着哈里曼先生的位子。我看到他们两人彼此谈得非常投机，我就对肯尼迪议员说，到纽约这段路程上，他可以坐在我那个紧挨着哈里曼的位子上，我可以到后面去坐他的位子。他很愉快地同意了。这是我一生中仅有的一次机会能见到肯尼迪总统，因为在他任总统的那几年期间，我一直在国外工作。

马歇尔将军任美国国务卿期间，曾到巴黎出席联合国大会。因为我以前有机会和他相识，哈里曼先生就让我当他的助手和翻译。这给了我一个机会，使我能见到某些其他欧洲国家的领导人。我见过意大利的财政部长贝拉，他对恢复里拉这一货币的稳定出了大力；我还经常有机会见到比利时的保罗·亨利·斯巴克。周末，马歇尔将军经常带他的夫人去参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那时他在那里服役，是珀欣手下一名年轻的上校副官。有一个周末，我们离开巴黎，在兰斯度过了夜晚。当时正是犹太恐怖主义者对马歇尔将军大肆威吓的时候，所以，我和我的行政助理卡特将军——他是我在里约热内卢时就认识的——以及他的副官陆军少校乔治工人都轮流荷枪实弹地守卫在马歇尔将军的门外。那天晚上，我们在兰斯的一家饭店吃了饭，我们谁都没有要酒喝。马歇尔将军在屋子里被许多人认了出来，突然间有一个满脸胡子的法国人走了过来，把一瓶香槟酒放在我们的桌子上，用厌恶的表情看着我们正在喝的水，并用英语说：“各位先生，水会泡烂你们的靴子，请收下这瓶酒和我的祝贺罢。”马歇尔将军非常高兴，因为这是一瓶优质的老牌香槟酒。

第二天我们驱车前往法国东部的梅斯。当我们的车从西面靠近这个城市时，马歇尔将军说：“靠近这条路右边的拐弯处有一些一八七〇年战后竖立起来的纪念碑。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里有一座为第十七勃兰登堡步兵团建立的纪念碑。”事过三十年他还能记得这么清楚，我非常惊讶。车开到那里，我们看到公路右边果然有一座纪念一八七〇年第十七勃兰登堡步兵团功绩的褐色石碑。我们在梅斯停留了一些时候就去南希。我们在南希的格兰德饭店登记住宿时，接待处一位妇女抽出该旅馆一九一八年的登记簿，并指给马歇尔将军看三十年前他和妇欣将军在这个旅馆一起登记住宿时的签名。在南希期间（由于马歇尔将军没有公开他的身份，所以，省长只把自己的名片日在旅馆，而没有争取见马歇尔将军），马歇尔将军要我到附近的龚德尔古尔城去了解一个名叫茹阿特的太太是否还活着。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个月里，他曾借住在她家里，他当时是一名上校。我走访了当地的警察局并查明茹阿特太太还健在，而且头脑清楚，不过已经九十多岁了。第二天，我陪同马歇尔将军和夫人乘车前往龚德尔古尔。我们把车停在茹阿特太太家门前，我一个人走上楼去按门铃。一位年迈的老太太出来开了门。我问道：“您就是茹阿特太太吗？”她说：“是的，我就是。”接着她看了看我说道：“哎哟，我的上帝，他来了，是吗？”她已经在广播里听到关于马歇尔将军已来到这个地区的消息，但是她简直不能相信他会来看望她。后来，我下楼去请马歇尔将军及其夫人。

马歇尔将军来到楼上，茹阿特太太激动地吻他的双颊。茹阿特太太非常感激马歇尔将军，因为她的儿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俘，后来，由于马歇尔将军的帮助，这个战俘得到了自由，而且被释放的时间出乎意外地提前了。她告诉我们一件很有趣的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巴顿将军率领他的军队路过这个城市时，曾来看过她。马歇尔将军过去曾向巴顿将军提出过，如果他路过龚德尔古尔城，就去看望一下茹阿特太太，并为她做点事。按照巴顿将军的想法，为她做一点事就是叫来一辆装满食品的两吨半卡车，并把食品卸到茹阿特太太的家里，因为当时法国非常缺乏食物。然后巴顿将军安排了一个装甲团列队从茹阿特太太窗前行进，他则和布阿特太太在窗前检阅这支部队。马歇尔夫人很高兴和茹阿特太太相识，因为她经常听到马歇尔将军谈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这所房子里住过几个月的情况。

在此期间，我和马歇尔将军还访问了意大利和希腊。在意大利，我们会见了意大利政府的许多要员，他们对马歇尔将军的印象都十分深刻。我认为我毕生认识的人当中，很少人有马歇尔将军那样的风度并给人以如此高贵和正直的感觉。他在所有与他交往过的政治家心目中都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有一次在希腊，马歇尔将军同当时已八十多岁高龄的马克西莫斯首相会谈。他老是提到他自己的年龄。当时，他自己是六十五岁左右。

此事显然激怒了马克西莫斯首相。当马歇尔将军第三次或第四次提到他多大年纪时，马克西莫斯看着他并用法语说：“马歇尔将军，你总是谈到你的年龄，你要知道，论我的年龄都能做你父亲了。况且，我还是希腊首相呢！”我将此话翻译过来了。我必须说，这件事使我大吃一惊，因为居然有人因自己的年龄大就想到可以当马歇尔将军的父亲，这是多么不可思议。当时马歇尔将军精力非常充沛，活动非常灵便，而且我们在希腊进行的是一次有意义的访问。我认为，在希腊历史上这一艰难困苦的时刻，美国国务卿来到希腊这件事本身，就是对希腊的极大鼓舞。

此后，我和华盛顿欧洲复兴计划署署长保罗·霍夫曼又去过希腊。这次我到了希腊北部，并在那里同部队一起度过了几天。我和第二师驻在一个叫弗洛里纳的城里。统率这个师的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希腊将军，身高约六英尺四英寸，还留着两撇浓密的八字胡，他叫帕帕多普洛斯（请别和希腊后来的独裁者混淆），浑名叫巴波斯。弗洛里纳城被游击队以某种形式围困已将近三年，而我在那里时，这种包围已解除。大批希腊军队开进这个城市，并结束了这种长时期的包围。这时，第二师受命开往位于大小普雷斯帕湖之间的地峡。我和这些希腊军队一道往下走到这个地峡，过了地峡就是阿尔巴尼亚同希腊的边界。当希腊人接近边界时，游击队还在向他们开枪，而希腊人仍继续前进。我知道雅典方面很快会命令希腊军队停止前进。但是，希腊的战地指挥官们说，只要游击队在阿尔巴尼亚国土上向他们射击，他们就准备继续前进。我自己也继续向前走，两脚踏进了阿尔巴尼亚国境，然后，很快又返回希腊。我相信，当时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进入阿尔巴尼亚国境的为数极少的几个美国军官之一。那时，希腊军队的士气很高。这个国家处于战争状态已将近十年，而希腊的士兵知道，由于南斯拉夫已不再支持共产党游击队，战争终于快要结束了。 意为北美印第安人的婴孩。——译者

——译者

一天，我和《时代》周刊的一名记者乘吉普车沿着公路前进，路边有一个营的希腊士兵正在休息。《时代》周刊的记者要我们停车，我们照办了。他问那些士兵：“这里有人会讲英语吗？。一个年青的希腊士兵说他会，他在美国上过学，会讲英语。记者问他，眼役前他干什么工作。他答称 he 原是鞋匠，还说，他不想继续在军队里，战争结束后，他将回去当鞋匠。然后，这个记者问他，美国军事团来到希腊后，希腊军队的素质是否有很大提高。年青的下士盯住他的眼睛说道：“先生，希腊军队一向是一支好的军队。它是世界上最好的军队。”正是这种精神使这支希腊军队把游击队赶到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去的。这是一个令人振奋和令人激励的时刻。希腊军队是一支擅长歌唱的军队。在这方面，希腊军队给了我非常好的印象。它看起来不象一支小国的军队，倒象是一支高度现代化的军队。一九四〇年以来，希腊几乎一直处于战争状态，战斗从未间断过。一天晚上，我回到弗洛里纳时，副首相维尼采罗斯先生正在宣布包围已解除。他的讲话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后来，我接到电话，要我立即回雅典，陪同霍夫曼去拜会希腊首相。我从卡斯托里亚机场起飞。当我到达雅典时满身都是尘土，有一辆车在等我，并把我直接送到首相办公室。我感到非常窘，因为我身上很脏，不仅衣服上，而且脸上、手上都是灰尘。我和霍夫曼一起被带进希腊首相的办公室。我为我的狼狈相向首相表示歉意。首相拍拍我的肩膀说：“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和难为情的。这是格拉莫斯的尘土，是从我们第二次格拉莫斯胜利中带来的光荣尘土。”（格拉莫斯山是战胜游击队取得伟大胜利的地方）就这样，我虽然有失外交礼仪，但得到了谅解。

欧洲人认识到，我们对于确保欧洲复兴的态度是认真的，我们是以认真的态度对待欧洲的防务问题，并把它看成我们自己的问题一样重要。一个火花燃烧起来了，前些年充斥整个欧洲的那种失望情绪开始消失。欧洲各国采取了行动，不但是保证欧洲各国得以复兴，而且还维护它们的共同自由。法国、英国、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组成了所谓的“西方联盟”，以便研究它们共同的防务，并委任阿拉曼的胜利者陆军元帅蒙哥马利为第一任全军

统帅。在蒙哥马利身上仍然保留着那一次胜利的光辉。战争期间在意大利指挥过法国军队的朱安将军被“西方联盟”任命为地面部队司令，当时他是法国驻摩洛哥总督。可是，朱安将军谢绝了这项任命。后来，这一职务由让·德拉特尔·德塔西尼将军担任。在抵御敌人在法国南部的登陆行动中，这位将军曾指挥过法国军队，后来，当法军推进到德国时，他又指挥过盟军最右翼的法国第一军。德拉特尔将军是一位非常卓越的军人。几年后，在印度支那再次证实了他的老练和才干。他是一个比较难以相处的人，曾几次同他的一些美国同僚和上司发生过冲突。有一次，当他在巴黎逗留期间，他要求约见马歇尔将军，我被指定在场当翻译。他和马歇尔将军是在战争中认识的。他来到美国大使馆官邸，两人握过手，就在起居室坐下来。德拉特尔将军以非常直率和近乎粗暴的方式开始了这次谈话。他对马歇尔将军说，朱安因为觉得没有军队可指挥，就拒绝担任“西方联盟”地面部队的统帅。现在有人要他担任此职。但他认为总要有人出来开个头，因此，他才愿意接受这个安排。英国人、法国人、比利时人、荷兰人和卢森堡人都对他说过，他们对他信得过。然而，他知道美国人对他不信任。可是，美国人迟早要介入西欧防务，因此，他想知道他怎样才能得到美国人的信任。马歇尔将军对这种直率的态度似乎有点吃惊，但他还是以同样直率的态度回答他说：“战争期间发生过几件事使我们对你有所疑虑。有一次我到你们司令部去，你当着一些记者的面同我谈到某些美国指挥官时，用语非常苛刻。”德拉特尔对他说：“当时没有任何人告诉过我，那些穿着军装、佩戴着小小绿色肩章的人是战地记者。我还以为他们是参谋。后来，当我发觉时，我也感到非常懊恼。”马歇尔将军说：“那么，还有另一件事。上级机关并没有给你发布命令，你就擅自跨越了莱茵河。”当时，德拉特尔将军答道：“马歇尔将军，你是一个军人。你能否设想这种情况，就是在我的祖国被德国人占领了四年之后，在德国敌军一路攻打，并越过莱茵河时，难道法国军队就不能到那里去吗？”马歇尔将军点点头表示理解，最后说：“还有另一件事。那就是要你撤出斯图加特时你拒绝执行命令。”德拉特尔答道：“在联军中担任指挥的将军一向是很难办的。福煦元帅曾经说过，他在指挥过一支联军以后，对拿破仑的崇敬心情就大大减退了。”他接着说：“而在本国领土上，在外国人统帅的联军里担任指挥，事情就更难办。”他随着拿出一封当时法国临时政府首脑戴高乐将军的信件，信中命令他不得从斯图加特撤退。我把信的内容扼要地翻译了，马歇尔将军听完后看着德拉特尔，并微笑着说：“我信任你。干吧，把指挥担起来。不久我们会申请国会批准：从我们在德国的储备中拨给你配备西方联军两个师的装备。”后来，我曾多次见过德拉特尔。他是一个坚强的指挥官，一位非凡的人才。如果他还活着的话，我真不知道法国在越南进行的战争将会怎样结束，但是，我肯定这场战争决不会以奠边府的惨败告终。阿拉曼为埃及城市名。一九四二年蒙哥马利元帅从这里出发攻占利比亚，因而得名。——译者

看到经受战争破坏的欧洲废墟上又开始点燃起充满活力的火焰，在某种意义上，就象漫长的冬天之后看到阳光明媚的春天，看到我们正在帮助欧洲恢复信心和恢复生产，这一切是多么令人感到欣慰而神往。欧洲大陆那颗古老而强壮的心脏又开始激烈地跳动了。我认为“马歇尔计划”最重要的成就不在于它提供的物质援助，而在于重新唤起了希望，重新恢复了活力，重新恢复了欧洲人的信心，相信他们不但能恢复正常的生活，而且能使生活过

得比战前任何时候还要好。马歇尔计划所显示的卓越远见，美国国会愿意为此计划提供资金，美国商业界同意使它的竞争者得到恢复，所有这些因素，促使美国许多商业巨头响应哈里曼先生的号召，为马歇尔计划的各个领域效劳。其它方面还有大学的师生和各界人士，他们一起组成了一支有非凡才能、并充满热情的队伍。这支队伍感染了欧洲人。哈里曼先生的充沛精力，以及他不断为欧洲复兴所作的努力，同样给欧洲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对哈里曼先生的爱戴和崇敬的心情至今仍然不可磨灭地铭刻在他们的记忆之中。我陪同哈里曼先生来往于欧洲各国：到过葡萄牙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我们走遍了整个西欧。我们也多次回到美国去见杜鲁门总统，或者在国会作证。

俗话说：熟则生厌，但这种说法经常是错误的。我在哈里曼先生身边工作时，更增加了我对他的敬仰。我佩服他在波哥大以及其后在德黑兰所表现出来的胆略，佩服他始终一贯的充沛精力和献身精神。他是一个十分富裕的人，他无须这样操劳就可以坐享他财富的收益。但是，他把自己年富力强的黄金时代几乎全部献给了他的祖国和人类的自由。

有象艾夫里尔·哈里曼这样的社会公仆为之服务的国家是一个幸运的国家。

这是我一生中特别有收获和有意义的阶段，因为它为我在政治、财政、经济和劳工方面打开了一个完全新的境界，这些方面是我以前没有接触过的。我从事于“马歇尔计划”这段经历，对我以后若干年的工作有极大的好处。它使我能够在不同场合做出需要我做出的判断。欧洲明显地获得复兴就是一个极大的收获。博尼斯蒂尔上校已晋升到更高的职位，去伦敦就任。经哈里曼先生的提名，我被任命为无任所武官，这时我已经是一个陆军少校了，并且，我相信，在武官的等级中，唯有我这个少校是个武官，而不是副武官。到一九五〇年夏天，我发现这种工作更加令人神往。真没有想到，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我一生中很有收获，很受教育的时期即将结束，而且数周后我又将开始执行一系列性质完全不同的新使命：陪同哈里曼先生到朝鲜和陪同杜鲁门总统到威克岛。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凌晨北朝鲜的进攻，标志着我执行“马歇尔计划”的结束和随后一些使命的开始。

二、随同杜鲁门总统去威克岛

——杜鲁门和麦克阿瑟的会晤

一九五〇年。麦克阿瑟的部队正全线向北朝鲜同中国和苏联的边界推进。美国政府感到有点不安，它担心麦克阿瑟会扩大战争。麦克阿瑟的态度和他的公开讲话使杜鲁门总统感到困惑。总统要求与麦克阿瑟磋商。麦克阿瑟明确表示，战争正处于关键时刻，他无暇飞往华盛顿。杜鲁门总统同意到离华盛顿几千英里的中太平洋的小岛威克岛同他会晤。艾弗里尔·哈里曼作为杜鲁门先生的特别助理将参加这次会晤，他决定让我随同前往。我的任务是帮助国务秘书维尼斯·安德森和奥马尔·布莱德雷将军的助手威利斯·马修斯等人，和他们一起为这次历史性的会晤作记录。

后来这些记录在华盛顿泄露了。麦克阿瑟宣称他本人对作记录一事毫无所知。布莱德雷将军在国会承担了全部责任。就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下，开始了我在这次至关重要的会晤中的使命。

十月初，哈里曼先生向我暗示，杜鲁门先生非常想跟麦克阿瑟将军晤谈。哈里曼先生表示他将随同前往，并让我作为他的助手一起去。

十月十三日我们乘一架军用专机启程飞往威克岛。我们先飞到旧金山。哈里曼先生的随行人员中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莱德雷将军，菲利普·杰塞普大使，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以及布莱德雷将军的两位助理马修斯将军和汉布伦将军。

我们在旧金山停下加油，然后飞往夏威夷，大家都在珍珠港的海军基地下榻。我还记得当走进给我安排的房间时，我心里一阵激动，因为床上放着一件碧绿色的夏威夷花运动衫，卡片上写着：“沃尔特斯少校惠存——杜鲁门总统赠。”自从我随同马歇尔将军在里约热内卢那次工作以来，我一直不喜欢穿花哨的衣服，但我却情不自禁地立刻把这件碧绿色的运动衫穿上了。至今我还保存着它。

我们在珍珠港过了一夜，看望了医院里的伤员，第二天清晨乘“星座号”飞机去威克岛。美国驻太平洋部队总司令阿瑟·雷德福上将陪同总统前往威克岛。乘螺旋桨飞机去威克岛需要很长时间，我们飞行了整整一个晚上。清晨，我走进驾驶舱，惊喜地在雷达上看到了那个岛屿。雷达屏上出现了该岛的地形轮廓，我可以清楚地辨认出岛中央的礁湖。我们正好在黎明前降落。当我们走下飞机时，天还没有大亮。使我感到惊讶的是，虽然我们身在热带，天气却很凉爽。

哈里曼先生向四周环顾了一下，问道：“麦克阿瑟将军在哪里？”有人指着离我们不远的一个地方答道：“他坐在那辆吉普车里。”我对麦克阿瑟将军没有到飞机前来迎接感到有点吃惊，因为飞机上坐着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莱德雷将军。根据我的了解，不管军衔如何，陆军部长是美国全体军人的上级。我们走到麦克阿瑟将军坐着的地方，佩斯先生和哈里曼先生跟他谈了很久，我则站在离他们较远的地方，听候下一步的安排。不久宣布了杜鲁门先生的飞机即将到达。有关麦克阿瑟将军让杜鲁门先生的飞机在威克岛等候的谣传纯属无稽之谈。麦克阿瑟将军在杜鲁门总统抵达威克岛前的一个晚上就到了那里，并在岛上过了夜。天刚放亮，总统的飞机着陆了。飞机滑行到离麦克阿瑟将军很近的地方停了下来。我们这些站在麦克阿瑟将军身旁的人向飞机走去，那时总统马上就要出来了。舷梯升了上去，机舱打开了，杜鲁门出现在舱门口，挥动着帽子。这时，两个航空警察走下舷梯，分别站到舷梯底端的两侧。

然后，杜鲁门先生慢慢走下舷梯。这时，麦克阿瑟将军才走下吉普车，向总统迎去。我有些惊奇地注意到，麦克阿瑟将军没有向杜鲁门总统行礼。美国宪法明文规定，总统是武装部队总司令。不管麦克阿瑟将军的政治信仰如何，象他那样老资格的军人竟然不向美国总统行礼，在我看来是令人奇怪的。

杜鲁门先生注意到麦克阿瑟没有行礼，但显得若无其事。他跟麦克阿瑟握了握手，后者把美国驻朝鲜大使约翰·莫西欧介绍给他。杜鲁门先生和麦克阿瑟将军同乘一辆汽车向一座孤零零的房子驶去。”他们单独在那里呆了约一个小时。这次会面所发生的情况只有杜鲁门总统和麦克阿瑟将军清

楚。我从未听到杜鲁门先生提起过那次谈话，也从未看到过那次谈话的备忘录。在他们谈话时，我们其余的人都被带到一间棚屋里，这个棚屋已经布置成为会议室了。中央搁着一张大桌子，桌子四周放着椅子。靠墙的地方也摆着几把椅子，是为象我这样级别较低的人员准备的。棚屋的一头有一条窄小的过道可通向另一个房间。杰塞普先生的秘书维尼斯·安德森坐在那里作必要的会议记录。不久，杜鲁门总统和麦克阿瑟将军出现了，两个人显得很亲密。杜鲁门先生走到桌子一头，指着他右边的那张椅子对麦克阿瑟将军说：“您坐在这儿。”接着，杜鲁门先生让他的随从人员坐到桌子四周的椅子上。我是级别较低的成员，因此坐到离桌子较远的、靠墙的一张椅子上。但是棚屋很小，我清楚地听到了会议过程中的所有发言。会议即将开始之前，我问杜鲁门先生是否可以让我在会议室拍一些电影。他笑了笑说可以，他不反对。

据我所知，那些是在那个棚屋的现场拍下来的仅有的照片。

接着，会议开始了。首先由麦克阿瑟将军简单地汇报了朝鲜的形势。他汇报时十分乐观，最后说：“历史上没有一个指挥官能象我这样得到政府如此巨大的支持。我想告诉你，总统先生，对此我是十分感激的。”杜鲁门先生谦逊地点了点头。然后提问开始了。他对麦克阿瑟将军说：“将军，根据我们得到的一切情报，中国共产党人即将介入这场战争。我想听一听你对这件事的看法。”麦克阿瑟将军依然慢条斯理、有声有色地回答说：“总统先生，他们是不会介入战争的。这是我们示强而不是示弱的时刻。我们再也不能卑躬屈膝了。如果中国共产党人越过鸭绿江，我将对他们进行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屠杀。”他接着说，中国共产党人得不到空中支援；而缺少空中支援，部队就难以打仗。他指出，即便我方也只有海军陆战队才拥有就近为地面部队提供的空中支援，他认为这种支援对战斗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既然中国人不能为他们的部队提供这种支援，他们在我们的空军面前就会束手无策。他最后说，这场战争无论如何要在感恩节前就可以结束。圣诞节时他将把一、两个师调回美国，在新的一年里再把一、两个师派往欧洲的北约。他说话时显得非常自信，很有把握，这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会议过程中发生了一件很说明问题的事。麦克阿瑟将军拿出他的烟斗，装上烟丝，把烟斗叼在嘴里，取出一盒火柴。当他准备划燃火柴的时候，停了下来，转过头来看着杜鲁门总统，犹豫地问道：“我抽烟，你不会介意吧？”这其实不是真心征求意见。麦克阿瑟已做好抽烟的准备，如果杜鲁门说他介意，那就会使总统显得粗鲁、霸道。杜鲁门先生狠狠地盯了他一眼说：“抽吧，将军。别人喷到我脸上的烟雾要比喷在任何一个美国人脸上的烟雾都多。”

后来他们还讨论了军队撤离朝鲜的时间表。麦克阿瑟将军百分之百地相信战争将在圣诞节前结束。维尼斯·安德森在房间的一头作记录，我自己也作了一些笔记，布莱德雷将军的助手马修斯将军也做了笔记。这些材料后来汇集成为这次会议的记录，以后被泄露到报界去了。对于麦克阿瑟将军当时是否知道有人在作记录这一问题有许多指控和反指控。我亲眼看到维尼斯·安德森作为这次会议的记录员被介绍给麦克阿瑟将军。这位将军也许不是说谎；当时他已年逾七旬，可能确实忘了会议一开始就有人做记录。当人们就泄露会议记录一事提出质询时，布莱德雷将军在国会勇敢地承担了全部责任。

会议结束时，杜鲁门先生表示他还有一、两件事情要处理。我们走出

屋子，来到强烈的阳光底下，一群新闻记者和摄影师把我们团团围住，拼命拍照。接着，杜鲁门先生开始把第三或第四枚橡树叶勋章 挂在麦克阿瑟将军的“ 优异服务勋章 ”上，以示再一次记功。他还给在汉城战斗中撤出该城时表现得十分勇敢的美国驻朝鲜大使约翰· 莫西欧授勋。我把这个场面拍成了彩色电影。于是，杜鲁门先生热情地同麦克阿瑟将军和在场的其他人员一一握手，登上飞机返回夏威夷。不久我们也跟着走了。麦克阿瑟将军对哈里曼先生显得特别亲切，说了许多赞扬的话，因为他在哈里曼先生前次访问时提出的增援部队的要求已经得到满足。我必须承认我为能去威克岛而感到幸运。那确实是一次巨人的会晤。那时我看不出他们两人后来如何会发生争执，但是尽管他们一直不和，他们在各自的工作领域里确实都是出类拔革的。

橡树叶勋章发给“ 优异服务勋章 ”获得者，每立功一次，发一枚，此勋章可与“ 优异服务勋章 ”同时佩戴，也可单独佩戴。——译者

我们飞口檀香山，在那里稍事停留后继续飞往旧金山。杜鲁门先生在那里发表了一次演说，然后返回白宫。两、三天后，一位华盛顿报业辛迪加的专栏作家发表了威克岛会议记录的颇为详细的摘录。那次记录一共只印了五份。哈里曼先生得到一份。这份记录装上信封存放在他的保险柜里，信封是密封的，上面写着“ 只有哈里曼先生或沃尔特斯少校才能拆封 ”。联邦调查局就这次泄露记录事件进行了调查。当该局调查人员来到哈里曼先生的办公室时，我们向他们出示了那个仍然密封着的信封。哈里曼先生收到它以后，从来就没有打开过。

在这段时间里，哈里曼先生一直在努力使我得到提升。那时我已经当了六年少校。

他终于成功了。他给我看了一封他刚从马歇尔将军那里收到的信，信上说：

亲爱的哈里曼，
我谨愉快地通知您，陆军部长弗兰克· 佩斯刚告诉我，沃尔特斯少校已被提升为中校。不知您是否知道，陆军的传统习惯是，把军衔标志泡在一杯烈性酒里，让新提升的军官将酒一饮而尽。既然沃尔特斯是个戒酒主义者，你们可以用牛奶或水代替。军衔标志即送上。

忠诚的，
乔治· 马歇尔

马歇尔将军在信的下端疾笔写道，“ 军衔标志即送上。我怀疑它是否能经得住烈性酒。” 我虽不是一个戒酒主义者，但我不喝威士忌和杜松子酒的，除非是在为国效劳的时候！我非常感激哈里曼先生把那封信给了我。直到今天，这封信还是我十分珍贵的纪念品之一。就这样，我当了中校，在以后的十年中我一直挂这个军衔。

这个时候我继续随哈里曼先生在白宫工作，因此有较多的机会见到和观察杜鲁门总统。这种机会使我深信，这个平凡的人已经成为名符其实的美国的伟大总统之一。他的淳朴无华、为人直率，令人难以忘怀。我记得有一次我听说白宫进行修缮，杜鲁门先生实际上住到了马路对面的布莱尔旅馆内的招待所里，还听说当他晚间离开白宫办公室回布莱尔旅馆时，他留下了以下指示：“ 从现在起到明天早晨，如果有事需要我处理，尽管叫我。但如果有些事根本不用我亲自处理，你们也叫我，那就天知道了。” 杜鲁门先生有

办法做到一旦离开办公室就毫无牵挂、自由自在，其实，没有人比他挑的担子更重。

我后来听说在决定对朝鲜战争进行干预的那次内阁会议上，在所有的内阁成员已经发言表示支持这种干预以后，杜鲁门总统说，他认为总有一天他将不得不站在上帝的宝座前，为所有由于他采取的行动而丧失生命的年青人负责，但他既已宣誓担任美国总统，他已无其它选择。他给人的印象是很深的，我能和他有这种接触是我一生的荣幸。

许多年以后，杜鲁门先生不当总统已经很久了，我到独立城去看他。我鼓起勇气向他提了一个长期以来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我对他说，“总统先，我能向您提一个轻率的问题吗？”他回答说，“沃尔特斯，不存在什么轻率的问题，只有轻率的回答，在这方面我倒是个专家。所以，你就请问吧。”然后我说，“总统先生，您到达威克岛后下飞机时，是否注意回回回”不等我问完，他就打断我说，“我是否注意到麦克阿瑟没有向美国总统行礼。你完全正确，我注意到了。”接着，他又用一种更温和、更镇静的声调说，“我当时感到遗憾，因为我知道那意味着我同他打交道将遇到麻烦。后来果然如此。我解除了他的职务，我早就应该这样做了。不管正确与否，他就是不了解如何治理美国。”

独立城在美国中部密苏里州，是杜鲁门的老家。

——译者

这是他们之间争执的症结。杜鲁门总统决心把那次战争限制在朝鲜半岛上，使它成为一次有限战争。麦克阿瑟将军则感到我们必须使北朝鲜人惨败，否则将来我们还会打其他这样的有限战争——后来的确如此。

在某种意义上说，两个人都是对的，但杜鲁门是总统，而麦克阿瑟却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个压倒一切的事实。当杜鲁门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时，许多人批评了他的做法，但是没有人对他运用总统的权力采取这个行动提出疑问。

两个人都是意志坚强，行事果断的人。这场冲突到最后，其中一个人势必下台，而在我们的制度下，这只能是麦克阿瑟。

三、陪同艾森豪威尔将军访问北约各国

——十字军重新唤起了希望

一九四八年四月四日，在华盛顿宪法街的礼堂内签署了关于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的同盟条约。早些时候西欧国家曾为组织起来建立共同防御作过努力，这个条约就是这种努力的结果。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和意大利成立了西方联盟总部，并委任蒙哥马利元帅为联盟的武装部队司令。正像大部分有见解的美国人一样，这些国家看得很清楚，如果没有美国参加，它们就没有足够力量保卫自己的安全。杜鲁门总统为他的外交政策争取到了两党莫大的支持，美国和加拿大决定参加西欧国家的共同防务。在它们与葡萄牙人、丹麦人和挪威人谈判之后，这些国家也参加了。

瑞典则选择了武装中立的道路。后来，希腊、土耳其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也同意加入这个组织。

苏联接管布拉格，希腊共产党游击队的军事压力以及苏联的其它威胁性行动，使这些国家深信，如果它们不团结一致，就会一个个地被吞噬掉。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原已答应提供经济上的援助，现在则决定为欧洲自由国家提供政治上的支持和经济上的援助。

这些自由国家在华盛顿，共同作出保证，认为一个成员国受到进攻等于所有成员国受到进攻。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正式成立日期是一九四九年四月四日。

——译者

一九四八年初，南斯拉夫和莫斯科之间发生了争吵，从而使南、斯拉夫人撤销了他们一直慷慨地向希腊共产党游击队提供的援助。希腊政府终于把游击队驱赶到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北约国家通过协商确定了这个联盟的主要的组织结构。最高机构将是政治理事会，每个成员国都将派一名大使参加这个理事会。军事机构将包括一个统一的司令部。这将成为人类历史上和平时最大的联盟。三十年以后它依然存在。有人说现在它已经失去作用，而且过时了。也许是这样，但是瓦解这个组织仍然是苏联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之一。如果苏联并不认为北约是他们实现计划的障碍，而且是个还在起作用的、难以克服的障碍的话，我怀疑他们是否还会浪费那么多精力来诋毁它。

联盟成员国同意把该组织的总部设在巴黎，并把政治理事会和军事司令部都设在法国首都附近。一九四八年为联合国大会召开会议临时修建的大楼可供政治理事会使用。

但在军事方面的工作却进展不大。

一九五〇年美国的参谋长们来到欧洲，向欧洲人提交联盟军事组织的计划草案。这些计划将代替西方联盟成国早些时候所制订的计划，当然将包括美国、加拿大以及后来在纽约条约上签字的其它国家。美国参谋长由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陆军将军奥马尔·布莱德雷率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一个庞大的军团的司令员，所向披靡，解放了西欧很大一片土地。他是仅次于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最孚众望的美国军人。他沉默寡言，谈吐温柔，但又刚毅、坚定。布莱德雷将军到达巴黎后，把我从哈里曼先生那里借过来，要我为美国参谋长们向欧洲军事当局陈述时作翻译。当时我正在执行马歇尔计划的哈里曼先生手下工作。欧洲国家的参谋长们喜欢美国的设想。由于南北朝鲜之间发生了战争，组织欧洲防务一事变得更加紧迫。

每次一开始讨论由谁出任司令的问题时，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想到艾森豪威尔将军。

对于绝大多数欧洲人来说，他的名字是与解放一词紧密相联的。由他出任军事组织的最高领导人，会使所有的人感到莫大的鼓舞。更重要的是，它将告诉苏联人，美国将认真履行它对保卫西欧所作出的承诺。艾森豪威尔将军那时是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他不大急于离开那个岗位。最后，他同意了杜鲁门总统的要求，出任第一任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的职务。一九五一年一月初，他决定访问北约各国首都，去会见这些国家的军政首脑。他将同他们商讨建立欧洲最高司令部的问题。

艾森豪威尔将军知道我能说几国语言。他请哈里曼先生安排让我参加这次出访。当时我正在白宫哈里曼先生手下工作。哈里曼先生欣然同意，因

为他知道，艾森豪威尔将军出访之后，我仍会回到他那里工作。艾森豪威尔将军挑选了一个精干的班子，其中包括一位有经验的外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第二。他是麦克阿瑟将军的侄子。

一九五一年一月六日，我们乘坐杜鲁门总统为艾森豪威尔将军准备的“星座号”军用专机离开华盛顿。飞机彻夜飞行，第二天上午到达巴黎附近的奥利机场。我们着陆时，法国国防部长朱尔·莫克和国防部参谋长阿尔方斯·朱安前来迎接。像大多数欧洲的非共产党人一样，他们看到艾森豪威尔将军时感到欣慰，热情地欢迎他。

尽管飞行了一整夜，艾森豪威尔将军立即投入了工作。我们同莫克和其他官员一起用了午餐。这位法国国防部长是社会党人，是一个坚定的反共人物。他的儿子在大战中被打死，因此他痛恨德国。他强烈反对德国参加任何西欧的防务。在这个问题上他几乎有点神经质。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原因，他也不愿意同佛朗哥的西班牙打任何交道。除了这点以外，他在其它方面能力很强，在工作中是有帮助的。艾森豪威尔将军在筹组联盟的最初几个月里同他会见过许多次。莫克先生的英文还过得去，但他感到说本国语言更方便些，因此通常都由我陪同艾森豪威尔将军参加这些会见。

到达巴黎后的那一天，我陪同艾森豪威尔将军去拜会勒内·普利文总理。他还拜访了外交部长罗贝尔·舒曼。舒曼是个极不寻常的人。他生于卢森堡，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德国军队中服役，现在是法国外长。他和德国的阿登纳、意大利的加斯贝利和比利时的斯巴克一样，是欧洲团结运动的伟大创始人之一。舒曼是一个禁欲主义者。他一生都致力于结束法国和德国之间长期的敌对状态。这种敌对状态在本世纪中曾经两次导致了可怕的毁灭性战争。

一月九日，艾森豪威尔将军拜见了樊尚·欧里奥尔总统。这位法国总统也是一个社会党人，说话时带着浓厚的法国南部口音。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架轻型飞机把他秘密地送出德国占领下的法国，随后他在伦敦与戴高乐会合。他是一个慈父般可亲的人，但他强烈地反对共产主义。那天上午我还陪同艾森豪威尔将军到枫丹白露访问了西欧总部。晚上未安将军来到我们下榻的拉斐尔饭店参加鸡尾酒会。他和艾森豪威尔十分亲密，他们是至交。

接着，艾森豪威尔将军飞往布鲁塞尔，受到了国防部长德格雷夫上校和国防部参谋长雅克·皮隆将军的欢迎。后者曾在艾森豪威尔的指挥下率领比利时军队为解放欧洲作过战，艾森豪威尔将军拜访负责国防的比利时官员时，都由我陪同前往，一切很顺利。

比利时人十分乐意帮助并支持这个新的北约司令部，并为此作了最大的努力。

第二天，也就是一月十日，艾森豪威尔将军飞往荷兰。由于所有的荷兰官员都能讲一口漂亮的英语，我就没有陪同他去拜会他们。等于休息了一天。像在比利时一样，这里事情进展得也很顺利。但是，国防部参谋长克罗尔斯将军和首相之间的关系似乎有点紧张。首相是一个和平主义者，还是一个反对军国主义的协会的会员。克罗尔斯告诉艾森豪威尔说，在促使首相批准荷兰武装部队最起码的军需上，他遇到很大困难。

随后几天是在丹麦和挪威度过的。在哥本哈根，丹麦国防部参谋长埃哈德·克维斯特加德海军上将将会见了艾森豪威尔将军。这位海军上将的儿子是美国部队中一名志愿兵，不久前在朝鲜战死。海军上将愿意给予协助，但

是丹麦很久以来一直是个和平主义国家。

一九四〇年德国入侵时它并没有进行有组织的抵抗。后来倒是有过一些英勇的抵抗，但是许多丹麦人认为，任何防御都是徒劳的。该国政府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了很大的帮助和合作。北欧国家都是传统的中立国，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丹麦和挪威都遭到入侵。瑞典选择了自己的道路。挪威和丹麦的情况有相似之处。但挪威顽强地抵抗了德国的侵略和占领。挪威人知道残酷的占领将意味着什么，因此他们保卫祖国的愿望比丹麦人更为强烈。王储奥拉夫设晚宴招待艾森豪威尔将军；国王哈康七世还接见了她。

我陪同他参加了上述两项活动。

一月十二日晚，我们在雪花纷飞中离开了奥斯陆。在加德莫恩机场，飞机驾驶舱的表面涂了一层甘油，以防冰冻。我们飞往伦敦后，英国人把艾森豪威尔当作一位高贵的老朋友来接待。他同艾德礼首相共进午餐。当英国人得到保证，他们将在联盟指挥机构中占有重要位置时，会谈就没有什么困难了。

艾森豪威尔在伦敦逗留期间发生了一件颇具讽刺意味的事。我们走出克拉里奇斯饭店时，碰到了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他头上戴着圆顶硬礼帽，看起来是个十足的英国绅士。艾森豪威尔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校长时曾授予尼赫鲁名誉学位。但是这位印度总理与艾森豪威尔会见时却显得十分紧张。苏联报纸当时正骂艾森豪威尔是战争贩子。

他们交谈的时候，尼赫鲁总是偷偷地四下张望，唯恐有人拍下他和艾森豪威尔在一起的照片。但是没有人拍照，他松了一口气。

我们从伦敦飞往里斯本，在那里我用上了葡萄牙语。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七日我陪同艾森豪威尔将军到圣本托宫拜会安东尼奥·萨拉查总理。我以前随同哈里曼先生执行马歇尔计划时曾见过萨拉查。他一下就认出了我，一边和我握手，一边问我的葡萄牙语是否还带着巴西口音。我承认还是那样，但答应争取在访问葡萄牙期间把它改掉。

萨拉查富于哲理性地谈到北欧和南欧国家之间的差别。他说，在美国、英国和斯堪的那维亚国家中，民主制度也许是行得通的，但这种制度在葡萄牙会变成无政府状态。

他回想起一九二六年他执政前夕葡萄牙全国的混乱局面。他清楚地看到苏联的威胁。他害怕苏联人支持他称之为海外省份的葡萄牙殖民地的独立运动。他预言说，苏联的战略将包括横跨西方国家海上交通线的非洲基地，这真是一个令人担忧的准确预言。这位葡萄牙领导人看来根本不像一个二十五年来惯于使用独裁权力的人。他举止文静，像个教授，说话细声细气。他从不穿制服，也不站在阳台上向群众发表高谈阔论的演说。当我们乘汽车离开时，艾森豪威尔将军沉思着萨拉查的怪僻性格，并说：“他是一个非凡的人。他的话我并不全都同意，但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我的巴西口音显然并没有影响双方的交谈。与这位葡萄牙总理会谈以后，我们发现这位葡萄牙的军界领导人乐于帮助。

接着，我们飞往意大利。意大利国防部长和国防部参谋长都到罗马机场迎接艾森豪威尔将军。当艾森豪威尔开始发表机场讲话时，我心不在焉地把讲话翻成了葡萄牙语，引得大家捧腹大笑。我很不好意思地改译成意大利语。一月十八日，我陪同艾森豪威尔将军拜访战后欧洲的最伟大人物之一——阿尔奇德·德·加斯贝利总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加斯贝利作为奥匈帝

国的议员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他曾经在哈布斯堡帝国中代表意大利少数派。他是一个具有远见并能用历史眼光观察问题的人，像他这样的领导人，意大利再也没有出现过。后来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也参加了会谈。加斯贝利回想起我以前曾陪同哈里曼先生拜访过他，他记得我当时佩戴一枚有皇冠图样的意大利勋章。这是国王翁伯托二世赐给我的。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奎里纳尔宫拜会了卢伊季·埃伊瑙迪总统。

然后，他与国防部长朗多尔福·帕奇纳迪一起吃午饭。意大利人对于他们能参加联盟，感到高兴，并非常乐意为联盟提供帮助。德·加斯贝利是欧洲团结和共同防御的强有力的支持者。

第二天上午，我们飞往卢森堡，这是联盟中最小的成员国。因为那里法语也很通行，所以我陪同艾森豪威尔将军拜访了女大公夏绿蒂、首相皮埃尔·杜邦和外交大臣约瑟夫·贝什。贝什担任外交大臣时间之长，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卢森堡武装部队的规模不大，这个美丽的小国根本不存在什么问题。

后来我们飞往德国。当我们乘坐吉普车在达姆施塔特附近沿着乡间公路行驶的时候，两个德国男孩兴奋地指着将军。停车后，我用德语问他们是否认识他。他们笑着说认识。

艾森豪威尔同我们在德国的许多指挥官讲过话，了解他们的看法。当时德国还不是一个完全的主权国家，仍然是一个被占领国。

次日，我们飞回巴黎。我陪同艾森豪威尔将军察看了几处可供建筑新司令部的地点。

最后他选中了位于罗康库尔的那一处。该处是属于法国总统的，欧里奥尔先生马上让了出来。艾森豪威尔将军继续同法国人磋商，并向他们转达了他访问各国时感到的良好的合作精神。一月二十四日下午，他在阿斯托里亚旅馆向他为数不多的工作人员讲了话。

在新的司令部大楼竣工前，这里是临时的司令部所在地。

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我们飞往冰岛的首都雷克雅未克。这是联盟中唯一没有武装部队的国家。我们在呼啸的暴风雪中在凯夫拉维克机场着陆。由于我对冰岛语一无所知，因此在将军同冰岛政府进行简短会谈期间，我一直留在飞机上。还有一位无拘无束、爱说俏皮话的年轻少校也同我们在一起，他发现那些穿风雪大衣的地勤人员中，大部分是美国人。随着夜幕的降临，风雪席卷机场。我想，要是再加上一群狼，这幅可怕的画面就完整无缺了。年轻的少校从开着的机舱门口向外望去，看见一个人正在保养飞机。他对那个人说：“嗨，伙计，你怎么被送到这鬼地方来？”那个人严肃地瞅着他，慢条斯理地说，“我生在这里，我是冰岛人。这儿可不是鬼地方。”我们把年轻少校拉进舱内，让他坐在那里，直到艾森豪威尔将军回来。随后我们向渥太华飞去。飞越格陵兰上空时，天气晴朗，巨大的冰帽的景色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我们在拉布拉多一个名叫熊肠的地方着陆。这个地名令人难忘。我们抵达渥太华时，受到加拿大高级官员的欢迎。

我们在劳里埃旅馆下榻。艾森豪威尔将军为了强调他职务的国际性质总不愿意在美国大使馆住。同加拿大人的会谈进行得十分顺利，他们了解艾森豪威尔，喜欢他，也信任他；

一月二十七日，艾森豪威尔将军结束了他旋风式的十三国之行程，回到纽约西点军校。

他将在那里度过周末，起草给杜鲁门总统的报告。我们在迷眼的暴风雪中在斯图尔特训练基地降落。当飞机倾斜飞行对准跑道时，我感到飞机在侧滑，并一闪念想到飞机将会撞毁。我的兄弟文森特当时正在地面上看着飞机，他后来告诉我，他也曾有同感。后来，驾驶员比尔·德雷珀拨正了飞机，使它安全降落。我在纽约辞别艾森豪威尔将军，回到华盛顿。每访问完一个地方，我就在飞机上向机上的两名准尉速记官详细口述我们的谈话内容。因此在旅行结束时我就没有积压的备忘录要写了。虽然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某些会谈不是由我翻译，但是只要我在场，我总是替他把谈话内容记录下来。

后来我又回到哈里曼先生手下工作，没有几天他就告诉我说，艾森豪威尔将军已请求杜鲁门总统委派我到巴黎欧洲最高司令部工作。我回到华盛顿才六个月，我很喜欢和哈里曼先生一起工作，也不急于离开他。但是哈里曼告诉我，杜鲁门总统曾对艾森豪威尔将军说，为了完成这项使命，他想要谁就可以得到谁。我自己是无法选择的，要嘛乖乖地跟着走，要嘛闹上一番，最后照样被拉走。第一种选择更合情理。哈里曼先生还发现，我在旅途中很爱玩桥牌。我和道格·麦克阿瑟为一方，对手是两位桥牌能手艾森豪威尔将军和格仑瑟将军。我和麦克阿瑟同他们对阵时打得不好，因而哈里曼先生给了我几本戈论写的关于桥牌的书，希望这些书对我有所帮助。后来两位将军再也不找我打桥牌了，显然他们感到我打桥牌的本领不能同我对语言的精通程度相比。

就这样，我为马歇尔计划工作后回国还不到半年，便又踏上了重返欧洲的征途，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新司令部去就职了。

二月二十二日，艾森豪威尔将军和夫人乘船去瑟堡，因为艾森豪威尔夫人一向不爱坐飞机。艾森豪威尔将军立即开始工作，着手筹建司令部和组织盟军的指挥机构。最重要的是，他把自己那种能感染人的热情和信心灌注到了欧洲最高司令部的每个工作人员身上。我多次陪同他拜访法国的军政要员。我还跟他一起去看过了法国政府提供给他的位于马恩拉科凯特村的房子。这个小村庄离罗康库尔的司令部不远。事情进展得很快，一九五一年四月二日，艾森豪威尔将军发布了关于建立欧洲最高司令部第一号命令。

艾森豪威尔将军为加速司令部大楼和附属的服务设施用房的建筑，几乎不间断地同法国人保持联系。他对军衔相同但国籍不同的军官所得薪金相差悬殊这一点很吃惊。这就是意味着他们的生活水准大不相同。在一个一体化的司令部里，这肯定会引起问题。

因此他说服法国人修建了大家知道的欧洲最高司令部村这一住宅区。这里的住房按军衔高低和家庭人口多少进行分配，房租比较便宜，这在某种程度上为消除薪金不均状况迈出了一大步，也使不同国籍的军官能够亲密无间地生活在一起，从而增进了友谊和了解。

我被分配在“各国军事代表执行官”办公室工作。在欧洲最高司令部工作的军官是以工作人员的身份，不是以国家或军种的代表身份出现的。代表国家或军种的有关工作由类似军事使团这种机构承担。各国军事代表们要解决与他们各自国家的特殊利益有关的问题时，通过我们办公室同最高司令接触。各国军事代表执行官是安东尼·德·比德尔上校。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在伦敦的各国流亡政府的大使。他的这段经历是非常宝贵的。他个人的巨大魅力为我们同各国代表打交道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我每天在那个部门工作，但不用说，当最高司令接见外国来访者需要我时，那就是我压倒

一切的首要任务。

艾森豪威尔将军认为，必须使盟国的全体人民都接受这样的思想，即需要集体防务，特别是需要北约的军事组织。这样一来，各成员国的来访者川流不息。不仅军政当局人士，而且民众团体、记者和各种协会都个别地或集体地来司令部了解情况，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这个联盟有好感。有一天，艾森豪威尔将军要我参加他为巴黎市议会议长、戴高乐将军的兄弟皮埃尔·戴高乐先生举行的午宴。戴高乐将军那时正领导法兰西人民联盟，极力反对法国当时的政府。

一九五一年四月，我飞往意大利北部去看望那里的部队，并为艾森豪威尔将军到乌迪内地区访问进行安排。由于意大利人认为当地的旅馆都不适合他住宿，因此决定让他住到弗罗利欧伯爵夫人的私人别墅里。大战期间，她丈夫的飞机在利比亚的托布鲁克上空被击落，他和意大利驻利比亚总督伊塔洛·巴尔波元帅一起阵亡。她拥有大量的地产，丈夫死后，她进波洛尼亚大学学习，取得了农业方面的学位。她很会经营土地。她的起居室里放着国王翁伯托二世（当时流亡在葡萄牙）和巴尔波元帅的照片。乌迪内的地方行政长官担心法西斯元帅的照片会使艾森豪威尔将军感到不快，也不知道将军对早在一九四六年就被废黜的国王的照片会有什么反应。伯爵夫人的态度很强硬，不愿拿走照片，并表示如果行政长官不愿意，他可以把艾森豪威尔将军安排到别处去住。由于该地区没有别的合适住处，最后还是伯爵夫人胜利了。艾森豪威尔将军进屋后不久，便注意到那些照片。在场的行政长官很紧张。艾森豪威尔将军对他的客人们谈起他同翁伯托国王的良好关系，还说，在巴尔波元帅率领意大利一个飞行中队横渡大西洋参加芝加哥一百周年成就展览会时，他被指派为巴尔波元帅的副官，当时他对元帅很有好感。这时，那位行政长官才松了一口气，伯爵夫人则得意地笑了。后来我随同艾森豪威尔将军去观看意大利阿尔卑斯部队的山地战演习。这次演习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炮火落在演习部队很近的地方，整个演习非常逼真。演习结束时，阿尔卑斯人把一顶插着一根长翎毛的阿尔卑斯帽送给艾森豪威尔。新闻界照了像，他们为能拍摄到这些照片感到高兴。

艾森豪威尔利用到各下属部队视察的间隙，不断在司令部接待大批来访者。与此同时，他继续进行筹建指挥机构的工作。为了解决某些政治问题，他需要竭力使出他能说会道的本领。选派指挥职务是特别棘手的问题。但将军没有因解决某个问题而招致怨仇。

他是一个搞政治外交和军事外交的大师。

中立国以极大的兴趣注视着北约司令部的建立。他们想知道美国是否真的为其欧洲盟国的防务承担义务。南斯拉夫派科·波波维奇将军来见艾森豪威尔。他能讲一口极好的法语，因此需要我在这次极为秘密的会晤中担任翻译。波波维奇离别时确信美国将实践诺言。瑞典也有一位类似的客人小心翼翼地来到这里。他会讲法语，我再次当了翻译。

他拜访最高司令后也放心回去了。

法国的一场政府危机使乔治·皮杜尔取代朱尔·莫克当上了国防部长。这位新部长在整个大战期间一直呆在被占领的法国，曾任全国抵抗委员会主席。莫克先生自称是一位不可知论者，他以谦和乐从的态度对待艾森豪威尔将军为强调精神准则的重要性所作出的努力。他似乎认为，艾森豪威尔将军正试图组织儿童十字军。皮杜尔则是一位虔诚的宗教徒，他能理解艾森豪威

尔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由于最高司令的许多会见都由我陪同，我常常要向他简单介绍他所要会见的人的情况。在同哈里曼先生一起工作的岁月里，我曾有机会见到艾森豪威尔后来会见的许多领导人。我最感兴趣的是艾森豪威尔在会晤这些领导人后对他们所作的评论。他是判断各种人物的行家。

他日复一日地接待一批批新闻界人士、北约成员国的议员、美国国会议员、群众和爱国团体。如果来访的团体人数多，他就举行冷餐会招待他们，在会场上走来走去，好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同他交谈。如果来访的团体不讲英语，我就设法呆在他身边。要把他的幽默感、信心和热情准确地翻译成其它语言往往是不太容易的。这些来访者中最令人难忘的也许要数温斯顿·丘吉尔了。他是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八日来的。他给我们讲了话，赞扬了北约组织和艾森豪威尔将军。他的话使我们深受感动。正如他所说的，继凯撒之后，象艾森豪威尔那样文武双全的非凡人物还不曾有过。有时，艾森豪威尔还会见来自非北约组织成员国的人和西班牙的记者以及南美洲的大使们，他要会见五大洲的人。在这种场合，我通常和他在一起。美国参众两院的许多议员在此期间也来了。许多议员想让艾森豪威尔参加一九五二年的总统竞选，另有一些议员则想把他排除在外，说他是欧洲不可缺少的人。议员们总是受到极大的尊重。我不禁要把这一点同最高副司令对待来访的英国议员的情形相比较。有一次我看见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象对待小学生那样来教训英国的议员。当他们想提问题时，他就命令他们站起来，通报姓名，然后再提问题。有位议员照办了，他报了姓名后，蒙哥马利便说，“啊，我记得你。你就是那位说我如果闭上大嘴就是件好事的人，现在你却想来听我的意见了。”

一九五二年一月，法国驻印度支那总司令兼高级专员让·德拉特尔·德塔西尼将军去世。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艾森豪威尔的领导下指挥过由十一个师组成的法国第一军。他是印度支那地区一位杰出的司令官。在他的独生子在印度支那被打死后不久，他便被癌症夺去了生命。德拉特尔得到国葬的待遇。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均被邀请参加扶灵，要伴随枢车步行数英里，从巴黎圣母院大教堂走到残老军人退休院的军事教堂。

拿破仑就安葬在那里。那天天气很冷，艾森豪威尔的不少顾问劝他不要去。他先听他们议论，几分钟后便打断他们的话说：“难道你们不认为这是我对一位老同志所能做的最起码的事情吗？”我在艾森豪威尔将军后面随着队列前进，与他保持一定的距离。天气极冷，寒风刺骨。艾森豪威尔伴随棺木步行，这给观看葬礼的数百万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达巴黎残老军人退休院墓地后，我到他身旁呆了一会儿。我问他：“将军，你还活着？”他笑了一下，回答说，“还活着，可只剩一口气了。”

有一次，我先行前往德国，去为他视察法国驻德部队作准备。一天清早，法国人告诉我，杜鲁门总统已经免除麦克阿瑟将军的职务。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自从我参加威克岛会晤后，我一直预感到可能发生这一情况。艾森豪威尔将军是从法兰克福前来视察阿尔及利亚第三步兵师的，我想他一定已经听到这个消息了，因而没有对他提起这件事。

我们观看了法国部队的进攻演习。休息时，随同他来的记者和摄影师围了上来。站在前面的一名摄影师把像机对准将军，然后说：“准备好了，向他提问吧。”后面的一名记者便问，“将军，杜鲁门总统已经以不服从领导为由撤了麦克阿瑟的职。您有何看法？”艾森豪威尔大吃一惊，他还不知道这个消息。记者抢了个镜头，那张照片在当年得了奖。

在我同他乘车回法国司令部的路上，他对我说，“你知道，当你穿军装的时候，你必须对自己有所约束。麦克阿瑟可能忘记了这一点。”当然我知道，他们之间深厚的友谊不会因此丧失，因为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菲律宾时，艾森豪威尔就在麦克阿瑟手下工作过。据传，麦克阿瑟那时曾说过，艾森豪威尔是他手下最好的办事员。艾森豪威尔曾经提到，他在麦克阿瑟手下学过业余演剧活动。

三月初，我随同艾森豪威尔将军前往希腊和土耳其，这两个国家当时都是刚加入北约组织。他在土耳其受到热情的接待。我们同土耳其人谈得很好，解决了由于土耳其不愿由意大利人当司令官以及由于对希腊人的疑虑而产生的微妙的指挥权问题，至少暂时是解决了。我们从安卡拉飞到伊斯坦布尔，在那里游览了几个小时的清真寺时，艾森豪威尔指着门框上的题词问是什么意思。一位年长的土耳其将军回答道，“题词说：‘你要祈求真主恩赐，自己先要作出努力’。”艾森豪威尔将军非常欣赏这条忠告。

我们接着飞往萨洛尼卡视察希腊第三军团，然后继续前往雅典。我陪同艾森豪威尔将军去希腊军事学院进午餐，他在那里向学员讲了话。当晚我们去皇宫参加国王保罗和王后弗雷德里卡举行的晚宴。晚宴前，国王保罗授予艾森豪威尔将军和他的参谋长格仑瑟将军高级希腊勋章。我坐在国王的叔父九十岁高龄的尼古拉斯亲王旁边。他嘟嘟囔囔地抱怨说：“真可笑，把勋章授给那些已经有了很多勋章的老将军们，他们应该把勋章授给象你这样的年青人嘛。”我对这种想法深以为然。

在回巴黎的路上，我们在意大利停了一下，去拜访国防部长帕查尔蒂。他坚持要由意大利的司令官指挥希腊和土耳其的部队，但希腊和土耳其都曾告诉过艾森豪威尔这是办不到的。在会谈中，艾森豪威尔好象突然误解了由我翻译的帕查尔蒂刚说过的某些话，他满脸通红并愤怒地拍着桌子。帕查尔蒂几次软弱无力地试图说明他误会了，但后来还是让了步，同意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希腊和土耳其的部队由美国司令官指挥。我极为沮丧，因为在帕查尔蒂看来，是我误译了他的话才使艾森豪威尔勃然大怒的。我想我作为一个语言学家的声誉在意大利算是彻底完蛋了。关于指挥权的问题得到解决后，我们回到那不勒斯机场，动身去巴黎。我正闷闷不乐地坐在前舱，艾森豪威尔将军走上前来拍拍我的肩膀说：“迪克，如果说有时我似乎误解了你的话，那是因为我借机发一顿脾气。”他笑了一下，接着说：“这是管用的”。这使我好受多了，但我仍然担心着我在意大利的声誉。

在这一期间，要求艾森豪威尔将军回美国争取当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压力越来越大，前来巴黎给他做工作的政客络绎不绝。起初他并不表态。在新罕布什尔州初选名单揭晓那一天，我已随他飞往德国。我想不起来是由于什么原因，在返回巴黎时，飞机上只有我们俩人。那天从早到晚，人们不断地把初选的部分结果、最后把全部结果报送给我。

我知道，从理论上讲他可能对初选结果不感兴趣。在口家的路上我终于对他说，“将军，你可能对此不感兴趣，但其他人却感兴趣。今天一整天，有人不断地把新罕布什尔州初选的消息报给我。现在我已得到最后的结果，就在这里。”他咧嘴一笑，看了看材料，然后对我说：“唉，对任何一个美国人来说，如果很多同胞对他感到满意，而他自己却不这样认为，那他就会被看作是个奇怪的家伙。”在初选中他没有参加竞选提名，竟然轻易地一举获胜。我个人从不怀疑他是会参加竞选的。一个人在人类活动的某一方面取得

非凡的成就时，通常希望在别的方面也取得成功。

他最后决定宣布他将回美国参加竞选。这个决定将在欧洲最高司令部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到了预定的那一天，大批记者从世界各地云集巴黎，等待艾克的公共关系办公室主任巴克·拉纳姆将军宣布将军的意向。这项宣布将由我翻译成法文，那是盟军的另一种官方语言。预定的宣布时间已到，拉纳姆将军却没有露面。其实他当时正在旁边的一间房子里急得满身大汗。他上完厕所后裤子的拉链拉不上了。时间越来越紧，只得作出紧急决定：让拉纳姆将军穿着裤子，把拉链遮布缝上。在几位上校的陪伴下，一位女秘书及时缝了几针。一场危机终于避免了。

在宣布参加竞选前的几个月里，我们不得不照顾大量的国会议员。有时候，他们为了占一些“小便宜”，却给我们带来十分严重的麻烦。一天晚上，我不得不帮助把一位喝得烂醉的议员护送回皇家蒙梭饭店去。另有一位议员告诉我，他在一家夜总会里丢失了钱包和护照，如果我能替他找回，他将不胜感激。我到了那家夜总会，他们告诉我，他是和一个年青女人一起离开那儿的。我几经周折，总算找到了那个女人。她承认他找过她，但不承认他留下了护照或钱包。我解释说，我对钱不大感兴趣，但很关心那个护照和钱包里的文件。我告诉她，我在巴黎警察局里有好朋友，并要她再去卧室找一找。

几分钟以后，她回来了，笑着说：“你知道吗，在那儿呢！”她把钱包和护照递给我。

我发现钱包里只有十元钱。那位议员这一夜的代价太昂贵了。他向我道了谢，但没有问我是如何找到的。另一位议员在旧货市场上买了一盏大型水晶吊灯，吩咐我把它弄回美国。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挂在我车篷顶架的钩子上，车开到奥利机场后，我偷偷地把它放进了议员们乘坐的“星座号”军用飞机。我把它挂在机舱顶的一个钩子上就走了。那位议员后来从美国写信来感谢我。他说我一定很想知道那盏吊灯是否已经安全运抵华盛顿。

它已经安全运到了。

艾森豪威尔在欧洲最高司令部任职期间，作过多次努力，想和戴高乐将军会面。戴高乐将军那时处于政府的反对派地位。他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支持是不冷不热的。很多人认为，如果能使他和艾森豪威尔将军会面，就可能把他争取过来。然而，安排这样的会见是困难的，因为艾森豪威尔是法国政府的客人，甚至住在法国政府提供的房子里。

戴高乐将军非常注意礼宾规格，他是不会到欧洲最高司令部来的。这个问题最后还是解决了，他们在颁发解放勋章的大厅共进了午餐。颁发解放勋章是戴高乐首创的。艾森豪威尔是得到这种勋章的唯一的外国人。七年以后，他们以各自国家总统的身份再次相见，我再次为他们担任翻译。

艾森豪威尔即将离任的消息使大家感到惋惜，只是在想到盟国在白宫将有一个好朋友时，才稍感宽慰。没有人怀疑他会当选。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一日，法国总统樊尚·欧里奥为艾森豪威尔将军举行正式告别午宴。我已无法记起他们谈了些什么，但我仍然记得酒菜味道极美。五月二十九日，欧洲最高司令部的军官们为他们的即将离任的统帅举行了一次场面感人的晚宴。三十日，艾森豪威尔将军向一位有丰富经验的、受人尊敬的军人——他的继任者马修·李奇微正式移交工作。当艾克离开他在马恩拉科凯特的别墅时，一个儿童合唱队高唱着《美好的往日》，在场的人无不热泪盈眶。

其他都已成为往事了。艾森豪威尔胜利地当选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欧洲最高司令部伟大的远征时代的结束。我为能在这段时间里与艾森豪威尔紧密相随而感到荣幸。

五、摩萨台与哈里曼的故事

——解决石油问题未成

在一九五一年，伊朗首相阿里·拉兹马拉被具有宗教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刺死之后，伊朗国王任命穆罕默德·摩萨台为首相，他是一个很有钱的大地主和伊朗民族主义者。

他年逾七十，可是他在伊朗的议会里堪称是出色的演员，常常能要哭就哭，要昏倒就昏倒。许多伊朗人认为，这足以表明他是感情丰富的和为人真实。伊朗的议会中的右翼和左翼议员联合在一起，拥戴这位容易激动而又脆弱的老人，于是他很快就开始勇敢地采取行动来对付英伊石油公司了。这家公司自一九一一年以来就控制了大部分伊朗的石油工业，包括钻探、生产，并在波斯湾沿岸的阿巴丹建有巨大的炼油厂。当时丘吉尔任英国海军大臣，他很明白石油将迅速取代煤作为军舰的燃料，并想为英国获取足够的石油供应，因而他鼓励英国对伊朗石油进行巨额投资。他选择的工具——英伊石油公司，成为石油世界最大的能源基地。尽管名字叫“英伊”，它还在别的地方开发石油，并在世界各地设有炼油和供销网。伊朗人认为英伊石油公司购买石油的价格是不公平的，而它获得的偌大赢利是不能容忍的，因而燃起了一股民族主义的热潮，而摩萨台正处在这个热潮的顶峰，他便着手进行英伊石油公司的国有化并取消该公司的租让权。他的一些动议使他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戴，而在英国人看来，这对他们的至为重大的利益是个致命的威胁，他们出售石油获取很大的好处。显然，伊朗人当时没有钱支付他们打算国有化的产业，况且他们并不真想这样干。他们只是觉得英伊石油公司已从投资中掠取过多的利润了。

当摩萨台向英国石油利益进攻时，反英情绪席卷伊朗，他们仍痛恨在二次大战中英苏联合占领伊朗和废黜现任国王的父亲。英国人与伊朗人双方的争论日益激烈，当伊朗人占领阿巴丹炼油厂时，英国人开始考虑用武力保卫他们的利益。他们驻在塞浦路斯的第十六伞兵队有可能在那个地区采取行动。英伊可能发生的冲突以及可能带来的后果，包括苏联在其边境上可能作出的反应，这种前景是很不妙的。美国对它这两个朋友之间的不可开交的吵闹感到很沮丧，杜鲁门总统吁请双方避免冲突，便指派解决纠纷的老手艾夫里尔·哈里曼特使作为调解人，看看能不能寻到使争吵双方都会接受的妥协的办法。

哈里曼先生过去是租借法案的促进者，曾任驻苏和驻英大使、商业部长、马歇尔计划驻欧负责人，具有丰富的经验、老练的外交手腕和胆略，由他来担任这一棘手的使命，人们认为是异常合适的。我曾在波哥大艰苦环境中与他一起工作过，后来在执行马歇尔计划过程中以及在华盛顿共事过。他

知道摩萨台曾在瑞士念过书，他的法文也是相当不错的，因而打算用法文与摩萨台谈判。他决定带我去完成这次使命。在杜鲁门的空军副官罗伯特·兰德里将军陪同下，哈里曼在赴伊朗的途中先在巴黎逗留一下。当时我被指派在设于法国首都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总部工作。我去会见摩萨台的使命就要开始了。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四日早晨，我在巴黎爱丽舍宫观礼台上观看法国国庆节的游行队伍。我在观礼台上的座位是作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最高司令的助手身份安排的，我对此甚为满意。这次游行令人难忘的原因有几个，但有一个至今记忆犹新。

规模巨大的游行的最后一项内容是直升飞机向共和国总统致敬。首先，许多步兵列队前进，接受检阅；接着一排排装甲车隆隆而过，然后是骑着马的共和国卫兵。高度机械化的部队往往在地面上留下某些痕迹。当直升飞机在离爱丽舍宫上空一百英尺的高度向下降落的时候，骄阳炙人。当飞机到达总统观礼台前时，它开始慢慢地着陆，它的水平旋翼喷射出一股小小的但是很浓的褐色烟雾，向总统和外交使团的观礼台扑来。我永远记得这样的情景：法国的总统使劲弯下腰去，紧紧握住他的荣誉军团的宽大的绶带，同时驱散他眼睛、鼻子和嘴前面的烟雾，因为这种突如其来的烟雾实在呛人。

游行结束后，我回到家里，我母亲告诉我，哈里曼先生来过电话，要我立刻回电找他。我在报纸上看到，他受杜鲁门总统的委托已启程赴伊朗，调解由于伊朗将英伊石油公司收归国有而引起的英伊争端。我就打电话给他，两人互相寒暄一番之后，他就说：“我们将于今晚九时动身。”我祝他一路顺风和解成功。对此，他立即回答说：“我说的‘我们’动身是包括你在内的。我已经跟艾森豪威尔将军谈过，他同意让你跟我一起去。摩萨台博士会讲法语，我要找一位翻译，以便直接与摩萨台谈判，所以你也得去伊朗。”我指出现在是星期六（七月十四日）下午，在巴黎的伊朗大使馆一般是休息的。

他认为要得到进入伊朗的签证是我的事而不是他的事。于是他问道：“在我来之前，你有没有去搞签证？”我回答说：“没有。”我认为如果我事先这样去办是有些僭越的。

他说：“好吧，不管怎样，别搞迟了，不要误了班机。我不想在这里等候了。”

我立刻打电话给我的老朋友艾格尼丝·施奈德，她多年来一直在美国驻法大使馆负责签证课的事务。她说，她去想想办法看。仅仅一刻钟之后，她口电话来说，她已经接洽好了，有一位伊朗使馆人员将为我们开馆，并给我一份签证。我得到签证后，即在晚上九点以前赶到机场。哈里曼先生又重复对我说，摩萨台会讲法语，有我在场，他可以同这位伊朗首相非常直捷了当地和秘密地谈。他说摩萨台一向喜欢严守秘密，对他自己的许多随从人员都不放心。

我会见了我们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兰德里将军，他是杜鲁门先生的空军副官，负责杜鲁门先生的安全；沃尔特·莱维，是一位杰出的无党派人士的石油专家；还有比尔·朗特里，是国务院的外交官和中东问题专家。后来他先后出任驻巴基斯坦和巴西的大使。

九时，我们从奥利机场起飞。飞机沿着罗纳山谷向南飞，躲过雷达荧光屏上所显示的一场可怕的暴风雨。我是第一次到伊朗去。飞机越过马赛后，

我睡熟了。

在进入早餐时，我醒了。我得知我们就快到巴格达了。我一跃而起，走到窗口边上，可是在二千英尺的高度，下面什么都看不清，眼前一片夏日炎炎的灼光。不久，我们在德黑兰上空盘旋，它的上面高高耸立着德马文德山的匀称的山峰，给人很深的印象。在一万八千英尺的高处，永远覆盖着皑皑白雪。在麦赫拉巴德机场，我们受到美国驻伊大使格雷迪博士、英国驻伊大使弗朗西斯·谢泼德男爵和伊朗高级官员的欢迎。我们首先驱车到国王的王宫去，在宾客簿上签名。我们又步行到对面国王母亲的王宫去，在另一本宾客簿上签名。

接着我们驱车到希姆兰去，它在德黑兰的郊区，树木茂密，但比首都高出一千英尺。

我们作为国王的客人，在国王的王宫之一查希勃·加兰尼宫里住了一个多月。这个宫殿的确象小说《天方夜谭》所描绘的宫殿一样。巨大的接待室四周的壁上镶满了一块块小镜子，给人以充满着珠光宝气的感觉。后来我发现，在许多波斯皇宫里都是这样装饰的。

国王的兄弟阿里·礼萨王子接见了我们。王子不会讲英语，但法语讲得很流利。

哈里曼先生和夫人下榻在巨大的接待室旁的一套房间里，而其余的人都各占一个大房间，门都是朝着接待室方向开的。那间接待室是那么巨大，我们的空旷的房间与之一比，那实在是相形见绌。事实上正如《新闻周刊》所描绘的那样。

当我们坐下来进午餐的时候，我想到人们事先告诉我的必须注意的事项，在波斯你应当吃什么或不吃什么。在我们飞机着落之前不久，在机舱里哈里曼先生召集我们全体开过会，告诉我们，他在过去多次访问德黑兰时，他的代表团成员由于对饮食不太注意自我克制，因而经常闹病，他还得服侍他们，把病治好。不管怎样，我们的第一餐最突出的是敞开地供应鱼子酱。因为我不爱吃鱼子酱，我只好盘子里随便拨一点做样子。

有人告诉我，伏特加酒有极好的杀菌功能，所以我一反常态，喝了大量的伏特加。老实说，我怀疑人们怎能把伏特加与纯酒精区别开来。这顿午餐至少吃了三个小时。王子走了，只留下了四十八个仆人来侍候我们。

哈里曼先生的夫人玛丽，是一路陪同他来的。她是一个杰出的女性，说话充满着幽默，很快就能编出一些娓娓动听的轶事趣闻。因为我观察了他们好几年，在我看来，艾夫里尔·哈里曼使她的生活有了目的性和尊严，而她则给她丈夫的生活带来了幽默和人情味儿。他们是极妙地相辅相成的，与他们相处是很有意思的。仅仅几天之后，哈里曼先生感染上了轻微的肠炎。哈里曼夫人很风趣地邀请我们到他们的房里去，重复了他丈夫几天前在飞机上说的话，她说：“你们瞧，现在到底是谁在德黑兰不能节制饮食，由于不自我克制而病倒了。”显然，他们是相亲相爱的。

在我们到达德黑兰时，就发现我们处在尴尬的境况中。美国大使格雷迪先生不太欢迎我们去伊朗。这是特使们常常遇到的问题。大多数大使认为他们是总统的名正言顺的代表，而所有与驻在国政府和政府首脑的交往都理应通过他们来进行。他们常怨恨总统企图不通过他们的渠道而执行外交政策。这个问题在我的经历中发生过好几次。在我被总统派去与政府首脑直接打交道的国家里，那儿有些大使使我感到很为难。

在第一次到德黑兰住宅区摩萨台博士家去拜会他的时候，我没有作任何准备。我从报纸上得知，他会突然哭泣，他在伊朗议会里曾有过戏剧性的矫柔做作的表演。摩萨台的性格是相当令人吃惊的。我与哈里曼先生一起到了他的朴质的住宅。稍稍等候了一会儿，我们被引到楼上摩萨台博士的卧室。他躺在床上，穿着一件骆驼毛的短上衣，扣子直扣到脖子上。他平躺在床上，双手就在脖子下交叉着；当我们走进房间时，他的双手轻微地拍打了几下。

他用法语向哈里曼先生致意，他说他很高兴会见他，他希望在整个会谈中，美国不要扮演充当英国的傀儡的角色。哈里曼先生向他保证，我们决不会这样，我们看到我们的两个好朋友之间的争吵感到很不安，我们迫切希望能尽一切努力谋求使双方都满意的解决争端的办法。

摩萨台博士身材矮小，瘦骨嶙峋，直到今天还不知道他究竟有多大年龄；我回想起来，当时他已有七十多岁了。他显得极其单薄和虚弱，而他曾充分地利用了这一点。事实上正是这样。有一个伊朗的医生，是个议会议员，他在与哈里曼先生的交谈中，回忆了他初次看到摩萨台博士在伊朗议会中戏剧性表演的经过。拉兹马拉将军在一所清真寺里被暗杀之后，摩萨台出任首相，他热情地向议会提出一项提案，希望议会通过。这位医生是反对派。摩萨台情绪激昂地呼吁大家通过他的提案，似乎要昏倒的样子，他泣不成声地表示他准备为他热爱的伊朗牺牲他的生命，他突然倒在地上。医生说，他的伪装的发誓改善了他的政治地位。医生当时跨过几条长椅，跪在首相身旁，解开他的领子，提起他的手腕，满以为会摸到一种虚弱、跳动不匀的脉搏，但事实上他摸到的是一个强壮、健康人的正常跳动着的脉搏。实际上，摩萨台博士可以活到九十岁以上。哈里曼就向医生说：“既然是这样，你怎么办呢？”医生回答说：“我太感动了，我对他的提案投了赞成票。”这仅仅是摩萨台博士巧妙地运用他外表的虚弱作为有力的武器的一个例子而已。

摩萨台博士处于极端反英的情绪中。他认为，从伊朗生活水平的降低，直到伊朗不再象历史上那样在世界上占有突出的地位，这一切都归咎于英国搞的阴谋诡计。他眼睛盯着哈里曼说：“你不知道他们是多么狡猾。你不知道他们是多么坏。你不知道他们怎样污辱了他们所接触到的每一件事。”哈里曼先生解释说，事实不是这样的，英国人与别国人一样，有些是好人，有些是坏人，而大多数人则处于中间状态。摩萨台又重复说：“你不了解他们。你不了解他们。”哈里曼先生有些恼火了，他说：“不，我的确了解他们。我曾经担任美国租借法案的代表面呆在英国。我也担任过驻英大使。我们曾经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并肩作战过，而你却没有参加过。我可以向你担保，他们有好有坏，而绝大多数居于两者之间。”摩萨台博士身子略略向前倾了一些，握住哈里曼先生的手，脸上显出愉快的笑容。

摩萨台长有一个很大的鼻子。我曾多次议论说，他的鼻子之大，足以使吉米·杜兰德的大鼻子看来相形见绌了。他非常友好，可是他的耳朵聋得厉害。在他躺在床上与哈里曼先生交谈的时候，我通常坐在哈里曼旁边，挨近他的聋耳朵。他会拍拍床脚，让我象佛教徒那样盘膝坐在那里为他们翻译。这就成为我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固定的座位。

摩萨台博士坐在床的一头；我坐在另一头；哈里曼先生坐在床旁、我们两人之间。

吉米·杜兰德 (Jimmy Durante, 1893—): 美国著名喜剧演员。

——译者

哈里曼先生试图向摩萨台说明关于石油问题的现实情况。摩萨台不能理解，为什么伊朗把英伊石油公司国有化之后，该公司年度报告中所显示的利润不能全数归他所有。

两件事搞明白了。第一，摩萨台不明白英伊石油公司的许多收入来自提炼，来自在许多国家的零售。看来他也不知道伊朗并不是石油公司原油的唯一来源。摩萨台认为，公司的名字的含义就说明伊朗是向该公司唯一提供原油的国家。哈里曼先生已把沃尔特·莱维带到伊朗，他是一个非常卓越的、洞察力很强、很有说服力的人。他是在希特勒开始统治德国时逃离德国的。他的父亲是犹太人，曾获得“普鲁士高级勋章”，这是德意志帝国授予在战争中英勇战斗者的最高军事奖章；凭这个勋章，可以免受纳粹的迫害。沃尔特不相信它会永远可靠，所以出走了。实际上这枚勋章确实保护了沃尔特一家，直到一九四三年他的父亲去世。他死后不久，全家就失踪了，他再也没有听到他们的消息。

沃尔特·莱维在摩萨台博士身旁坐了好几个小时，力图为他解释国际企业的复杂情况。他说明，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委内瑞拉和其他国家都出售石油，故而伊朗必须创造条件才能进行竞争。摩萨台终于被说服而理解到，如果许多石油公司联合起来对付他，那末伊朗的国有化是不会成功的。如果伊朗获得成功，那末，别的地区也会照此办理。

事实上，他的确有点怀疑了。他欣然承认，他曾想销售从英伊石油公司收归国有的石油，但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由于伊朗没有油船，他想租用油船，但他发现船主们不愿把油船出租给他。他觉得这是“七姐妹”或其他大石油公司施加压力的结果。这些公司也许由于要与英伊石油公司进行竞争，所以不想做出什么事情向石油生产国家表明，国有化是控制它们自己石油的最好解决办法。

哈里曼先生或沃尔特·莱维拿世界范围的石油生产和销售的现实情况日复一日地开导摩萨台博士。他们都没有对他的石油国有化的权利进行挑战，但他必须准备付出赔偿。

摩萨台对此立即表示拒绝，因为他觉得，与勘探和发展伊朗油田而负的债务相比，英伊石油公司多年来获得的利润要多得多。

此外，还有另一个复杂的因素：摩萨台之出任首相是他的前任阿里·拉兹马拉被暗杀的结果。当时伊朗有一批极端民族主义的狂热分子，他们对拉兹马拉的被杀是有责任的。摩萨台一再以谈知心话的口气提到“恐怖、恐怖、恐怖”的气氛，而他必须在这种气氛中活下去。

与摩萨台博士谈话总是很有趣的，但是有大量的重复。在我看来，他把列宁的名言“退一步，进两步”颠倒过来使用，他的进一步是为了要退两步。经过一天的讨论，哈里曼先生已把摩萨台带到了某一点。当第二天我们重新开始讨论的时候，摩萨台不但不在前一天我们结束讨论时的那个点上，甚至也不在前天我们开始讨论时的那个起点上。

他是在前两天讨论的中途的某一点上。我常常有这种印象，我们不是在前进，而是在后退。

有一天，摩萨台对一桶石油所要求的份额甚至比一桶石油的全部价格还要高，这就激怒了哈里曼先生，他对摩萨台说：“摩萨台博士，如果我们要理智地讨论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共同遵守一些基本原则。”摩萨台那双眼睛从大鼻子后面凝视着他，带点儿狡猾神情地说：“什么样的原则？”哈里

曼先生说：“例如，没有一件东西的局部比它的整体还要大。”这是指摩萨台希望得到一桶石油的利润的百分之一百以上。摩萨台博士瞧着他，用法文说：“那里面有弄虚作假的。”哈里曼先生不大讲法语，可是他明白这话的意思。他脸带疑惑的表情，问我道：“他是不是说有弄虚作假？”我回答说：“是的，他的确说这是弄虚作假。”哈里曼先生转向摩萨台说：“你所谓的‘弄虚作假’是什么意思？”摩萨台说：“好吧，拿狐狸来作比喻吧。他的尾巴往往比他的身子还要长。”说完，他把枕头蒙在他的头上，身子在床上滚来滚去，痉挛地笑了起来。哈里曼先生却有些扫兴。

有时，摩萨台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他的确想谋求一种解决石油问题的办法，协议已经在望。但下次谈话却清楚地表明，任何协议都是遥远的事。他似乎以此为乐。他好象把鱼吊在鱼钩上一样，拿人寻开心。

好些日子过去了，讨论又讨论，没有任何成果。我受命负责会谈记录，并起草发往华盛顿的电报，报告会谈的“进展情况”。有一天深夜，白天已经历了完全无效的谈判，我回到查希勃·加兰尼宫，写下了下面的记录：“今天，摩萨台博士和哈里曼先生双方以两小时的时间，重复了过去讲过的话。”摩萨台总是喜欢用他自己过去的经历作为有趣的插话，来使他的谈话更加生动地体现他的论点。他津津有味地告诉我们——表明他是如何机敏和灵巧，谁也无法以智取胜于他——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医生们劝告他需要做一次割除阑尾炎的手术。因此，他决定到俄国去做手术。他就与当时住在德黑兰的一个美国医生谈判，如果请医生陪同他到俄国南部的巴库去，需要多少报酬。那位美国医生提出了一个价钱，这在摩萨台看来是太昂贵了，没有成交。摩萨台发现这个美国医生本来自己也要到巴库去，所以他设法比医生早两三天动身上路。每到一个换马的驿站，他就作了有把握的安排，使后来的美国医生不能换得好马，因而超不过摩萨台。一连两个晚上，美国医生总是很迟才赶到旅馆，而发现摩萨台已经住在那里了。

到了第三天，医生对摩萨台说：“摩萨台博士，我知道你的任务是什么。我能不能跟你结伴同行啊？这不需要你付任何代价。”摩萨台讲完这个故事，就倒在床上，神经质地狂笑起来。他对他自己的精明狡猾感到非常骄傲，他的机智超过了美国医生，他使医生在整个旅程中陪伴他而不付分文。这件事使他深信，如果一方持久地进行讨价还价，能促使另一方疲惫不堪以致投降。这就是我们与他打交道时遇到困难的原因之一。

一次又一次，每当沃尔特·莱维或哈里曼先生指出，倘使他那方面采取某种措施或不能采取某种措施，那末会给伊朗带来不幸的后果时，摩萨台便会耸耸肩膀，简单地用法语说：“Taut pis'our nons”。对此，我用英文把大意译出来：“那末，我们一起进地狱吧。让我们同归于尽吧。”有时哈里曼力图使他弄明白，倘若对这一问题找不到某种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将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摩萨台便泪水盈眶，眼泪慢慢地从面颊上淌下来，他说：“是的，我将马上支付不了武装部队和警察的薪金。如果发生这样的事，他们再也不会来保护我们了。”接着，他压低他的嗓子悄悄地说：“左面的那个党（他甚至说不清“杜德党”就是伊朗共产党）会夺取政权，他们会消灭我们同西方的一切友谊。”已经多次听到他这类话的哈里曼先生对他说：“可是摩萨台博士，你得明白，他们首先要消灭的一批人中就有你。”“是的，”摩萨台说，接着狂笑起来：“可是，当他们夺取政权时，也会使你们的货车动弹不得。”

他总是摆脱不了这种观点：伊朗对它自己的重大困难没有责任。有一天他用这样的话来开始谈话：“伊朗的各种问题总是外国人造成的。这笔账得从希腊的亚力山大算起。”他指的是亚力山大焚毁波斯波利斯事件；虽然这是二千四百年前发生的事，但是他描绘得有声有色，好象这是刚才发生的事。他是一个非常讲究礼貌的人，从来不说粗话。他总是以彬彬有礼、字斟句酌甚至是十九世纪的方式进行谈话，但是很容易激动。当我们谈到美国给伊朗的军事援助时，他轻声轻气地说：“可是别使他们太强大了，他们会推翻我的。”另一天，当哈里曼先生走进他的卧室时，摩萨台目光炯炯地瞧着他，双手上下挥舞几下，颇为慎重其事地说：“啊，我今天情况不好。早晨我昏厥了三次。”

这次谈判确实与我所经历过的任何谈判不一样。摩萨台博士有一种顽固而强烈的反英情绪。在经过几周谈判之后，哈里曼先生试图使谈判更加具有私人交往的性质，就问他有没有孙子孙女。几分钟之前，摩萨台还自言自语地谈到英国人的恶行。摩萨台说，他只有一个孙子，他象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爱他。哈里曼先生说：“可是我好象没有见过你的孙子。”摩萨台说：“没有，他出国去念书了。”哈里曼说：“噢，他在哪里念书？”摩萨台发出了大声的痴笑，回答说：“当然在英国罗。为什么到别处去呢？”这就是这个人在性格上的典型的矛盾之处。然而，他自己也的确发觉他的回答是可笑的。

有一次，他为了向我们炫耀一下他的机灵，告诉我们他是怎样在瑞士获得一张摩托车驾驶执照的。当他向我们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脑子总在捉摸，摩萨台博士驾驶摩托车的景象。当时他在瑞士纳沙特尔大学念书，他去接受驾驶测验。检查员并不与他一起驾驶出去。他要摩萨台驾驶到湖边，然后转回来。摩萨台对我们说，他把车开向了湖边，但他不知道煞车。当他到达湖岸一带，那里有个露天市场，他闯进了一个由一位瑞士老妇人摆设的水果摊，把摊子撞了个底朝天。那老妇人朝着他骂道：“猪猡！猪猡！”摩萨台向我们瞟了一眼说：“你能想象这对我意味着什么？一个穆斯林竟被人叫做猪。”他接着生动地说：“我付钱赔偿她的损失，这期间，我的摩托车一直躺在水果摊旁边发出刺耳的声音。最后，我把它扶起来，整顿一下，骑上去，慢慢地驶向小山。当我见到检查员时，他说：‘摩萨台先生，你去了这么久。你该是非常小心地在驾驶吧。我祝贺你。这是你的驾驶执照。’”所有这类故事使摩萨台形成他对西方的概念，并且使他深信，要是一个人能长期坚持或装聋作哑，他几乎可以获得一切东西。当然，这种态度导致整个问题老是得不到解决。

在谈判进行的同时，摩萨台的一个心腹、铁道部大臣呆在我们的宫中。我们经常一起进餐，因而他把摩萨台的话转达给我们，或评论摩萨台对谈判的感想，等等。大使的妻子卢克丽霞·格雷迪夫人是一个活泼愉快的人，但是很喜欢用特殊的言词来表达她的意思。有一次，她对首相说：“摩萨台博士，你的脸非常富有表情。每当你什么都不想的时候，我可以从你发呆的眼神中看出来。”我必须承认，我改变了她的话说：“摩萨台博士，你的脸非常富有表情。每当你进行深思的时候，我可以从你脸上的聚精会神中看出来。”幸亏当时没有人抓住我在翻译中改变了原意。又一次，她会见了铁道大臣，告诉他在美国使馆里发现一只很大的老鼠，几乎把女管家的婴儿给吃了，所以他们组织了一次老鼠大围剿。她对他说：“现在，布什里博士，倘使你要到这里来，你必须事先通知我们，这样就没有人向你射击了。”布什里博士

懂一点英语，他肯定她的话里有把他误认为老鼠的意思。幸而他不太相信这话。我记不起当时我用了什么特殊绕弯的翻译，使那紧张的局面平息下去。

在我们谈判的过程中，哈里曼先生曾一度飞回伦敦，去催促英国政府派遣一个谈判的全权代表去跟摩萨合谈判。英国驻伊朗大使弗朗西斯·谢泼德男爵原先在印度尼西亚工作，他谈起与工党外交大臣厄尼·贝文议论过，他在那里处境困难。于是贝文对他说：“弗朗西斯，你在印度尼西亚遇到了麻烦。我们打算把你派到一个新的岗位上去，那里的居民从来没有找过我们的麻烦，那就是伊朗。”我不认为弗朗西斯·谢泼德男爵完全了解伊朗发生了什么情况，但他是个非常勇敢的人。在反英运动达到高潮的时候，他还常常乘着罗尔斯-罗伊斯轿车，在德黑兰大街上奔驰，车上飘扬着一面大大的英国国旗。

任何暴力恐怖或别的什么，都不能吓退他。

哈里曼先生敏锐地觉察到极端民族主义者和狂热分子给予摩萨台的沉重的压力。他觉得专程去拜访一下那位毛拉（或宗教领袖）阿亚图拉加沙尼，也许能打开僵局。有人对他说，这不会有好处，因为加沙尼本人就是个狂热分子，跟他进行任何会谈都不能获得有益的效果。然而，哈里曼先生坚持要会见加沙尼毛拉。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安排了一次会见。

加沙尼毛拉住在古拉克区，位于德黑兰市区与我们王官所在地希姆莱区之间。直到我们去拜访他之前，我在伊朗看到的大部分东西，使我吃惊地觉得比我想象中的要西方化得多，但当我们的到了毛拉的家里，我才找到了一个在我看来是十足东方色彩的地方。

毛拉头缠头巾，留着一部大胡子。我们被带进一间帷幔重重的屋子，我能看到帷幔后面不断有人在活动。

哈里曼先生试图与这位毛拉讨论有关问题。那毛拉一再说他不了解英国人，反正他们是世界上最坏的人。哈里曼略带试探性地说他了解英国人。他在英国当过大使，与英国人相处了好多年，并与他们在两次大战中并肩作战过，比伊朗要熟悉得多。毛拉看来极端狡黠，他一面抚摸着大胡子，一面问哈里曼先生：“哈里曼先生，你有没有听说过恩布里少校这个人？”哈里曼先生摇摇头说：“没有，我从来没有听到过。”毛拉说：“那我告诉你，他是美国人，他在一九一一年或一九一二年来到伊朗。他插手到石油事务中去，而这并不是他的事情，这便引起了人民的憎恨。有一天，他走在德黑兰街上，被人枪击中弹，倒在街上，但他没有死。人们把他送进医院。愤怒的群众跟踪闯进了医院，就在手术台上把他宰了。”毛拉双目盯着哈里曼先生问道：“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哈里曼先生的嘴唇绷得紧紧的，我知道他发火了。他用非常强硬的口气回答说：“阁下，你必须搞清楚，在我一生中，遇到过许多危险的局面，我可不是容易被吓倒的。”“好吧，”毛拉耸耸肩说：“那就不妨走着瞧吧。”谈话毫无结果。毛拉保持着僵硬的态度。

他咒骂摩萨台亲英，他恶意地预言道：“如果库萨台屈服，他的血将与拉兹马拉一样流出来。”这时我们完全了解到，这个毛拉是参与杀害拉兹马拉的，这同样威胁着摩萨台博士的生命。我们可以肯定，如果他威胁了我们，他会把这件事转告摩萨台的。这也是迫使那位老人不愿意跟我们达成任何协议的因素之一。

在哈里曼先生的请求下，英国政府派遣了一个谈判代表，他是工党的大财主，名叫理查德·斯托克斯。他是一个出色的人物。他后来也承认摩萨

台一些主张的合理性。斯托克斯带了一位翻译，但当摩萨台发觉他在袖口上作记录时，就拒绝再次会见他了。因此我被迫担任哈里曼和斯托克斯两人的翻译任务。这件事使我看到了摩萨台博士的另一面。

在讨论到某一论点时，摩萨台对斯托克斯说：“我们不能达成协议的原因是因为你是天主教徒。”斯托克斯说：“我看不出这与石油事务有什么联系。”摩萨台说：“你瞧，根据你们的教义，你们是不准离婚的，而根据我们的教义，我们只消对妻子说三遍‘我要与你离婚’，她就被离掉了。你所不了解的就是我们已与英伊石油公司离婚了。”斯托克斯说：“是的，是的，但你得记住，摩萨台博士，即使你跟她离了婚，你仍得支付她赡养费直到她再结婚，而英伊石油公司还没有再婚啊。”摩萨台把他紧紧地搂在怀里说：“如果所有的英国人都象你这样，我们的谈判就不会有困难了。”当时还有一个有趣的侧面情况是，英国叫我不要把与伊朗人进行的情况告诉美国人；而美国人则叫我不要把美、伊之间的会谈告诉斯托克斯。

这些会谈进行了两个多月。我曾多次与哈里曼先生一起去谒见国王。一九五一年国王与今天的国王判若两人。当时他很年轻，没有经验，对摩萨台之得人心印象很深刻，担心摩萨台不忠于王朝，并可能一有机会便宣布伊朗为共和国。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想法是正确的。我记得在我们抵达德黑兰的傍晚，我们是在美国大使馆进的晚餐。当时内务大臣法佐拉·查希迪将军在场。我们在花园里进餐，当时外面的枪声清晰可闻。后来我们知道，原来发生了一起暴乱，死伤了十三个人。摩萨台要求并接受了查希迪将军的辞职。这是一个错误。后来摩萨台废黜国王之后，查希迪将军在使国王复辟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查希迪的儿子阿台秀·查希迪多次担任伊朗驻美大使。

星期五是穆斯林的安息日，摩萨台博士就不与哈里曼先生会谈了。在这样的日子里，哈里曼先生通常要出门，他乘他的星座十号飞机到一个风景区去，诸如大不里士、迈谢德、设拉子或伊斯法罕。德黑兰的气温徘徊在华氏一百二十度左右。我们住的宫里没有空气调节设备，连电扇也没有。幸而晚上比较凉爽。我记得，我们乘飞机离开德黑兰去旅游时，我们的飞机飞得很高很高，关闭了飞机上的暖气。我们都用毯子裹着身子来享受一下寒冷的滋味。我们中间有一个人半开玩笑地问哈里曼先生：“我们这样每星期五乘飞机出来，每小时烧掉八百加仑汽油，你是否感到内疚？”平时不喜欢提到他的财富的哈里曼先生，冷冷地瞧着他说：“你如果看到我这几年上交的所得税，你就会知道我已经为美国政府购买了成批这样的飞机了。”

旅游是非常有趣的，人们都欢迎有这样的机会去看看伊朗的其他地方，并且可以离开德黑兰那儿显然很紧张的政治气氛。

几乎两个月过去了，我们肯定摩萨台就是不想达成任何协议，因为他觉得民族主义者不能同意他这样做。因此，哈里曼先生不得不通知他我们将返回美国，希望这不是我们之间讨论的结束，我们是伊朗的朋友。我们的确希望有助于伊朗。我们对伊朗实行国有化的权利决不阻挠，但是我们确实认为伊朗应作一些补偿。摩萨台博士激动地谈到阿巴丹炼油工人可怜的景况。哈里曼先生问摩萨台博士，他有没有到过阿巴丹，摩萨台大笑起来，说“没有”，但他从报纸上看到了这些消息。

在我们逗留伊朗期间，我们到过阿巴丹，那里气候之热使我大为吃惊。早晨七时的温度接近华氏一百二十五度。我们的汽车从阿巴丹开往省会霍拉姆沙赫尔。伊朗的水手在路旁排着长队，使我奇怪的是，我们在几小时后口

来的时候，他们还站在那里。我不能理解，在那样强烈的阳光下，竟然有人能在路边站上几个小时。阿巴丹炼油厂规模很大，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那时因为负责工厂运转的英国工程师们都走掉了，几个伊朗的工程师只能使这巨大的综合工程的一小部分运转，所以开工不足。况且，正如摩萨台说得很清楚的，提炼出来的油还有个销售市场问题，因为其他石油公司拒绝买他的油。

最后，我们走了。摩萨台送给我们大批礼物。我得到五磅鱼子酱。我向来不爱吃鱼子酱，可是我在巴黎分送给谁还得斟酌一下。我们飞到巴黎，哈里曼先生显然由于没有完成使命而感到不快。在飞返的途中，他作了一个有趣的声明。他说：“我是很少失败的。”摩萨台和伊朗是一个少见的挫折。

哈里曼把我留在巴黎。在他飞返华盛顿的途中，他写信给艾森豪威尔将军，感谢他派我去执行任务。我很高兴，因为他申明，谈判的失败与我毫无关系！

我向艾森豪威尔将军谈了许多关于在伊朗与摩萨台谈判的事情。我想，我们的谈话可能对他后来出任总统决定美国的伊朗政策时是有一些影响的。

摩萨台的故事到此尚未结束。不久后，英国在海牙国际法庭控告摩萨台博士。我接到指示，要我到海牙去找摩萨台谈谈，弄清楚他的看法和他对于达成一项协议的意向如何。我从巴黎驾车直奔海牙，我到印度旅馆登记房间。这家旅馆建筑古老而环境比较安静，很多著名的外国来宾都住在这里。我虽然事先没打电话去预订，可是很容易地租到了一间房间。我问摩萨台是否住在那里。旅馆的职员瞧了瞧我，讲了一句俏皮说“不，我们这旅馆可没有摩萨台的房间。”我说：“我不明白。你有房间给我，怎么没有房间租摩萨台博士。”那职员盯着我说：“先生，壳牌石油不只是英国的，而且也是荷兰的股份公司，所以，对英国的威胁也就是对我们两国的威胁。”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恰好证明了摩萨台的感觉有道理，世界上各个大石油公司的确企图不让他的国有化政策获得成功。

几个月以后，摩萨台博士又到了纽约，因为英国又在联合国中控告他。由于他明确提出，他喜欢我、信赖我，并且愿意有一位非伊朗人当翻译，因此我又一次飞回纽约，担任美国副国务卿乔治·麦克奇的翻译。而麦克奇在联合国大会开会期间负责与摩萨台打交道。我认为，乔治·麦克奇开始担心我会不经心地把鲁莽和粗野的军人习气带进这种细致复杂的外交谈判中去，但是由于哈里曼坚持要这样安排，并说摩萨台信任我，而我也了解这个老人，这会有助于谈判气氛，他才勉强同意了。我们第一次进入摩萨台的卧室时，摩萨台就拍拍他的床头，我就象往常一样坐在他的床脚头。麦克奇非常吃惊地看到，一个美国的中校竟然坐在伊朗首相床脚头的景象。

麦克奇办事通情达理，容易与人相处。摩萨台很快喜欢他了。我可以肯定，如果摩萨台存心要达成协议的话，那他很可能与乔治·麦克奇拍板成交。由于副国务卿麦克奇一次又一次被召回华盛顿去执行其他任务，我们在纽约的谈判常常中断。

摩萨台住在沃尔多夫大厦，但睡在行军床上，因为这样一来，人们可以拍出他生活在朴素简陋的环境中的照片，这是做给伊朗的新闻人员看的。摩萨台博士当时确信，联合国只是英国的傀儡，其目的是要命令他把英伊石油公司归还英国。

有一次，当麦克奇先生回到华盛顿时，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一个个

成员欧内斯特·格罗斯大使，具有当时许多人所持的观点（也包括我在内），即：“如果人们让我来经办这件事，我能很快就办理妥当。”我知道，人人都想插手于一下。既然欧内斯特·格罗斯是大使，而我只是一个中校，我没有理由拒绝他的要求。因此，我把这事同摩萨台商量，他同意我们在当天下午四时去会见他。我和格罗斯大使就在约定的时间来到摩萨台博士的房间。格罗斯是个可爱的讨人喜欢的人。他跨进房门就走到摩萨台博士的床跟前。当他走去的时候，我已注意到，我们从他交叉搁在胸前颈下的双手的非常轻微的拍打中获得一种不妙的示意。这通常意味着时机不利。

格罗斯大使握着摩萨台的手说：“摩萨台博士，我是欧内斯特·格罗斯大使。我是你的朋友。我想帮助你寻找一个解决你们的问题的办法。为了帮助你获得伊朗人民公正的份额，我愿意做一切工作。”摩萨台双目谨慎地从他巨大的鼻子后面向大使窥视着，问道：“大使？你是驻在哪里的大使？”格罗斯先生说：“噢，我是驻联合国的大使。”一听到这话，摩萨台就尖声喊叫起来，犹如被刀子捅了一家伙，身子痉挛着从床的这一边滚到那一边，竟嚎啕大哭起来，大颗鳄鱼的泪珠从面颊上直滚下来。他这样嚎啕大哭，我在过去是没有见过的；欧内斯特·格罗斯也为这种大爆发而愕然吃惊。我不得不对他说：“大使先生，我想今天不是继续谈判的日子了。”他说：“天啊，我也这样想。”于是他紧握着摩萨台博士的手说道：“摩萨台博士，下次当你感觉好一些的时候，我们再来看你吧。”我们走出房间。我们走到门外就站住了，格罗斯大使问我：“他是否常常这样发作的？”我回答说：“我看到过他静静的抽泣，但我从未见他这样剧烈痉挛地哭泣过。”格罗斯说：“你没有见过吗？那你千万别告诉别人他这样对待我。”

摩萨台博士又移居到华盛顿。在他到达的时候，伊朗大使馆印发了一本小册子，题目是《穆罕默德·摩萨台——伊朗的乔治·华盛顿》伊朗当时有一条法律，规定年届七十的人不能当首相，也不能被处决。我曾在德黑兰与许多人交谈过，他们告诉我，他们已经多年庆祝摩萨台博士的六十九岁寿辰了。跟（美国的演员）杰克·本尼一样，他总是过三十九岁生日。摩萨台至少还得过几年后，当他因叛乱罪而判处死刑时，他才宣称他早已年过七十了，因此他不会被处死。根据伊朗的风尚，这就生效了。那时他兴致勃勃地给了我那本小册子，上面写着：“摩萨台博士一八八四年生于德黑兰。他在德黑兰跟家庭教师学习。他随后到了瑞士，在纳沙特尔大学获得政治学的学位。他旋即回到伊朗，在一八九六年他成为法尔斯省省长之前，他长期成功地从事法律工作。”他轻轻地推了我一下，说道：“那对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说来，干得不坏吧。”

在华盛顿的谈判再次证明毫无成效。很清楚，摩萨台博士觉得他的处境不允许他接受任何协议。在他计划动身返国前夕，哈里曼先生吩咐我单独去拜访他，作一次最后的努力，看看是否能使他僵硬的立场略为松动一下。我立刻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并且象别人一样，我确信我能解决伊朗石油问题。我到他所住的肖拉姆旅馆的房间里去。当我进入房间的时候，他拥抱着我说：“我知道你来的目的，我的答复还是‘不行’。”接着，他请我喝伊朗茶。在我们交谈时，他对我说：“你该知道吧，昨夜一整夜我听到旅馆外面开枪的声音。”我说：“摩萨台博士，可能是放鞭炮的声响，昨夜旅馆外面并没有开枪。”他说：“沃尔特斯，你们很好地保护着你们的国家，但我能辨别枪声，昨夜的确在旅馆外面有许多枪声。”我不能说服他，使他相信并无其事。我

们交谈了一会儿，他反复讲他不能改变他的立场。我对他说：“摩萨台博士，你在这里已耽搁了很久了。我们非常希望你这次访问能获得某些有效的结果，而现在你将两手空空地回到伊朗去。”他狡黠地瞧着我说：“你真的认为我两手空空地回伊朗吗？我这样回去，我的地位会比我获得一项协议去向狂热分子兜售要强得多。”我很满意地感到，他只是在此时此刻不愿达成协议。我站起身来告别，他对我说：“我能否向你提一个要求？”我以为这样又有了一线希望，就说：“讲吧，摩萨台博士，任你提什么要求吧。”他说：“能不能让我亲吻你？”我略为考虑一下，最后说：“如果这就是你的全部要求，那就请你吻我的脸，请吧。”他高兴地咯咯地笑了起来，亲吻了我的两腮，我就离开他了。这是我最后一次会见摩萨台。此后的几年中，我总接到他寄给我的圣诞节贺卡，上面画着一个留着大胡子的波斯老人，他周围是一群漂亮、年轻而半裸体的舞女。我还与他保持了四、五年断断续续的通信关系，但我知道我没有可能解决英伊石油问题。这整个使命是愉快而有趣的，然而终究是没有成果的。正如哈里曼先生所说的，我也是很少遇到失败的；而当我看到这位老年人离开时，我感到很遗憾。伊朗国王复辟事件发生后，我由衷地希望这老人能安然无恙。事实上，也不算太坏。他回到祖传的庄园去退休了，多年后他才逝世，年龄已超过九十岁了。

这次使命不同于其他使命。这里面具有小说《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的性质，为此，在我到达德黑兰三天后，我特地写信给哈里曼先生的秘书，要她给我寄一册这部小说来，这样可以使我了解故事的结局。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次使命失败了，这次使命对此后二十五年西方世界与石油关系的重大问题蒙上一层阴影。这些情况摩萨台博士已不能看到了，但问题却导源于他。

五、陪同艾森豪威尔总统出访

——日内瓦、百慕大、巴拿马、白硫泉

最高级会谈，为了和平而奔走

一九五三年底，我仍旧在欧洲最高司令部供职，担任主管后勤和行政副参谋长的助理。十一月，华盛顿事先通知我，要我作好准备，参加百慕大首脑会议。艾森豪威尔总统定于十二月四日至八日在那里会见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和法国总理约瑟夫·拉尼埃尔。

我乘飞机回美国。白宫和国务院向我简要地介绍了美国将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的各项方案。以及美国对会议宗旨的大体看法。这对准确的翻译至关重要，如果不知讲话的含意，就很难正确地转达原话的意思。

当时，华盛顿正值隆冬腊月。令我感到惊讶的是；飞机飞了没多大一会儿，就到了已进入夏季的百慕大。会址设在中洋旅馆。这是一个优美的避暑胜地，四周为高尔夫球场和海滩所环抱。三国代表团都将在这家旅馆下榻。我赶在艾森豪威尔总统来到之前到达，以便了解当地的情况，看看对我有些什么要求。我要知道会址在什么地方，并熟悉一下会场周围的情况。会上只

讲法语和英语，因而我估计不会遇到什么问题。

艾森豪威尔总统乘他的空军专机“哥伦拜”号抵达百慕大，受到身着礼服、头戴漂亮翎帽的当地总督的欢迎。丘吉尔和总统热烈地相互问候。

三国代表团抵达百慕大后不久就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艾森豪威尔、丘吉尔和拉尼埃尔二巨头出席讲了话，他们都希望和祝愿会议成功。记者们问艾森豪威尔为什么手上贴着一块药膏。他解释说，他教玛米使用手枪时不小心把手擦破了。丘吉尔年事虽高，看上去身体还不错。指艾森豪威尔夫人。——译者

例行的预备会议和礼节性拜访开始了。每一方代表团团长都去拜会另一方，另一方又来回拜。我陪艾森豪威尔去拜会了法国代表团，没有陪他拜会英国代表团。他和英国人说话显然不需要翻译。然而，在许多场合，我都注意到乔治·肖伯纳所讲的同种语言分离了两个民族这句至理名言是千真万确的。“TO TABLEA PAPER”这一个短语在英国和美国意思截然相反。

这一短语在英国是“提出议案”的意思，而在美国则是“搁置议案不理”——译者

工作人员都在旅馆的餐厅用膳。使我感到意外的是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也下楼到餐厅里同我们一起吃饭。第一天，我和他同坐在一桌。他谈起自从美国代表团游览了百慕大之后，许多人向他提出申请，要求当驻百慕大领事，而在参观之前，却没有人提出过这样的申请。

由于百慕大是英国直辖殖民地，所以丘吉尔作为东道主，主持了这次会议。岛上采取了警卫森严的安全措施。一部分安全工作由当地防务力量——百慕大步枪团负责。另一部分安全工作由从牙买加调来的皇家威尔士火枪团负责。皇家威尔士火枪团是英国正规军。当时，在中洋旅馆流传一句关于旅馆四周灌木林的俏皮话：“如若它摇动不停，那准是百慕大步枪团；如若它纹丝不动，那准是威尔士火枪团。”

丘吉尔在开幕词中慷慨激昂地呼吁西方团结起来，强调必须找到一条大家都可以走的共同道路。他讲到激动人心的话时，突然低下头来，仿佛自言自语地说：“我曾在恩图曼策马冲锋，现在又乘同温层飞机来到百慕大，这都是我毕生的经历。”顿时，我理会到这位非凡人物的一生饱经了沧桑。

这时候，法国人正忙于越南战争，并且呼吁盟国给予援助。刚开了几次会议不久，法国代表团团长约瑟夫·拉尼埃尔总理就病倒了。法国代表团一位团员来问我，艾森豪威尔的医生霍华德·斯奈德少将能否给法国总理看病。因为法国人没有带医生来。我问他拉尼埃尔先生患了什么病。他说显然是某种肺部的毛病。斯奈德将军表示这不是他的专长，因为他基本上是个心血管专家。他建议我们去找丘吉尔的内科医生莫兰勋爵。莫兰勋爵同意给拉尼埃尔先生看病。我把他送到法国总理房门口就要往回走，但法国人要我留在那里，因为拉尼埃尔不会讲英语，可能莫兰勋爵也不会讲法语。我随莫兰勋爵走进房间，他给拉尼埃尔先生检查了很长时间。最后，他告诉法国总理，说他患了支气管炎。拉尼埃尔说：“可是，我一定要参加会议，否则大家会认为这是一场外交病。”莫兰勋爵向他保证，他将以医生身份向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讲清楚，拉尼埃尔确实是生了病。拉尼埃尔说，尽管莫兰勋爵提出这样的建议，他仍然认为应参加下次会议，他不能够躺在床上。莫兰勋爵对他说：“总理，如果你参加下次会议，我敢肯定你要转为肺炎。”这话使得拉尼埃尔多少理智了一些。最后，他说：“这样吧，如果你答应让我参加明天

的会议，今天我就不去了。”莫兰勋爵看着他笑起来了，说：“总理，治病与搞政治一样，都是难以预言的。你应该卧床休息。你如果过早起床，会转成肺炎的。你应该把代表团交给外交部长皮杜尔先生去管。我将向英美两国领导人说清楚这不是什么外交病，是由于我一再坚持，你才卧床休息的。”

在这段插曲发生之前不久，有一次，我正与拉尼埃尔总理在旅馆门厅里聊天，丘吉尔走了过来。我知道他会讲点法语，便抽身离开了。他同拉尼埃尔只讲了几句话，就招呼我回去替他翻译。对他来说，讲法语实在太费劲了。突然间，丘吉尔停了话头，看了我一会儿，说道：“你以前给我翻译过，那是在什么地方？”我回答说：“首相，那是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五日您在意大利的瓦达向巴西军队讲话的时候。”他说：“对啦，是那么回事。那么，你还会讲葡萄牙语罗。”我说：“是的，首相，我会讲葡萄牙语。”他顺手递给我一个装着雪茄烟的大盒子。我不会抽烟，所以一口谢绝了。不过后来，我一直为当时未拿一支雪茄烟留作纪念而懊悔不已。

由于莫兰勋爵的规劝，拉尼埃尔一直卧床休息。会议的后一阶段，外交部长乔治·皮杜尔实际上成了法国代表团的团长。皮杜尔是一位杰出的法国政治家，自一九四四年巴黎解放以来，他一直任内阁阁员，大部分时间任外交部长，也担任过其他职务，并且当过总理。大战期间，他接替因落入德国人之手而自杀的让·莫林，在被占领的法国担任全国抵抗委员会主席。他是法国国内抵抗力量的最高官员，在国内一直坚持到解放，盟军开进巴黎那一天他才公开露面。

在一次会议上，皮杜尔颇为热切地恳求英国和美国援助法国，反对印度支那的共产主义。他讲完之后，丘吉尔相当生硬地回答说：印度支那基本上是法国的事，法国应当自己解决。他说话时激昂的语气颇使我愕然，因为丘吉尔并不是反对殖民主义的人。丘吉尔快讲完话的时候，忽然意识到刚才对皮杜尔讲得太尖锐了，于是，他以郑重其事的口气说：“我说这些话是因为四十年来我一直站在我们的法国同志一边，支持他们力求保卫祖国免遭灭顶之灾的危险。请诸位永远不要忘记，今天坐在我们中间的皮杜尔先生是熬过整个被占领期间的漫漫长夜的。他日日夜夜，时刻都有丧生的危险。当《马赛曲》歌词中所说的光荣日子破晓之时，他在凯旋门下等待我们。他因此赢得了整个自由世界永久的感激之情。”丘吉尔结束讲话时，声音哽咽，在房间里的人听了都深受感动。皮杜尔双手捂着脸。艾森豪威尔显然被感动了，我自己也被深深地感动了，首先是由于丘吉尔非凡的口才，其次是了解到皮杜尔先生曾是德国占领者在法国的四年内最想捕获的通缉对象。丘吉尔讲完后的片刻功夫，寂静无声。接着，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用法语说：“乔治，你听了这，席赞词以后，总得有所表示吧。”这句话固然风趣，但却破坏了当时动人的气氛。

后来，皮杜尔以法国代表团代理团长的身份设午宴招待艾森豪威尔。这次我出了差错，这也许是我当译员期间最严重的一次差错，可以说是大出洋相。谈话中，话题忽然转到文学方面。皮杜尔指出：有些作品原著很出色，译文很拙劣，然而也有相反的情况。

他用法语说：“譬如说，有的作家原著甚美，译文则很差，如莎士比亚。依我看来，若要理解亨利第四和亨利第五这些人物，你就得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可是，”他继续说道：“也有一些作品的译文很漂亮，但原著却无甚价值，如巴尔扎克。”当我把这段话译成英语时，前面都译对了，临到末尾却说错

了。我用英语说：“……却无甚价值，如皮杜尔。”饭桌上爆发出一阵哄笑，气氛糟透了。皮杜尔自己也禁不住笑了。我狼狈极了，尤其因为皮杜尔恰好是一位自命有文采的作家。几个星期后，我与当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最高司令格仑瑟将军在巴黎见到他，才知道他原谅了我。会见结束时，皮杜尔用法语对我说：“沃尔特斯，你还只是中校吗？”我也用法语对皮杜尔说：“谢谢，外交部长先生。我看您真的原谅了我在百慕大所犯的口误了。”其实，我从百慕大返回欧洲最高司令部的时候，这件事早已传到了格仑瑟将军的耳朵里。他曾问过我准备怎样补救法美关系。不过，为时不久，此事也就烟消云散了。后来，我曾多次见到皮杜尔先生。他十分宽宏大量，有时还幽默地提起这件往事。

会开得并不紧张，中间有不少娱乐休息的时间。每次休息，艾森豪威尔总统都到旅馆外面去打高尔夫球，我则去游泳。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也常常和美国代表团一些下级人员到离旅馆不远的海滩去游泳。旅馆附近有一个高尔夫球场，有一条马路从球场径直穿过。路上来往汽车不多，因为百慕大不久前才允许使用汽车。路上有一座桥，桥上竖着一块相当奇怪的指示牌，上面写着：“小心打高尔夫球者及飞来飞去的高尔夫球。”

象大多数首脑会议一样，这次会议并没有取得什么特别的成果。然而，它毕竟为西方世界三巨头提供了碰头见面和加深彼此了解的机会。他们还讨论了经济、政治问题、殖民地问题以及采取共同立场对付苏联及其主宰世界的欲望等问题。他们在这里可以安静地、私下里讨论问题，不必象他们在各自的首都那样，整天忙于日常公务。我应该说：面对那两位盎格鲁撒克逊巨人，皮杜尔先生举止庄重，侃侃而谈，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会议一结束，我就乘飞机返回华盛顿。

象往常一样，我在这类会议上，主要任务之一不仅是翻译，而且每晚要把我所听到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同别人的谈话尽可能详尽地整理成备忘录。这是一项大量而耗费时间的工作。在私下会谈时，我一般不做笔记，因为那样会对讲话的人有所干扰，影响他完全推心置腹地谈话。会议上，秘书处当然是作记录的。诚然，私下谈话时做笔记能有助于准确地翻译，但是，如果注意力集中到逐字逐句的叙述，你就会丢失不少说这些话时的感情和语气。如果你纠缠在字面上，你就可能忘记讲话人想要传达的意思和要旨。

我继续留在欧洲最高司令部，当主管后勤和行政的副参谋长的助理。我是在艾森豪威尔离开欧洲最高司令部之后，被派去做这一工作的。在这之前，我是各国军事代表助理执行官。我感到这一工作正在收缩。当然，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格仑瑟将军需要，我还是照样给他当翻译。他找我谈话，非常希望我留在欧洲最高司令部工作，并一般地征询我的意见，问我担任什么职务最合适。我把它多少看成是一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因而未作具体答复。一天，我开车跟他去拜访一位外国要人，他对我说：“我问过你，应该把你分配到司令部里什么地方工作，可你却含糊糊糊，不予合作。”我回答道：“将军，我并不是不想合作。我只是觉得，由我自己来对您说最好在您的司令部里某个部门工作，似乎不太合适。”他弄清了我的意思，不久，就问我是否愿意去做主管后勤和行政的法国副参谋长的助理。当时的副参谋长是一位机智、风趣而干练的法国军官奥利维埃·波瓦德诺中将。我曾在波瓦德诺和接替他的弗朗索瓦·布里萨克将军，以及能力非凡、才华出众的让·艾蒂安·瓦吕伊将军手下工作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瓦吕伊曾是法国第一军的参谋

长。他后来指挥一个师，在印度支那作战。他离开欧洲最高司令部后，任中盟军地面部队总司令。传说，有一次，戴高乐将军对瓦吕伊说，他不久就会使美国人跪倒在他的面前。瓦吕伊回答说：“如果你真的那么想，那你准是疯了。”为此，戴高乐命令瓦吕伊出去。瓦吕伊是一位无所畏惧和才华横溢的军官。

这项有趣的工作使我有机会随瓦吕伊将军走遍了欧洲和美国许多地方。瓦吕伊将军的工作人员中有一位法国骑兵上校，此人也是一名伞兵。这位上校贵族气派十足，手上很有钱，对英国人和美国人抱相当蔑视的态度。有一次，他在军官食堂吃完饭后，走进我的办公室，一本正经地说道：“这个食堂的饭菜太差了，连英国人和美国人都有意见哩。”他确是这个意思。

格仑瑟将军以他超凡的聪明才智和理解力赢得了普遍的敬仰。欧洲人信任和爱戴他，美国人也知道他能力非凡。我感到可惜的是，格仑瑟将军离开欧洲最高司令部后，没有出任大使，他当大使真是再合适不过了。我总是在想，如果他出任驻法国大使的话，他就会设法劝阻戴高乐将军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选择一条不同于他最后选择的道路。在我认识的人当中，很少有人能象格仑瑟将军那样令人信服和有说服力。

我在欧洲最高司令部的任务行将结束时，我得到通知说，下一个任务将使我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发生联系。我将去华盛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常设小组，在美国代表团工作。

这个常设小组是由成员国参谋长组成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委员会的一个执行机构。

显然，这个军事委员会不可能经常开会，常设小组就是它的常务执行机构。常设小组由美国、英国和法国的代表组成，但工作人员中也有来自其他成员国制订计划的人员。当时驻常设小组的美国代表团团长是美国前陆军参谋长劳顿·柯林斯将军，他是一位杰出的军人。我在常设小组担任翻译并任特殊事务的官员。我曾以后一种身份安排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高级军官于一九五七年去埃尼威托克岛和比基尼岛观看一系列核试验。这些试验的代号是“硬饼干”，既包括核试验又包括热核试验。我一共看过大概八次试验，全是恐怖可怕的，正如有人对第一次核试验评论的那样：“有点儿象身临混沌初开那个场面似的。”

我在常设小组工作的时候，瓦吕伊将军——我在欧洲最高司令部工作时的老上级——也被委派到这里任法国代表团团长。他的机智才华使他赢得美国和英国同僚们的钦佩和爱戴。常设小组花许多时间为整个联盟草拟军事文件，不仅为欧洲最高司令部，而且还为其他司令部——基本上是海军的大西洋司令部以及海峡司令部起草文件。

在常设小组里，我饶有兴致地并且好奇地注意到，拥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文字宪法的美国人总希望把一切事物最详尽地用文字记载下来。而根本没有文字宪法的英国人却总是反对把那些他们认为没有必要的东西写下来。他们感到把一切东西都写下来会限制他们的灵活性。法国人的态度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在他们看来能取得一致认识的所有意见他们都表示附和。有一次，我向瓦吕伊将军问起这一点，他回答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采取强硬态度，因为我们知道，到时候，每一家都会做出它认为符合本国利益的事情，不管书面上写的是是什么。所以，我们对见诸文字的东西不太重视。”

有一段时间，英国驻常设小组的代表是位十分能于和聪明的海军上将

迈克尔·梅纳德·丹厄爵士。美国的代表先是利昂·约翰逊空军上将，他是接替去印度支那当大使的柯林斯将军的，后来是弗雷德里克·布恩海军上将。布恩上将和丹厄上将不仅为文件的实质内容，而且为标点符号，经常发生争执。两人都很重视正确使用标点符号，常常为此争执不休。有一次，两人对“和”字后面是否应该使用逗号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现在我已记不清那一次谁赞成，谁反对用逗号。但是我还记得这场毫无结果的争论的激烈程度。最后，他们征求了瓦吕伊将军的意见。瓦吕伊将军早就对这场讨论不感兴趣。

当其中一人问到他的看法时，瓦吕伊正在阅读海外版《世界报》瓦吕伊将军放下报纸，茫然地问道：“什么问题啊？”以此强调他对这场争论不感兴趣。他们就把是否应在“和”字后面使用逗号的问题向他概述了一遍。瓦吕伊将军带着几分讥讽的口吻回答说：“对于这个问题，我想讲两点。第一，在法语中应该用逗号，但又从来不用。第二，在我们法国军队中，这类事情通常交给尉官去干，不必由陆军上将或海军上将亲自出马。”两位上将面面相觑，颇不好意思。其中一人说：“也许我们应该让秘书处去处理这件事吧。”瓦吕伊将军非常善于制止这种漫长的鸡毛蒜皮的讨论。

我在常设小组供职期间，白宫通知我，美国、苏联、法国和英国将于一九五五年四月下旬在日内瓦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议，要我作为总统的翻译陪同前往。不用说，常设小组是不会反对的。于是，在四月中旬，我就成了白宫先遣组的成员。这种先遣组，通常在总统出访前到当地去做一切必要的安排。我们到了日内瓦，受到瑞士人的盛情款待。

我们与他们多次会晤，对这次访问的各个方面进行了讨论。因会议要在日内瓦举行，所以这些瑞士人差不多都讲法语。我与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军事助理罗伯特·舒尔茨上校去参观了日内瓦湖畔那座富丽堂皇的费尔米尼希别墅。这幢别墅在会议期间将供总统住宿。

为供其它代表团使用，腾出了些宽敞的私人住宅，房主都搬往别处，让代表团长们住进去。费尔米尼希别墅宏伟华丽，有两个整齐美观的花园一直延伸到湖边，景色绝美。别墅的庭园里还有一个大招待所，我和总统身边的其他工作人员就住在这里。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五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带着他的儿子约翰和美国代表团的其它成员抵达日内瓦出席会议的开幕式。在这里还是采取百慕大会议的方式，只不过这一次是四个代表团，而不是三个。各代表团之间进行了大量的单独会晤，以便为会议做好准备。美国急于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的主要方案之一是“开放天空”计划。这个方案向所有各方提出保证，别国不会利用有控制的飞行策划对一国发动突然袭击。我们之中无人真正认为俄国人会接受这个方案。他们的社会封闭得如此严密，一个开放的越境飞行的想法必然引起他们的憎恶。

我被苏联领导人吸引住了。我对他们进行了仔细的观察。会议是在日内瓦旧国联大厦的一个大房间里举行的。这个房间的对面是日内瓦湖和勃朗峰。苏联代表团是庞大的，其主要成员是赫鲁晓夫、布尔加宁、莫洛托夫、葛罗米柯、朱可夫元帅和能干的苏联翻译奥列格·特罗扬诺夫斯基。英国代表团由哈罗德·麦克米伦首相率领，成员有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和外交部的伊冯·柯克帕特里克。法国代表团团长是埃德加·富尔总理。

他带着外交部长安托万·比内、法国驻莫斯科大使路易·若克斯和他

们那位才智过人、会讲三国语言的翻译康斯坦丁·安德罗尼科夫亲王。陪同总统的是国务卿杜勒斯，还有国务院顾问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第二以及狄龙·安德森。

在第一次会议上，俄国人坐在美国代表团的右边。英国人坐在美国代表团的对面，而法国人则坐在美国代表团的左边，面对着俄国人。当时我做了些笔记，现抄录如下。

赫鲁晓夫的左眼抽动了一下。他坐在布尔加宁的右边。

艾登盯着俄国人说，将来在任何一场战争中，都不会有胜利者。布尔加宁、莫洛托夫和特罗扬诺夫斯基是吸烟的，其他人不吸烟。俄国人不戴珠宝——既没有戒指也没有袖扣。午餐时，赫鲁晓夫换了一件衬衣（出席后来的会议时，他们都穿瑞士衬衫并戴瑞士袖扣，好象他们都是同时一起买的）。葛罗米柯的袖子上有条折痕，也许这是他在美国时留下的纪念。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都有点象东方人。莫洛托夫本人看起来比照片更象东方人。我猜想，他们的祖先跑得不够快，没有逃脱鞑靼人。布尔加宁和朱可夫看起来完全是西方人。特别是布尔加宁，样子象一位和善的乡间老医生，他的目光虽然炯然，但不如过去闪烁明亮。朱可夫元帅的样子很象我们的奥马尔·布莱德雷将军。

会议一开始，俄国人照例作了一系列的宣传性发言，而西方人则努力劝他们同意某种检查制度。苏联人申明，他们对任何检查制度都不会赞同。他们认为这是对他们主权的侵犯，他们不接受任何检查制度。

每天，我都和艾森豪威尔总统乘他的车前往国联大厦。当我们的车驶近日内瓦湖时，许多正在游泳的人都会跑出来看我们。其中有许多很漂亮的姑娘，穿着极为短小的比基尼游泳衣。总统把她们叫作他的“比基尼族”。

一种分成上下两片的女游泳衣。——译者

有趣的是，按俄国的礼宾规矩，在小汽车里身份最高的人显然坐在最前面。赫鲁晓夫常常坐在折叠式坐椅上，而朱可夫元帅则坐在后排座位上。我们与负责保卫苏联领导人的苏联安全官员们有相当多的接触。新闻记者和摄影师们被整个会议及苏联领导人不寻常的露面所吸引。在此之前，这些苏联领导人中很少有人敢于迈出国界。有一次，当四位首脑正在大厦外面的草坪上拍照时，我走过去要和摄影记者们一起拍些电影片，正在抢占好位置的摄影记者们粗鲁地把我推来推去。

我在观察苏联代表团时发现，尽管布尔加宁名义上是团长，无疑赫鲁晓夫才是真正的头目。他似乎知道这一点，也是这般行事的。我的印象是，莫洛托夫和葛罗米柯是高级文职人员，不是决策人。布尔加宁显然处于中间地位，在莫洛托夫和葛罗米柯与赫鲁晓夫之间。

我陪同艾森豪威尔总统去和法国人进行了一系列会晤，以争取协调我们的立场。与往常一样，我没有出席同英国人的协商。在最后一次会议上，艾森豪威尔为他的“开放天空”建议激昂慷慨地发出呼吁，他最后说：“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让你们相信，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是诚心诚意的，对你们毫无恶意。但愿上帝恩赐我某种办法可以使你们相信我们提出这一建议是诚恳而忠实的。”他的话音刚落，一道闪电划破天空，雷声震耳，大厦中的所有灯光顿时熄灭。我听说，至今俄国人还想弄清我们当时是怎么搞的。

这次会议所取得的实质性成果甚微。西方的领导人倒是对他们的苏联同僚以及俄国领导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得到了更多的感性知识。西方世界第一次看清了那些统治苏联的人。以后，苏联领导人还要出国访问。在某种意义上，这次会议是他们到世界各地旅行的首次公开露面。

我陪同艾森豪威尔总统出席了另一次最高级会议，那次是北美三国政府首脑会议。

艾森豪威尔于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日在弗吉尼亚州的白硫泉会见了墨西哥的阿道弗·路易斯，科尔蒂内斯总统和加拿大的路易斯·圣·劳伦特总理。

这基本上是一次礼节性会议，是向两个友好而亲密的邻邦做出的一个姿态。路易斯·科尔蒂内斯是个饶有趣味的人。他有阿兹台克皇帝所具有的那种轮廓清晰的脸庞。

在这次会议上，我碰上了一桩令人难堪的事。我写了一份艾森豪威尔总统与路易斯·科尔蒂内斯单独谈话的备忘录。在格林布莱尔饭店，杜勒斯国务卿到我房间里找我时，我只穿着内衣。他向我要那份备忘录。我向他解释说，我奉总统本人的特别命令，任何人都不得在总统亲自签署之前看任何一份备忘录。杜勒斯二话没说，转身就走了。我不知道他当时是否生气了。然而从那以后，杜勒斯先生对我非常亲热，显然对我拒绝向他提供那份备忘录并不介意。这是一次令人愉快的会议，一点也不紧张。这些领导人讨论了飞行航线、文化等一些同苏联举行最高级会议之后的次要而轻松的问题。

阿兹台克是墨西哥古代土著民族之一。一三二五年在墨西哥山谷中建立帝国，一五二〇年被西班牙殖民者并吞。——译者

墨西哥总统对我的西班牙语非常注意，而且对我从未到过墨西哥感到惊奇。他邀请我和总统的海军助理内德·比奇上校到墨西哥去。我们乘飞机到了墨西哥城，并作为路易斯·科尔蒂内斯的客人在那里住了四、五天。他带我参观了他的官邸松树别墅。当我评论他的住所多么豪华时，他以一种低沉的语调说：“是啊，我住在这座宫殿里，然而还有千千万万的人吃了上顿没下顿呢。”他甚至还带我看了他自己的住处。我看到他的卧室里挂着十字架有点吃惊，因为墨西哥强烈反对教权干预政治，而且，墨西哥政府官员是不准进教堂的。他看到我诧异的样子，就微笑着说：“我的夫人，她信教。”

我回到北约常设小组继续任职。作为公共关系官员，我到美国各地的一些大学里作了演讲，解释何谓北约；北约对美国的意义；为什么联盟的强大符合我们的利益。当总统接待的外国贵宾操我所掌握的语言时，我经常被召去为他做翻译。这些贵宾是奥地利总理、几内亚的塞古·杜尔总统、黎巴嫩总理，还有其他许多人，包括好几位北约国家的总理。人们都知道我是总统的翻译，但是在此期间我从未真正被分配到白宫工作。为总统做这种工作，是我履行五角大楼正常职务之余外加的任务。我想，总统经常这样使用我是因为他认识我已经很久，而且同我在一起比较随便。如果他准备同外国领导人讨论的问题不是特别重要，事前他总要安排给我吹吹风，就象他对国务院官员说的，“迪克·沃尔特斯会知道，在这个特定的问题上，什么时候该防止我出错儿。”显然，他只是在次要的问题上才这样做。不过，只要可能，在别人向他汇报时，我总要设法出席。

我了解了一个问题的背景和有关各方要达到的目的，就能够更好地表达总统的立场。同样，我对来见总统的外国领导人的立场了解越多，也就越

容易准确地理解总统真正想说而没有明说的意思。有时，我实际上通过情报人士了解到他们的真正立场，这就使我完成任务时容易得多。有时候，我还不得不在可以说是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参加谈话。我从未忘记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是美国的总统，但有时他的热情和友好使我难以记起这一点。

有一次，我住在华盛顿的瓦尔特·里德陆军医院里，要从我的右腿取出一枚金属钉来。

这个金属钉是一九五四年我滑雪出了一次事故后打进去的。我和另外两位中校同住一个病房。给我做手术取出这枚钉子的医生，就是四年以前在德国给我将钉子打进去的那位医生米尔顿·S·汤普森上校。我对他是永远感激不尽的。有一天，我的病房里出现一大束鲜花，上边别着一个卡片，卡片上写着：“迪克，祝你早日康复，谨致亲切的问候。

艾克与玛米赠。”他身为美国总统，在百忙之中还记着我在医院里而且还送来鲜花，这使我既惊讶又感激。我出院后见到了他，并感谢他送花给我。他问我收到鲜花后是否发生了什么特殊情况，我回答说，在收到总统的鲜花后，几分钟内我就搬进一个单间。他眼光一闪，咧嘴笑着说：“我并不想要求对你特别照顾，但是我估计，如果我和玛米送花给你，也许会出现那样的情况。”

还有一次，当戴高乐将军来华盛顿时，我出席了几次给白领带、穿燕尾服的宴会。

戴高乐将军在美访问的最后一天，我被告知，我不出席法国大使馆当晚为艾森豪威尔总统举行的白领带晚宴了。总统将带白宫的一名军事助理去。我把这事告诉了我母亲，她随即把我唯一的一副礼服领子送出去洗了。但是，当晚五点半钟，我接到白宫一个电话，通知我与总统一起赴宴。我向母亲要我的礼服领，她说已送洗衣房了。我很着急地对她说：“你不知道我两个半小时之后得穿着这副领子与总统去参加晚宴吗？”她回答说：“你说你这个星期不再有这样的礼宾活动了，你告诉过我没有？”正是我告诉她的，我心里更乱了。我打电话问了几家服装店，它们不是已打烊，就是没有礼服领。我给在白宫的约翰·艾森豪威尔打了个电话，问他能否帮助解决。他穿的是十五号领子，他父亲穿十五号半，而我穿十六号半。约翰叫我到白宫去，让他们想想办法。他似乎觉得这一糟糕的局面很有意思。我穿着全套制服到了白宫，胸前佩戴着小型勋章，手里拿着我的自领带，因为没有穿领子。在约翰住的三层楼上到处寻找适合我穿的礼服领，结果是徒劳的。约翰要去出席另一个晚宴，就把我交给了总统的侍从约翰·A·毛尼军士长。我和他乘电梯到了二楼。门一开，总统站在那里，他身穿燕尾服，佩带着荣誉军团的饰带。

他看了看我，咧嘴笑着说：“听说你有个难题，我觉得很有趣。”我回答说：“总统先生，我相信您会明白，我对这件事并不感到那么有趣。”他于是说：“跟我来，我要让你看看我年青时当军官的时候学到的本事。”我们一起走到他的卧室，他拿出一副十五号半的礼服领。然后他坐到床头上，用一个指甲挫刀仔细地将领子两头的扣眼弄大。他告诉我，这样做要非常仔细，免得将领子撕裂，但是如果搞得适当，领子两头都会长出半号来。他弄完了，站起来，将领子交给我说：“瞧，这就给你解决问题啦。”我把领子穿上试了试，相当合适。我感谢他说：“是的，总统先生，解决了，从来还没有像你这样地位的人为我解决过问题呢。”

我感到惊奇的是，这位曾经下令进入欧洲，并在大规模进攻开始时出动了一千艘舰艇和一万一千架飞机的人物，竟能腾出时间来为一个折断过腿骨又找不到礼服领的中校操心。这是衡量这位伟大人物对下级和被他人看作是朋友的人富有人情味的热情与关怀的一个尺度。

在这个时期，我不仅有幸跟随总统出席最高级会议，而且他历次出国访问，除了远东那次以外，我都有幸陪同前往。这些访问包括，一九五九年八月到德国、英国和法国，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从欧洲、中东到印度次大陆和非洲的长途旅行，以及一九六〇年底访问巴西、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尽管他的身体有严重毛病，他还是外出进行了这些访问。他深信，通过直接交往而相识的人，错误判断对方动机的可能性比较小。他相信，他所建立的个人联系，包括与外国领导人的联系以及和外国人民的联系，会把世界变成一个生活起来更安全的地方。就象在战争中建立了丰功伟绩的马歇尔将军一样，艾森豪威尔渴望在其壮年和晚年成为国际间搭桥的人，一位和平人士。

有些人在这件事或那件事上挑剔艾森豪威尔；一些人认为他本来应该更快地并以更小的代价赢得战争；一些人认为他的高尔夫球打得太多了；或者认为他像大多数将军一样，并非真正明智。他们错了。在这个人身上有一种特别的品质，几乎可以立即为人们所了解，不仅为他的绝大多数同胞所了解，而且为印度人、西班牙人、巴西人和摩洛哥人所了解，更不用说欧洲各国人民了。他是他们的解放者。正像卡尔·桑德伯格对林肯的评价一样，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是位刚柔相济的人物。他对世界各个地方的影响，美国国内从未做过充分的评价。人们总容易忘记，他担任总统的八年是全国团结、和平、繁荣和平静的八年，从那以后我们再没有见过这种情景。他代表美国一切最优秀的东西，他无论在朋友或敌人面前都显示这样的形象。我曾多次与他同乘一辆汽车。我与他同坐在车里不能看不到他对那些前来看望他的人群所产生的影响。他们来看望的不仅仅是美国总统，而且是“艾克”。从兴都库什山影中的喀布尔到安第斯山积雪中的巴利罗切，这种影响都是一样的。人们从他身上看到了本国同胞现在还只是隐隐约约察觉到的，即，他是我们这一时代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察觉到这一点是缓慢的，因为他并不神气活现、装腔作势或因为拥有一切权力而洋洋得意。

我差不多总是参加这些总统出访的先遣组。我们与之打交道的安全官员中，有许多是我认识的。有时，我们的特工部门或新闻记者想要办的事，按当地标准是人们特别反感的，而我们还是能够办到。因此，我非得往返两次，一次随先遣组，一次陪总统。我发现这样做很有好处。因为这实际上排练了一次，我就可以告诉总统下一步做什么，或者该往哪里走，或者在什么场合他将见到什么人。

这些出访也提出了一些政治性问题。他不能只去印度而不去巴基斯坦。他不能只去希腊而不访问土耳其。那次在欧洲和亚洲的长途旅行中，我发现他将从法国到摩洛哥去。

我对新闻秘书吉姆·哈格蒂说：“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要越过容许我们保留基地的西班牙，而到正要求我们撤离基地的摩洛哥去吗？”哈格蒂回答说：“但是西班牙是个独裁国家呀。”我答道：“你认为我们正在访问的那许多国家是什么样国家呢？”我不知道我的话是否对访问日程产生了影响，但西班牙被列入了日程，而且马德里举行了盛大的群众欢迎，规模仅次于新德里。

这些出访往往使有关人员感到精疲力竭，我更是如此。我感到要持续地集中精神，会使人疲惫不堪，但令人振奋。在翻译总统的讲话时，一旦说溜了嘴，就可能使美国处境尴尬。如在翻译外国领导人的讲话时出一个错，又可能使总统误解对方的意图。我认为感到最累的时候是一天已经过完，别人都已上床休息的时候。那时我得从当地的美国大使馆叫来两三位秘书，开始为总统当天的各次会谈口授冗长而详细的备忘录。我不能做记录，但是我还必须把清楚在哪场谈话中谁说了什么。我口授完一份备忘录，便开始核对另一份。这种工作往往进行到凌晨两三点钟，而往往在早晨六点钟要交行李。多数人对整理备忘录这一部分工作是看不见，也是不知道的。许多人甚至意识不到我除了做实际的翻译工作之外还得干这个。国务院许多人对我干这项工作很不满意，因为我搞这工作的时候，他们不可能得到这些备忘录的抄件，而由国务院的译员整理备忘录时，他们就可以容易地弄到手。我奉总统最严格的命令，这些备忘录在他审阅并签署之前，不得向任何人提供，任何人也不例外。

由于总统经常一下飞机就需要我，我通常与他同乘一架飞机。有时在旅途中，他听完国务院的汇报之后，就把我叫过去，听我谈谈他将要会见的国外领导人的情况，或是那个国家的特殊风俗。他出访前做准备工作，以便进行有目的的旅行。有一次他提到他出国访问的目的时说：“为的是在我将访问的这几个国家的首都，再一次保证，美国致力于体面与公正的和平；为的是支持西方团结起来反对一切侵略，并在必要时使用武力，并且维护我们共同安全所需要的防卫力量。”他还强调了美国愿意与苏联人就一般或特别裁军方案进行实际的谈判，只要这种方案是合情合理的和双方都可以实现的。许多人认为这些是新的主张，其实在十五年前，或者更早以前他就已提出来了。

艾森豪威尔到巴黎进行国事访问时，是在法国外交部下榻的。我同他住在一起。我们到法国那天下午稍晚些时候，戴高乐将军陪同他去凯旋门下面的法国无名烈士墓献花圈。这位年老的法国将军身穿制服。艾森豪威尔看了看他，几乎是若有所思地说：“你还能行？”“是的，”戴高乐回答说，“我还能行。”后来巴黎市政厅接待艾森豪威尔总统，戴高乐也在那里接待他。戴高乐的讲话较长，我贴近总统的耳朵低声翻译；后来轮到总统讲话，他讲了八分到十分钟就转向我，让我翻译。他用法语说：“我热爱你们大家。”以此结束了他的讲话。我把总统的讲话向集合在市政厅前的十五万群众翻译成法语。在结尾时，我用英语说“我热爱你们大家”，博得了全场喝采。我离开麦克风走回到总统后边的时候，戴高乐严肃地向我点了点头说：“沃尔特斯，很好。”这大概是人们可望从他那里得到的最高赞扬了。这场翻译是不容易的，因为戴高乐总统讲话比较长，而且一口气讲完，中间没有停下来让我翻译。

九月三日，总统按原计划搬进美国大使馆，我则搬进克里荣旅馆。同日，总统会见我熟识的意大利总理安东尼奥·塞尼，我当翻译。前些时候他在伦敦会见西班牙外交部长费尔南多·卡斯铁利亚·迈斯，也是我当翻译。

许多人喜欢打听总统同各国领导人谈论些什么，这是我必须处理的问题之一。对政府高级人员，比较容易应付。我只消说：“总统指示我不要谈论他同任何人的谈话”，他们往往就悄然离去。新闻界则不好对付，他们会泡蘑菇。有一次，总统同一位外国要人谈笑风生的情景被拍成照片。一位新

闻记者对我说：“他们讲的一定是个很有趣的笑话吧。”我回答说，是个妙趣横生的笑话。他问我是什么笑话。我回答说，虽然关系不大，但我从不谈论总统同外国人谈话的内容，这已成惯例。他对我说，“可是，美国人民有权知道。”新闻界声言有“权”知道一切，这种情况我还是第一次碰到。我索性说：“那就让他们行使这种权利吧。去找参加谈话的人，别找旁观者。而在这些事情中，我正是旁观者。”他毫不在乎，但眼看从我嘴里再也掏不出什么东西来，就不追问下去了。

意大利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大国商议问题时，他们被排除在外，不了解“内情”。

对于他们这种情绪，总统是一清二楚的。在同塞尼总理会谈时，艾森豪威尔象向别人作保证那样，再次向他保证，美国不会背着意大利人同俄国人谈判，美国将向他们通报一切情况。当晚，我们乘飞机到朗布依埃。美法两国总统在那里会晤，坐在壁炉前谈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艾森豪威尔在朗布依埃城堡的弗朗西斯一世塔下榻，一名大胆的摄影记者在城堡外用好的望远镜偷拍了一张他身着内衣的照片。两人谈论了他们最关心的问题：艾克最关心的和平和对苏关系；戴高乐最关心的阿尔及利亚问题和法国的核打击力量。我认为，公报的措词远远没有表达出两人会晤时高兴的情景。他们间的关系是一种特殊的、毫不拘束的关系。戴高乐曾这样说：“我们是两名写过回忆录的老将军，我们从来没有用恶语相写过。这种关系几乎是绝无仅有的。”艾森豪威尔笑着表示同意。他们之间常发生意见分歧，但又有一种相互的仰慕之情和同志情谊；我很少看见戴高乐以这种态度对待其他人。

艾森豪威尔认为此行效果很好。我相信，公正的观察家大多也有同样看法。通过这次出访，他消除了欧洲人担心美国背着他们同俄国人搞交易的疑惧。在这方面，他的直率、热情和品格起了很大作用。他正直庄重，感染力很强，就连对人最冷淡的持怀疑态度的人也难以无动于衷。我认为他是明白他的出现和他的言论能起什么作用的。他的这种认识推动他更多地出访活动，以促进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相互了解。对全世界千百万人来说，他是可以信赖的美国总统的典型代表。他知道战争是恐怖的，一定要尽力使这种灾难不再发生。

那年十一月下旬，我随先遣组到他将要访问的许多国家去打前站。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他从华盛顿到罗马，我去钱皮诺机场接他。那时，大雨如注，只好改在室内举行欢迎仪式。总统的飞机在空中盘旋，直到安排就绪才降落。乔瓦尼·格隆基总统在机场大楼里迎接总统，我贴近他的耳朵，低声翻译。总统致答词时，我又大声地把他的话翻成意大利语。在倾盆大雨中，我们驱车进入罗马商业区。我和总统同在巨大的奎里纳尔宫下榻。奎里纳尔宫建筑宏伟，过去是教皇和意大利国王的官邸，现在是意大利总统府。

总统顺着宽阔的楼梯缓步走上楼去，因为一九五五年他患过心脏病，此后就不得不小心一些。过了一会儿，总统会见意大利总统格隆基、总理塞尼和外交部长朱塞佩·贝拉。

他们谈了约一个小时。意大利人小心翼翼地提到，四大国多次商谈问题和作决定都把他们排除在外，对此他们感到不快。艾森豪威尔深表同情，说他要把他们的意见转告四大国。

接着是盛大的国宴。祝酒词和两位总统席间的谈话都得由我翻译。大

家就寝后，我又得写长篇备忘录，直到深夜一、两点。翌日，天还下着雨，我陪总统去意大利无名烈士墓献了花圈。在罗马，欢迎群众很少，几乎比此行当中任何停留地方的群众都少。罗马对名人屡见不鲜，因为它在两千五百年的历史中已见过很多。这里欢迎群众比别处少，与大雨也有一定关系。

翌日（十二月六日）晨，我跟随总统去见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对我这个天主教徒来说，这显然是不寻常的时刻。这位教皇当选前，我在巴黎就认识他。当时他叫龙卡利红衣主教，是教皇派驻巴黎的使节。这是一次隆重的会见。在此以前，美国总统只会见过一次教皇，那是在一九一九年。会见时，我把总统的话译成意大利语。总统对教皇说，他希望此行将有助于各国间的和平与谅解。教皇表示赞同。谈话开始前，总统把他的随行人员介绍给教皇。总统、约翰和巴巴拉·艾森豪威尔、国务卿克里斯琴·赫脱等人都不是天主教徒，他们一一同教皇握手。轮到我时，我吻了教皇的戒指。他抬起头来含笑说：“Ah! Uno dei nostri.”（啊！一个我们的人。）他送给我一枚银质小纪念章。

教皇约翰是我见到的第二位教皇。他具有热情和慈父般的性格。庇护十二世则有灵性和近乎超俗的品质。教皇约翰不会讲英语，特向总统表示歉意。他说，除了本国的意大利语外，他还会讲法语、保加利亚语和土耳其语。总统问：“英语呢？”教皇说：“我年纪大啦，又很忙，但每天还是学一小时英语。”总统又问：“学得怎么样啦？”教皇微微一笑，回答说：“我越学英语就越懂得，教皇无错论并不涉及英语发音。”我们都笑起来了。摄影记者抢拍了这个镜头，这张照片事后登载在许多报刊上。接着，教皇谈起总统和他两人都有过当兵的经历。教皇含笑说，戎马生涯，前程似锦。“你从将军变成总统，我从军士变成教皇。”大家又笑起来了。我感到，对于总统想做的事，教皇非常了解并赞成。他公开这样说，并祈求上帝保佑总统的努力获得成功。

会见后，我们乘直升飞机直接到钱皮诺机场，在那里乘飞机经过两个半小时的飞行到达安卡拉。由于我不会讲土耳其语，在这里没有公务可忙。这次访问，还是很有意思的，只是因为不能与土耳其人交谈，颇有闭目塞听之感。艾森豪威尔和土耳其总统乘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克坐过的一辆旧车通过市区街道时，受到热烈的欢迎。当晚我没有出席国宴，无谈话记录可写，痛痛快快地睡了一觉。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克又名基马尔（1881—1938），土耳其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曾领导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译者

翌日，我们继续乘飞机去巴基斯坦。在这次出访过程中，总统每到一地之前，我国驻该国的大使馆副馆长总是乘飞机来接总统，以便同机前往该地，并向总统报告有关下一站的情况。举例来说，驻卡拉奇大使馆的副馆长到安卡拉陪同总统乘飞机一起前往卡拉奇，作这样的规定是便于总统掌握有关下一站的最新情况。

巴基斯坦充满异国情调，景色壮丽，赏心悦目。在这里，我又没有什么公务，因为所有官员都讲一口非常流利的英语。这是长期受英国影响的结果。这里的欢迎也很盛大、热烈。进入市区的最后一段路，艾森豪威尔和穆罕默德·阿尤布·汗乘的是一辆六匹白马拉着的敞篷马车。有些礼节性拜会和谈话我没有参加。对我来说，这又是此行中最轻松、最愉快和最有趣的一站。然而，到下一站阿富汗我就忙起来了，尽管我不会讲波斯语，也不会讲

普什图语。由于国王讲法语，我又成了出头露面的人物。从卡拉奇飞往喀布尔，沿途景色蔚为奇观。当飞机飞过赫尔曼德沙漠时，我心想，这样荒凉的地方我在地球上还没见过哩。在机场举行了小型但有浓厚军事色彩的欢迎仪式。然后，总统同国王穆罕默德·查希尔会谈，我把法语翻译成英语。谈话中实质内容不多。阿富汗正好与苏联的南疆接壤，不得不严守中立。在国王举行的午宴上，我注意到苏联大使直盯着我。

他也许感到奇怪，美国军队从哪儿找出这么一个会讲当地话的中校呢？他的座位离主宾席相当远，听不清国王讲的是法语。几星期前我们来喀布尔打前站的时候，看到机场及其周围俄国人那么多，都为之愕然。那次我们走的时候，总统飞机的驾驶员比尔·德雷珀让飞机一起飞就陡直上升。当飞机直冲云霄时，他在扩音器上说：“这是我们对机场上俄国人的商业广告。”几年内，他们是不会有喷气式运输机的。

我们的飞机越过传说中有名的开伯尔山口，飞往下一站新德里。它是一个不很亲美的国家的首都，而欢迎盛况却超过艾森豪威尔在其他任何地方访问时的规模。汽车从德里的帕拉姆机场鱼贯而出，我坐在车队靠后头的一辆车里。即使在那些当地政府不需要我当翻译的国家，我一般也总是在总统视野所及的地方，这是因为如有外交官上前同他说话，他可随时找我。总统到德里大学讲话使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情况。他曾经问过有没有必要把他的话翻成印地语。回答是，不必要，因为这所大学讲课全用英语。在同一位来自印度南部的年轻空军军官交谈时，我问他，印度的语言这么杂，空军军官学校里怎么办？他回答说，讲课全用英语。我又问，倘有学员不会讲英语，怎么办？他的回答很简单：“不会讲英语就进不了空军军官学校。”

从德里机场驶往总统府拉什塔帕提·布哈范（艾森豪威尔下榻的地方）的汽车络绎不绝，汽车之多令人难以置信。夹道欢迎的群众恐怕有两百万人，十哩路程走了两个多小时。不知为什么，总统象磁铁般把印度人吸引住了。他在印度国会和德里大学发表了严肃的讲话。他在人山人海的拉姆里拉阅兵场上说的那番话也许最为动人。他引用甘地的话说：“自由是神的恩赐。神的恩赐不能永远不让他的子孙享有。”由于参加正式活动较少，我两次到阿格拉参观泰吉·玛哈尔陵，那也许是人类以双手修建的最美的建筑。

对总统及其一行中大多数人来说，印度这一站是最累的，对我来说却最轻松。我随总统出访期间，工作较少的时候不常有。在这里，我居然有时间到许多地方游览。随先遣组来印度时，我到阿格拉玩了一天，参观了泰吉·玛哈尔陵等名胜。那天中午，我在一家古老的英国式旅馆花园里用餐。那时，一个印度人带着一只受过训练的鸟走过来，说他的鸟能要把戏。我说一个数字，它就叼那个数字的卡片。我看得出了神。小鸟还会飞起来衔住朝它扔去的小铁环。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小节目演完后，我问那人我该给多少钱。他说：“四个卢比（一美元）。”我说，这个价钱不小啊。他温和地回答说：“先生，您知道教这只鸟干这些活儿要花多少时间吗？您知道这只鸟又能括多久呢？”我给了他五个卢比。

下一站是伊朗，我以前曾去过多次，情况很熟悉。伊朗又是此行中我感到非常惬意的一站，因为正式的活动与我关系不大，我有可能去看望一些老朋友，并看看自从我上次访伊以来德黑兰所发生的非同一般的变化。总统抵达德黑兰时，从机场到王宫的一路上有五十万人，街道上铺了波斯地毯。在德黑兰作短暂停留后，我们又前往希腊，到希腊时，正下着雨。总统和保

罗国王驱车进城，一路上有七十五万希腊群众夹道欢迎。同前几个站相比，希腊显得很热情，西方色彩很浓。艾克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供职时，同保罗国王就很熟了。一九五二年国王在雅典给他授勋，我跟他一起出席了那次晚宴。

席间我曾向王储康斯坦丁简单介绍了一九四八年希腊对共产党作战期间我在那里的经历。

文克在希腊国会讲话后就乘直升飞机去“僧侣”号巡洋舰。我则乘直升飞机去“埃塞克斯”号航空母舰，乘该舰去突尼斯和法国。第六舰队司令乔治·安德森海军上将也在舰上，他是我的老朋友。我们一起横渡地中海，平平稳稳地到了突尼斯附近的海面。这里讲法语的人很多，又要我当翻译了，因为哈比卜·布尔吉巴总统已表示他将很高兴用法语跟艾森豪威尔总统谈话。我从“埃塞克斯”号乘飞机到“僧侣”号。然后跟总统一起乘直升飞机上岸。布尔吉巴的欢迎词是用法语讲的，我为总统作了翻译，接着又把总统的答词翻成法语。这是一次只有数小时的短暂访问。总统同布尔吉巴谈了很长时间，后者对我的法语知识很感兴趣。由于我身穿军装，人们对我的语言造诣更为惊异。尽管艾森豪威尔将军抵达突尼斯时好些人没有看到他，这一天对突尼斯人民来说还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他们同阿拉伯联盟关系不好；法国人对他们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仍很恼火。艾克这次顺便访问时间很短，但他们对他这一姿态仍非常赞赏。他们还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来到这里，指挥军队把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赶走。两位总统谈了两小时，谈话中心是阿尔及利亚问题。布尔吉巴担心法国人会因他支持阿尔及利亚人而对他采取行动。艾森豪威尔请布尔吉巴放心，并说他深信法国不会对突尼斯采取行动。实际上戴高乐正在设法从阿尔及利亚困境中解脱出来。我们在突尼斯机场乘直升飞机回军舰。

飞机起飞前，布尔吉巴对总统说：“你对我国的访问是当代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他还再次赞扬我的法语讲得好，随后飞机起飞。

当我们的舰只驶进法国重要海军基地土伦港时，那里的法国部队司令皮卡尔·德斯特朗海军上将以个人名义发信号向我们表示欢迎。我在欧洲最高司令部工作时就认识他，他的母亲是美国人，生了十一个孩子。人们一听说她有这么多孩子，往往对她说：“你必定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她总是这样回答：“不，我只不过是个多情的新教徒。”总统受到土伦人民的热烈欢迎后，就乘戴高乐的私人火车前往巴黎，路程为九小时。安排火车走这么长的路程，我有一些责任。因为先遣组来打前站时，法国人就提出乘他们总统的私人火车去巴黎，但美国人一听说要乘火车，大为吃惊。我尽力劝说他们，说在法国乘火车旅行还是很好的，戴高乐的火车一定非常舒适，最好别拒绝法方建议，否则他们会认为我们瞧不起他们的火车。吉姆·哈格蒂和艾森豪威尔的秘书托姆·斯蒂芬斯同意我的意见。所以这次我们就没乘飞机而乘火车去巴黎。

我们抵巴黎时虽已深夜，戴高乐还是到车站迎接总统。这次不是国事访问，所以艾森豪威尔住在美国使馆，我住在克里荣饭店。该饭店总经理克劳德·勒梅尔西埃是我的老朋友，他象以往一样，安排我住得很舒服。艾森豪威尔在那里同戴高乐、麦克米伦和阿登纳会晤。四大国重申他们对柏林问题的坚定立场。在这个问题上戴高乐的态度尤为强硬。有一次，他当着我的面对美国人和英国人说：“我决不会不战而离开柏林。如果我动起武来，你

们是不会有选择余地的，是吧？”他们商定，翌年四月西方领导人在巴黎同赫鲁晓夫会晤。后来，这次会议成了U-2会议，因为美国U-2型侦察机被击落，这事就成为会议唯一的一项议程。戴高乐和艾森豪威尔的会晤象以往一样热烈友好，但新闻界纷纷推测，说法国想部分脱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倾向有所增长。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推测是有道理的。

飞机飞了一个半小时，我们到达另一站——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这里又要我当翻译了。在托雷洪空军基地，佛朗哥念了一篇热情的讲话稿，对总统表示欢迎。我们站在一个小小的高台上，我接连不断地低声给总统翻译。总统讲话时，我转译成西班牙语。十年后，尼克松总统再次在这里讲话时还是我当翻译。西班牙电台送给我一盒盒式录音带，是我翻译艾森豪威尔总统一九五九年那次讲话和尼克松总统一九六九年那次讲话的录音。

马德里欢迎群众很多，格外热情。我与总统和佛朗哥同乘一辆车。对当时的情景，我能说的只是一片高呼“佛朗哥万岁”的声音。许多人把他看成可恨的独裁者，但这个人显然深孚众望。关于此次访问的新闻报道中没有反映这一点，而这一点以及佛朗哥驱车穿过熙熙攘攘的欢迎群众的情景却给艾森豪威尔留下很深的印象。

在机场讲话中，艾森豪威尔反问道，他来自一个有许多州取名加利福尼亚、科罗拉多、佛罗里达、内华达、得克萨斯和亚利桑那的国家，在西班牙怎么可能感到陌生呢？这话正说到西班牙的以艾森豪威尔命名的广场。我不禁将之同巴黎相比。巴黎是由艾森豪威尔统率下的军队解放的，但这个城市中以艾森豪威尔的名字命名的只是一条没有楼房的小小街道。人们的感激之情是变化无常的。

这些美国的州名和拉美国家的一些地名相同，如阿根廷有一条河叫科罗拉多，墨西哥境内有个半岛叫加利福尼亚，西班牙南部有一个高原叫内华达。此外，得克萨斯一八四八年前属于墨西哥。

——译者

当晚，佛朗哥在东方宫设国宴款待总统。东方宫曾是西班牙国王居住的地方。佛朗哥不愿住在那里，宁愿住在离市区几哩以外的豹宫。豹宫比东方宫小得多，但还是很宽敞。拿破仑在东方宫封其兄弟约瑟夫为西班牙国王时对他说了这样一句话：“约瑟夫，现在你住的地方比我还好哩。”宾主在宴会上热情祝酒。宴会后有一个小演奏会，五名提琴手拉起斯特拉迪瓦里制作的小提琴——他们手中的无价之宝。

安东尼·斯特拉迪瓦里（1646—1737），为意大利著名小提琴制作者。

翌日（十二月二十二日）清晨，我同总统一起驱车去豹宫与佛朗哥会晤。见面后先进早餐，气氛十分轻松愉快，所以艾森豪威尔让我给佛朗哥讲个故事。那个故事他听我讲过，觉得很有趣。情节如下：

在拿破仑的军队中，有一个名叫杜邦的上校。此人特别勇敢，这在上校中是常见的；但又特别愚蠢，这在上校中却是罕见的。他是个将军迷，这在上校中很普遍。拿破仑说，他知道杜邦很勇敢，但他决不能让法国军队有那么一个愚蠢的将军。然而，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中，拿破仑看见杜邦带领卫队的骑兵冲锋陷阵，把俄国人和奥地利人一个个打得人仰马翻，胜利在望。忽然，杜邦的身子摇晃了一下，从马背上摔下来，原

来他中弹了。拿破仑深受感动，便派他的副官和外科医生拉瑞去救护。不久，年轻的副官骑马回来，对拿破仑说：“陛下，杜邦上校的脑袋被打穿了。子弹从一个耳朵进去，另一个耳朵出来。拉瑞说，他现在还有知觉，到傍晚就性命难保。”拿破仑想了一会儿说：“傍晚就会死去。这样吧，你去告诉他，我刚提升他为将军。”年轻的副官快马加鞭，直奔救护棚。这时，拉瑞正在给这位新将军治伤。他让杜邦喝了好几口白兰地，然后锯开他的头，把头盖放在桌上。他的大脑已散开，拉瑞正设法把它捏在一起，这时，副官冲进帐篷，宣布说：“拿破仑皇帝刚提升杜邦上校为将军。”杜邦喝了拿破仑的白兰地，酒意正浓。他的大脑还在桌上，但他闻到白兰地的酒气，听到了“将军”这个富有魅力的字眼，便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把头盖放回头上，踉踉跄跄地朝帐篷门口走去。拉瑞边追边叫：“我的将军，不能这样走啊。你的大脑还在桌上哩。”杜邦醉醺醺地回答说：“去它的吧。我当了将军，还要它干什么？”

在座的人——其中有些是将军——哄然大笑。佛朗哥也笑起来，诙谐地对艾森豪威尔说：“你注意到没有，那些不是将军的人笑得更起劲啊？”我没想到佛朗哥竟这样幽默。他还说：“现在的将军们这么差劲就因为他们是从最好的上校当中选拔的。”这句话引得在座的将军们放声大笑。后来，我们到佛朗哥的书房，简单讨论了美国的基地问题。佛朗哥认为，西班牙的经济形势正在好转，过不了几年就会象其它欧洲国家一样，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后来情况果真如此。艾森豪威尔问他对苏联人的意图有什么看法。佛朗哥心平气和地说了说，他对苏联人的意图作了一个最客观、最冷静的估计，即：避开大战而处处进逼，你退我进，这边严重受阻就向那边推进。他预言苏联人将千方百计破坏西方国家奋起抵抗的意志并打消他们认为有东西值得保卫的信念。在这方面，又证明了他是一位有真知灼见的预言家。多年以后，我又在这个房间里见到他，同他研究他去世后西班牙可能发生什么情况。他还是那样冷静，那样客观。

我们从豹宫乘直升飞机去托雷洪空军基地。直升飞机起飞时，佛朗哥神态自若。几分钟后，艾森豪威尔问这位西班牙领袖是否经常乘坐直升飞机。他说以前从未坐过，这回答使我深感惊讶。看他那镇静自若的样子，谁也不会想到他没坐过直升飞机。他和艾森豪威尔在机场热烈拥抱，然后艾克登上飞机。我在飞机后部相当大的机舱里靠窗而坐。

当飞机在跑道上慢慢滑行时，西班牙人和美国人向我们挥手告别。看到这情景，我说：“看他们的口形，我就知道他们大家在说什么。”飞机上其他的人信以为真，问道：“他们在说什么？”我回答说：“很怪，他们都在说同一句话。”“什么话？”大家都想知道。我口答说：“他们都在说，‘谢天谢地，他们可走了！’”这话引起一阵哄笑，但也许非常接近事实。总统的一次访问对于东道国和美国驻该国大使馆来说都是一次精疲力竭的经历。

我们继续飞往卡萨布兰卡，对摩洛哥进行访问。在这里，我们受到国王穆罕默德五世的欢迎。双方在机场发表了我记忆中最简短的讲话。然后两位国家元首驱车进城，成千上万的摩洛哥人骑马夹道欢迎。从山区来的部落土人骑马跟在车队旁边，对空鸣枪，使特工人员惊愕不已。他们从来没有在一位美国总统面前，听见这么多枪声。午餐的时候，王储哈桑走过来，跟我

谈起一九四二年那几次会面。我不知道他是真的记得，还是有人告诉他的。总统告诉摩洛哥人，我们将撤走在摩洛哥的空军基地。摩洛哥曾是法国的保护国，这些基地是法国人在那个时期给我们的。这次访问在非常友好的气氛中结束。

我还曾陪艾森豪威尔总统参加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在巴拿马举行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当时他因回肠炎动手术，尚未完全康复，正在疗养，但他仍决定前往参加会议。他认为，向拉丁美洲人民表明我们对他们的关心是十分重要的。他不屈不挠的勇气和责任感使他带病完成了此项任务。他接见了几乎所有与会的总统，当然我都在场。他参加会议或社交活动，我也总在他身旁，所以我知道他为此做出了多大的努力。

会议中途，要在巴拿马市商业区举行一个仪式，每个总统都将发表讲话。对艾森豪威尔来说，这将是好长一段难熬的时间。我正式被派去见几位总统，请他们讲话简短些，并请他们将此意转告他们的同僚。那几位总统都表示理解，并答应尽力去做。后来，各大国，如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的总统各讲了约三分钟。接着厄瓜多尔的当选总统何塞·贝拉斯科·伊瓦拉开头表示要说短话，但结果讲了四十五分钟。我不禁寻思，倘若他不决定说“短”话，他的讲话该多长呢？总统在会场上坚持下来了。贝拉斯科结束他的长篇演说后，我低声问艾森豪威尔：“总统先生，您还好吧？”他低声回答：“嗯，差点不行。”

会议期间，他轮流接见了与会各国的总统。参加会见的多米尼加人都佩带着几乎露在外面的零点四五口径柯尔特自动手枪，使特工人员深感不安。所有这些接见都由我作翻译。我还得写出每一次会谈的备忘录，作为会议记录。有几位总统，如尼加拉瓜的路易斯·索摩查·德瓦伊莱，英语讲得很好。但我为其他所有的人作了翻译，包括讲葡萄牙语的巴西总统儒塞利诺·库比契克和讲法语的海地总统让·马格卢瓦尔。

这次会议虽然没有取得看得见的、真正的成果，但很有助于向我们南面的邻邦再次表明，我们没有忘记他们，我们没有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欧洲和远东。他们注意到艾森豪威尔刚刚动过手术就来参加会议，认为这是美国对他们和他们的国家关心和友好的表示。

艾森豪威尔一向具有的魔力，对拉丁人一如对巴基斯坦人和德国人都是灵的。他努力突出美国作为一个公正、体面和可敬的国家的形象，但从没有赢得充分的称颂。他执政期间，我们在全世界受到尊敬，以后就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我永远忘不了这位老战士。他不知疲倦，置自身的健康于不顾，为促进和平事业和表明美国是自由世界的领袖和爱好自由国家的旗手而在世界各地奔走。

我多次随他出访，学到许多东西，并看到一个真正的美国伟人怎样为他的国家、为和平而奋斗，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他任职期满前好几个月，知道我急于想摆脱译员工作，就决定派我去罗马。一九六一年一月四日，我在罗马收到他离开白宫前夕给我写的一封信。这封信我将永远珍藏并为此感到自豪。总统在即将卸任、心中有那么多牵挂的时候还想到我，这表明了他特有的人品。他的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迪克：

在离白宫之前，我想再次向你表示深深的谢意，感谢你每

当我需要你和要求你给我帮助时，你总是如此慷慨地把你卓

越的才能贡献出来。长期以来你为我做的工作是极其宝贵的，因为你不仅精通你掌握的各种语言，而且对我们一起访问的各个国家的问题和背景情况了如指掌……

请向你母亲转达我最良好的祝愿。当然，我还要热烈感谢你，向你致以亲切的问候。

你的忠实的朋友，

德怀特·戴·艾森豪威尔（签名）

他在信末加了一句：“这封信的抄件将放入你的档案。”

我最后一次看见他是在沃尔特·里德陆军医院，那是在一九六九年二月十七日他逝世前不久。我看望他时，他满意地回顾他的一生。他对我说，他知道自己活不多久了，但无可抱怨。他童年时代的梦想大多已实现。

我从事口译工作已经做到头了。我想表明，我能管好自己这个部门，并担任一种能用得上我懂的几种语言的职务，但那几种语言并不是我将来所需要的一切。艾森豪威尔总统知道我的想法，并帮助了我。于是，我怀着感激的心情离开这位伟人去任新职——到罗马去当武官。我感激他给我机会，使我能如此密切地同他一起工作了这么长时间。

六、陪同尼克松副总统访问南美

——利马和加拉加斯的暴力行动

阿根廷多年来第一个经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一九五八年如期举行就职典礼。美国对阿根廷还政于民感到高兴，根据历来派遣一名高级政府代表参加这类典礼的惯例，决定委派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作为代表参加阿图罗·弗朗迪西总统的就职典礼。这一消息宣布后，许多其他南美国家也向尼克松先生发出了邀请。由于尼克松在一年前已访问了巴西，这次当然不再去该国访问了。这时，在利马的美洲大陆上最古老的圣马科斯大学——这所古老的学府的创办时间比美国任何一所大学将近早一个世纪——邀请尼克松先生前去演讲。发出邀请的还有其他国家：乌拉圭、巴拉圭、玻利维亚、秘鲁、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美国认为，这次访问将表明我们对拉美邻国仍感兴趣，而驻上述国家的大使亦都强烈敦促副总统接受邀请。华盛顿发表了接受邀请的声明，有关国家政府对此均甚为满意。但当时对某些消极因素也许估计不足。美国政府在国内团体要求保护其利益的压力下，曾采取了某些保护性措施，结果引起了许多拉丁美洲国家人民的强烈愤怒。例如，美国对进口委内瑞拉石油作了一定的限制。而在加拉加斯暴力事件发生以后，据说有许多委内瑞拉人因此失业。共产党人知道尼克松是一个坚定的反共分子。因此，他们不愿失去这一机会：企图通过暴力行为，使尼克松信誉扫地，如能使他蒙受耻辱，当然就更好了。怀有这种意图的不仅仅限于共产党人。自称不依附于莫斯科的所谓新左派，在其它地方还没有露面之前，就在拉美出现了。当时，新左派为了给任何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辩解，便拿美国当作现成的替罪羊，就象它目前所做的那样。

有个外国人曾向我讲起他们国家的一句谚语：“下雨了，怪奥政府！不下雨，也怪奥政府！”他说，如今这句谚语已改为：“下雨了，怪臭美国佬！不下雨，也怪臭美国佬！”此外，还有一个消极因素，就是南美大陆上的人普遍认为：美国对泛美主义理想只是一味空谈，其真正利益在欧亚。他们觉得自己象一个前娘养的孩子，非得通过使用某种暴力，才能引起美国的注意。遗憾的是，这种看法确有一定根据。拉丁美洲有许多人看到美国富强，而自己的国家却不是如此，于是便认为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是美国的过错。

不少非左派人士也持有这一观点。许多极右分子也把这当作福音书中的真理一样。左右两派的极端主义者，在许多问题上的观点往往相去不远。

当时，美国政府是了解这些情况的，但也许它看得并不象我说得这样直截了当。政府曾考虑过这些因素，最后仍决定进行访问，因为这样做符合美国的最高利益。

我随同尼克松副总统去南美访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我和他第一次接触很不寻常。一九五八年四月初，我在佛罗里达州度假，当我驱车从迈阿密去棕榈滩时，一名州警察在公路上追上了我。我一直很注意遵守汽车的时速限制，因此当他打信号叫我停车时，我吃了一惊。停车后，他问我是不是弗农·沃尔特斯中校，我说是的，他便要我赶紧给白宫挂个电话。于是我在下一个服务区停下车来，打了电话。总统的军事副官罗伯特·舒尔茨告诉我，经艾森豪威尔总统建议，我将随同副总统尼克松先生去南美访问，并由我担任他的副官兼翻译，我们将于四月二十六日离开华盛顿。我不明白究竟有什么必要非得在路上紧急通知我不可，但我对于进行这次有趣的旅行，并有机会见到副总统，这使我感到很高兴，因为以前我还从未见过尼克松先生。

这次旅行的第一站是蒙得维的亚。临出发前，我获悉我将不和副总统同机前往，而是和陪同他参加阿根廷总统就职典礼的一个小组，同乘一架空军 C-118 型飞机。该小组包括参议员蒙扎亚，当时他是国会议员。由于这架飞机只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所以从那儿到蒙得维的亚，我只得改乘班机。我一到乌拉圭首都机场，就有一名使馆人员来接我，并告诉我马上去乌拉圭国会大厦，因为副总统准备在那儿讲话。于是我立即赶去。

当我走进国会大厅时，尼克松先生即将开始他的讲话。甚至还没有来得及把我介绍给尼克松，他就开始讲话了，而我对他要讲些什么，事先一无所知。对一个翻译来说，如果以前曾给某人当过翻译，那么，第二次再给他做翻译就容易得多。但这次，因为我一下飞机就直奔这里，身边连作速记的纸都没有带，这样，当尼克松先生讲了很长一段，停下来让我翻译时，我只得尽力凭记忆来翻。这次讲话受到了乌拉圭人的热烈欢迎。随后，当尼克松先生跟国会议员交谈时，也由我给他翻译。接着，我们又拜访了国务委员会，这里的政府机构有点像瑞士，当时，乌拉圭以这种机构取代了总统制。以后，我被指令随时跟随尼克松先生，共坐一辆车，同乘一架飞机。我也见到了尼克松夫人，她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富有魅力、举止文雅的女人，后来她还显示了非凡的勇气。

在访问蒙得维的亚期间，参观大学也许是一项最有意思的活动。尽管大使馆很担心，但尼克松先生还是在那里同一群有反美思想的大学生机智地进行了辩论。我为双方这场连珠炮式的交锋担任了翻译。尼克松先生欣然同意参加这种方式的辩论，他在辩论中表现得如此神态自若，以及他胸有成竹

的态度，使大多数学生不得不十分佩服。辩论开始时，气氛不甚友好，但到后来，却以握手和拥抱而告终。不管学生对美国抱有何种政治态度，他们对副总统居然抽出时间来与他们进行辩论，显然感到高兴。我也感到高兴。

后来尼克松还在其它地方进行类似的辩论。

我们乘坐副总统的专机从蒙得维的亚直飞阿根廷首都。在这儿，我们受到了威勒德·包拉克大使的接待。一九四八年在波哥大时，我就认识了这位大使。这次，尼克松先生和他同住使领馆官邸，其余大部分随行人员，则住在古老而又漂亮的普拉萨旅馆。第二天是个宗教节日。清晨六时，我来到旅馆附近的一个教堂，我惊讶地发现副总统的秘书罗丝·玛丽·渥茨和他的空军副官唐·休斯少校也在那儿。我们都是单独偷偷溜出来的，但又一起回到旅馆用了早餐。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访问期间，尼克松先生的正式拜会活动均由我陪同，但没有让我陪他去参加弗朗迪西总统的就职典礼。包拉克大使会讲西班牙语，他向我保证说，一切都由他负责。结果他带着副总统去参加典礼时，竟迟到了十分钟。这件事曾被广为传播。

副总统对此很为不安，但包拉克大使却反而无所谓。

参加就职典礼后，尼克松对大使很不满意，便改为由我陪他前去阿根廷总统府玫瑰宫。我们从那儿的阳台上观看总统就职典礼的游行队伍。在游行过程中，发生了一起大规模的庇隆分子的示威活动。数以千计的人模仿埃娃·庇隆的姿势，并挥舞着小白手绢。

许多带着庇隆夫妇肖像的小气球飞上天空，在游行队伍上空飘荡，但没有发生暴力行动。

尼克松先生参观了由弗朗迪西总统的兄弟任校长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校长的政治观点非常左。在校园里，尼克松先生又和学生进行了辩论。这次辩论进行得特别活跃。

我为这场一来一往的唇枪舌剑翻译，简直有点招架不住。总的来说，象在蒙得维的亚一样，这次辩论给学生们留下的影响是积极的。尼克松先生没有对学生摆什么架子。他显然很了解这一情况，而且关于他的形象并不象学生过去心目中所想象的那样。学生们印象最深的是，他在阿根廷逗留期间，竟然还抽出时间来与他们谈话。

尽管庇隆分子吵吵嚷嚷，举行了示威游行，尽管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墙上到处都被画得一塌糊涂，但人们还是能感到立宪政体确实回到了阿根廷。临时总统佩德罗·欧亨尼奥·阿兰布鲁将军已率领部队回到兵营。阿兰布鲁是一个气宇不凡的军人和政治家。他秉公无私，并没有想在政府里长期做官的野心。后来，他遭到极端主义分子残忍的谋害，死得很惨。他给我们所有的人都留下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尊严的印象。

我们从布宜诺斯艾利斯乘飞机前往内陆小国巴拉圭的首都亚松森。在途中，我向尼克松先生简单地介绍了斯特罗斯纳总统的情况。以前，我曾陪同其他显要人物在这里访问，对他很了解。我从自己过去的经历中，给尼克松提供了有关他将要会见的许多重要人物的情况和趣闻。对此，尼克松先生是非常感激的。

斯特罗斯纳总统在机场上迎接了我们。检阅了服装笔挺的仪仗队以后，我们就驱车前往亚松森。我住在格兰德饭店，这里原来是十九世纪巴拉圭独裁者罗佩斯的情妇埃莉萨·林奇的寓所。饭店里的旅客住得很挤，分配我住

的那间房间只有一张床，而另一位官员也分配到这个民间来住，于是我们不得不用抽签的办法来决定谁睡床铺，谁睡地板。

结果是我睡了地板。

在一块准备修建美国大使馆办事处的空地上，演员们为尼克松先生表演了瓜拉尼民间歌舞。其中有一个节目，是表演者将一个空瓶顶在头上的舞蹈。在亚松森，没有遇到什么特别棘手的麻烦，老百姓的欢迎是热烈而友好的，斯特罗斯纳和巴拉圭人对副总统的访问都感到非常高兴。我们安然结束了对巴拉圭的访问。

下一站是玻利维亚的拉巴斯。我们从海拔只有几百英尺的巴拉圭首都乘飞机前往位于世界之巅、海拔达一万三千英尺的玻利维亚首都。同其他各段行程一样，尼克松先生也随身带了几名记者，并在飞行中同他们进行简短的交谈。记者们同副总统谈话后，回到尾舱喝酒。忽然间，有人想知道驾驶员准备何时给机舱减压，以适应拉巴斯一万三千英尺的高度，于是我走进驾驶舱，去问驾驶员。他回答说：机舱压力早已定到一万三千英尺（他说话时已戴着氧气面具）。我回到尾舱告诉了记者。不管感觉如何，他们已经身在海拔一万三千英尺的气压中了。几分钟后，其中有一个人感到气喘，另一个人觉得头痛。而这些症候，只是在他们知道自己所处的高度之后才感觉到的，看来这是一种巨大的心理作用。一飞机在拉巴斯爱鲁阿尔托机场降落，一下飞机就看到一块用英文和西班牙文写的牌子：“拉巴斯爱鲁阿尔托，海拔一万三千英尺，世界上最高的商业机场。”有位记者一见这牌子后，当即昏了过去。

玻利维亚法定首都为苏克雷（Sucre），但政府所在地在拉巴斯（La Pas）。这里所说的玻利维亚首都，指拉巴斯。

——译者

我们在数以千计手持旗帜大声欢呼的人群中乘车驶向拉巴斯。人群中夹杂着很多头戴圆顶礼帽或圆顶硬礼帽的玻利维亚妇女。这里的欢迎场面也十分盛大、热情和友好。

但美国报纸对此却很少报道，似乎只报道了此行的消极面。我相信。就在这次访问中，尼克松先生开始感到新闻界对他怀有很深的成见。一九六二年，尼克松在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失败后，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流露了这种情绪。

在拉巴斯，我亲身领教了尼克松先生的精力。在一天之内，他向不同的团体作了十一次演讲。我所以能记住这个数目，是因为我要把每篇演讲用西班牙文重复一遍。

在拉巴斯市政厅向副总统赠送该市钥匙时，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市长先用西班牙文向尼克松先生致欢迎词，我在副总统耳边悄悄地作同声传译。尼克松先生致答词后，我再大声地将他的话翻译给市长和市议员。赠送钥匙后，一位印第安人酋长——他头戴一顶高原之国的阿伊玛拉印第安人特有的帽子，这种帽子又称为“楚诺”。他开始用阿伊玛拉印第安语向尼克松先生致欢迎词，但由于我对这种语言一窍不通，一时感到不知所措。正在这时，突然有人在我左耳旁轻声地将酋长的话翻译成西班牙文，原来是一位身材矮小的玻利维亚人正踮着脚尖在给我翻译，我转身又用英语对尼克松先生说：“我们玻利维亚的印第安人，为能使用我们祖先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就已经使用了一千年的语言向你表示欢迎而感到骄傲。”尼克松先生懂一点

西班牙文，他知道这位酋长讲的不是西班牙语，于是他惊愕地看了看我，因为他看不到帮助我摆脱窘境的那位矮小的玻利维亚人，还以为我是直接将阿伊玛拉语翻译成英语的呢。我们离开市政厅后，他在汽车里问我是在哪里学的阿伊玛拉语，我听后忍不住笑起来，并将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他很满意。但使他感到可笑的是：几天后我们在美国报纸上读到这样一条消息：“使每个人感到惊讶的是，沃尔特斯上校翻译阿伊玛拉语竟象他翻译西班牙语那样不费力气。”

阿伊玛拉 (Aymara)，原为上秘鲁印第安人，文化比较发达，后被西班牙人征服。

——译者

虽然我终日不离副总统，陪他到处活动，但并不觉得拉巴斯的高度对我身体有什么影响。事实上，由于我整天忙忙碌碌，根本没有功夫去检查自己呼吸是否急促。然而，当我夜间躺在床上时，可以感到我的心跳动得比较剧烈，好象是由于我已处在地球王常大气压一半多一点的情况下，因而要求补偿一些氧气似的。尼克松先生对拉巴斯的访问非常成功。玻利维亚人对美国和其它国家的达官要人越过他们国家的领空去访问南美其他国家的做法，早就习以为常，因为人们不愿去尝试一万三千英尺高度的严酷气候。

我们从拉巴斯乘飞机于当天下午就抵达了秘鲁首都利马。我们在机场受到了由许多著名人士所组成的代表团的欢迎。举行通常的机场仪式后，我们便乘车进入利马市。副总统一行下榻在位于秘鲁首都中心的圣马丁广场上的玻利瓦尔 饭店。使馆办事处在广场的对面，我们在那里会晤了美国大使特德·艾基利斯和使馆其他成员。按照日程，副总统要到圣马科斯大学去参观，该大学的一个学生团体早已宣布他是不受欢迎的人，因此人们很关心此事。使馆大多数官员劝阻尼克松先生不必前去，他们认为，如果他去，就会发生不愉快事件。大使认为，既然副总统几个月前就已接受该大学的邀请，那么，他起码应该去试一试。但是，几乎所有在场的人都强烈反对副总统做这种尝试。最后，尼克松先生征求我的意见，因为我曾在南美生活过多年，了解当地的情况。我回答说：不同的国家重视问题的角度不一样。譬如在法国或比利时，聪颖被视为最大的优点，而愚笨则被视为最大的缺点。但是，在任何一个讲西班牙语的国家，被视为最大的优点是勇敢，而最大的缺点是懦弱。如果尼克松先生认为不应该去，那么，我觉得还不如干脆取消此行，并宣布由于国内事务，应召回国。我建议他按计划去圣马科斯大学，并补充说：“我能这样坦率地向你提出这个建议，是因为如果你去，我必将同车随你前往。”尼克松先生决定于次日访问该大学。大学校长那时虽有满腹疑虑，但并未撤销对副总统的邀请。尼克松先生说，如果他数周前接受的这一邀请没有被撤销，他至少得去走一趟。

玻利瓦尔为十九世纪南美的一位反对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的民族英雄。

——译者

当我徒步穿过圣马丁广场回到玻利瓦尔饭店时，饭店外面已聚集了一大群人，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是不友好的，笼罩着一种敌视的紧张气氛。回到饭店后，尼克松先生正派人来找我。他对我说，在参观大学问题上，他同意我的观点，并如我所预料的那样，我将和他同车前往。必须承认，尽管我对可能产生的后果感到有些担忧，但如果尼克松先生从这里“偷偷溜走”，

我将更感到失望。

第二天，在一大批警察的护送下，我们驱车前往圣马科斯大学。校方最初向副总统发出邀请时，并没有考虑到左翼学生团体出来捣乱，更没有估计到这些学生如此好斗。

在副总统到达利马前一、两天，一些学生开会宣布：如果尼克松准备来这里，他将是不受欢迎的人。正是这项宣布引起了我们在使馆对副总统是否应该参观该大学的那场讨论。

校长通知我们，他自己对可能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也无把握。当尼克松先生询问这是否意味着他撤销邀请，校长答复说，他不能这样做。汽车快到学校时，我们远远看到校舍前聚集了几千名学生。等车开近校舍，我们发现有不少学生年龄已有三十多岁。当汽车在他们前面停下后，人群中立刻响起了一片喧闹的嘘叫声。许多学生打着小旗或举着牌子，上面用西班牙文写着：“尼克松滚出去！”有一条用英文写的标语是：“尼克松滚回去！”还有一条是：“美国佬滚回去！”有一条用西班牙语写的标语，竟把尼克松先生叫做驴子。尼克松看到了这条标语，并问我：标语中是否把他叫做驴子。我回答说是的，他说，作为一个共和党人，他最不愿意别人管他叫驴子。警察非常紧张，他们使劲将学生从汽车旁推开。充满敌意的呼喊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副总统无法以自己的声音去压住这种呼喊。我们乘坐的是一辆敞篷车，他叫我站起来，用西班牙语问学生，他们肯不肯听他讲话。我照他的话问了，为了使人群能在嘈杂声中听到我的话，我放开喉咙用力地喊，结果却引起了一片更大的嘘声。这时尼克松对我说：“你问问他们是否仍然惜守旧有的大学传统：只有在听完讨论双方的意见后才能下结论。”我用最大的劲拉开嗓门将他的话翻译成西班牙语。然而，引来的仍然是一片嘲笑声。尼克松先生离开车座站了起来，叫我跟着他，下车后，他迈步走进笑骂的人群中。那些学生和警察以及我自己都对尼克松先生的这一举动感到惊讶，警察开始把学生往后推。尼克松问我西班牙语的“不要推”怎么说，我告诉了他，他听后使用西班牙语多次告诉警察不要去推学生。他走“进发出一片嘘声的学生中间，并伸出手去。对于尼克松所显示的这种勇气，许多学生的脸上露出了钦佩但又局促不安的笑容，他们纷纷上前同他握手。那幅场面看起来真有意思。接着更多的学生围拢过来，争相同他握手。警察再次推赶人群，但尼克松告诉警察不要这样做。这时，一些学生告诉尼克松先生，他们和他并无个人恩怨，他们反对的只是美帝国主义。尼克松主动来到学生中间所产生的这种反应使我惊讶不已。那些站在后面的学生既看不到也听不到这边发生的事情，于是他们就向尼克松所站的方向乱掷小石子、水果和鸡蛋，但他们却不知那些站在前排的学生正在抢着和尼克松握手。由于扔过来的东西纷纷落到我们近旁，我就悄悄对尼克松先生说：“副总统先生，他们在向我们扔石子和水果了。”他也悄悄答道：“知道了，我们很快就走，但要慢慢离开，切不可失掉尊严。”从人群的数量和大多数人的情绪来看，要进入这所大学显然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使用武力，但尼克松先生拒绝采用这一办法。我们开始慢慢地向汽车走去。我穿的是军服，但使我惊奇的是，竟有不少学生来和我握手，并用西班牙语说：“美国佬有男子汉气概！”这在西班牙语中要算是一句最高的褒奖了。我们走向汽车时，尼克松先生告诫警察，不要粗暴对待学生。有些学生还友好地拍了拍尼克松的后背。我们坐进汽车后，尼克松还站起来向学生们挥手力果这时有人向他瞄准，那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很多学生也向他

挥手。

我们慢慢地驶离大学返回旅馆。这是事先计划好的，一是准备一旦无法进入大学时的办法。尼克松先生在大学里所目睹的这种偏激情绪，使他感到十分愤怒和失望，然而，对于靠近他身边的那些学生的反应，却又使他感到高兴。在他身上，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任何焦急或恐惧，但在我们回旅馆的路上，我可以从他脸上的严峻表情，看出他多么失望。我对他说：“先生，你到这所大学去过了。他们至少能看到你并没有被他们所吓倒。”他笑了笑说：“你看到他们是怎么抢着同我握手的吗？”他说这句话时似乎情绪有所好转。于是我又说：“他们可能不赞成你的政治态度，但他们至少知道，你并不怕他们。”谈话间，汽车驶过一些高大的建筑，他问我这些大楼是什么机构，我告诉他是利马另一所有名的大学——天主教大学的校舍。

突然，尼克松先生厉声说：“停车！”汽车停下后，秘鲁警察和便衣警卫都用期待的目光看着副总统。他叫我跟他一起下车，并登上了通向天主教大学主楼的台阶。按照活动日程，我们不该在这里停留，当然也就没有人出来欢迎我们。尼克松先生健步如飞，几乎用小跑的速度拾阶而上，走进大楼的门厅。这里除了几名惊慌的学生外，几乎空无一人。他走上了二层楼，打开了一个教室的门。里面正在上课，教授大吃一惊，全班学生都抬起头来惊讶地看着我们。当这位教授认出他是美国副总统后，便停止讲课。尼克松先生举起手来说：“我刚刚从圣马科斯大学来，我看到在那里的学生并不恪守昔日的大学传统；要听完讨论双方的意见后再行动。但是，我在利马的时间只有一天了，我也很想知道天主教大学是否也不惜守这样一个传统。”我立刻将他的话翻译成西班牙语。

话音未落，学生们便不约而同一窝蜂地向他拥去。这时，秘鲁警察和便衣警卫也赶到，使他们感到着慌的是，学生们把尼克松抬到肩膀上，口里还用西班牙语呼喊：“尼克松万岁！”“美国万岁！”我尽量使自己站得离尼克松近一些，以便为他和那些抬着或者说是护卫着他的学生们之间的友好交谈进行翻译。那位教授兴高采烈地也跟着我们一起往前走。学生们洋洋得意地将尼克松抬到汽车旁才把他放下来。他们的行动已经解答了他的问题。尼克松和学生说了几句开玩笑的话后告诉他们，他很高兴看到天主教大学的这种宽厚态度，这是他在另一家更为古老的大学所没有看到的。在我把他的话译成西班牙语后，学生们呼喊表示同意。尼克松和他们挥手告别后，便坐进了汽车。

我和他同坐一辆车。当汽车慢慢驶离仍在欢呼的学生时，他亦频频不断向他们挥手致意。有一位随团记者塔德·苏尔克——他当时并不崇拜尼克松，以后更没有崇拜过他——一边跟着车跑，一边喊道：“副总统先生，干得漂亮！”尽管我和苏尔克之间很少有意见相同的时候，但必须承认，我是赞同他的话的。我当时的心情同我陪伴哈里曼先生——他属另一派政党——在波哥大和德黑兰时所产生的心情是一样的。我为我国一位重要的政界人物表现出这样的勇气，不禁产生出一种自豪感。很明显，不论在民主党内还是共和党内，我们都不乏这样的人物。

这件事像春风一样，很快传遍了利马。这一天，不论副总统走到哪里，都受到极其热烈的接待。他出席了秘鲁商人为他举行的一次午宴，稍后，又出席了一个大型记者招待会。我们在利马参观时，只要有人向我们提出刁难的问题，那么他的声音便立刻被人们压下去。在一个讲西班牙语的国家，尼

克松已经受了必须经受的最大考验，表现了勇气。他在卡亚俄港向一群码头工人发表了讲话。他讲到圣马科斯大学事件时说道：这清楚地表明了共产主义的丑恶嘴脸。这时人们向他热烈欢呼。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特别指出：上述事件是对秘鲁、秘鲁的解放者圣马丁以及所有维护自由的人的一个侮辱。

他的话赢得了秘鲁记者们的喝彩。

第二天，我们飞往基多。它海拔一万一千英尺，是安第斯山脉中另一个高山之都。

副总统在机场受到热烈的欢迎。在通往基多的公路两旁，人们夹夹道欢呼，那是一幅热烈而令人鼓舞的欢迎场面。尼克松几次停车同欢呼的群众握手。在尼克松正式拜会了卡米洛·庞赛·恩里克斯总统和其它政府官员之后，我们便到美国使馆听取汇报。在这之后，尼克松提出要穿过市中心去散步，这使便衣警卫和厄瓜多尔人感到意外，因为日程上并没有这项活动。散步时，我跟随着尼克松，路上不断有人走上前来同他握手致意。

在一条大街上，他忽然看到一家理发店，他决定进去理发。他坐在理发椅上对我说：“叫理发师给我修修边。”我把他的话告诉了理发师，而他已被这位不速之客的到来楞住了。这时，门外聚集了一大群人，来观看如何给美国副总统进行“修剪”。我幸好随身带着一点厄瓜多尔钱，付了理发费，还给了理发师一笔可观的小费。开始他不愿接受，他表示这件事本身已使他感到荣幸之至了，但最后我还是说服了他，副总统还为他签字留念。理发时，副总统不停地向理发师了解厄瓜多尔的情况，还问他有什么困难。理发师高兴地用西班牙语对我说：“这下子，我这家理发店可要变成金矿了。从现在起，我准备将店名改为‘尼克松理发店’。”后来，他确实这样做了。一年后，当我再次到基多时，我看到“尼克松理发店”的招牌已高高悬挂在店外。走出了理发店，我们又徒步去看了一场当地的足球赛。在这里，尼克松又被人们认了出来，于是又受到一番热烈的欢迎。基多市民对我们真是再友好热情也没有了。

厄瓜多尔前总统加洛·普拉萨讲的英语完全像个地道的美国人。他对尼克松先生说，尼克松到圣马科斯大学去参观，并同蒙得维的亚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学生展开辩论，这样做是对的，显示了他的理智和勇气。由于学生不能找到权威人士来听取他们的意见，因此，他们往往带有情绪。我们在厄瓜多尔听到一个消息：利马圣马科斯大学在一次全体学生大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学校内所发生的那次事件。由于群众指责了他们，因而使他们感到压力不小。不论是在哪个国家或哪所院校，有一件事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些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学生，组织严密，具有很强的战斗性。他们还知道怎样去利用大多数人的冷漠态度，同时他们又是将少数人装扮成代表大多数人的能手。

我们在基多收到了一份令人不安的报告：有人预谋在尼克松先生访问波哥大和加拉加斯时，将采取暴力行动。十年前，我曾陪同马歇尔将军到过波哥大，过去的经历使我对那里的形势尤为担心。何况十年来，哥伦比亚一直在进行着一场局部内战，发生了很多暴力和流血冲突，这一事实更加重了我的忧虑。然而，我们在波哥大受到的接待却是热情友好的，局势是平稳的。军人政府刚刚推翻了古斯塔沃·罗哈斯·皮尼利亚独裁政府。其成员在嗣后的自由选举中，选择了阿尔贝托·耶拉斯·卡马戈这样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担

任总统。波哥大海拔八千英尺，也是安第斯山脉中的一个高山之都，但这不论对代表团的成员还是对随团记者来说，都算不了什么了。波哥大的变化使我感到惊奇，城市规模扩大了，在通往机场的公路两旁，盖起了很多高楼大厦。我们按照日程不论到哪里去参观，人们都非常友好。圣马科斯事件帮助了我们。事实上，那些敌视美国的示威，并不都是由共产党人煽动起来的，很多国家对美国所采取的各种经济措施颇为不满，美国这样做的原因，或是由于国内压力，或是对这些措施在某些穷困的南美国家所产生的后果一无所知。在哥伦比亚访问期间，副总统拜访了一位颇孚众望的天主教牧师，并观看了由他组织的一个旨在消灭这个国家的文盲的广播节目。他是一位将全部精力献给扫盲事业的人，节目安排得很周到。哥伦比亚准备结束军人统治，把政权移交给刚刚选出来的文官总统。拉丁美洲的军人力量是这一地区的稳定因素，也是对共产党人实现其野心的一个障碍。据我看，共产党人最大的本领就是抓住一项正义事业，并利用它来动员许多善意的非共产党人，让他们不仅支持这一正义事业，而且还支持其为该国制订的全部共产主义纲领。南美的大多数国家，除军人外，只有共产党人及其朋友有严密的组织。

他们有明确的动机，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和目标，他们不断训练自己所需要的干部，让他们渗透到学生、工人、教会和知识分子等不同组织中去。人们不能不钦佩他们的组织能力和热忱，当然还有他们的勇气。但是，这些青年人拿自己的全部勇气和献身精神去为本质上是邪恶的事业服务，这对世界来说是个悲剧。美国繁荣富强，而许多比我国稍后获得独立的国家却并非如此，这一事实也使人们感到失望，并产生嫉妒。因此，他们想找个替罪羊，而最现成的答案是：美国在某种程度上应对此负责，因为美国使这些国家成为经济力量极为虚弱的原料供应国。所有这些因素都使南美国家很容易煽起反美情绪，而我们的愚昧无知，又往往促进这些因素的发展。

我们于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三日离开波哥大，飞往相距不远的加拉加斯。我们被告知说，那里有可能发生问题和暴力行动。我们在飞行途中几次收到美国驻加拉加斯使馆的告诫：为抗议尼克松副总统的这次访问，当地将在他抵达时举行暴力示威游行。由于飞机上装有一台单波段收发报机，我们可以与华盛顿的家属直接通话。我同母亲通了话。

母亲问我到了什么地方，我说正在从波哥大飞往加拉加斯途中。她说：“我的上帝，那儿有刺客在等着呀！”我听了这话心中很不轻松，因为我们已经收到过一份十分令人不安的报告，说有人将要把一枚白磷炸弹扔进副总统的车内。白磷是一种非常讨厌的东西，它能把人烧成灰烬，根本无法扑灭。

我们的飞机在加拉加斯的迈克蒂亚机场降落。当飞机滑行到跑道尽头时，我看到机场大楼的楼顶上和主停机坪周围站满了人。他们象是拿着旗子，边喊边挥舞。机舱门打开后，我紧跟在尼克松副总统和他的夫人后面走出机舱。我能听到敌意的叫骂声，并辨认出标语上写的：“尼克松滚回去！”“美帝国主义和尼克松一起滚出去！”还有其它一些类似的敌意的口号。这时，副总统扭过头来问我：“他们在叫喊些什么？”我回答道：“这群人是反对我们的，副总统先生！”我们走下舷梯到了地面后，看到委内瑞拉当局派来的人正在欢迎我们，为首的是委内瑞拉外交部长文图里尼先生。这时，示威者的嘘声、叫骂声连成一片，副总统转过身来对我严峻地说：“我不准备发表通常的机场演说了。”示威人群不但站在机场大楼的楼顶上，连阳台上也有。副总统与美国大使以及在场的要人握了手，然后向机场的机械师组走去。

他们都神情严肃地站在那里。

副总统也同他们一一握了手，这时他们才露出了一丝笑容。我记得，当时我曾希望他们不要来检修我们的飞机。在乐队演奏《星条旗歌》的整个过程中，嘘声、叫骂声震耳欲聋，一直没有中断。在乐队奏起委内瑞拉国歌时，我本指望吵闹声会逐渐消失，因为在每个拉美国家，演奏国歌是一件十分庄严的事，通常会受到所有人的尊重，不管其政治上属于什么党派或何种信仰，但加拉加斯那次的情况却不然，演奏时，叫骂声照样不断，而且叫骂声之高，同演奏《星条旗歌》时完全一样。奏完国歌，我们便穿过机场大楼走出去。奇怪的是，委内瑞拉人没有把汽车停在停机坪附近，而是停在离我们很远的大楼那边。当我们穿过大楼时，那些站在阳台上示威的人就从头顶上向我们吐唾沫。唾沫密如雨点，简直无法躲避，二、三层，甚至三层以上的阳台都站满了人。我们压住心中怒火穿过了大楼。我看出尼克松副总统极为恼火，我也由于生气和感到无可奈何而差一点失去了控制。这帮家伙眼看着我们无力还击，眼看着警察对骚动听之任之而显得极为得意。警察对这一切无动于衷，好象什么事也没发生。

副总统的汽车已停在那里，当地警察把一大群示威者拦阻在离副总统约四、五英尺远的地方。他们无法靠近他，但照样能吐唾沫、起哄、骂人。雨点般的唾沫又开始掉在副总统及其夫人和我的身上，有的甚至溅到了委内瑞拉外长身上，但他似乎并不介意。

我和副总统、委内瑞拉外长一起坐前面的那辆车，副总统坐在后排右手，外长坐在左手，我坐在外长前面的折叠椅上，副总统前面的折叠椅上坐着一名保镖，另一名保镖与司机一起坐在前排。当我们的车子穿过嘲笑叫骂的示威者，离开机场大楼之后，委内瑞拉外长转向尼克松先生，苦笑着说：“请你别把这件事情看得过于严重。这不过是出于一些年轻人的兴奋心情，他们在佩雷斯·希门尼斯独裁统治的漫漫长夜后，呼吸到了醉人的自由空气。”尼克松先生看了看外长身上、他自己和我身上的唾沫，冷冷地答道：“如果你们不学会控制这些暴民，将会出现另一个独裁政权。到那时，相形之下佩雷斯·希门尼斯也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了。”委内瑞拉外长突然把话题一转，指给我们看眼前的漂亮的公路。这条公路从机场附近的沿海地区通往海拔三千英尺的加拉加斯市区，它沿着海边的陡坡蜿蜒上升，途中景色颇引人入胜。外长告诉我们，这条路的造价高达每公里数百万美元。对于美国副总统刚才受到极大的侮辱，而那些委内瑞拉警察却呆在一旁，几乎袖手旁观，他仿佛毫不介意。我发现四周没有军队，一切保卫工作似乎都交给了警方。一路上还算平静，汽车在滨海公路上疾驰，很快就进入了加拉加斯的新建设区。在我们前面还有几辆小汽车，一辆满载着新闻记者和摄影师的大卡车就走在我们前面。我们驶抵加拉加斯市郊时，发现在高速公路上停着两辆被人扔下的小汽车，而路中央的安全岛又很高，无法越过它到另一条行车线上去。我们的车不得不随着前面的卡车停下来。

这时，从公路两旁的灌木丛中涌出来一大群人，手里都拿着棒球棍、铅管和石头。我始终没搞清楚，原先护卫我们的摩托车队这时跑到哪儿去了，反正都不翼而飞了。暴徒们开始用铅管、棒球棍击打我们的车子，而坐在一辆正在被人敲打的、车门又紧闭的汽车里，就象坐在一个鼓里一样。副总统保持着异乎寻常的冷静。尼克松夫人正坐在我们后面的那辆车里注视着眼下所发生的一切。几个保镖走到我们汽车周围，他们既想要保护车子，又

怕伤害了委内瑞拉人，但当暴徒猛击车窗并想敲碎玻璃时，保镖们便将他们拦开。

坐在我旁边折叠座上的那位保镖拔出枪来说：“让咱们打死他几个王八羔子离开这里吧！”尼克松先生却非常镇定地对他说：“把枪放下！等他们打开车门要抓我时，你再拿枪，现在别拿，我不叫你开枪，你就别开！”保镖听了他的话，把枪收了起来。

这时车窗外面那一张张气愤的脸孔也真值得一看，愤怒、仇恨、恶狠狠的表情简直使人觉得可怕。我看见一个男人的大衣掀开了，一支手枪掉到地上。当时我弄不清楚他究竟是捣乱分子呢还是警察，后来才知道他原来是一个警察，但他并没有为保护我们免受这些恶棍的伤害而出什么力。

尼克松先生镇静地坐在后面座位上。我们前面那辆车上的摄影师，对这场围攻看得一清二楚，一个劲儿地忙着抢镜头。记得我当时有点惊慌，不知所措。我担心自己会被打得鼻青脸肿。但始终没有人开枪，这多少使我放了心，我并不认为有人会要我的命。

一般说来，怕遭人杀害时会引起最恐惧的心理。我的这种想法也许是天真的，没有什么道理吧！

委内瑞拉外长的神色非常不安。他坐在后面座位上，说话有点语无伦次。当一块石头打破了他身边的车窗、玻璃碎片飞溅到他身上时，他简直要发歇斯底里了。我我还记得有一个男人站在车外，手里拿着一大块金属制品，看上去象一个炮弹壳的底盘。我希望他把它扔进另一边的车窗里去，别往我这边扔。他卓然往那边扔去了。正当我从我这边的车窗往外看时，从人群中飞来一块石头，正巧打碎了我面前的车窗，碎玻璃片溅了我的脸。

副总统问我是否受了伤，我说我自己觉得没有。我将嘴里的玻璃碴子吐在车板上，扭头刚要答话，尼克松说：“嗯，也许你没有受伤，但你的嘴在流血！”他接着又说：“把玻璃片吐出来吧，今天你还得为我翻译呢！”我吐出玻璃碴子，但心里却怀疑是否已吞了几块下肚了。这时，愤怒的人群还在敲打我们的汽车，想法摆脱这一困境似乎极为困难。可是，奇迹出现了，横在我们前面的两辆汽车竟然开走了。我不知道是谁把它们开走的，是保镖呢还是委内瑞拉警察，或别的什么人，反正它们终于被人从路中央开走了。这时，我们前面那辆载着记者、摄影师的卡车也开动了。它一开动，我们的车子也跟着动了，并慢慢地从人群中开了出去。暴徒们跟着追了一阵子，但汽车开足了马力把他们甩在后面，车队的其他车辆也跟了上来。我们穿过了相形之下颇为空旷的街道，经过名叫埃尔·西伦锡俄的主要新市区后，便进入加拉加斯市中心。我们拐进一条窄小的街道，这条街通向伟人祠，祠内埋葬着半个南美洲的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的遗体。按照原定日程，我们要去那儿向这位解放者的坟墓献花圈。我们的武官戴利中校正带着花圈等候在那里。当我们驶进这条又长又窄的街道时，我发现这里也站满了一大群怀有敌意的人。我便转身对副总统说：“副总统先生，您不能去玻利瓦尔墓。”他瞅了我一眼，说：“那么，咱们上哪儿去？你熟悉加拉加斯吗？你以前来过这里吗？”我回答说：“来过，先生。如果我们从这里向右拐，很快就能到住宅区，到美国使馆。使馆在一个山顶上，等他们追到那儿，也就累得喘不过气来了。最要紧的是，这样我们可以绕开已经公布的您的车队的路线。”尼克松先生对我说：“那么，告诉司机拐弯吧！”委内瑞拉外长因为眼睛里飞进了玻璃片，一路上没讲话，靠在后面座位上差一点要抽泣起来了。这时，

他开了腔，他说。“那简直是发疯，那条路上可没有警察保护我们啊！”我听了这话，有点忍无可忍，因为自从离开迈克蒂亚机场以来，我几乎连个警察的影子都还没有见到！我转过身去用西班牙语说：“请问部长先生，护送我们的警察在哪儿？”我们汽车周围连一个警察都没有。副总统厉声对我说：“告诉司机向右拐！”我向司机重复了这句话，他照办了。我们的车子在那条偏僻的街巷开了几百码，街上行人稀少，一片寂静。我们已经摆脱了人群，进入了一个安静的居民区。副总统要我让车停下。然后他请我到后面去看看他的夫人，问她情况如何，并转告她，他自己安然无恙，准备去大使馆。我下了车，走到她的汽车跟前，见她坐在车里泰然自若，双手放在膝盖上。我对她说：“尼克松夫人，副总统想知道你现在怎么样？他说他很好，我们现在准备去美国大使馆。”她抬起头来看看我，平静地说：“告诉他，我也挺好，不过刚才我在这儿从后面看去，可真够热闹。”我不能不钦佩她在这样的时刻还能有这种勇气和这样的镇静态度，尤其是她坐的那辆车被拦在后面，同我们的车隔开了，可以说她是坐在“前排席位上”观看了人们对她丈夫的那辆车的围攻。她的车窗也全被打破了。副总统的秘书罗西·玛丽·伍兹与尼克松夫人同乘一辆车，也很镇定自若。

我们把委内瑞拉外长顺路送到一家医院去治眼睛。其实，他伤得并不厉害——不过是飞进了一小片碎玻璃，但惊吓甚于伤痛，这也是可以理解的。随后，我们便驱车前往美国使馆。斯帕克斯大使也在我们的车队里，大使夫人是一位非常沉着的比利时妇女。

根据原定计划，我们应该下榻在豪华的委内瑞拉官员俱乐部，现在我们三、四十人，却出乎意料地来到了使馆。但几分钟后，大使夫人就为大家准备了吃的、喝的，我们吃上了烤面包。

过了一会儿，委内瑞拉总统沃尔夫冈·拉腊萨瓦尔海军上将来到了美国使馆。他是前来对所发生的事件表示歉意的。他也把此事看得很轻松，只归罪于佩雷斯·希门尼斯的独裁统治和他所想到的其他一些人，而偏偏没有提到共产党，但这一事件恰恰是共产党人应负主要责任；同时还应归咎于政府的疏忽和无能，它把保证副总统安全的任务全盘交给了城市警察而不调军队进城。况且关于发生抗议尼克松先生访委的暴力行动，政府事先已得到过警告和威胁。当然，参加这些暴力示威游行的人并不都是共产党人，但正象共产党人经常所做的那样，他们是这次行动的组织者和控制者。毫无疑问，在场的许多人并不是共产党人，但他们对既富有又强大的美国人怀有某种厌恶或妒忌的心理。

拉腊萨瓦尔总统是个矮小精干的人。他自称是民主分子，打着反对独裁统治的招牌大做文章。谁都知道，他在佩雷斯·希门尼斯手下工作过，是委内瑞拉现代史上第一个海军上将，而任命他为海军上将的人正是现在他所谴责的那个独裁者。

他离开了使馆。后来我听说，在下山的路上，他的汽车也遭到石头的袭击，车窗也被砸碎了，袭击者就是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尼克松的那些人。应该说我有幸灾乐祸，虽然他的汽车是防弹的，但他至少尝到了我们早些时候尝到的那种滋味。

晚上，国防部长卡斯特罗·莱昂将军不顾拉腊萨瓦尔和政府的反对，把军队开进了城，恢复了法律和秩序。

接着举行了由新闻界人士出席的记者招待会。尼克松先生在他们面前

表现得很克制，他说，他相信白天的事件并不代表委内瑞拉人民的真正感情，而是捣乱分子、职业仇美分子搞出来的。

在这之后，一批委内瑞拉的政党领导人拜会了尼克松。他们对他们坦率得多了。他对当地政府无力维持最起码的法律和秩序——尽管在闹事前已得到多次警告——表示十分忧虑。但这些政党领导人都坚持应把这一事件归罪于佩雷斯·希门尼斯的独裁统治，仿佛这个独裁者不是流放在迈阿密，而仍然在掌权。本来，肯尼迪政府要把这个独裁者交给委内瑞拉政府审讯，但他被囚禁多年后，一直没受审讯，最后还被选为加拉加斯市议员，但由于当地对民主程序的古怪解释，所以一直未能就职。从他被选为加拉加斯议员这一事实看来，这个独裁者可能并不象我们所听说的那样为众人所痛恨。

看到使馆里的人实在太多，我便对大使夫人说，我想进城去看看，顺便在城里吃顿饭。我走了很长一段路，来到市区，在一家饭馆吃了饭。人们可以感觉到城里的紧张气氛，但那家饭馆还照常营业。我没花几个钱，就吃了一顿美餐。当地饭馆的价钱一般都便宜得惊人。

吃完饭，我上山回到使馆。我宽慰地看到，使馆已由国防部长调进城的军队警卫起来。当晚，代表团成员长时间讨论了下一步该怎么办，以及副总统应怎样离开加拉加斯的方案。他的几位顾问主张尼克松去城市另一头名叫拉·卡罗利纳的小机场乘C-47型飞机离境，而不要再穿过城市到迈克蒂亚机场。但我强烈反对，副总统不能从后门溜走，应该昂首阔步按原路回去，委内瑞拉政府应该保证这一点。对我来说，这并非夸夸其谈，因为假如我的意见被采纳，我就得和尼克松同乘一辆车去机场。

我们还决定，如果城里平静，就争取完成原定第二天日程中安排的大多数活动。

商定以后，我们便上床就寝。我还睡得很酣呢！机长有一台单波段收发报机，一直带在身边，以便与华盛顿联络。华盛顿得知我们的情况后甚为惊恐，命令两连海军陆战队作好一级战斗准备来搭救我们。很难说这两连海军陆战队在一个上百万人口的城市里能起多大作用，但不管怎样，这是当时下达的命令。尼克松先生为此生了气，他认为这既无必要，又耸人听闻。

第二天，我们得到报告说城里十分平静。副总统在其夫人陪同下，按原计划活动，参观了一家医学实验室和其它几个单位。当我们经过大学时，当局显然很紧张。加拉加斯大学享有中世纪的庇护权，警察不能入内，任何罪犯都可以躲在校园里而不受到警察的追捕。这里一直是共产党发动暴乱的温床。几年后，警察进入了该大学，在那里发现了不少坟墓。

很难相信，在二十世纪竟然还存在这类古代的特权，而这也正是委内瑞拉许多骚乱的根源。

我们参观了安排中要去的各个地方。第三天早上，我们终于驱车出城，所经街道人迹稀少，只有曾用来驱赶人群的催泪弹的烟雾在上空飘扬。我们很顺利地到了迈克蒂亚机场，离开了加拉加斯。当飞机一起飞，机舱内立即发出一片欢呼声。我相信，当时大家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因为我们终于离开了这样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接替佩雷斯·希门尼斯政权的政府是如此软弱无能，它在重建民主和自由的幌子下，实际上是在为那些极左政党采取这类暴行和恫吓大开绿灯。如果听任这些极左分子恫吓美国，以致使我们的政治家不能再出国活动，那么，当我们要对付其在我们和美洲兄弟之间所制造的矛盾时，我们将完全处于防御地位——如果不是束手无策的话。

我们顺利而又愉快地飞到了波多黎各的圣胡安，并受到了地方长官路易斯·米尤诺兹·马林的接待。尽管他在政治上与尼克松先生很不一样，但他热情而尊敬地欢迎了尼克松先生。我们在圣胡安过了一夜，第二天就飞回华盛顿。艾森豪威尔总统主持了对尼克松先生的盛大热烈的欢迎仪式。次日，一位政府高级官员在白宫把我拉到一旁，说道：“我对迪克·尼克松是非常看重的。但请告诉我，有人想把尼克松从车里抓走的时候，他到底表现如何？”此人是接近政府上层人士的，他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使我感到讨厌。

我冷淡地回答说：“我所能告诉您的是，作为一个美国人，我为美国副总统感到骄傲。”他有点局促不安地说：“向你提出这样的问题也许是不不得体的。”我没有再答腔。也许尼克松先生的这一形象与大多数报道不相符合；我只能说，我在这里是如实地记录了这次出访中我所见到的和观察到的一切。尼克松先生显示了他的智慧、勇气和判断力。后来一九七三年在欧文委员会作证时，我也对尼克松先生的这种品质表示过钦佩。

七、关于U - 2 飞机的会议

——赫鲁晓夫暴跳如雷

在二次大战结束后的年代里，苏联给美国情报局留下了如丘吉尔所说的“一个内部的难题、一个谜中之谜”。战胜德国和日本之后，苏联不象英国和美国那样让大部分军队复员。

这个庞大的极权主义国家，拥有地球陆地面积的六分之一，狂热地在技术上追赶美国。苏联人发展了原子弹和氢弹，并在五十年代后期，致力于生产一些足以发射和打击到美国心脏地带的武器。美国因为对在珍珠港由于没有预防而受到代价很高和悲痛的创伤记忆犹新，所以决定避免自己再次遭受突然袭击。如果美国想保持了解苏联国内在干些什么和避免突然袭击，那就得想出一些办法来。美国只有用某些新的工具才能在技术发展方面保持与严格防守边境和保密的苏联齐头并进。美国人的独创性、想象力和技术，要为获得有关苏联的情报这个难题寻找答案。

这种情报的需要导致了一种设想，并制造了一种飞机，要它能飞得很高和很远，使得苏联的地面武器和飞机都打不到。这种飞机必须具有飞越苏联辽阔疆土的航行力。

于是U - 2 飞机便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制造出来了（当时秘密制造武器还没有被当作一种罪行）。在一九六〇年之前，这种飞机已经在苏联上空飞行了将近四年，飞机上装置的非常完善的照相机，对苏联内部活动的情况和生产武器的情况拍摄了大量照片。苏联人用雷达和肉眼观察到有飞机飞越他们的领空，但是公开抗议或承认有此事情，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奇耻大辱。于是他们默不作声地着手发展地对空导弹来射击U - 2 飞机。

在这近四年里，许多U - 2 飞机在航程中没有一架受到过严重的威胁，而这种侦察飞行已成为日常工作。当然，美国总统是知道整个计划的，而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也由于拿到飞行所得的高级情报而了解到一些情况。这种

照片使美国人看到铁幕后面的大工厂和军事基地进行活动的第一手材料。

一九六〇年五月一日，一架U-2飞机在从巴基斯坦飞向挪威的航程中，突然被深入苏联内陆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附近的地对空导弹所击落。飞行员加里·鲍尔斯在飞机坠落后跳伞，并被苏联俘获了。他们把鲍尔斯和飞机的残骸公诸于全世界新闻界，并且对此事件极为愤怒。

早在鲍尔斯的U-2飞机被击落以前，英、法、苏、美四大国的首脑原已安排在一九六〇年五月举行一次会议，这与U-2飞机事件是完全无关的。我的下一个使命便是作为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副官和翻译到巴黎去参加四国首脑会议。赫鲁晓夫要求美国作低声下气的道歉；当美国没有道歉时，这位苏联领导人便高视阔步地走出会场，并威胁要给以强烈的报复。美国的盟国坚决和我们站在一起。

一九六〇年五月十四日，我和艾森豪威尔总统一起离开美国到巴黎去参加四国首脑会议。会议是否能举行，一度成为问题，因为U-2飞机在苏联被击落、鲍尔斯被俘和美国的承认，使苏联人火冒三丈，而尤其使他们冒火的是这件事是我们美国人干的。经过一段时期的犹豫和磋商，会议的东道主戴高乐（因为会议在法国举行）宣布会议将如期举行，其他国家的首脑也相继宣布准备出席会议。当赫鲁晓夫宣布他将参加会议，全世界为之宽慰地舒了口气。如果他愿意出席会议，事情不至于发展太坏吧。

五月十五日，我们到达巴黎。应戴高乐的邀请，我陪同艾森豪威尔去会见他。象通常一样，这两个人见面是友好、热情甚至可以说是充满感情的。三十年来，我曾陪伴许多美国高级官员去会见戴高乐，而他不以轻视态度交谈的只有三个人：艾森豪威尔总统、尼克松总统和州长哈里曼。他们对他们不仅表示敬意，并且有真实的热情，而对艾森豪威尔则格外亲热。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这两个人毕竟都是由他们的人民自由选择出来领导他们可尊敬的国家的。这不只是两国首脑的会见，他们还象两个老朋友的重逢。

戴高乐告诉艾森豪威尔，赫鲁晓夫曾经来拜访过，他为U-2飞机在苏联领空飞行非常恼火。赫鲁晓夫完全不理解为什么艾森豪威尔竟然公开承认他知道这种飞行。按赫鲁晓夫的标准看来，这不是表明美国的诚实，而是对苏联人的鄙视。他根本不懂得美国人有被迫承认错误的老习惯，这一点连戴高乐也不能理解。赫鲁晓夫曾向戴高乐念了一篇冗长的声明，宣布飞越领空事件和要求艾森豪威尔道歉。戴高乐接着对艾森豪威尔说：“显然，你不能道歉，但你得拿定主意你打算怎么对付这件事。我会尽一切努力帮助你的，可是不公开显出我是你的同伙。”（当时只有他的英语和俄语高级翻译员康斯坦丁·安德罗尼科夫在场。）他还说他曾经向赫鲁晓夫探问过，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是否能使会议进行下去。他的驻莫斯科大使曾把这个问题在赫鲁晓夫离开莫斯科前向他提出过，赫鲁晓夫回答说，他们要参加。当他到达巴黎之后，戴高乐又当面向他重提这个问题，他又说他们必须参加。戴高乐还对赫鲁晓夫指出，他不能认真地指望美国总统向他道歉。

这一类的事情不能由政府领导人来处理。赫鲁晓夫表示坚决要艾森豪威尔为U-2飞机事件道歉。戴高乐觉得，赫鲁晓夫在听到不能指望艾森豪威尔道歉而仍准备参加会议，是一个有希望的兆头，但是，他加了一句话：“我们走着瞧吧。”戴高乐以超然而冷静的态度来谈论这件事。他告诉艾森豪威尔，他认为在政府首脑会议上讨论这种情报工作的小小过失是不适宜的。

戴高乐在这整个事件中异常的沉着。在我看来，他是同盟者中的领袖，他对整个事件一点也不灰心丧气。他从未显出象麦克米伦那样的张惶失措。或象艾森豪威尔总统那样的局促不安。把情报工作上的不幸事件提高到政府首脑会议这一级来，使他很生气。

他安慰艾森豪威尔说，这类事是所有情报机构都是这样的，但通常必须小心从事，再则，这类事也不宜于把底兜出来给大家看的。这不能牵涉到他们的领导人。我很惊奇，他竟从不为 U - 2 飞机事件责怪艾森豪威尔。他甚至还记得过去我曾给他看过一张文尼察（苏联）的照片，而他连问都不问这张照片是怎么弄来的。

在会议期间，还发生另一个奇怪的小插曲。一位高级美国官员问我不能把一个藏有录音器的小提箱带进会场，我作为翻译人员之一在会场里是有座位的。我且不管他的级别有多高，我回答他我不能这样干，除非总统亲自命令我这样干。这事会使总统有进行窃听活动之嫌；只要他愿意，我就干。我还提请那位高级官员注意，法国在这个方面是非常老练的，而在爱丽舍宫可能有精良的装置，能够探测到这种窃听器的存在和操作，并且我可以肯定，戴高乐将军毕竟会大力帮忙的；如果我们不跟他打招呼而这样干，他会很生气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所以我表示，只有艾森豪威尔总统要我把窃听器带进会场，我才干。这位官员显然有些苦恼，但他不再强迫我了。这是我所知道的有关此事的最后的状况。当会议进行时，我对美国代表团周围观察了一下，没有发现任何类似录音小箱子那样的东西。

美国代表团显然由于 U - 2 飞机的被击落和鲍尔斯的招供而处境尴尬，但代表团决定不允许赫鲁晓夫利用这个会场公开侮辱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明确地感觉到，为了对美国负责，他必须摸清楚美国所受到的威胁的程度，而面对苏联那样关闭的社会，除了使用 U - 2 飞机这类工具之外，别无他法。况且苏联人的人造卫星早已飞越美国的领空，苏联曾经把装在人造卫星上的照相机拍摄到的照片公开印出来过。

首脑会议在爱丽舍宫举行，这座宫是法国总统的传统官邸。会场设在二楼一间宽敞而天花板很高的房间里，它离戴高乐的办公室只隔了几个房间。窗子朝南和朝西，面向宫里的花园。房间中央的几张桌子摆成四方形。戴高乐和法国代表团坐在东边，接近戴高乐的办公室。对面是美国代表团（我坐在最右边，挨近苏联代表团）。美国代表团的右手是苏联代表团，苏联代表团的对面是英国代表团。我随着艾森豪威尔总统和戴高乐将军进入会场，他们俩是在楼梯口相遇的。戴高乐心中非常清楚，只有他和艾森豪威尔既是代表团团长，又是国家元首，而另外两个代表团团长只是政府的首脑。苏联代表团早已在会议室了，他们站着，围在一起聊天。艾森豪威尔向法国和英国的代表们打招呼，但苏联代表们依然彼此在聊天，艾森豪威尔只得绕到自己的桌子边就坐，国务卿坐在他的旁边。几分钟之后，戴高乐宣布开会，所有站着的人都坐了下来。戴高乐向代表团长们表示欢迎，感谢他们莅临巴黎，并表示希望即将举行的会议获得丰硕的成果，对世界和平作出贡献。他指出，全世界的眼睛都注视着他们。他接着说，在座的只有艾森豪威尔是另一个既是代表团团长，又是国家元首，他要请艾森豪威尔总统首先发言。赫鲁晓夫显然激动了，他立刻站起来气呼呼地要求让他首先发言，并说作为代表团的团长，都是平等的。他要求首先宣读一篇事先准备好的声明。当这番突如其来的话翻译出来以后，戴高乐对着艾森豪威尔一扬眉毛，用询问的眼神看了

看艾森豪威尔，后者点了点头。

于是戴高乐让赫鲁晓夫首先发言。赫鲁晓夫站起来，开始高声朗读声明。这显然就是那份他事先向戴高乐念过的东西。在他滔滔不绝地念稿时，戴高乐露出一副难堪而又忍耐的表情。赫鲁晓夫不时停顿下来让人翻译时，喝口水。

国务院一再嘱咐我不要穿军装，因为这次是“和平会议”。尽管这样，苏联国防部长罗季昂·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却是全身军装，怒目而视，他坐在苏联代表团的左端，紧挨着我。在赫鲁晓夫继续咆哮时，我数了一下马利诺夫斯基胸前的绶带。总共有五十四条，使我觉得有趣的是这里面竟包括一条美国军团奖绶。当赫鲁晓夫念到一处时（我注意到赫鲁晓夫拿讲稿的手在发抖，不知他是由于激动、焦急还是愤怒），嗓门提到异乎寻常的高度。戴高乐把脸转向苏联翻译人员（而不是向自己的翻译人员），说道：“这间屋子的音响设备是极好的。我们都可以听到（部长会议）主席的话。他没有必要把嗓门提得这么高。”苏联翻译人员的脸色唰地一下发白了，把脸转向赫鲁晓夫，正想开始翻译，戴高乐却早又转向自己的翻译人员，那位译员立即毫不踌躇地翻译了法国领导人的话。赫鲁晓夫稍微停顿一下，双眼从眼镜框上面对戴高乐将军凶狠狠地盯了一下，接着以略为低的声音继续念稿子。他更加疯若狂地念着，当他念到美国飞机飞越苏联领空时，他的手直指天花板，似乎此时此刻有一架U-2飞机在我们头顶上飞着，他说：“我被人飞越了！”戴高乐插话说，他也被人飞越了。赫鲁晓夫问道：“是你的美国盟友吗？”戴高乐回答说：“不，是你。昨天，就在你从莫斯科出发之前，你发射了一颗人造卫星，给我们强烈的印象是它要在法国领空飞越十八次，但并没有得到我的许可。我怎么能相信你们就不会利用卫星上的照相机拍摄法国的照片呢？”戴高乐双臂往胸前一交叉，以询问的目光盯着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张口结舌。接着，他的脸上显露出非常愉快的表情。

他双手高举过头，清楚地说：“天晓得。我的双手是干干净净的。你不能认为我们会干那种事吧？”戴高乐说：“那么，你们是怎么拍摄那些月球背面的照片的呢？你们还曾振振有词、引以为骄傲地给我们看哩！”赫鲁晓夫说：“噢，只有在那颗卫星上我们安装了照相机。”戴高乐说：“噢，你们只有在那颗卫星上安装了照相机。天晓得，请继续念你的稿子吧。”

这一番交锋搞得赫鲁晓夫慌了手脚，他在念那冗长的声明时，双手越发颤抖了。在他念稿时，美国国务卿和前驻苏大使奇普·波伦在轻声议论：“我们对此不能默不作声地坐着听。我们需要回答。”艾森豪威尔一声不响地听念原稿和翻译。他不耐烦地拿铅笔在纸上乱划乱涂（后来他离开桌子后，我把那张纸收了起来，至今还保存着）。他的脸部和颈部都涨得通红；我的经验还不足以说明他是否极度地愤懑了。我与艾森豪威尔将军共事了好多年，可是从未见过他大发脾气。然而，长期的经验告诉我，他的愤怒的心情已全部表露出来了。他间或一两次瞧瞧戴高乐；戴高乐带着略呈厌烦的表情坐在那里，似乎明白地对人说明：“我有什么必要坐在这里重听一遍呢？”他早已听过了。英国首相面有愠色地瞧着愤怒的赫鲁晓夫、脸红的艾森豪威尔和恼怒的戴高乐的时候，感到有些惴惴不安。

赫鲁晓夫念到一处叫嚷道：“是什么魔鬼驱使美国人这样干的？”戴高乐说，哪里都有魔鬼，双方都有，这种间谍活动从来就在进行着，而不值得那些世界人民对之寄予和平希望的政府首脑去过问。赫鲁晓夫摇头晃脑，象

一头公牛，继续念稿子。他终于结束了那长篇的咒骂文章，并宣称，除非艾森豪威尔总统表示道歉，他将不再参加会议。

艾森豪威尔总统接着宣读了一项温和的声明，包括若干为使用 U - 2 飞机而公开辩护的理由，并答应美国飞机不再飞越苏联领空。赫鲁晓夫愤慨地回答说，如果艾森豪威尔不道歉，他将不再出席会议。他的话被翻译出来以后，出现持久的尴尬的冷场局面。于是戴高乐说：“赫鲁晓夫主席，你提出了艾森豪威尔将军显然不能接受的强迫条件。在你离开莫斯科之前、U - 2 飞机被击落之后，我指派我的大使拜访你，问你这个会议是如期召开呢还是延期举行。你过去所知道的情况与今天所知道的一样多。你告诉我的大使说，会议必须进行，并且会获得丰硕的成果。在这次会议举行之前，我又当面向你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你又再次说会议必须召开。现在，你提出美国总统显然无法接受的强迫条件，你使我们的会议进行不下去了。你使麦克米伦先生从伦敦赶来，使艾森豪威尔从美国赶来，使我在严重困难的情况下筹备和出席了会议，而你的寸步不让将使会议并不成。我们大家必须考虑这个问题，还得考虑全世界人民寄托于这个会议的希望，我们明天此时再来会面。现在休会。”

赫鲁晓夫跳了起来，再次重申除非艾森豪威尔道歉，他将不出席会议。戴高乐用瞅淘气的孩子似的眼光瞅着赫鲁晓夫，宣布明天照常开会。赫鲁晓夫在他整个代表团的簇拥下，大踏步地走出会场，走下楼梯。其他代表团的成员都面面相觑。戴高乐说，他要与苏联人保持接触。于是全场站了起来，走出会议室。戴高乐走到艾森豪威尔跟前，挽着他的手臂。他也拉着我的胳膊，把我们引到一边去，他对艾森豪威尔说：“我不知道赫鲁晓夫想干什么，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但是不管他干什么，也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让你知道，我始终与你站在一起。”我对他这番话感到惊讶，而艾森豪威尔明显地被这个意想不到的无条件支持的表示深深地感动了。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这件事，这一情景直到今天还鲜明地印在我的脑子里，犹如当时听到他讲话一样。艾森豪威尔向戴高乐表示谢忱，戴高乐从楼上直送到他上车。一进汽车，艾森豪威尔又陷在今天的插曲的困扰中了，他瞧着我说：“那位戴高乐的确是个人物。”我点点头，完全同意他的着法。我们驱车不远，便到了美国大使馆（当时在伊耶纳大街）。美国代表团举行会议，商讨明天的对策。

我是不能参与这次讨论的，也不知道有什么决定，既然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温和的声明和对 U - 2 飞机不再入侵苏联领空的保证都不能把赫鲁晓夫带到会议桌上来，那么，艾森豪威尔即将应邀访苏一事，当然也就要撤销了。

在此期间，赫鲁晓夫召集了一个急风暴雨似的怒气冲天的记者招待会，进行含沙射影的威胁，”痛骂美国背信弃义的行为。在第二天指定的时间，戴高乐、麦克米伦和艾森豪威尔来到了昨天开会的房间。三个代表团的成员坐在那里，局促不安地互相瞧着。

戴高乐将军说没有获得赫鲁晓夫的口音，赫鲁晓夫到“街上亲吻孩子的脸蛋，为法国共产党竞选卖力去了”。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到凡尔登去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曾在那里打过仗，可是他曾企图破坏苏军与盟军的联合作战”。等了一会儿，戴高乐下命令去与赫鲁晓夫联系，问他是否出席会议。又等了一会儿，一个助手走进来说，赫鲁晓夫说他不出席会议，除非艾森豪威尔道歉。戴高乐火了，麦克米伦泄气了，而艾森豪威尔既困扰又愤懑。戴高乐转向助手说，我邀请赫鲁晓夫是有书面文字的；因此，他也得

书面答复。几分钟之后，助手又来说，赫鲁晓夫回答说他不愿书面答复。戴高乐对助手说：“告诉他，对书面的通知必须作书面的答复，这是有文化教养的民族的习惯。”助手走开几分钟后回来说，赫鲁晓夫将作书面答复，但不来开会。

看来戴高乐赢得这个小面子也满意了，便宣布休会。我觉得奇怪的是，毫不动摇的戴高乐和对整个过程显得晕头转向的麦克米伦，都始终没有提出或暗示艾森豪威尔必须道歉。

当时阿登纳等候在巴黎，他看到西德至少不必为四国协议付出任何代价，如释重负。

艾森豪威尔旋即访问葡萄牙，受到托马斯总统和萨拉查总理最热烈的欢迎。

在我看来，苏联人打算使艾森豪威尔屈服，而当他们达不到预期目的时，便迷失了方向。他们预料戴高乐和麦克米伦都会出面向艾森豪威尔施加压力，作出某种姿态的道歉，然而，没有发生这样的事。

历史地看，戴高乐控制了整个会场。他既没有象赫鲁晓夫那样暴跳如雷，也没有象麦克米伦那样惶惶不安，他利用东道主的地位，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一方面他没有露出他是美国公开的同伙，另一方面他又使赫鲁晓夫明白，他认为整个事件不过是茶壶里的小小风暴而已。通过高空先进技术，有照片为证，苏联首先飞越别国的领空，他们很难把自己打扮成无辜的受害者。戴高乐在真正短兵相接时，证明他是一位勇敢的、坚定不移的同盟者和朋友。

八、肯尼迪总统访问巴黎

——我为什么没有完成任务

一九六〇年夏季，在我刚担任驻罗马使馆的武官职务几个月之后，我接到我的老朋友、肯尼迪总统的军事副官特德·克利夫顿少将的电报，通知我准备到巴黎去与白宫派出的先遣人员汇合，一起商讨如何安排肯尼迪总统即将到法国首都对戴高乐将军的访问。

我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个指令，因这件事对我表明，新政府了解到我是一个纯粹的军官，不管白宫的最高司令员是谁，我总是忠心为之服务。我以前既为民主党的杜鲁门总统服务，又为共和党的艾森豪威尔总统服务。我听到一些谣传，说是新政府派性比过去的政府要强，但克利夫顿发来的电报足以向我证明，事实并非如此。

我告诉了莱因哈德大使，他也非常高兴，认为由于我早已非常了解戴高乐将军，在这法美关系趋向分裂的时候，我可能有助于促使两位总统接近起来。几天之后，我又接到一个电报，指令我立即到巴黎去会见先遣组的总统新闻秘书皮埃尔·塞林杰和肯尼思·奥唐奈以及其他成员。我把这件事通知武官处，并得到他们的许可，就动身去巴黎。

我一到巴黎，就向皮埃尔·塞林杰报到。塞林杰原是（法国东北部）阿尔萨斯人的儿子；他父亲移居美国，他当时法语就讲得很好。由于长时期

住在法国，他的法语越发讲得流利了，常常在法语电视台讲话。他还在法国各种社会团体和机构公开讲课。

他们相当热情地接待我，我也跟其他成员一一见了面。我们就开始同法国总统府和外交部门进行联系。戴高乐保卫部门的许多人员在上次艾森豪威尔将军访法过程中已跟我混得很熟了，所以他们都热忱地欢迎我。我感觉到，他们并不很热情地欢迎塞林杰和奥唐奈。我与戴高乐的副官和一些主要助手的关系是亲密友好的。在讨论到总统访问时，他们都非常融洽和合作。在整个讨论过程中，塞林杰和奥唐奈的某些态度使我感到有些不安，但不管怎样，我们逐步为肯尼迪总统的日程作出各种安排。我知道有一句话我永远也说得不得，这就是：“这是我们过去用过的办法。”这种话总会触犯新政府的，所以在会谈时，很多事我让法国人多做一些。有一次，塞林杰他们问到我某一件事过去是怎么办的，我在这种情况下，才回答他们，并叙述了为艾森豪威尔将军的访问所做的特殊安排方式。

这次与法国的讨论包括许多事情：肯尼迪总统访问的项目、他将会见哪些人、戴高乐将军举行的官方招待会、肯尼迪总统在美国大使馆举办的答谢招待会，还要安排复杂的与报刊和电视界人士的会见。在安排中，正如过去我参加过的总统先遣组工作一样，我们很注意既让总统本人感到愉快，也要让新闻界和宣传部门的人感到愉快。因为塞林杰是新闻秘书，对这方面特别注意。这种事往往使法国官员有点恼火，因为他们（至少在那时）对他们的新闻界不象我们那样关心我们的新闻界。他们有一次对我说：“你们美国人对新闻界比对总统还更为操心。我们却正好相反。”

此外，对总统的安全作了复杂的部署。这些就需要在美国总统保卫处和法国各种各样的保卫机构之间进行费时的讨论。法国的有关机构我都很熟悉，它们是国际保卫处、总统安全处和巴黎警察局。再则，我们还探讨了美国总统抵达和离开奥利机场的安排，因为我曾多次为艾森豪威尔将军安排而受过训练，故而我很熟悉法国所喜欢用的办法。

然而，我却闭口不谈，除非他们问我，而我还是尽量保持客气谦虚。即使这样，我仍感到这个先遣组对我愈来愈冷淡，因为他们意识到我非常熟悉那些他们正在与之打交道的法国权威人士。

然而，我们心里都明白，但嘴里不说出来，直到准备工作就绪之后，他们回美国，我国罗马。只是约定，当总统来访法国时，我得再来法国担任肯尼迪总统的翻译。我知道这种做法多少有点打乱了国务院的计划；因为，如果他们的翻译人员在场，他们就能弄到总统与别国领导人会谈的纪录。而我呢，我遵守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指令，千万不能把会谈纪录抄录给任何人，除非经他亲自签署。有一次，我不得不拒绝把这种纪录交给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杜勒斯虽然当时对我的拒绝发火，但并不因此反对我，并且。在下次见到我时显得格外亲热。塞林杰、奥唐奈和他们的先遣组回美国，我回意大利仍担任武官职务，并约定在总统到达法国前一、二天我再到巴黎去。

我回到意大利之后，就开始琢磨我在巴黎所处的气氛，我觉得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塞林杰和奥唐奈把我看作是艾森豪威尔某种政治上的代表人物。他们都不完全了解我，我只是一名陆军军官，只知道执行命令，不管谁当总统，我总得为他效劳。我想到这些，在我看来，最好是打一个电报给克利夫顿将军，说明我与先遣组相处的结果使我觉得我不宜为总统访法之事

再到巴黎去，除非他能肯定地告诉我，他们的确需要我去巴黎。如果我事实上毋需到场，我这样做会使他能体面地摆脱困境。我就给克利夫顿打了一个这样的电报去，我很快接到他的回电，证明我的印象是正确的，叫我不必为总统的访法再到巴黎去了。这并不使我感到意外。

肯尼迪总统的访法进行得很好。肯尼迪夫人也获得很大的成功。访法结束后，她要飞到希腊去，她要在罗马稍为逗留一下换乘飞机。我接到总统保卫处的通知，要我去接她，并安排一间候机室，以等候飞机，继续她到雅典去的旅翟。我很高兴做这件事，在指定的日期，我跟我的老朋友、机场的指挥官萨拉里斯上校一起作了必要的安排。当肯尼迪夫人的飞机一到达，旅客们还在机上时，我就走上飞机。我走到肯尼迪夫人跟前，自我介绍我是美国驻意大利武官，并告诉她由我负责带她到候机室去，以等待到飞机为飞往雅典作好准备为止。她瞧着我，用深沉和动人的声音对我说：“你是沃尔特斯上校吧，你是在巴黎最失意的人。”我常常说，任何专说奉承话的人也会到处获得奉承话。

这件事给了我极好的印象，所以我得说，我成了杰奎琳·肯尼迪的热心的赞赏者。

九、在巴黎担任武官

——花絮拾零

我在越南期间，有一天，艾布拉姆斯将军召我前去，并向我表示祝贺。当时，他担任驻越美军总司令威斯特摩兰将军的副手。我问他，是否我正在争取派驻越南的想法实现了。他说：“不是。”我又问，是否要授予我勋章。他说：“也不是。”后来他告诉我，我被提升为少将。我对他说，我认为这事能有错，一定是提升另一位沃尔特斯将军吧。于是他引述了我的军号，并问我是否就是已被任命、但尚未就职的驻法国武官。我回答说，是的，这时，我才相信我确实被提拔了。

对我来说，这是非常意外的，因为我认为，我在工作中并不是走的那种让上级选拔为少将的道路。我认为当初升为准将已经是够幸运的了，我不相信这种意外提升的事会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再次发生。于是产生这样一个问题：我是否还去巴黎担任武官呢？因为这一职位通常是由准将充任的。不久，我从华盛顿得到证实，大意是命我前往巴黎，以少将衔仍派驻该地。这时我才明确要去巴黎，而不能留在越南了。我写了一封信给波伦大使，告诉他我在期待协助他进行工作。当时他任驻法大使，我同他相识至少已经有二十年了。他的复信语气有些生硬，说他将高兴地同我合作。对此我感到有点诧异，因为我通常不是同上级“合作”，而是“协助”他们工作。后来我接到国防部情报局局长一封电报，任命我为驻法武官的就是他，电报中说，巴黎情况发生了变化，要我务必在八月十五日到巴黎报到，不得有误。这样，我在越南的时间大大缩短了。更使我吃惊的是：八月份法国人都要休假，很清楚，等我到达法国时，不会见到任何高级官员。这份电报不仅指示我八月十五日

报到，而且要我回电，答复执行这项命令。我认为这件事有些令人恼火，就简短地拍回一封两个字的电报：“遵命。”我想这表达了我两点不愉快的心情：一是被迫缩短了越南逗留的时间；二是我在陆军服役期间，历来都是服从命令的，可是他还要指示我复电表明我将遵照命令行事。

我取道曼谷、新德里和罗马飞往巴黎，武官处工作人员到机场前来迎接。我于八月十五日开始主持武官处的工作。那天是圣母升天的节日，法国人不上班。我情不自禁地想给国防部情报局局长——他和我一样也是天主教徒——发一封电报，我想告诉他：“我已于圣母升天节接任武官处职务，但无人到场可资证明。”后来，我想这样做一定会被视为傲慢失礼，所以电报没有发出去。

直到九月，我才得以谒见法国军方当局，这时他们都已休假回来。我被引见给国防参谋总长、陆军参谋总长、国防部参谋处情报官和陆军参谋处情报官。陆军情报官居伊·塔坦维尔上校是一位生性相当固执的军官。尽管如此，在我离开法国前，我们已经成了好朋友。我发现对付他的最好办法就是同他一样的固执。我到达法国时，就已经感觉出来，对我有某种怀疑的气氛。四年以后，国防部参谋处一位情报官退休了，这时他才把这一点对我作了解释。他退休后，有一天我同他共进午餐。他告诉我，把我派驻巴黎，是在要求美国撤出在法国的基地后不久。当时法国人认为，我肯定是奉命代表北约组织煽动法国陆军反对戴高乐将军的，因此他们对我进行非常严密的监视。由于我是单身汉，他方认为对我有两个可乘之机，利用美女或变童。这位朋友说：“当两者都不见效时，我们感到简直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我参观了第一批法国部队后，那位固执的情报官对我说：“我注意到你参观部队时从来不提令人为难的问题。”我说：“我想法国人很精明，我参观部队时，那里的司令官只会同我谈规定他所能谈的问题。如果我提一个问题，他因为不能告诉我而感到为难，而我又因为得不到答复而感到难堪，这就不合适了。我对于了解一个营的实力实在不感兴趣，因为过一天它就可能变了。我比较感兴趣的倒是我所代表的美国军人能给人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他苦笑说：“嗯，这一点你做到了。”

我调法国工作后不久，法国人为了表明他们对情况的深入了解，向我提起我八岁住在法国时所发生的一件小事。那时，我因为骑自行车没有牌照而被拘留，我母亲缴了一百法郎罚款，我才获释。这样的材料还留在档案里，合我留了很深的印象。他们告诉我，任何一个同警方打过交道的外国人，只要他还活着，他的档案就得保留着。法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是他们对外国人的记载都保存了下来。

我刚到巴黎任职时，法国人告诉我应当去拜会一下那里的武官团团团长、苏联将军谢尔盖伊·索科洛夫。我先用电话同他约会，叫他定个时间。电话中，我提到我打算穿便服去拜访他。他相当狡黠地回答说，他要穿军装。我于是说：“那么我也得穿军服。”他在隆香路的一间小接待室里接见了。在场的有后来接替他的雅罗申柯上校。谈话前，我们先寒暄了一番，然后他说：“你认为越南的形势怎么样？”我答道：“将军，我想你是知道我国政府在越南问题上的观点的，现在是想了解我个人的看法吧！”他说：“对，是这样。我对他说：“第一，你必须知道，我认为越南这场战争是正当的；我是志愿动去参加的，本来可以不需要我去。第二，我想你应当知道，我认为，我们来到越南就是给苏联人效了劳，而对此你们却表现出忘恩负义，真是令人

难以置信。”这句话使他不知所措，他说：“我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我对他说：“只要我们呆在越南，中国人对他们南方的边界就感到担忧。什么时候他们不再为他们的南方边界担忧，他们就要关心他们的北部边界了。现在，我们美国人同中国人关系不好，但是感谢上帝，我们同他们并没有六千公里的共同边界，我们也没有占领他们认为是中国的任何领土，而他们的人口却有八亿之众。”我接着说：“将军，坦率地说，你给我世界上任何东西，我都不愿意处于你们的地位。”这一席话使他十分震惊，我就趁机向他告辞了。两年后，雅罗申柯上校已升为将军，他对我说：“你知道，那些中国人发疯了。他们认为战争是件好事。”我说：“雅罗申柯，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说的话吗？”他悲叹地说：“是的，我记得很清楚。”

我到法国后不久，就认识到我以前决定要到越南去是多么明智。法国武装部队中差不多每一个少校以上的军官都曾在那里服过役。由于我去过越南，他们对我更尊敬了。

要不是我到过越南，我就只能是从一个武官职位到另一个武官职位上的一名参加鸡尾酒会的将军而已。我曾在越南拍摄了许多影片，其中几部有相当多的战场实况。我常常邀请法国军官到我家观看这些片子。有一次，我放映一部有关越南一个小市镇的影片，在座的一位法国军官告诉我，他就是在这个市镇的教堂里结婚的。在我参观法国部队时，几乎每当部队的指挥官单独同我在一起时，他就会对我说：“我国政府对你们正在越南干的事不太积极，但是我想让你知道，正在挨你们打的人，杀死过我们的人，杀害过我们的伤员，因此，每当你们同他们斗争取得胜利时，我们心里就觉得很高兴。”这种感情在法国陆军中很普遍，他们能理解我们在越南干的事。有一位法国军官对我说：“你们拾起了我们的折断了的剑。”可惜，我们也要象法国人一样把它扔掉。

我到法国不久，一位老朋友安德烈·拉朗德少将请我吃午饭。我们在华盛顿北约组织常设小组共过事。拉朗德是法国陆军中最卓越、最勇敢的军官之一，他在奠边府表现出非凡的英雄主义。在我派驻法国期间，他担任共和国总统戴高乐将军的军事助理，住在总统的官邸爱丽舍宫。我到他漂亮的寓所去同他共进午餐，餐厅在这座宫殿的三楼，可以俯瞰下面的花园。在座的还有其他几位客人。我们喝了几杯酒就用午餐。午餐主要的一道菜是鸡。正在吃鸡的时候，我突然觉得一块鸡骨头卡在喉咙里。我转动舌头试图把骨头吐出来。后来发现不行，我开始担心咽喉会被卡住。我说声对不起就站起来，转身打开最近的一扇门往外走。我原来想到另一个房间去，这样可以在那里用手指把骨头取出来。然而，我发现走进了一个漆黑的壁橱。尽管如此，由于情况紧迫，我把指头伸到嘴里把骨头取了出来。我怀着某种宽慰的心情重新回到餐桌前就座。在餐桌上，没有人问我这件事。但是，当其他客人告辞后，拉朗德将军问我道：“迪克，你突然进入那个壁橱，究竟怎么回事？”我说：“安德烈，我喉咙里卡了一块骨头。我不愿意在席面上把手伸到嘴里去，以免大家把我看成一个美国的乡下佬。我当时以为我是进了另外一个房间，当我发现走进了一个黑暗的壁橱时，我也感到很惊奇，但是不管怎样，我把手指伸进去把骨头取出来了。”他说：“我的上帝，你把它取出来了我很高兴。你想想，假如你在爱丽舍宫憋死了，所有的美国人都会说：‘瞧！戴高乐将军的又一卑劣勾当。’”

还有一次，也是我任职初期，戴高乐将军为波伦大使调离法国设午宴

钱行，我也被邀请出席。当我被引见戴高乐时，他谈起以前我们在许多场合见过面。这时，我没有讲很多话，而是沿着迎宾队列前进。宴会上，我坐的席位离戴高乐很远，没有机会直接同他谈话。午宴结束，当端上咖啡和甜酒时，戴高乐将军的副官弗朗索瓦兹·弗洛希克上尉走过来说：“将军想同你谈谈。”我立即走到他身边。他回忆起当年我们在意大利见面时的村庄的名字。他象往常一样，非常得意地表现出惊人的记忆力。这种得意也是有道理的。他问我回到巴黎多久了。我当时很想对他说：宴会前法国国内情报机构国土保安司给他的有关来宾的材料上大概已写清楚。可是再一想还是不那么说为好。尽管他以为我是在中央情报局工作，他对我仍然亲切相待。其实我是几年以后才入中央情报局的。

一九六八年五月，美国新任驻法大使萨金特·施赖弗来到巴黎。他娶了尤妮斯·肯尼迪，是肯尼迪总统的妹夫。他向戴高乐将军呈递国书时，我再次见到了这位将军，并同他闲谈了几句。那时，行将震撼法国的骚乱已经开始，戴高乐将军说，他将尽力而为，但是，未来是掌握在上帝的手中。这句话使我感到有些不祥之兆，因而深感忧虑。骚乱是五月初开始的，骚乱的学生占领了各种建筑物。他们接管了圣日耳曼大街，并重新命名为英雄的越南大街。骚乱迅速蔓延全市。当时总统和总理都不在国内，等他”回国时，巴黎塞纳河左岸大部分地区已被骚乱分子占领。骚乱分子得到了法国共产党人和其它极左分子的很大支持。红旗、甚至无政府主义者的黑旗在许多被占领的工厂上空飘扬。形势日益恶化，最后举行了一次总罢工，几乎使全国陷于瘫痪。巴黎最大的拉扎尔火车站关闭了，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看到。骚乱蔓延到法国其他各地，反对戴高乐将军的各派政治领袖开始谈论要组织临时政府。在美国大使馆中，许多人强烈反对戴高乐将军。看来有些人几乎欢迎这种事态的发展，认为这样就有希望把他推翻。这件事，使我回想起古巴的局面。我们并不喜欢巴蒂斯塔，可是顶替他的是卡斯特罗，而卡斯特罗领导的是一个更具有压制性的社会，并且同苏联结盟。我担心这一次戴高乐将可能由共产党人或者某一个同共产党人关系非常密切的人来接替。对这一前景，我不象我的一些美国同事那样处之泰然。我向他们表示忧虑时，他们带着宽容的神情向我解释说，法国和巴西很不同。法国的武装部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不起任何作用。我的一位同事认为，戴高乐将军三十天以内定会下台，并与我打赌三十美元。我同意打赌，结果我赢了。（迄今我未拿到这三十美元，我怀疑他是否还记得同我打过赌。）

在同法国军方人士谈话中，有一点是清楚的：尽管由于戴高乐放弃阿尔及利亚，尽管由于他对法国将军们在阿尔及尔的反叛而对军方采取的措施引起军方对他抱有反感，但在他们看来，如由共产党来统治那就更糟了，因此，他们肯定会保卫戴高乐和捍卫法国合法政府的。大使馆的这一时期的报告表现出相当的惊惶失措，所以我不得不在大使馆的电报后面附了一项声明，大意是说，各军种武官不同意这种估计。事实上，海军和空军同僚也很有经验，并且了解法国，他们同意我的估计，认为这些骚乱不会推翻戴高乐将军。但有人又一次对我说，说我对这个问题根本不理解。我对于大使馆的报告感到十分不安，因此，以我的名义开始拍了一系列给国防部的电报，题目是：“当前事态对武装部队的影响”。我首先就武装部队的情况写了几行，然后我对当前事态发展的政治意义作出估计。我并不愿意这样做，但是，我觉得我有责任使美国政府知道我对法国当前正在发生的事态的正确看法，

而直接向国防部发电报是我能做到这一点的唯一办法。

我把电报的副本分别交给了大使、大使馆政务处和有关的其他人。

在电报中，我在好几处提到这一事实，即戴高乐将军手中有“王牌”，那就是武装部队的忠诚，首先是宪兵队的忠诚。宪兵队是一支高度军事化的警察力量，组织形式既有地方小部队，又有驻扎在营地的类似军队的部队。人数约有六万五千名，分布在法国全国各地，一般年龄都在二十五岁至三十岁，或者更大一些。官兵纪律严明，有忠于政府的伟大传统。这时，他们已征召了后备兵力，拥有实力共约十万人。大使馆负责政务的部门不断催我提供情报，要我说明对法国武装部队和陆军中应征入伍的士兵将采取什么行动的看法。各个左翼组织正在号召他们起来造反。我答复说，现在的形势同当年阿尔及尔的形势很不一样，那时有人要求法国陆军起来反对合法组成的共和国政府，而这一次，连最敌视戴高乐的人，对他的总统职权的合法性也没有提出异议。此外，我还觉得当初阿尔及尔的形势是，应征入伍的士兵不听从他们军官的号召，不去造戴高乐的反，因而当前的形势，同那时不能相提并论。大约就在这时，某些陆军部队开始向巴黎附近地区移动。有些法国部队，根本就没有应征士兵，如海军陆战队中的步兵部队。似乎正是这支部队正在向巴黎附近移动。有几支装甲部队在骚乱开始时，正在外面进行演习。

总罢工开始后，它们又不能按正常程序，把坦克经铁路运回原来驻地，而只靠坦克的履带由公路返回。许多坦克已开到巴黎地区附近，夜间就可以开到巴黎周围的一赤色地带区，午夜时刻就可以听到坦克履带的隆隆声。有报告说，法国可能起用外籍军团，但是我对此有点怀疑，因为外籍军团有相当大的比例——虽然不到一半——是外国人，起用他们来恢复法国国内秩序是不明智的。

外籍军团原系法国统治集团招募外国人组成的雇佣侵略军，后来也招收本国人，因而其大部分成员为法国人。——译者

我在电报上一再提到一件事：武装部队和警察仍忠于戴高乐将军，保卫法兰西共和国的合法政府。从实质上说，这就是戴高乐将军手上的一张有力的王牌。在此期间，我的年轻侄子吉米·沃尔特斯和他的朋友杰伊·史密斯——两年前，这两个孩子都曾到巴西去探望过我——正同我在一起。自然他们都渴望来看一看骚乱的情况。通常，我每天晚上都到发生骚乱的地方去，而且总是穿着法国衣服，戴着荣誉军团勋章绶带，以免被人看出我是一个外国人。后来，在一本有关情报工作的无聊的书中，作者写到过这一时期，并且描述他如何观察“那位肥胖的武官在办公室往窗外看，数着卡车。”那时，我并没有临街的办公室，也没有数过卡车。一天晚上，我发现外面情况比较平静，我决定带那两个孩子出去，因为他们非常渴望去看一看骚乱的场面。我们驱车越过协和大桥朝着圣日耳曼大街的陆军部方向开去。我因为车上有外交牌照，所以把车停在远处，然后沿着大街朝一处街垒走去。当我们走向街垒时，遭到催泪性毒气的袭击，不得不跌跌撞撞地流着眼泪退回我们的车里。我决定带他们到别的地方去。于是我掉转头，重新越过协和大桥，沿着塞纳河岸行驶。杰伊对我说：“将军，我们周围有些人在拣石头呢。”我已经看见，并且有些担心，但是为了不使孩子们惊慌，我说：“啊，他们老是那样干。”

别去管它。如果他们拦车，你们就高呼‘打倒美国’，并且帮助他们把车推翻。他们看你们年轻，不会对你们怎么样，我就可溜之大吉。”突然间，我们发现我们的车已开到一个广场，而且两边受到包围，一边是一批警察，

另一边是一群骚乱分子。我们驶到广场时，那些骚乱分子扔出一个莫洛托夫燃烧瓶，它越过我们的车顶向警察方向飞去。警察则向骚乱分子回敬了音响手榴弹。我立即全速沿着码头向前开去，但是一个警察把我们拦住了。于是我向后倒车，试图穿一条小街开走，但在那里我又被骚乱分子拦住，还是无法前进。我再次倒车试着走另一条小街，可是再次被骚乱分子拦住了。于是我决定沿着码头往前开，不去管那个警察。我高速从他身边开过，这次他没有企图拦阻我。当我们的车于开出骚乱地区时，我的侄子吉米大笑起来。我问他笑什么，他回答说，他们在即将离开亚特兰大时，我的哥哥弗雷德曾对他说：“巴黎现在正在发生骚乱，但是你用不着担心。迪克叔叔不会让你们卷进去的。”如果我真的不让孩子们来看看，那他们永远也不会原谅我。我理解他们的心情。

我认为在那个夜晚，我目睹了人民表现出来的反对骚乱分子的情绪。当时我在巴黎东部共和国广场工人住宅区。骚乱的学生用电锯把几棵百年老树锯倒，用以修筑街垒。

我看到劳动人民的愤慨。一位妇女对我说：“这些小杂种，这些树再长起来得花五十年。”那天夜里，骚乱分子放火烧了许多小轿车。我在观看这些骚乱活动时，发现参加这些活动的人大多数不属于劳动者阶级。他们多数是巴黎有钱人聚居的第八区和第十六区富裕阶层的左翼青少年。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时髦的左派观点和由于继承财富而感到内疚，这三者的结合才把他们卷了进来。人们常讲一个关于这个时期的故事：一个有钱的年轻人，回家对他爸爸说，那天夜里他放火烧了七辆车。他的父亲问：“七辆？好，你比我强。我只烧了一辆。”他的儿子感到很惊讶，问道。“爸爸，你烧的哪一辆？”他爸爸说：“孩子，我烧的是你那辆敞篷跑车。”我觉得这次骚乱不会把戴高乐将军推翻，理由之一就在于此。如果我看到巴黎工人阶级。的青年参加骚乱，我就会感到忧虑，因为他们人数多，足以推翻法国政府，而有钱人的子弟太少了，所以是不足以推翻法国政府的。

每天晚上我外出时，总要首先经过宪兵坦克营的营房。如果坦克仍然停在营房的院子里，局势就不是真严重。我常常从那里再到其它容易发生骚乱的地方去，以便估计会发生什么事。我对于宪兵队的纪律性和克制态度，印象极深。尽管骚乱分子对他们进行了恼火的挑衅，使用了最肮脏的语言，巴黎却没有发生死人事件。在持续一个且的骚乱期间，整个法国只死了两个人。我真羡慕法国警察所具有的这种高度纪律性。他们从来没有由于骚乱者的挑衅而开枪射击，但是上帝知道他们是受到挑衅的。因骚乱分子撬了铺路石板，用碎石打人，许多警察受伤，有的腿被砸断。巴黎大学化学系的学生多次把固定铺路石板的沥青化开，然后用这些石板作为武器来砸警察。

政府的举棋不定使我迷惑不解。我觉得有办法把骚乱镇压下去，他们何以不使用这些办法使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我才明白，戴高乐将军的策略是让总罢工造成的不方便把居民彻底激怒起来。我把这种想法用电报报告了华盛顿——我说戴高乐将军是在等待这种情况的出现，然后他就会还击而使局势恢复正常。这时，出乎大家意外，并使人感到惊愕的是戴高乐将军失踪了。施赖弗大使把我召去，问我：“他在哪儿？他可能上哪儿去？”我说：“大使先生，他到哪儿去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他正在干什么。

他可能正在同将军们谈话，问他们是否支持他。这些将军会告诉他，他们是支持他的。

他将回巴黎，并制止这些胡闹。”我眼睛盯着那位认为戴高乐将军三十天内要下台、并以三十美元同我打赌的政务官员，并对他说：“你知道，巴西和法国情况可能很不一样。”

这位总统正在同他的将军们谈话，看他究竟能否继续执政。而在这方面，这两国的相似程度可能比你想得还要高一些。”戴高乐将军从德国回法国。他到德国去是会见驻德法军司令马絮将军。马絮将军向他保证一定支持他。于是戴高乐通过广播向全国讲话。当时。我到巴黎附近絮伦地方的美国公墓参加授勋节典礼，在返回巴黎途中，电台节目中中断，宣布戴高乐将军要在电台发表讲话。我命司机立即停车，因为我想要听清楚他到底讲的是什么。我环顾了四周，注意到其它车辆也都停下来了。他的讲话很简短，他宣布所有加油站都要开门营业，总罢工现在将要结束，大家都要去工厂复工。我驱车返回大使馆，马上给华盛顿发了报。我知道使馆政务处无疑已经把戴高乐将军的讲话稿报回。

我这一个电报是我作为武官所发回的最简短的电报之一，电报上只说：“今日下午四时，戴高乐将军打出了我前几次电报中提到的王牌，游戏到此结束。”我前次曾经报告说，接连两天戴高乐派在巴黎各处活动，他们正在组织一场支持戴高乐将军的示威游行。我还说，等戴高乐派起来进行反击时，规模将是巨大的。那天傍晚，大批手舞旗帜的戴派和反对左派接管行动的人开始在协和广场集合。在这以前，我曾经向一个负责政务的同僚发表评论说，许多法国人对于被占领的工厂上空只飘扬红色和黑色的旗帜，而没有一面法国国旗感到很不安。共产党人的红旗在抵抗德国人期间，在一定程度上是一面受尊敬的旗帜，但是在这红旗旁边往往有一面法国国旗。一位政务官员对我说：“沃尔特斯，你真是老脑筋。你还认为旗帜具有意义。”五月三十一日下午，在大使馆前面的协和广场上，群众越聚越多，我们在大使办公室里往外看得一清二楚。夜幕降临时，我朝外望去，看到集合在广场上的人大概有五十万之多。他们全都挥舞着旗帜。一些年轻人站在广场周围象征法国各大城市的各个塑像顶上，挥舞着大型法国国旗。后来，我到隔壁克里荣饭店吃饭，吃完饭出来时，一批青年来到饭店门口要求会见经理。我留下等着看发生什么事。他们对经理说：“先生，你们饭店没有悬挂法国国旗。请升起一面法国国旗。”经理似乎相当害怕，并且说：“噢，我得问问饭店的老板。”他们听到这句话后又说：“先生，这是位于巴黎市中心的一家法国旅馆，限你五分钟内挂起法国国旗来。”经理赶忙上楼升起国旗。升旗时，旅馆前面的群众高唱《马赛曲》，唱得真是扣人心弦，和我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在卡萨布兰卡法兰西广场听到的《马赛曲》一样地激动人心。

这些人看来已意识到，他们的命运接近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捷克居民头一天在就寝时还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里，第二天一觉醒来却已经生活在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里了。广场上有许多人并不是戴高乐派，事实上，群众手里拿的除了法国国旗以外，还有许多英国、比利时和美国的国旗，真是有意思。庞大的群众队伍开始涌向香榭丽舍大街，朝着凯旋门走去。我费了好大劲才挤到香榭丽舍大街拐角，我顺着大街往前望去，看到整条大街从凯旋门直到协和广场密密麻麻地挤满了人。我想这恐怕是我一生中很少看到的集合了百万人的场面。坐汽车的人驱车前进，喇叭根据约定的代号鸣响，意思是：“戴高乐要继续当政。”他的确继续当政了。

那天晚上，我到一家饭店吃晚饭。我知道这家饭店的主人强烈反对戴

高乐将军。开始时他不在店里，稍等了一会儿，他偷偷地带着一面法国国旗进来了，我禁不住想挖苦他一下，就说。“你到哪儿去了？”他说：“我到香榭丽舍大街去了。”我对他说：“我原来以为你不喜欢戴高乐将军呢。”他说：“我是不喜欢他。但是我一想到可能取代他的人时，我认为我能为法国作出的最好的事，就是到那里去参加示威，并向对方表明法国不是捷克斯洛伐克。”如果这是他的目的的话，应该说他是成功的。

在骚乱结束后，我又开始了武官的正常业务。我继续到法国陆军的许多单位去参观。

那年夏天，我有许多事情要做，其中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陪施赖弗大使和他全家到诺曼底滩头堡去，因为那里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施赖弗大使曾经告诉我，他这次去要不露姓名，但是又要接受法国电视台记者的采访。我不知道他此行能够保密到什么程度。他问我在哪里接见记者最好，由于天气不好，所以我建议他在圣母教堂镇空中博物馆室内会见记者，那里既可遮蔽风雨，又能为采访提供照明。我们到达该镇后，他就在空中博物馆开始答记者问。不多一会儿，施赖弗夫人和孩子们对记者的采访就感到厌烦，而去教堂游逛，那座教堂是因为电影《最长的一天》而出了名。（一名伞兵的降落伞缠在教堂尖塔上，教堂轰鸣的钟声把他的耳朵都震聋了。）我们走进这座古老的教堂。那天是礼拜六下午，一位神父正在忏悔堂听取忏悔。由于我已很久没有参加忏悔仪式，我就进去作了忏悔。我出忏悔室时，施赖弗的小儿子十五岁的博比问我：“你怎样用法语作忏悔呢？”由于他法语讲得很好，所以我就告诉他作忏悔开始时用的那些套语。他说：“对，但是请告诉我你是怎样忏悔你所犯的罪。”对此，我回答说：“博比，我向神父忏悔我所犯的罪，但不向你忏悔。你进去向他好好地坦白你所犯的罪吧。”博比耸了耸肩膀就进去了。博比还没有出来，施赖弗就来了，他说：“噢，做忏悔啊！你怎样用法语做忏悔呢？”于是我又告诉他那些套语，等博比出来时，施赖弗又进去了。当他还在忏悔室的时候，采访施赖弗的电视台记者同省长一起来了，后者的职位相当于美国州长。

电视台的那位记者问我：“大使在哪里？我想同他告别。”我回答说：“大使正在作忏悔呢。”这位法国电视台记者说：“他妈的，我知道他对我说了许多谎话，但是他的确抓紧时间以求得上帝的宽恕啊！”

后来我们继续前进，来到圣米歇尔山，在那里省长把他的直升飞机让给施赖弗一家使用。大使、大使夫人和博比乘直升飞机围着这座山绕了几圈。向大海那边看去，景色确实非常壮观。然后，我同他们的女儿玛丽亚和小儿子蒂莫西坐上直升飞机也绕着山飞。

我们只绕了一圈就开始返回。蒂莫西很不满意，他说他们都飞了三圈。我给他解释说，我是少将，只有飞一圈的资格。你得当大使才有资格飞三圈。这个答复看来使他满意了。

在这段时间里。戴高乐夫人前来回访施赖弗夫人。施赖弗夫人对于儿童智力发育迟钝的问题有浓厚的兴趣，而据我所知，戴高乐夫人对这个问题又非常敏感，因为戴高乐夫妇有一个名叫安娜的孩子，智力迟钝，二十岁就死了。施赖弗夫人在这个问题上谈了很多，我给她翻译。她在这一问题上所表现的兴趣似乎使戴高乐夫人很感动。施赖弗夫人在谈到某一处时说：“我注意到将来智力迟钝的成年人将享受法国社会保险。我想这是由于你对将军谈过这件事才作出的决定。”戴高乐夫人沉默了一会儿说：“是的，是因为我

对将军谈过这件事。”根据我的记忆，她承认对将军施加影响，这是仅有的一次。

我到法国后不久，我建议，美国国防部应邀请法国国防部参谋长空军将领米歇尔·富尔盖将军和他的夫人访问美国。后他们接受了邀请。我被指定陪同他们访问。六、七年来这还是头一次由一位法国国防部的高级官员前往美国访问。在为富尔盖将军安排日程时，五角大楼问我；他可能想看些什么。我没有同他本人商量就说，我想他会愿意看导弹发射井。这一建议引起了一阵忙乱，并为此反复商议。然而，最后五角大楼让步了，同意让他看导弹发射井。富尔盖将军在美国各地参观期间，被带到太平洋沿岸的范登堡空军基地和那里的导弹发射井。他怀着极大的兴趣观看了这些发射井。人们拍摄了许多有关他参观这些导弹发射井的照片。这些照片几年以后对我极为有用，而且对于改善法美军事关系起了极大的作用，而我刚到达法国时这方面的关系是非常冷淡的。后来还进行了更高一级官员的相互访问，从而大大促进两国武装部队重建友好的关系。我初到法国时，曾试图不介入与北约或者与戴高乐将军有关的政治问题。我多次设法参加关于一、二次世界大战中法美联合军事行动的纪念活动。这些活动往往使这些城镇的居民感情激动。他们往往走到我身边说：“戴高乐将军也许已经忘了你们美国人所干的事情，但是我们没有忘。”有时候他们还当着法国官员的面对我讲这样的话，这多少有些使我尴尬。

我同各国驻法武官关系很好，其中有一位后来担任了秘鲁总统，那就是胡安·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以后，在秘鲁和美国关系紧张时，我利用同阿尔瓦拉多的友好关系为美国的利益服务。

有一次，我去参观法国山地旅。我同他们一道滑雪。在参观的最后一天，我邀请该旅的旅长埃切维利将军及其幕僚同我共进晚餐。当天下午四点钟，我去滑雪时，出了事故，把腿跌断了。我被送进医院，腿部打了石膏。这时我接到电话，建议我取消这次晚宴，但我决定仍照常进行。那天晚上我虽然感到很疼，腿上石膏也没有干透，但是还主持了宴请阿尔卑斯旅全体军官的晚宴。这件事传遍了法国陆军，他们说我不仅法语讲得很好，而且摔断了腿并不影响宴请法国同僚的预定计划。

法国人还头一次允许我参观在科西嘉岛上的外籍军团。以前他们不让我去，因为有少数几个美国人在外籍军团中服役，他们不愿意让我同他们有任何接触。我说，对于外籍军团中是否有美国人服役我是最不关心的。这是他们的事，同我无关。我到科西嘉岛参观了外籍军团的各个部队后，感到非常有意思。外籍军团在越南战争中首当其冲。我去参观时，他们对我特别热情。事实上，当我参观外籍军团的第一个营地时，他们唱军团的一支旧歌《反对越南人》来欢迎我。尽管名叫外籍军团，但这支部队的官兵绝大多数是法国人，其次是德国人、南斯拉夫人和西班牙人。人数的多少大概就按这个顺序。

现在，军团大部分驻扎在科西嘉岛上。它的招兵站在法国。有些部队仍然驻在吉布提和太平洋各法属领地。

我有许多美国客人，他们一般地位很高，都是前来参加北约或者盟军驻欧最高司令部组织的军事演习的。他们总是要找个借口到巴黎来，指望我款待他们一番。不幸的是，供我支配的招待费只能用于招待外宾，所以这给我增加相当大的负担。有些客人我是很欢迎的。我记得有一次纽约大主教库

克红衣主教来了，因为他是天主教教士的代理主教，所以请我照顾他。我请他在我们的俱乐部吃晚饭，因为天气很好，我们就在花园里共进晚餐，突然间下起暴雨来了，客人们一个个都立即将桌子搬到屋子里去。我不知道遇到这种情况对一位红衣大主教应该怎么办，可是正当我看他时，他正站起来准备把桌子抬走，于是我就同他一起把桌子抬进了屋里。当我们正抬桌子时，俱乐部那位年轻的经理跑过来，对我参加抬桌子表示吃惊。他说：“我的将军，我不能让一位将军抬桌子啊！”我看着他笑了笑说：“你还只知道一半呢。你知道谁在抬桌子的那头吗？那是纽约教区红衣大主教。”他更吃惊了。等他安定下来后，我们已把桌子抬进屋内，并且又开始吃起来了。

尼克松总统就职后不久就访问了法国，这大大促进了正在改善中的法美关系。象往常一样，他到达法国后，我就奉命给他当翻译。大使馆为他准备了一篇在机场发表的讲话稿。然而，当尼克松到达巴黎后，戴高乐将军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来欢迎他，这样，总统只得完全离开了他事先准备好的讲稿，也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答词，对戴高乐将军说了更多赞美的话。对英法两种语言都懂一点、但又不很精通的某些记者，指责我改动了总统的讲话。我对他们说：“你们可能手里有事先发给你们的讲话稿，但是我翻译的是总统在机场所讲的话。”

戴高乐将军的内心对尼克松先生始终怀着特别热烈的感情，并且认为尼克松一生的经历同他自己颇有某些相似之处。有一次，他以非常明确的语言对我说，尼克松先生还会再度担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总统抵达法国后，举行了各种各样的集会，其中有一次是在凡尔赛官中在戴高乐将军主持下修复的特里亚农宫举行的。戴高乐将军在午宴上回忆往昔，说他认识我的时间最早，比认识在座的法国部长们都早，因为我们是一九四二年在伦敦相识的，而这些部长是以后在伦敦、阿尔及尔、或者在他回到法国本土以后才认识的。这时，席间的气氛顿时大大融洽起来。

有一段时间，戴高乐将军认为我是为中央情报局工作的。我同他的一位副官谈了话，十分明确地告诉他，我可以向他保证，我不是中央情报局的雇员。事实上，好几年以后，我才开始为中央情报局工作。一九七二年五月，我担任了中央情报局副局长，这才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为中央情报局工作。戴高乐将军一直对我极为热诚，而且法国人确实让我享有比其他武官同样或者更多的行动自由。我不仅参观过法国各地的部队，而且还参观了驻德法军。

尼克松先生第二次到法国访问时，仍由我陪同。那时我们同戴高乐将军的关系也非常亲密而热情。戴高乐将军辞职后，尼克松先生请我特地到科隆贝双教堂镇向他递交了一封亲笔信。

一九六九年八月，我开始参加基辛格同北越人秘密谈判的工作，这将在后面的一章中叙述。稍后一些，到一九七〇年，我参与了同中国共产党人的秘密谈判，这一谈判导致尼克松先生访华并同中国人建立了新关系。然而，这些谈判以及经常把基辛格先生秘密接到法国的的工作，使我在巴黎任武官的日子处于尴尬的境地，因为我不能进行武官正常的参观访问活动。当大使要我和他一起去参加某些庆典时，我也不能告诉他由于这些秘密谈判而不能同去。这样，我就很难执行我驻法武官的职务。我认为尼克松总统和亨利·基辛格先生从来没有意识到我的处境多么为难。他们指示我不要对任何人讲起我所做的事——既不要对我为之服务的大使讲，也不要对我的上级国防部讲。我离职返美前不久，前往德国向法国驻德部队告别时，四天中有两天，

我接到基辛格博士的两次电话，命我返回巴黎去同中国人和越南人会见。头一次我乘的是班机。第二次，我坚持要他派一架军用飞机接送。他马上搞了一架。当然，法国人对我的行动感到莫明其妙，这两次突然的巴黎之行只能增加他们的好奇心。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厄尔·惠勒将军在我任职即将期满时来法国访问。法国人问我惠勒将军想参观些什么。我没有同他商量就说他想看导弹发射井。他们不同意，说外国人没有到他们的发射井参观过，而且，我们也没有给他们看过我们的导弹发射井。

这时候，我得意地拿出富尔盖将军三年前在范登堡空军基地参观导弹发射井时所拍的照片。这起到了必要的作用，法国人在惠勒将军的日程中列入了参观阿尔比恩高原的导弹发射井这个项目。我相信他是参观这些发射井的第一个外国人。不用说，我也作为译员随同前往了。这是改善法美军事关系的一个象征。他们还授与惠勒将军荣誉军团大军官勋章。

我在巴黎任期即将届满时，同北越人和中国人的谈判几乎占去了我的全部时间。然而到我真要离任时，法国人对我极为热诚，随后又第三次把我在荣誉军团中的地位升到司令官一级。这一级的勋章实际上是我回国后由法国驻美大使雅克·科斯久什科—莫理泽送交给我的。蓬皮杜总统接替戴高乐将军后，我陪同蓬皮杜总统去美国进行访问。这是一次既辛苦又愉快的旅行。我们在美国访问了许多地方，其中有肯尼迪角、洛杉矶和旧金山。但蓬皮杜总统这次访问的时机对他不利。因为当时法国出售飞机给阿拉伯人并对以色列实行禁运，因此美国发生了多起反对蓬皮杜的示威活动。所有这一切使情况极为糟糕。法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是它决不允许在一位来访的外国国家元首身边发生这样的示威活动。我力图向蓬皮杜总统解释美国的联邦制度和市政制度，但是对他没有产生多大效果。在法国，要是一位市长以任何方式使中央政府难堪的话，中央政府就可以把他解职。蓬皮杜很喜欢旧金山，我们从那里乘直升飞机前往斯坦福大学。学生排成长队，进行示威，反对蓬皮杜，既抗议法国在阿以争端中的态度，又抗议蓬皮杜在一九六八年担任总理时“镇压”学生的骚乱。参观完学校后，蓬皮杜同教职员和一位学生代表会见。他同每一个教职员工都简短地谈了几句。针对他的话，这位学生代表总是说：“学生们不同意你说的这一点。”最后，蓬皮杜凑近他，并问他是怎样成为学生代表的。

他说，他是被推选出来担任这一代表的。蓬皮杜两眼闪闪发光地说：“这学校的一万五千名大学生中有多少人在这次选举中投了票？”那学生说：“五千。”蓬皮杜说：“五千张选票中你得了百分之几？”那学生说：“嗯，候选人很多。我得了百分之三十二。”蓬皮杜眼睛问得更亮了，他侧过身子说：“孩子，我得的票数，百分比比你大。”大家都笑了，那个青年也不好意思地咧嘴笑了。

我们离开旅馆，前往直升飞机停机坪时，蓬皮杜问我在等什么。我转向礼宾处长布斯·莫斯巴赫尔。他回答说，舒曼外长还没有来。我把这句话翻给蓬皮杜听后，他说：“在巴黎有排成六队的候选人在等待接替他的职务呢！”我把这话翻给莫斯巴赫尔听后，他问我这是什么意思。我回答说，我理解的意思是说，以后我们只要等蓬皮杜夫人就行了。

后来我们飞往芝加哥。在那里，遇到一件我们在整个旅程中所碰到的最难办的事。

当我们走进旅馆门廊时，有一批大喊大叫的示威者走到离蓬皮杜和他夫人很近的地方。

他们喊“沙龙”(Shalom)，希伯来语的意思是“欢迎”或者“和平”。蓬皮杜夫妇却认为他们喊的是“萨劳”(salaud)，这个词在法语中是一个侮辱人的词汇。蓬皮杜夫人很生气，当晚，蓬皮杜回到旅馆后，就决定提前回国。负责安排这次访问的美国礼宾处长莫斯巴赫尔吓坏了。蓬皮杜对我说，他不能让他的夫人遭受这样的侮辱。美国可能容忍这类事情，但是他不能容忍，特别是涉及他的夫人。蓬皮杜夫妇是一对特别恩爱的夫妇。他们在车上，在不引人注意的情况下，经常手拉着手。蓬皮杜对自己不能讲英语很遗憾。蓬皮杜夫人是一位讨人喜欢和通情达理的妇女，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后来，蓬皮杜决定自己留下来，继续进行访问，但是他要在第二天把他夫人送回国。莫斯巴赫尔问我怎么办。我说我确信唯一能给蓬皮杜消气和防止他第二天把夫人送回国的办法，就是请尼克松总统亲自打个电话来。于是，莫斯巴赫尔便打电话给尼克松总统，并把经过情况告诉了他。总统同蓬皮杜通了电话并说他本人将出席原定由阿格组副总统出席的在纽约为蓬皮杜举行的宴会。蓬皮杜很高兴，于是取消了原定第二天送蓬皮杜夫人回国的计划。后来我们就飞往纽约，住在怀特普莱恩，礼宾处长莫斯巴赫尔的家里。一位神父到莫斯巴赫尔家里为蓬皮杜夫妇作弥撒。我充当作弥撒时的助祭，并且用法语念诵了《使徒书》。在沃尔道夫·阿斯托里亚饭店举行了欢迎蓬皮杜的盛大招待会，但是那里又有一些示威者走到离他很近的地方，看来他对此很生气。这次访问给蓬皮杜对美国的态度留下了伤痕，这道伤痕直到他逝世前一直没有消失。我听一些朋友说，他曾发誓永远不再到美国来。那些捣乱事件发生在反越战争示威高潮时，当时有大批煽动者竭力在国内外进行捣乱，使尼克松政府难堪，甚至连外宾也没有能够幸免。 法语 Le salaud，意思是坏蛋，下流胚。——译者

欧洲人很难理解，为什么美国联邦政府在制止群众侮辱外宾方面存在困难。在欧洲，这种事情根本不会发生，即使在法国和英国这种民主国家也不会发生。不久，亨利·基辛格处境不好，可能使他同中国人和北越人进行的谈判处于不利地位。当我要求蓬皮杜帮助基辛格摆脱这一困境时，证明我那次陪同蓬皮杜夫妇在美国参观访问是非常有益的。

蓬皮杜毫不犹豫地给予了帮助。然而，由于他访美期间遇到了反对他的示威活动，所以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他对美国仍怀着一种比较冷淡的感情。

一九七一年美军开入柬埔寨，并进攻早已存在的北越庇护所时，在美国，乃至全世界掀起了一阵鼓噪。这不是共产党人、而是新左翼分子组织安排的。在美国各大学的校园里，各城市的大街上，在世界各地的美国大使馆前，普遍都出现了骚乱。也许使用“组织安排”这个词并不恰当，但是时间步调配合得很一致。在巴黎奥尔塞码头、法国外交部附近有一所美国学院，校舍是哥特式的石头建筑，墙上有嵌板，很有美国名牌大学的气派。这所学院的学生占领了校舍，并要求美国大使馆派人去说明为什么美国入侵柬埔寨。据我所知，他们对于北越人许多年前就侵入柬埔寨并且一直占领那个国家的大片领土，从来没有任何疑问。气氛很紧张，大使馆很不愿意派人到学院去同这些学生见面。对此我有些恼火，因此我说我去。我穿的是便服，万一他们对我无礼（我确信会发生一些这样的事），那只是针对我个人，而与

美国陆军无关。我通知学生，我于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二日下午二时三十分到那里去。我在校舍前下车，看见了在那所学院读书的一位第六舰队海军上校的女儿。她认出了我，并对我说：“将军，别进去，会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的。”我回答说：“亲爱的，我成人以后在陆军服役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对付某种不愉快的事，而大多数于那些事的人，他们的本事，要比我预计在这所学校里遇见的人要大得多。”我走进那座房子，人们同我打招呼，并把我带进礼堂。我从四处分散的一群群学生身边走过，他们对我投以饱含敌意的目光。礼堂里有大约二百五十名或者更多一些的学生同我面对面坐着。我发现他们坐的地方刚好把我同唯一的出口处隔开了，这时，我觉得已没有在外面同那位女学生说话时那样有信心了。会议开始时，派克教授情绪激动地谴责美国在越南的行动。然而，这位教授说明，他并不是反对一切战争，只是反对越南这场战争。他讲话结束时，人们报以一阵热烈的掌声。接着就轮到我讲话了。我站起身来走到放扩音器的那张小桌旁，当我开始讲话时，十来名学生从中间通道朝我走来，领头的是一位美国青年，他手里拿着一个纸包，他们一言不发地朝我走来，并且把那个包放在桌上。纸包散开后，露出了一个胎儿。一名女生在胎儿身上放了三朵花，说：“献给越南的死者。”我小声说：“我希望也献给在南越的死者。”她似乎有些吃惊，但是什么话也没有说。然后，这批人走到礼堂尽头开始大喊：“不要听这个法西斯猪猡讲话；他讲不出什么来的。在越南正在死人，而他却在这里高谈阔论。”下面的话就听不清楚了。看来大部分学生对这次捣乱感到意外。有些学生喊道。

“住嘴，我们要听听他有什么话要说。”那批喧闹的学生提高了嗓门，再次高呼同样的口号。大多数学生生气了，高呼：“我们也许不同意他的话，但是我们要听听他要讲些什么。”一个男生大声对示威者说：“你们不是我们学校的。我们是请你们来听这场辩论的。现在住嘴，不然就滚出去。”那个把胎儿放到我面前、并且看来闹得最凶的男生回答说：“我穷，这是有钱人子弟上的学校，我缴不起学费。”在这一段时间里，扩音器在我手里，我决定利用它，因为扩音系统的音响足以淹没他们之间的一切吵嚷声。我说：“如果为了证明我的论点，由我来导演今天这场戏，决不会干得比这更好了。事情的实质就在这里，是让你们大家按照老的学术传统，先了解问题的全面情况，然后作出自己的判断呢，还是让礼堂尽头那伙大喊大叫的人来决定你们的年龄是否够大、听我的讲话是否有分析能力、会不会受骗上当呢？我并没有要求到这里来，是你们请我来的，如果你们不愿听我讲话，我就走。但是如果你们想听我讲话，你们就得有所作为，以便维护你们自由听取意见的权利。”许多人为我这段话鼓掌，包括派克教授在内。

一位头发特别长的男生站起来，向那些吵闹的人喊道：“要是你们不想听，就滚开！”

“我们想听。”那个闹事的小集团大声嚷着回答说：“那个法西斯猪猡不会对你们讲什么的。”那位长发青年又说：“谁愿意听？”绝大多数人举起手。那位长发青年于是用最高的嗓门喊道：“滚出去！不然我们就要把你们赶出去。”大多数人的情绪如此强烈，以至于那些捣乱分子只有离开，他们喊叫着：“那么，好吧，你们要听那个法西斯猪猡的讲话；你们就听吧！”他们走了。我向学生们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在英、法两国丧失信誉之后爆发的，他们容许希特勒重新占领莱茵河地区，占领萨尔地区，然后夺取奥地利、苏台德区，以后又占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和梅麦尔。最后，他们不得不在波兰

问题上坚持立场，于是一场世界大战就随之发生了。如果他们早一些反抗侵略者，那时，还比较容易一些，那么这场浩劫本来是可能避免的。我们在亚洲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美国的信誉是否可靠，并不一定非要在越南来证明。但是无论如何，已经有四位美国总统支持要在越南保住美国的信誉，假如我们现在丢掉信誉，那末将来谁还会信任我们呢？我们还会有多少真正的朋友呢？也许南越并非是一个理想的民主国家，但是它容许某些反对派存在。如果北越人哪一天来到西贡，他们根本不会容许任何反对派存在，正如在北越不容许有任何反对派存在一样。多年前，北越人早已侵入柬埔寨，并且一直把它当作享有特权的庇护所，用以攻击南越和美国部队。是不是说我们进攻柬埔寨是错了，而他们进攻柬埔寨又是对的呢？当时，偶而有人发出嘘声，但是学生们基本上是注意听我讲话的。讲完话以后，我宣布准备回答问题。

一位青年站起来对我说，你必须懂得，青年人的这种政治活动是新生事物，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我说，我不同意，因为青年一贯有高度的政治觉悟。我还说：“请允许我给你讲一讲我们那个时代表示抗议的那支伟大歌曲。歌词是这样的：‘青年一代正在奋起迎接风暴。在我们的拳头面前，一切壁垒都要崩溃。任何东西都不能阻挡我们，因为我们是迎击风暴的青年一代，我们高举着新时代的旗帜。’”我接着又说，他们都太年轻，不会记得这是一支什么歌。它是希特勒青年团团歌《我们的旗帜飘扬在前方》的第一节。有一个男生站起来说：“但是我们是诚心诚意的。”我说有三百万德国青年战死在全世界各个战场上——他是否认为这些人不诚心诚意呢？我所知道的最大悲剧是青年人的真诚被利用于邪恶的目的。有一两位勇敢的青年人为我这句话鼓掌。我接着又说：“在我们的制度下，存在着变革的途径。如果有多数人表示同意，你们就可以改变我们制度中的任何东西。这一点，任何其它制度都不能办到。虽然，我们的现存制度存在着许多不平等现象和缺点，但是它同人类所建立的任何其它制度相比较，我们的制度为其大部分成员所提供的生活中的美好事物要多得多。等到马克思主义所能提供的自由和取得的各种成就和我们的制度一样多的时候，我才会比现在更注意地听它的宣传。（这段话引起相当多的掌声）

另一个问题是，“什么人们不听我们的？”我回答说：“他们是听的。但是，你提问的真正意思是为什么我国政府不按你所想的去做。你必须懂得，虽然智力和教育很重要，经验同样也是重要的。你是愿意同一个经验不多、却有许多函授班文凭的驾驶员一道飞行呢，还是同一位文凭不多、但有许多小时的飞行经验的驾驶员一道飞行呢？你无法期待那些身负重任、了解情况、偶而不慎遭损失最大的人会听你们的哈喝指挥。”

最后，我读了三段引语——肯尼迪总统、罗伯特特·尼迪参议员和艾德莱·史蒂文森的话——以此来说明我们为什么要介入越南以及我们要在那里保卫些什么。讲话结束后，约有三分之一的听众鼓了掌，还有许多人走到我身边说，虽然他们仍然反对越南战争，但是他们感谢我到这里来讲话。我离开那里时，从学生中间走过，已没有人表示敌对情绪。所有的学生都特意告诉我，那些试图冲散会场的人不是这所美国学院的学生。

后来，我收到那个学院的十六封学生来信，感谢我前去讲话。有些人同意我的看法，有些人不同意，但是都为我到他们那里去讲话表示感谢。当天晚上，阿尔巴尼亚电台报道说：“巴黎美国学院的民主学生阻止了那位法西斯武官为美国可耻的越南战争进行辩解。”后来法国人给我讲了一位目击

者的叙述。显然他们也在场。我从这次事件中吸取了很大教训，那时青年人之所以表示愤怒和沮丧，大部分是由于他们认为没有人听他们的意见。我未能使听过我讲话的大部分学生明显地改变观点，但是我去学院时和我离开时的气氛截然不同，这是非常明显的。

我调离法国就任新职以前，在巴黎工作期间，还做了另外两件事情。我奉命陪同尼克松夫人前往秘鲁访问遭受地震灾害的地区。一九七〇年七月二十六日，我飞往洛杉矶，并从那里前往圣克利门蒂。二十八日是星期天，我同尼克松夫人乘总统专机从埃尔托罗海军陆战队基地直飞利马，随机携带了药品、医疗设备和食品。临出发前，总统把我叫到一边，要我照顾尼克松夫人并尽力多帮助她。我们抵达利马时，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总统的夫人孔苏埃洛到机场迎接。我住在大使馆驻地。秘鲁的胡安·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政府对美国一向不甚友好。几年以前，当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担任驻法武官时，我就认识他了。尼克松夫人的到来使他极为感动。他把我拉到一边说：“你知道，只有当你患病卧床时，你才发现谁是你的真正朋友。”星期天，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夫人和我们同乘 C - 130 飞机前往遭受地震严重破坏的瓦伊拉斯街地区。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夫人是一位美貌而引人注目的妇女。当我看到我们将要降落在安塔深谷底部一个用泥土修筑的简易机场时，我不敢相信他们竟会把美国和秘鲁的两位第一夫人带到这样危险的简易机场上来。机场跑道很短，没有铺路面，海拔九千英尺高，狭隘的山谷，两边高耸着高出地面达数千英尺的大山。尼克松夫人和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夫人似乎都没有感到不安。可是我很担心。飞机一降落，直升飞机就把我们送往这一地区的各营地和遭到破坏的村庄。一个叫云盖的市镇，在一场土山崩裂中被全部埋没，许多受灾者在此葬身。死者约两万人。这座市镇留下的唯一遗迹是以前矗立在教堂前高耸入云的几棵棕榈树的树顶。其它一切全都埋在深达三十英尺的泥土中去了。无论我们走到哪里，人们都想同帕特和孔苏埃洛谈话。当地居民一再要求，在原地重建这个市镇，尽管他们的家园已不是第一次遭到地震摧毁。人们对本乡本土的深厚感情使我赞叹不已。尼克松夫人对于灾民的苦难深表同情。有一次，一个小男孩泪汪汪地向她跑来，她一把将他抱起，紧紧拥抱，直到他不再哭泣。美国总统夫人在秘鲁人民十分悲痛和遭受苦难的时刻，远道而来，同他们相聚在一起，这件事秘鲁人民是不会忘记的。那天下午，我们从那条危险的泥土简易跑道起飞，在壁立于峡谷的山崖中间升入高空，飞返利马。第二天上午我陪尼克松夫人去参观儿童医院。头颅开裂病人的数目十分惊人。一般土坯修筑的房子屋顶很重，墙壁一倒塌，房梁就掉下来，往往造成头部创伤，看起来确实很可怜。六月三十日，我们飞返埃尔托罗后，又乘直升飞机前往圣克利门蒂。第二天，我又动身返回巴黎。

后来我接到尼克松夫人一封非常客气的来信，感谢我在这次访问中帮助她与秘鲁人民交谈。

十、与北越秘密会谈

——“干掉阮文绍！”

一九六七年夏末，我到巴黎接任驻法陆军武官。赴任前，我曾到越南作过短期逗留。

我走遍了越南整个战区，并参加过不少次战斗。越南战争卷进了大批美军，需要掌握大量有关越南的情报。我觉得当时人们没有充分认识到这样的事实：越南受法国统治几乎长达一个世纪，在法国的档案和卷宗里，关于越南的情报堆积如山。我就承担了尽可能多地搜集北越有关设施、通讯和运输等方面情报的任务。这些设施和设备，几乎全部是法国人以前修建的，只要注意观察，这方面的情报在巴黎都能搞到。而且，法国人在印度支那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曾搜集并积累了许多越南领导人的材料，其中有不少人当时正在同我方进行战斗。把这种情报搞到手并不容易，但我逐渐获得了搜集这些大量情报的能力。

不少法国人在越南住了一辈子，对情况非常了解，但美国人一般都认为他们所了解的情况已经过时。当我们在制订计划准备营救关在河内希尔顿监狱中的战俘时，我找到两名熟悉该监狱情况——包括它结构上的薄弱环节和坚固难以突破之处——的前狱吏。

然而，我们没有请他们帮忙。

我当时也找到了曾与河内某些领导人一同上过学或工作过的法国人。我在巴黎工作的第一年，向国防部作的报告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关于越南的。那些在这一战火纷飞的国家里工作的司令官，曾多次向我表示感谢。有一次我曾得到过关于北越人企图暗杀艾布拉姆斯将军的情报。

我在别处已明确表达过我对越南战争的看法，这里不再重复，但只想说明，我当时坚定地认为，我们是在努力帮助南越人维护他们原来享有的那点自由——这远远超过他们现在享有的自由，我们这样做是正确的。我认为，北越人是敌人。对于我来说，他们代表着生活当中一切可恶的东西。甚至在我们已深深地陷进了南越的战争时，我也一点都没有想到会被找去同越南人打交道。我没有自告奋勇去承担这个任务。我是接受命令不得不去。我在苏联集团举办的招待会上常常遇见北越驻巴黎的代表。我们对待他们，象对待中国人一样，彼此从来不说话，也不打招呼。北越不同于中国，他们没有在法国派驻武官，因而我见到他们的机会不如见到中国人的机会多。我见面能认得出来的唯一的北越人可能就是北越驻法国的高级专员梅文蒲了。同许多越南人一样，他曾在法国受过教育，能讲一口地道的法语。

约翰逊总统宣布同北越人开始和谈，并派遣艾夫里尔·哈里曼率领美国代表团参加谈判。哈里曼先生到达巴黎时，我前往奥利机场迎接。他曾不胜感慨地说，从他为执行马歇尔计划前来巴黎已相隔二十年了。

在最初阶段我没有直接参加谈判，我作为武官，在后勤方面对美国代表团给过支援，直到代表团的机构齐备、生活可以自行安排为止。我同哈里曼先生、赛伊·万斯先生、菲利普·哈比布先生以及代表团其他一些成员都是老相识。我当时已逐渐意识到这种谈判不会有什么成果。我知道，对于会议桌的式样和位置以及谁应该坐在什么地方等等具体问题会进行无休止的讨论。从同法方的接触中，我也得知，双方代表团除了在美淇饭店进行公开谈判外，还有其他接触。例如，我知道哈里曼先生曾秘密会见过北越代表团团长。根据我从法国人那里得来的情报，我很清楚地了解春水团长的情况。他

曾因诈骗其法国雇主，一度入狱。雇主观还活着，而且还在巴黎。我把他这一段个人经历统统报告了美国代表团，但他们似乎不懂得如何利用这一情报，可能还怀疑这一情报的真实性。

谈判从一九六八年五月开始，中间经过美国大选和新总统就职，一直拖延下来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哈里曼先生辞去美国代表团团长后，由美前参议员、驻南越大使亨利·卡伯特·洛奇接任。代表团长人选的更换丝毫未改变在美琪饭店无止境谈判的局面。显然，北越利用公开谈判作为宣传，鼓动欧洲和美国人民起来反对美国。他们宣传的主要对象是美国公众舆论。

在某一时刻，华盛顿作出了试图同北越进行私下会谈的决定，但同时，公开谈判仍照常进行，这是为了使他们感觉到，既能保留宣传讲坛，又有希望在私下会谈中取得进展，以寻求体面地结束战争的途径。

基辛格博士来到巴黎。他在大使馆约见了我们，他充满信心地告诉我，他将去会见北越代表，并要我同行。他要我为他任翻译，还为双方以后可能进行的交往充当联络。他是通过前法国驻北越高级专员让·圣特尼的关系，安排同他们会晤的。圣特尼夫人是基辛格博士在哈佛大学的学生。基辛格同北越人第一次会晤是在一九六九年八月，地点在巴黎的繁华地区里沃利街圣特尼的公馆。我们比北越人先到。在我们等他们的时候，圣特尼招待我们喝酒。当时，我考虑应该怎样同敌人交谈，是否同他们握手？举止行动该怎样呢？我不知该怎么办。那所豪华寓所的门铃响了，我们都走向门厅。那时春水已在那里站着，根据照片我一眼就认出了他。同他一起来的还有另外两个越南人。基辛格向春水伸出手去，他带着尴尬的微笑同基辛格握了手。当圣特尼为我们作介绍时，基辛格又同那两位越南人握了手。其中一人是很高明的翻译，他除了本国语外，法英两种语言都掌握得很好。然而，这个人并不讨人喜欢，常常在翻译令人不愉快的言词时，明显地表现出他十分欣赏他所翻译的那句话。

后来，圣特尼把我们带到他的起居室，为我们准备好饮料后，他就走了，留下基辛格博士、北越人和我。基辛格博士说，美国政府愿意同北越进行私下会谈，看是否可以努力找到某种办法来结束这场漫长而破坏严重的战争。要做到这点，只能是私下会谈，双方都不得利用会谈达到宣传的目的。北越人当即申辩从未利用会谈进行过宣传。在长时间会谈中，少不了北越人的挖苦讽刺和基辛格博士的尖刻回敬。我们边谈边喝茶，情况逐渐明朗。北越人感到战争的压力，乐于进行这种私下会谈。但他们并没有直接说出来，当场也没有表示以后继续会晤。他们只答应把这个意见转告河内，并表示如有答复将同我联系。我把我的电话号码告诉了他们。双方谈定，以安德烈作为彼此称呼的代号。

他们强调必须绝对保密，并明确表示：此消息一旦被泄露，他们将切断那条即使业已沟通的渠道。按照规定，我如有情况，就给越南驻巴黎高级专员公署去电话，自称是安德烈，要同高级专员梅文蒲谈话。他如有消息告我，则说安德烈来电话，并要求见我。他们再次强调，全部问题都将由河内决定，以后才能答复。他们先离开公馆，我和基辛格博士稍留几分钟，喝了一杯茶。然后我们步行回大使馆。当天下午，我和基辛格博士同机飞往布鲁塞尔。他严格指示我应如何与北越人打交道。为了直接与他在白宫进行联系，他将为我准备一套专用密码。电文由我自己翻译。他嘱咐我，绝对不许把会谈情况告知大使馆任何人，也不得报告我在国防部的上级领导。当我表现出

某些犹豫时，他说这一点非常重要，并说我不久即可回华盛顿，届时总统将以总司令身份确认这些指示。我应该记住，总统负责执行外交政策，在法律允许范围内，他可以根据他的意愿行事。我对基辛格说，通知一下法国最高领导可能是明智的。他问我有什么必要这样做。我说法国有一套非常严密的情报机构，关于这种接触，必然为他们所获悉。如若不通知他们，他们可能恼火。于是他问我怎样才可以防止法国情报界扩散这个消息。我建议由他亲自和蓬皮杜总统通话，请总统以非常秘密的方式加以处理，只容许法国情报机构最高一级人员知晓。他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我还对他说，我必须告诉我的秘书，她这人非常严谨。

他又问这样做的必要性。我说要是有一天我去会见北越人而没有回来，总得有个人知道我的去向。他很勉强地同意了。我同他在布鲁塞尔分手后回到巴黎，在那里等候北越方面的第一个信息。此刻，有人自华盛顿带来了专用密码，供我与基辛格联络使用，并教给我使用的方法。

我不禁思忖着这种情况的讽刺意味。象我这样如此强烈地反对北越的人并不多，然而偏偏是我被选中去和他们打交道。作为一个军人，我接受了命令，并准备去执行一项我根本没有争取过的任务。

我想尽可能多地收集关于梅文蒲和春水的情况，以便更好地对付他们。

基辛格离开后不久，我就去华盛顿。总统确认了基辛格博士给我的指示，并重申我不得同任何人谈论这条同北越人谈判的渠道。

在这之后不久，我接到了期待中的梅文蒲的电话。他对我说，北越人要在巴黎一个工人居住的郊区的一所私人别墅里见我。这使我面临了一个小小的问题，因为我的汽车上有外交牌照，清楚地表明是美国使馆的汽车。这样一辆车在塞纳河畔维特里这一主要是共产党人居住的郊区出现，一定会引人瞩目。因此我不得不把车停靠在距离较远的地方，然后再搭公共汽车到北越人指定的别墅附近。北越的高级官员多数都住在巴黎豪华的第十六区。他们甚至在那里为本国人开设了一家妓院，里面全部是北越妇女。然而，他们会见我的地点却经常在工人区。我在约定的时间来到座落在维特里的朱尔拉盖斯街七十三号别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座别墅的马路斜对过就是一座天主教堂。我去别墅参加第一次会谈时，先搭公共汽车，然后步行前往。那时是否有人跟踪，我并没有发现。接待我的是梅文蒲和另一个越南人。我们在他们起居室坐下，喝着越南茶。他们对我说，他们已同意我们提出的私下会谈，并建议基辛格博士选定一个同他们会晤的日期。

我向他们说明，基辛格博士希望河内方面能派出一个同他在美国政府中地位相当的人选。

他们说，政治局委员黎德寿将来参加会谈。接着，他们向我提了一些关于我个人的问题，问我是否在越南服过役，是在什么地方。他们没有提出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而且，我在越南服役这一段经历，看来根本没有使他们不安。我们总是用法语交谈，他们很想知道我是怎样学的法文。他们大都进过法国学校，而且法语都很熟练。梅文蒲讲的法语没有一点越南口音。他们还问了我许多其他问题。显然，他们在编写一篇人物材料。我们谈话时，座位上方悬挂一幅胡志明在向我们深情地微笑的像片。后来，他们交给我一封胡志明主席致尼克松总统的信。我对他们说，我将把信转交给总统，不久便可收到复信。

我离开别墅后，立即去使馆执行把信息译成密码以供发报的累人任务。

连续进行数年的一系列会晤就这样开始了。为了会晤，我必须悄悄地安排亨利·基辛格到法国而不让使馆人员发觉。我被告知，最重要的是不能让记者发觉，一经他们发觉，事情就会宣扬出去。北越人说过，如走漏消息，他们将中断会谈。

基辛格博士一般乘“空军一号”飞往欧洲，这有利于保密，因为毋需旅客名单。这架飞机经常用来训练空勤人员，不会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基辛格博士星期五晚上要特意在华盛顿某处公开露面，然后飞往巴黎。他回国后，又要马上在公共场所专门出现一下，使人们觉察不出他有来回巴黎的时间。他要为自己安排乘飞机旅行的问题，我则必须为他安排不经过海关和移民手续就进入法国。他有时转道英国或德国进入法国，有时运来法国。我曾同蓬皮杜的顾问迈克尔·若贝尔交谈过，他非常帮忙。基辛格博士指示我要不时地向他通报情况。我曾把基辛格秘密弄到法国前后加在一起多达十五次以上，但从未与法国海关稽查或移民局官员碰面。我同奥利机场的朋友一起安排了一个停放军用飞机的地方，这样就没有人来找麻烦。有时由于若贝尔的协助，他可从另一个法国机场入境，一切安排妥当，不会有人提出任何问题。法国人曾为美国“空军一号”加过几次油。我相信这些法国人至今都还没有得到过任何报偿。我还多次使用阿沃尔的法国机场，这个机场停有为他们的核打击力量空中加油的飞机，而这种加油飞机从外表看又酷似“空军一号”。我在那里安排他乘我自己的武官专用飞机或法国飞机到巴黎。大概就在这个时候，由于经济上的原因，我的武官专用飞机被撤销了，而我又不能说出我需要保留这架飞机的理由，因为我不能向国防部报告我在利用这架飞机偷偷运送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去法国的事。有一次我问基辛格博士，他是否能帮助我留下这架飞机。他说，他不可能做到既过问这件事，而又不暴露他在巴黎的会谈。他有时先飞德国，把美“空军一号”留在那里，然后换乘空军飞机，机上人员都曾宣誓要保密。

基辛格博士来巴黎时，通常带两名年轻的外交官作为助手。他们都住在我在纳伊区的寓所里。这是一个并不宽敞的公寓，有两间卧室、一间起居室和一个餐厅。车库有两个出入口。这两个出入口，都可以上锁，以防别人随后跟踪，还有个好处，就是可以把车朝不同方向的两条街道开出去。基辛格博士住在我的卧室里，两个助手住客房。我自己则有时睡在起居室的长沙发上，有时让我的带有军籍的副官住到他朋友家去，我便住到他的公寓里——距我的寓所只有一条街远。但是这件事本身却给我增加了麻烦，因为离我住所一条街远的地方有一幢属于美国大使馆的大楼，里面住了不少美国人，由于距离这么近，我经常担心，怕基辛格博士会被人认出来。我告诉我的女管家，这位客人叫 H·A·基尔希曼，是一位美国将军。我认为有必要使用基辛格博士姓名的第一个字母。

其实，我的副官对这位来访者究竟是谁是清楚的，但他保密做得非常好。

有一次，基辛格博士要我把他带到塞纳河畔总统私人公寓去见蓬皮杜总统。他叮嘱我不要对跟随他来巴黎的两名助手提及此事。我们把这两人留在我的寓所，我用我自己的汽车把他送到波旁码头。基辛格同蓬皮杜谈论了有关谈判事宜，并感谢他给予的帮助。

数月之后，一家新闻杂志发表了基辛格曾在蓬皮杜私寓会面的消息。我没有告诉过杂志社，我肯定蓬皮杜也没有告诉过；那么只有一种可能。

基辛格博士一般是在深夜到达巴黎，然后我们一同到我的寓所，他在那里过夜。翌晨，他就在那里吃早饭。基辛格通常不大夸奖人，但有一次，他说我招待他吃的早餐，是他所吃过的最好的早餐，也就是说；我的厨师兼管家和那位副官手艺高明。早餐后我们去同北越人会晤。为了这个目的，我不得不用租来的汽车。这是为了避免由于在北越别墅外面出现有外交牌照的汽车而使整个事情暴露。同北越人会晤后，我通常送基辛格到奥利机场隐蔽的停机坪，他就乘机前往德国或英国，然后坐“空军一号”飞回美国。

后来，同中国人的会谈开始以后，他总是先会见中国人，后会见越南人。他曾向中国人提到他正在同越南方面会谈。显然，越南人早就将此事通报给中国人了。有时他们会转弯抹角地提到此事，问基辛格说：“你这次来还要见见别人吧？”我不能肯定，但我十分怀疑，中国人曾否告诉过北越人，他们也在同美国人会谈。

我在巴黎陪同基辛格会见越方人员的地点总是在西图阿希的达尔特路一所小房子，而不是我单独拜会他们时的场所。这些会谈是在不同程度的紧张气氛下进行的。基辛格博士会见黎德寿和春水时，由我把他的话译成法文，越南译员再把法文译成越南文。他们用越南文回话，译员再把越文译成英文。我始终不理解，为什么我们不用两种语言通话，而是用三种语言。但这是他们要求的。而且在我参加的会谈中也都是这样做的。基辛格回国后，双方的信息都由我传递。不论什么情况，我从来没有参与实质性的会谈。

有时我也同他们长谈，当他们交来胡志明致尼克松总统的信件时，我们曾相当长时间地谈论过胡志明和他的生活情况，我们也谈过战争，但我也很清楚，他们真正的希望不是在打仗的战场上取得胜利，而是在争取美国公众舆论的战场上取得胜利。他们做得对。

他们在美国取得了胜利，但没有在他们发动最后胜利攻势的南越中原高地取胜。他们参加谈判的人始终是以黎德寿和春水为首。我们一方的公开谈判人员，先后由戴维·布鲁斯大使和波特大使接替了洛奇大使。我从未受权向洛奇大使作过汇报，但后来却允许我告诉布鲁斯大使和波特大使。通常的情况是，在把基辛格送上飞机之后，我就去见布鲁斯或波特，并把经过情况报告给他。由于那些会谈，多次影响了我作为武官的正常外出活动，和作为大使随从在正常情况下应陪同大使外出的活动。

我也很难在我的休假期间安排外出旅行，因为我知道，我随时可能接到通知，要把基辛格博士弄到法国同北越人会晤。在谈判过程中，北越人的发言充满宣传的语言。但中国人却完全不同。北越不断指责美国发动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指责美国从未表现出“善意和诚意”。特别是后面这句话是他们爱用的口头禅。有时候基辛格对那些宣传感到厌烦了，便说，“你们为什么不把那些话留到美琪饭店公开谈判时讲呢？”他们听了咧开嘴一笑，然后又继续讲下去。

起先他们提出一条不可更改的先决条件，要美国人“搞掉阮文绍、阮高其、陈善谦集团”。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发现这个办不到，他们就不提陈善谦了，只要求撵走阮文绍和阮高其。后来他们又降低要求，改为只要求撤换或清除阮文绍。一天，他们又在唠叨这个问题，基辛格说，我们不能这样干。我们在越南只有二十万人，而阮文绍却有一百万。后来和基辛格同时荣获诺贝尔和平奖金的黎德寿说：“你们知道该怎么办。”基辛格回答说，他不明白黎德寿要我们干什么。黎德寿又说：“你是知道的。摘掉他。”我确信基

辛格知道北越人指的是什么，但他有意要对方亲口说出来。基辛格说，“我真不明白你们要干什么？你的意思是要我们杀掉他吗？”黎德寿立即回答说：“是的，但是你不必把这一点写进协定中去。”他就是这样直截了当地提出要美国暗杀其盟友。他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而丝毫没有不安的表现。亨利严峻地回答说，这是不光彩的犯罪行为，美国是不会参与这种行动的。北越人像往常一样，感到难堪的时候，就神经质地咯咯发笑。

还有一次，基辛格来到会晤地点，预期要见的是黎德寿，可是只有春水在那里。春水对他说，黎德寿因身体不适，不能出席。亨利说：“我是个忙人，我是美国总统的特别助理，我从这么远的地方来，期望见到与我级别相当的人。”于是春水说：“我是特命全权大使。”亨利回答说：“比尔·波特也是特命全权大使，你去同他谈吧！”基辛格说完拂袖而去，重新登上飞机飞回美国。从此以后，黎德寿再也没有缺席过任何一次会谈。他们明白了。由于北越不肯妥协，会谈每隔两个月就要中断一次。过了若干星期之后，总有一方会建议本着“新的态度”恢复会谈。北越人只有一种态度：总是要求清除阮文绍。显然，他们把他看成一个很强的领导人，看成是他们希望实现征服南方的主要障碍。他们如此不断地催逼基辛格，国会方面对他也有沉重压力，我真担心会给他造成什么影响。我对他说，“你若有意把阮文绍的脑袋献给他们，可不要指望我去端盛脑袋的盘子。”他以十分震惊的目光盯着我，问我什么东西使我产生这种想法，认为他想干这样的事。我答复说，“没有什么东西。我只想确定你获得的是好的、而不是坏的诺贝尔和平奖金。”基辛格经常担忧国会可能强迫政府对北越做更多的让步。他多次在汽车里对我嘀咕：“下届国会非放弃这块地方不可了。”

在这些令人厌烦的谈判过程中，基辛格始终表现出非凡的耐心和宽容，令人钦佩。

他只是在对方傲慢无礼的时候，才说一些自我贬低的话来巧妙地泄他们的气。起初，他们对他总是自我贬低感到迷惑不解。他有时会说：“我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大学教授。”他们猜不透这句话讲的是否是真情，是否在和他们开玩笑，还是在企图蒙骗他们。他们又觉得这三种意图的成分都有。对方一遍遍反复宣传同样的题材使我联想起一九五一年我们同摩萨台的谈判。他们同他一样，都认为只要他们反复讲某一件事，讲的次数多了，对方就会认为这就是实际情况。

显然，他们对美国深有疑虑，并认为我们是不可信赖的。他们从来不承认在南方驻有他们的军队，也不承认对临时革命政府有任何影响。这是一次使人难以置信的伤透脑筋的经历，而基辛格表现了极大的耐心，他只是在对方说了些明显攻击性的话之后才发过一两次脾气。有关会谈的所有情况，在我们办公室里除了我的秘书之外，没有其他人知道。我单独同越南人的会谈总是呆板而生硬。梅文蒲因河内认为他太法国化而终于被召回国，我就和他的继任者武文充打交道。武文克现在是北越驻法国大使。此人远不如梅文蒲有风度。在我与他们的会谈当中，他们总是想探听美国公众舆论的情况，并期望舆论界敦促政府服从他们的要求。

当我们派兵进入柬埔寨时，他们确实震动了，而且据我看，这是他们第一次表现出害怕。他们反复地对我说：“你们的总统怎能干这样的事？他这人完全不可捉摸。”到那时候，我才初次认识到，“不可捉摸”是多么有力的一件武器。由于进兵柬埔寨，美国国内引起了骚动。越方对此充满希望，

希望这种骚动会迫使美国政府满足他们的要求。

当然最后看来，他们寄托这样的希望是对的。水门事件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蠢事帮了他们的忙，使他们有可能取得胜利，这件事大大削弱了总统的地位，因此福特无法继续沿袭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和尼克松等曾试图在东南亚走过的道路。

我永远忘不了一九七一年九月的一天。那天我正同基辛格一起走上他们别墅的台阶，看见黎德寿站在最高一级台阶上，面带胜利的笑容对基辛格说，“我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同你进行谈判。我刚刚同麦戈文参议员谈了好几个小时，你们的反对党将迫使你满足我的要求。”他说话时那种洋洋得意的口吻简直难以容忍。这是基辛格最了不起的日子中的一天。他两眼直盯黎德寿说，“特别顾问先生，你是我们这个地球上率极权国家的公民，你根本不懂什么叫反对党，因为在贵国一旦出现任何反对党，都会遭到你们残暴的镇压。还是让那些可以容忍反对党的人去解释什么是反对党吧！你不要企图解释你根本不懂的事情。”黎德寿神经质地咯咯发笑，意识到他威胁基辛格的企图未能得逞。

此后，他们再也不直接提美国的内政了。

这些谈判真是枯燥无味、令人沮丧。有时会感到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他们又会后退到原来出发点的后面。八月间，我收到基辛格一封来信，他说，“对你作出的非常宝贵的贡献再次表示感谢。到现在为止，这些贡献被证明是有成效的，你可能已经注意到，总统昨天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可能无意识地使人们进一步猜测正在进行秘密谈判。

他的讲话将使你本来就很艰巨的任务更为复杂……”他说对了，是这样的。北越人怀疑我们泄露同越方进行秘密谈判的消息以减轻政府受到的压力。收到基辛格信后第二天，我同越方进行了一次异常激烈的会谈。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四日我向他们传递信息，说美国准备在新的态度的基础上恢复谈判。

会谈是恢复了，但僵局仍继续存在。他们坚决要求把越南政府首脑阮文绍总统赶走，并以此作为任何实质性谈判的绝对必要条件。十一月我从英国把基辛格接来巴黎同越方再次会晤。我必须先去伦敦，要求空军部的人员保证为他这次行动保密。虽然报界曾揣测某处可能在秘密谈判，但从未报道过亨利来往巴黎的消息。我为此非常引以自豪。

一九七二年一月，武文充召见我，指责我们走漏了谈判的消息。后来到了二月，双方又同意继续会谈。然而我在巴黎任职的期限快到了，而且我急于卸掉这一重担。尽管北越人十分粗暴无礼，我同他们个人之间还是保持了较好的关系。他们对于通过我进行联络表示非常满意。日我知道我在法国的任期快结束，我就向基辛格博士和黑格将军推荐了我的助手、驻法空军武官乔治·圭上校。我说他将是一位同北越继续保持联系的合适人选。

他是一位风度出众的官员，说一口漂亮的法语，而且有印第安阿贝纳基人的血统，所以外貌有点象东方人。他为人十分严谨，而且我多次看到他表现出具有十分高超的判断能力。基辛格表示同意。我当即通知北越方面，乔治将接替我的联络工作，并陪同他前往维特里别墅，把他介绍给北越人。

在这之前，当我准备陪同基辛格博士去会见北越人时，我总要先派我的秘书南希·乌莱特乘另一辆租来的汽车到北越的别墅附近巡视一番，看是否有记者或可疑的行人。

然后她就在事先约定的地点同我们碰头，并向我们报告平安无事。我感到翻译密码太乏味，所以把译密码的方法教给了我的秘书。她为我翻译来往的电报，使我腾出不少时间，减轻我不少工作。她在这段困难时期给我的帮助是怎么赞扬都不过分的。在我们驻巴黎的大使馆内，唯有她一个人知道我同北越人和中国共产党人之间的活动。在我会见北越和中国共产党人这段时间里，我经常担心的另一件事，是中央情报局或联邦调查局可能发现我的活动，并认为我要叛逃或同这两个共产党国家进行里通外国的接触。奇怪的是他们没有发现。我离巴黎后，一位我在法国认识的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对我说，“哎呀！

我一直以为你仅仅是一位顶呱呱的语言学家呢。”这是一句老实话，但是对一个即将成为他上级的人说这样的话是不得体的。

我同北越本最后一次会见时，他们问起我尼克松和蓬皮杜在亚速尔的会谈进行得怎么样，因为他们在电视新闻里见到了我。我就告诉了他们，我不久将回美国担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武文充颇为酸溜溜地对我说：“但愿你在这个职位上永远不要做任何给我们提供把柄的事情而指责你。”我回答说唯一关心的是我在那个职位上，永远不做使我们国家有理由指责我的事情。他点点头，未做进一步的评论。

我离职后，乔治·圭接替我同北越打交道。他的工作成绩显著，因商被提升为空军准将。他同北越秘密联络，直到一九七二年谈判转为公开，基辛格能堂而皇之前往巴黎同越方会晤为止。

我在巴黎将近两年半的时间一直同北越人打交道，但从未走漏过消息，没有把当时发生的事情泄露出去。我在完成武官正常业务之外，还要担任联络工作确有很多困难。

这一点基辛格博士十分清楚，他曾多次给我鼓励。我经常在基辛格的办公室同黑格将军接触，他也特别理解我，给了我很多帮助。

同北越人打交道远不如同中国人打交道有意思。我当时必须同时同这两方面发生联系，但又要装作他们彼此都不知道。有时我觉得我象一个玩杂耍的人向空中不断地扔三个球：一个球是驻法武官；一个球是中国；一个球是北越。我很不谦虚地说——我希望这种不谦虚可以得到谅解——在这段漫长而令人厌烦的时间里，这三个球哪个也没有从我的手中落地。至少在同中国人打交道方面，我能够看到些进展。坚冰逐渐消融，继基辛格博士之后，总统又前往中国访问。同北越的谈判，没有明显的进展，有的只是长时间的相互指责和紧张激烈的辩论。中国人很有风度，富于幽默感。越南人或许也有这种性格，但我所能说的是，他们如果真有这种幽默感，那么，他们在这整整两年半的时间内，在我面前隐藏得十分彻底。去和中国人见面总是使人感到激动和振奋，但去见北越人却有点像去见牙科医生。此外，北越人只供我用茶，而中国人的招待却十分丰盛。

我同北越人打交道是有反感的，但我有服从命令的义务，还想到“向和平使者祝福”这种福音，反感情绪也就克服了。我失败了，但并不是因为我没有做出真诚的努力。我对基辛格博士的耐心，和他在执行华盛顿的正常任务之外，还毫无怨言地在漫长和疲劳的旅途上奔波的精神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有十分惊人的巧妙的答辨本领，他的对手从没有能够占上风。就我看来，有时他的涵养功夫和容忍态度简直象个圣徒——尽管我把这个词用在这位大博士身上不一定恰当，但他确实过去谈判者很少遇到的情况下作了最

大的努力。

这对我是一次不寻常而有挑战性的经历。我必须同对方交谈，还要在有限的人力、物力的情况下，组织完成当代一项极为秘密的使命。在这方面，过去长期搞情报工作和同具有不同文化、思想的国家打交道时积累起来的经验，都对我很有帮助。谈判期间，我读过的越南历史和文学方面的书籍（当然都是翻译本），比我一生中其余时间读过的还要多。由于这些原因，我得以使他们承认我是一个对越南的国情、文化和历史都有所了解的人。

我能被任命为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并能在风云四起和最动荡的时期在政府中任职，是由于我参加过同中共和北越两方面的谈判以及长期从事情报工作。一九七二年春，我结束了同北越和中共打交道的使命。

十一、与中共秘密会谈

——二十五年后又言归于好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宣告，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长期内战，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抗日战争曾经一度中断，终于由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告一段落。在国共内战时期，美国支持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战后一段短暂的时期内，美国和中共人士曾有所接触。尔后，中共与美国的关系完全断绝了。虽然在华沙会谈时作过微小的努力，但最后一无所获。

蒋介石被赶出大陆以后，美国继续支持他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美国第七舰队奉命防备共产党侵犯台湾。结果是自一九四八年以后，美国与中国一直没有外交上的联系。

一个在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和一个最富有和强大的国家之间竟丝毫没有接触。事实上，除了通过第三者外，确实没有别的渠道可以相互沟通。

在美国国内，中国问题成为棘手的问题之一，在美国政界，甚至有人散布这样的观点，有人“把中国出卖给赤色分子”了。右翼人士指责左翼人士要承担责任，是他们把占地球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送给了共产党。美国人一直激动地谈论中国问题，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一个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要提出改变中美关系现状的话，那是十分困难的。

事实上，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想和美国进行接触。他们尽管与苏联决裂了，他们的反美宣传仍然极为激烈和尖锐。要打开这种僵局需要最高领导人的巨大勇气。理查德·尼克松具有这种勇气，而亨利·基辛格耐心地、坚持不懈地执行了这项政策。事实上，他们向中国伸出手来，也为的是寻找一种办法，可能借助于中国的帮助以制止北越的侵略。然而我们的希望落空了。拥有二千万人口的北越人利用我们的孤立主义从“竹幕”的那边向南推进了。但是，对中国的门户还是开放的。这是因为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认为，美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而且办事果断，否则他们也不会对我们感兴趣。如果我们象放弃越南、柬埔寨和老挝那样放弃朝鲜和日本，他们也会因此对他

们的政策作出必要的结论。根据我的看法，如果我们放弃台湾，中国共产党可能认为，与其说这是我们对他们友好的表示，倒不如说这是证明我们是不值得信任的。在这小小的行星上，我们只有进行对话。事实上，除开对话之外，我们都没有别的选择。

我担负与中共接触的使命大概是在一九六九年一月，当时我还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这件事。那时我担任美国驻法国使馆的武官，当我从巴黎返抵纽约时，到皮埃尔旅馆拜访刚当选为总统的尼克松。我们会见的时间很短，在谈话中尼克松对我说，在他担任总统期间想做的工作中，有一项就是设法与中共人士接触。他觉得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与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完全没有接触，对世界是不利的。

当时我认为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我也不知道尼克松究竟该怎么办。会见后，他建议我去找当时已被选中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亨利·基辛格博士。

我从未见过基辛格。他在皮埃尔旅馆也有一套房间。过去我曾读过他的一些著作。

显然，他也曾听到别人谈起过我。在我们见面后，他要求我给他准备关于巴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越南情况的三份报告。几天以后，我就把报告交给他了。我在皮埃尔旅馆见到的基辛格几乎是一个温文尔雅缺乏胆识的人，而以后我却不再是这个印象。我当时有点纳闷，为什么当选的尼克松总统会选中基辛格这样的人来担任如此重要的职务。

事隔一年以后，有一次我从巴黎返回华盛顿，基辛格交给我一封给中国的信件，内容是说如果中国方面愿意，美国准备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秘密谈判。此事可通过美国驻法使馆武官弗农·沃尔特斯将军进行联系，保证严守秘密。信中还指出，如有必要，尼克松总统准备派高级代表到巴黎与中共人士会谈。我被授权以口头方式告诉他们，这位高级代表是基辛格博士。这时，我又去见尼克松总统，他指示我今后应该通过基辛格直接向他本人汇报，并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参与其事。

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七日，我企图把信件交给中国驻法国使馆武官，他名叫范文（译音）。他是我经常见到的中国使馆官员。但是每当我们见面时，互相都假装视而不见，从来没有握过手，讲过话。此外，我也很难找到单独跟他在一起的机会。那天，在出席波兰使馆招待会后，非常偶然地在院子里突然见到了他，而且只有我们俩在一起。

我向他走去，并用他也会讲的法语对他说：“我是美国使馆武官沃尔特斯将军，我有一封我国总统给你国政府的信件。”他目瞪口呆地瞧着我，好象想说什么，但又不知说什么好。最后，终于气吁吁地用法语说：“我告诉他们，我告诉他们，我告诉他们。”说完急忙跨入“奔驰”轿车开走了。我把这次碰壁的情况向基辛格汇报，他指示我暂时把此事搁一搁。

六月十六日，我接到一封信件，指示我要在六月十九日将此信交给中国驻法大使黄镇。我立刻想到地处闹市的中国大使馆比较引人注目，便决定到市郊纳伊区的大使官邸找他。第二天早晨八时许，我步行到城堡街大使官邸附近，那里距离我的住处不远。八点半整，大使乘坐他们本国制造的、“奔驰”式无产阶级高级轿车驶出大门。第三天，也是同样情况。我由此得出结论，他每天总是八点半出门。六月十九日早晨八点二十分，我未经通报就推开大使官邸前院的大门。那时，基辛格从巴基斯坦到北京的闪电式旅行刚宣

布。我的这次使命无疑是中美初次接触的结果。

中共使馆在巴黎有两处房产。一处是在乔治五世大街的大使馆。在法国政府承认毛泽东政权为合法政府后，中共从国民党政府接管了这座老式的办公大楼。这里地处巴黎市中心，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场所，所以几乎无人不晓。为了避免招摇过市，我选择了到另一处住宅跟他们联系，这是诺曼第庄园式的宽敞建筑物。显然，过去是非常富有的法国人的财产。这住宅四周是花园，故而并不面临街道。花园周围有高墙，临街一面，还钉有金属板的栅栏以防行人窥视。除了大使以外，使馆其它人员也住在这里。我从我的纳伊区的寓所步行到中国大使馆官邸，这样就不致于被人察觉。因为所有属于外国使馆或外交人员的汽车都有带着 CD 字样的牌照，并根据不同国家分别用数字以示区别。譬如说，CD6 代表美国，CD45 代表英国。这样，与中国人接触的问题就复杂化了。带着 CD6 牌照的汽车在中国使馆附近出现显然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博士明确地告诉我要谨慎从事，否则会影晌全局的计划。

当我推开大使官邸的大门时，一个年轻人正在那里等候着。我向他作了自我介绍，并告诉他我是来递交信件的。他说他名叫魏栋（译音），是大使的助手。他示意我跟他进去。我们穿过庭院一直到官邸主楼的门口，另一名官员出来迎接。他说他名叫赵贵生（译音），他讲的是英语。他们好象是在等待我，所以我想基辛格可能早已将此事事先通知他们了。他们带我到一间宽敞的客厅，其陈设富有中国民族色彩，四周墙上都是红绸贴面。

不久，大使来到客厅。他称赞我办事细心周到，不到大使馆而到这里来找他。如果到大使馆，警察和新闻记者就会很容易发现我的行踪。他说他很高兴和同僚交谈，因为在担任大使前，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军。他答应将信件转交北京当局，他对信件本身不作任何明确的表态。他讲的是汉语，魏栋把他讲的话译成法语。

第二次会晤时，大使告诉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接受谈判原则，并同意由我负责在两国政府间传递消息。大使说他希望事先了解与基辛格博士会谈中要讨论的问题。七月二十日，中国方面接受基辛格的建议，决定基辛格来巴黎与中国大使会谈的日期是七月二十五日或二十六日。我用与北越人会谈时使用的专用密码立即报告白宫基辛格办公室。

唯一知道内情的只有我的女秘书南希·乌莱特。

中国使馆人员在一间宽敞的大厅里接待我，只有一、二次例外。这间大厅的家具、图画和布置完全是中国式的。在会谈时，我和大使通常并排坐在长沙发上，沙发前的小桌上摆着食品和饮料。法语翻译魏栋坐在右边，英语翻译赵贵生坐在左边。每次会面时，总是端上中国花茶，还有中国葡萄酒和茅台酒。我不敢多喝这种烈性的茅台酒，也从来不按中国习惯在干杯时把酒一饮而尽。除此以外，还有荔枝、枣汤和杏子罐头。我不喜欢荔枝，但是杏子罐头滋味鲜美，我颇为喜爱。为了礼尚往来，我也送些活动铅笔、自来水钢笔或美国糖果之类的礼品。我们都没有送过值钱的礼物。随着我们关系的发展，他们经常问我有关美国的问题，我也向他们提一些有关中国的问题。我们的关系开始时比较死板和拘谨，后来就越来越友好和不拘客套。但是，虽然谈天说地，言谈也还是谨慎小心的。

我安排基辛格到巴黎与北越进行秘密谈判长达一年多时间。一九七〇年七月二十六日，基辛格第一次与中国大使会晤。从那时起，基辛格到巴黎

后总是先与中国人会面，然后再找北越人谈判。为了不惹人注目，我采取了各种办法和不同的途径把他带进法国。

他也采取了许多审慎的办法，除了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几个亲信助手外，其它美国人都不知内情。尼克松总统指示关于我的秘密使命，既不要告诉国务院，也不要告诉国防部。

基辛格乘坐总统专机“空军一号”来到巴黎，出发前在华盛顿某个场合露面，动身来巴黎时往往是周末，回华盛顿时再在某个场合露面，使人们不怀疑他的来去行踪。

七月二十五日夜，基辛格来到巴黎，在我的寓所过夜，并题在我的卧室。他的助手睡在我的客房，而我自己只好躺在起居室的沙发上。二十六日早晨，在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后，我第一次把他带到中国使馆大使官邸。中国人象招待我一样，端来茶水，摆上荔枝和杏子罐头等食品。基辛格和中国大使回忆起在戴高乐将军的葬礼时曾见过面。

那天，基辛格曾想找中国大使交谈，但这可能招致轩然大波。后来话归正题，大使宣布周恩来已接受这样的原则，即基辛格在尼克松总统访华前去中国访问，时间定在十月下旬。中国建议，如果基辛格要来中国，可取道阿拉斯加到上海。基辛格建议，当时负责与北越谈判的美国布鲁斯大使陪同他访问中国。中国方面提出种种理由，表示此事难以办到。基辛格说布鲁斯大使得到总统的完全信任，对布鲁斯大使不能随同访问甚表遗憾。

基辛格还说，美国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谈判都将告知中国，并请将此事转告周恩来。

看来这种做法，中国人是满意的，并且比较放心了。

基辛格与中国大使的会晤，比起我与这位大使的会晤来显得拘谨了。以后，我定期与中国使馆人员会晤。八月十六日，基辛格又到了巴黎，这次是通过另一个邻国抵达法国的，由我秘密地带他进入巴黎。与以前一样，他并不通过法国的入境检查员或海关人员。

当我与中国人再次会谈时，他们对我的谈话总是表示很大兴趣，有些话题根本与我担负的使命无关。显然，二十五年来中美两国互不来往，关系极不和睦，因而他们对与美国人会谈是很高兴的。我们的交谈极为麻烦，我一会儿讲英语，一会儿又讲法语。魏栋和赵贵生都给大使作翻译，魏讲法语，赵讲英语，翻译都很流和熟练。当翻译中有搞不清楚的问题时，两位翻译用两种语言分别询问。因此，大使要听两种语言的翻译。这样做的目的似乎是为了更确切地了解我的讲话内容，以保证谈话内容确实无误。但用这种办法谈话很费时间，一次会谈往往要持续几个小时。

最初会谈时，他们拿一份材料给我看，让我作记录，但不让我带走。后来，我们关系有所进展，他们给我文件，可以保存，我也照此办理。但是，我不能用美国政府的纸张，而只能用法国的水印纸。他们给我打电话时也是小心翼翼的，只是在约定会见时间时通知一下，在电话里不谈论其它内容。我们都用代号称呼对方。我打电话只能找魏栋或赵贵生，而他们只能找我的女秘书南希·乌莱特，因为使馆里谁也不知道我们的事情。

由于我的活动对美国驻法国大使也是保密的，所以我也很难向他说明我为什么不能陪同他参加武官应该参加的某些军事方面的礼仪性活动。但是迪克·沃森大使跟我极为友好，我想他已知道我的活动。一九七二年三月，当我从巴黎离任回国担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后，他接替了我的工作，为中美

两国秘密来往从中传递消息。

显然，中国使馆人员对我个人也作过一番调查研究。因为他们设法让我知道，他们了解我去过越南，喜爱滑雪，对地下铁道也感兴趣。中国大使曾对我说：“哪天您到中国访问，可以让您参观我们的地下铁道，看看城市里的地道。”他们从来没有谈到过台湾，这是个禁忌的话题。因为我们双方的立场还有很大的距离，还是不谈为好。一般说来，我们双方都避免谈论可能引起争论的问题。有一天我谈起苏联是左派，而他们纠正我说，苏联实际上是右派，是社会帝国主义。

中国人接待基辛格时与接待我时的方式大不相同。我去见中国人时，魏栋在大门口等我，然后领我到大使官邸的主楼门前，由赵贵生负责接待，并带我到我称为“满洲厅”的大厅内，其布置都是红色的。几分钟后，大使来到大厅，握着我的手，用汉语说：“您好！”我也用汉语回答：“您好。”我们坐下后，他们总是请我吃东西——杏子罐头或荔枝罐头——喝茉莉花茶，有时还有茅台酒和中国产的玫瑰香葡萄酒，这些我不太喜欢。当基辛格来访时，完全是另一种礼仪。魏栋和赵贵生在大门口等候，到主楼时，大使在门口等着。这时，室内不仅轻轻地播送中国音乐，而且可以闻到焚烧檀香的微微的芳香。

基辛格和中国大使会谈后。曾问起我来中国使馆时的礼仪待遇。我说情况不同，并向他描绘一番我单独来见大使时的情景。基辛格脸上显出满意的神秘的笑意，好象是说在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里，也承认他和我的等级差别，礼仪待遇也不尽相同。

我曾经将很多白宫发来的信件转交给中国使馆，又将中国人的信件发往白宫。这些信件是安排尼克松总统的访问和基辛格的访问有关事项。原则上基辛格的访问安排在尼克松总统之前。后来，大使对我态度越来越随便了，有一天，他谈到我们两国之间的信件来往竟通过我们两个军人来进行，这真是有趣的事。他说，中国是爱好和平的。我回答说，一旦他进一步了解美国，他也会觉得我们的国家也是爱好和平的。他问我，苏联外交人员有没有问起过中美关系问题，我老实告诉他没有。他还问我是否认为苏联已经知道基辛格即将访华。我说我不知道，根据我的经验看来，苏联情报机构的活动尽管十分活跃，他们在这方面还没有这样大的本事。大使放声大笑，并友好地拍了拍我的背部。

大使问我许多有关美国的问题，例如：与总统不属同一党派的人能不能当州长，内阁部长是否应该是参议院或众议院成员。他问我美国有多少汽车，我告诉他美国二亿多人口有一亿辆汽车，这个数字使他颇为吃惊。

在八月和九月，随着我们会谈进展，我发现大使对我更为亲切和乐于协作。然而，显然他本人不能作出任何重要决定，重大事情都得由北京决定。

一九七一年八月三十一日，我去找米歇尔·若贝尔，他的地位的重要，人们喻之为蓬皮杜总统的基辛格。他问我谈判进展如何，我告诉他，中国已同意在尼克松总统访华前，基辛格先去中国访问。他问我，我是否认为中国人实际上操纵着北越。我回答说，中国人和苏联人实际上都是北越的后台，他们都给越南提供武器、粮食和金钱，使越南能坚持下去。但是若贝尔认为中国人对越南人的影响比苏联大，他告诉我说，他曾对苏联驻法大使瓦莱里安·佐林说过，法国和苏联在越南问题上有相似之处，也就是说两国对越南起不了多大影响，然而，苏联给越南的钱可多得多。他还说佐林对此似乎很

不高兴。就在那时，我写信向白宫建议，请尼克松总统写信给蓬皮杜总统，感谢他在美越巴黎谈判中所给予的帮助。这件事后来照办了，蓬皮杜对此颇为赞赏。

九月三日，我给中国人送交一封关于美苏海上冲突事件谈判的信件。大使看了信之后，微笑着对我说，希望今后不要发生船只在海上相撞的事件。我回答说我也希望这样，但是苏联船只在海上航行时常常过分靠近我们的船只。有一次，在地中海航行时，我亲眼看见苏联船只离开我们航空母舰只有几百米。

此外，中国大使还谈到中国的人口问题。中国每年出生人数大约是一千三百万到一千五百万，相当于捷克斯洛伐克的人口。大使说，中国设法减少到一千万。中国在很多领域里还比较落后，很需要得到帮助。不过，他们在针灸方面有独到之处，所以在医疗技术方面可以和西方国家进行交流。

每次拜访，他们显然要留我多呆一会儿，多交谈交谈。他们喜欢谈话和交换意见，而我也相当坦率地与他们交谈。大使问了我一些关于我个人的事，譬如：我是怎么当兵的，又怎样当上了军官，在大战期间于了些什么，结婚了没有？我回答说没有。他又问我信什么教？当我回答说信天主教，他点了点头，未置可否，只表示知道这一事实罢了。有一次他问我：“基辛格是信犹太教吗？”我只是淡漠地回答，我从来没有与基辛格谈过宗教问题。我对他说，主要的他是个美国人。后来我对基辛格谈及此事，他对我的回答感到满意。

九月二十一日，我交给中国人一份基辛格访问北京随行人员的名单。在这以后，他们提的问题更多了，如问我美国军人的退休年龄，我说像我这样有少将军衔的军官的退休年龄是五十八岁，如果我被提升为中将，那就得五十九岁退休。大使似乎感到这个年龄退休早了些。大使还问我退休后能否享有专用汽车和配备一个司机。我回答说没有。

但是我回答说退休后可以得到数目可观的退休金，生活可以过得很舒服。

中国大使和基辛格几次会谈以后，他告诉我他喜欢和基辛格打交道，因为基辛格性格比较坦率，说话直截了当，而且相当幽默。他说尼克松总统到中国访问会受到欢迎。

有一天他问我基辛格有没有在部队呆过，我说他曾经是军人。他又问我那时他是什么军衔。我说在大战期间他是普通的士兵，但是基辛格爱跟别人说他是预备役的上尉。大使说：“啊！如果是这样，我们都是将军，他应该向我们敬礼。”我回答说：“他可能向您敬礼，但遗憾的是他不会向我敬礼。”我很喜欢这种开诚布公和坦率的会谈。我们象来自不同星球的居民，但最后终于建立了联系。

我跟中国人联系时，代号是“让”，而与越南人联系时，代号是“安德烈”。我打电话时说“让”要找魏或赵接电话。九月二十二日，赵打电话给我，要交换关于基辛格的座机与上海虹桥机场指挥塔台无线电频率的情报。后来，我们谈起有关语言的问题，我说我很抱歉，不会讲汉语。我们终于找到了一种共同语言。黄镇大使和我都懂俄语，我们开始用俄语交谈。但是我的俄语并不高明，而他的更糟。他笑着对我说，别人决不会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大使与美国驻法使馆的武官会在一起用俄语交谈。在那时，我们已颇为知交，大使手扶着我的肩膀，一直送我到门口。当然，我一直担心，

我拜访中国大使的事会被苏联人、中央情报局或联邦调查局发现，他们会怀疑一个美国将军到共产党中国的使馆去干什么。幸好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

九月二十八日，我又到中国大使官邸，告诉他们，我要回美国与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博士磋商。大使告诉我中国正与法国就关于购买供国际航线使用的协和式飞机一事进行谈判；他还说，一旦中美关系比较正常后，中国也一定会购买美国飞机，以供国内航线使用。我说：“在你们还不能自己制造这类飞机以前，就买我们的飞机吧。”大使笑着说：“我们的想法正是这样。”他还问我关于美国的吸毒问题，问我对贩卖毒品的人该如何处理。我直截了当地回答说，对那些把剧毒品卖给少年的贩子应该处决。他完全同意我的意见，认为对这些家伙怎么处罚都不过分，因为他们会损害一个民族的体质。

十月二日，我将尼克松总统与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的会谈简报交给中国大使。我对他说，苏联已邀请尼克松总统访问莫斯科，但尼克松总统还没有表态，我们坚持应将此事告知中国。显然我这样作，是华盛顿的指示。十月三日。我又向大使递交一份信件。大使问我挣多少钱，沃森大使薪水是多少？我告诉他，如果美国人挣一百万元，就得交百分之八十所得税。他对此感到吃惊。然后又说，他作为军人，爱跟军人打交道。因为我们不像一般外交官那样喜欢转弯抹角。魏和赵翻译这句话时，似乎都不太自然。在这次会谈时，他们请我转交他们同意的基辛格访华随行人员名单的信件。大使说，他在一九四六年见过来中国的马歇尔将军和他的夫人。我说马歇尔夫人还健在，已经九十多岁了。

还讨论了对座机到达上海机场后一系列细节问题，诸如机场详细情况，地面供电情况，冲洗飞机设备，登机舷梯，以及由中国负责保卫工作等等。所有关于尺寸问题都以公制计算。在飞机返回美国时，中国方面要在二小时前通知关岛。中国方面还要求随行人员始终穿着便服，不要公开佩带武器。

他们经常晚上打电话找我。十月九日，要我在晚上十点去找他们。遇到这种情况，我有时步行，有时把汽车停在离大使官邸较远的地方，再步行到那里。我从汽车反光镜里看看或回过头去看看，反复证实我后面是否有人跟踪。当晚，他们接受了随行人员名单，并交给我有关虹桥机场办理手续的程序。他们还附加说明，中国的银行一般是不接受美元的，但对基辛格一行则特别照顾；我告诉他们尼克松总统即将访问苏联，而中国是获得这个消息的第一个外国政府。我还交给他们一份基辛格将要发表的新闻发布会上讲话的副本，他们很感兴趣地接受了。

十月十二日，我又去找他们。他们回答了我以前提出的许多问题。我还告诉他们从关岛起飞后基辛格座机的无线电呼号。他们对我很热情，并要求我告诉基辛格，中国欢迎他来访，而他的访问已不会遇到什么困难了。他们同样欢迎尼克松访华。为了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尼克松总统表现了很大的勇气，他将受到中国的热情接待。按照大使的看法，由于中国邀请尼克松访华，因而苏联也邀请他访苏。大使询问我，美国还有谁知道我们来往的事。我说据我所知，只有尼克松总统、基辛格博士、黑格将军以及基辛格的有关随行人员，而在巴黎只有我的女秘书南希·乌莱特小姐。我把她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写给他们，并说他们如果有紧急的事，而我又不在巴黎，可以与她联系，后来他们与她联系过。大使告诉我，中国知道此事的人很少，而在使馆里只有魏和赵知道。他还提到基辛格建议以渥太华为谈判地点，因为中国已

在加拿大设立了大使馆。但是他们认为那里不是合适的地点。他们喜欢通过我和他作为沟通两国政府的渠道。

在下次见面时，在谈论公事之余，大使在闲聊中问起为什么美国已决定不生产超音速飞机。我说，按照我的看法，这是一个错误，我们在不久的将来要生产这种飞机。

大使同意我的看法。

十月十四日到十五日，我又去中国大使官邸，谈的还是有关基辛格访华事宜。他问我美国军人在美国生活中的作用。我告诉他，他们是国家的雇员，就国内情况而言，并不是卫士。他们不能竞选公职，军人在政治上没有地位，而且在参加政治集会时不能穿军服。我国还有一条奇特的法律，它规定，如果在最近十年内曾在军界任职的人不能当国防部长。我觉得，这种规定对军人来说是不公平的，而且把军人当作危险人物来对待的，这在美国历史上是一件不合理的事。大使听了这些话后也感到迷惑不解。他问起马歇尔将军和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情况。我说马歇尔将军是国会破例通过一项法令后担任公职，而艾森豪威尔将军作为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以前，放弃了五星上将的军衔。我还提到，有一次苏联人曾问起我能否参加竞选，我回答说不能。我们的苏联同僚说他可以。

我说：“是的，但是我有一点比您强，因为我可以站到反对派一边，而您却不能。”大使哈哈大笑，虽然在这方面，中国与苏联的情况并无区别。

我隔几天就找中国大使，经常定期会面。十一月十八日，我们商定在北京时间十一月三十日清晨五点、华盛顿时间十一月二十九日下午四点，双方同时宣布尼克松总统访华日期，总统访华为期七天，访问北京后还访问杭州。美方原来建议宣布尼克松总统访华日期是十一月二十三日，但中国方面不同意。在我追问其理由时，他们说因为那天恰好有一位北越高级领导人在北京访问，因此感到为难。他们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宣布尼克松总统访华。

中国人屡次劝我喝他们的烈性酒，我强调说我要自己驾驶汽车，醉酒开车会被拘留，所以总是谢绝。我终于决定对他们讲一个关于俄国人酗酒的故事。他们很喜欢听有关俄国人的故事。有一次赫鲁晓夫访问美国，他对艾森豪威尔说他看到许多美国人酗酒。艾森豪威尔对此感到吃惊，他并不认为美国的酗酒者比别的国家多。赫鲁晓夫坚持他的观点。于是，艾森豪威尔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一支手枪递给赫鲁晓夫说：“如果您遇到酗酒的醉鬼，我允许您向他开枪。”赫鲁晓夫把手枪装在口袋里，来到了纽约。他在苏联驻联合国使馆过夜，第二天早晨在纽约市到处溜达。他在帕克路和八号街口碰到一个醉鬼，他向这个醉鬼开了一枪。然后，在麦迪逊路和八十二号街口向另一个醉鬼开了第二枪。到列克星顿路和八十四号街口又向第三个醉鬼开了枪。第二天，纽约各报都在头版用大标题刊登消息：“三个苏联外交官神秘地遭到暗杀。”他们听完我讲的故事后，都放声大笑。

这一天，大使问我是否陪同基辛格访华。我说我对此事还一无所知。大使说，他曾向他的政府官员谈起过我，说我为打开关闭二十五年之久的中美关系之门出过力。我也很希望随同基辛格访华，但最后并未成行。

十一月二十日，中国大使打听基辛格与北越人的会谈为什么取消了。我说基辛格原来约定与黎德寿会谈。但开会前两天，他们突然通知说黎德寿不能出席。因此，基辛格拒绝会见级别比较低的官员。

十一月二十九日和三十日，我去中国大使官邸时告诉他们，我将陪同

尼克松总统去亚速尔群岛。同一天，我发电报给黑格将军，告诉他我在陪同尼克松总统访问罗马和马德里时，我的名字没有列入随行人员名单，没有专门的房间，也没有事先为我准备交通工具。我希望这次访问不会发生类似情况。我接到黑格将军亲切的答复，说这次将作为总统十分信任的翻译给予妥善的安排。

尼克松总统曾指示我向中国要求释放理查德·费克图和约翰·唐内，这两个美国人被指控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在中国监禁已达二十余年。总统在信件中指出，如果中国作出反应而释放他们，将在美国受到高度的评价。中国大使答应转达信件，但当时并没有答复。我动身回到美国，然后陪同尼克松总统到亚速尔群岛。在我离开巴黎期间，中国方面派人告诉我的女秘书南希·乌莱特，宣布他们将释放费克图和唐内。几年以后，我见到了这两个人，我把他们介绍给我的女秘书，并告诉他们，我曾要求释放他们，而我的秘书当时曾接到释放他们的通知。

十二月二十日，我又到中国大使官邸，大使说他在电视里看到了我和尼克松以及蓬皮杜总统在亚速尔群岛时的情况。我的声誉显然提高了。他们还赞扬了南希·乌莱特，她与他们打交道时非常谨慎和能干。我说我知道，正因为这样，我请她当我的秘书。此外，中国大使对印度—巴基斯坦战争的进展感到忧虑。

圣诞节那天，他们打电话给我，向我祝贺节日，希望第二天能见到我。次日，当我到大使官邸时，他们热烈地向我和美国人民表示祝贺新年。大使对我说，尼克松总统在亚速尔会议上处理货币问题时，与打开中美关系门户时一样，都表现出巨大的勇气。他说，大家都同意这种看法，只有《纽约时报》的詹姆斯·赖斯顿例外。当周恩来总理称赞尼克松总统的这种勇气时，赖斯顿对周恩来总理说尼克松总统没有这种勇气。大使对中国在联合国建立使馆时美国给予的礼遇表示感谢。他还和我谈起美国大量的粮食生产问题。我说苏联的耕地面积比美国多一倍，但是要用三十二个劳动力才能供养一百个人。

而美国只需二个人。这不仅是一个机械化问题，因为苏联的拖拉机数量比美国多，这是由于美国在劳动组织方面作得更为有效。

十二月三十一日，他们同意关于与尼克松总统座机联系的各种方案。然后，我们讨论了带有普遍哲理性的问题，我说我觉得每个国家得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管理自己的国家，美国也不希望任何外国人来教他们如何管理国事。

一月十九日，由于一架南越的飞机飞入中国南部而坠毁了，中国对此感到很恼火。

我向他们解释事情的原由，因为我早已获悉这次事故的经过情况。经说明后，他们仍赞扬尼克松总统对中国执行开放政策的勇气。我说，可以设想中国方面要下这样的决心也并非易事。大使严肃地点头表示同意。显然，在邀请尼克松访华问题上，在中国党内也得作一些说明，为什么要让他们长期来一直抨击的尼克松来中国。我说按照我的看法，只有象尼克松这样温和派的总统才能对中国执行这种开放门户的政策，如果一个自由派的民主党的总统这样干的话，必然会被指控出卖给“赤色分子”。大使接着说，苏联长期以来想把中苏关系变成主仆关系，这是中国非常憎恶与绝对不能容忍的。中国已经上过一回当了，决不能再次上当受骗。

第二天，我交给中国使馆参加中美会谈各种会议的人员名单、飞行计划、陪同总统的政府官员名单。他们交给我总统在访问杭州时的住房安排计划。我还交给他们一些准备插在总统汽车上的旗帜。他们指着旗帜，一面称赞绸子和刺绣的质量都很高，中国人这么说确实并不是恭维话！

一月二十六日，他们对运载总统随行人员的飞机数目太多感到有点为难。当谈话结束正要离开使馆时，有一辆大众牌大轿车驶进院子，在屋里的人把我带到客厅旁边的一间房里。一直等到那些从车上下来的人们各自回到自己的宿舍，我才出来。显然，他们不希望这些坐汽车的人看见我来到使馆。

一月三十日，我要求他们设法使北越人更为理智些。他们交给我一封态度强硬的回信，重申北越是正确的，而美国正在进行一场不道德的帝国主义战争。当他们念这封照会时，态度比较尴尬，但是没有作任何评论。第二天，他们又交给我一份态度同样强硬的照会。这份照会是答复我方提出关于在北京举行尼克松和黎德寿会谈的可能性，因为黎德寿在尼克松访华前后也在北京。中国人在照会中指出，这不是他们应该管的事情。

这种接触应由美国和北越直接进行。我还交给他们尼克松将在北京周恩来宴会上讲话的发言稿。我们还谈到中国最古老的军事著作《孙子兵法》。大使对我说，这本书是中国军事学校的必读书。

在那几天，中国人还告诉我们未经证实的报告，说蒋介石“集团”准备在尼克松总统访华途中，派战斗机击落总统座机，还说这些战斗机还有大陆中国的国籍的标志。他们说，虽然难以判断情报的价值，但是出于谨慎的考虑，还是把情况通知我们。我对此表示感谢并准备采取相应措施。

二月十一日，他们再次拒绝在北京安排尼克松总统与黎德寿的会晤，大使及其助手对于那份交给我的语气生硬的照会，感到有点尴尬。二月十五日，他们指出，我们已进行了四十二次会谈，还说我们很友好，对我非常了解。他们在两天后告诉我，一旦总统座机进入十二海里领海的中国海域上空，他们负责保护总统座机的安全。

尼克松总统的访问进行得很顺利。中国人对此非常满意并多次谈起此事，他们认为此次访问打开了发展中美关系新的可能性，又对尼克松总统表示赞赏。这时，我即将从巴黎离任，基辛格决定由沃森大使接替我与中国继续保持联系。沃森大使事先也了解我的活动；在此以前，他带着基辛格驱车前往特拉卡代罗广场与我会面，当时沃森大使对我也在那里等他们感到吃惊，这时基辛格已决定将全部情况告知他。

三月五日，中国人请我赴宴，这几乎是我离开巴黎的前夜了。他们得知此事后坚持宴请我。我们在大餐厅入座，大厅的陈设华丽，墙上挂着一幅绣着毛主席和少数民族人民在一起的绒绣。显然，制作绒绣的艺术家是受到名画《最后的晚餐》的启示的。这顿饭有十四道菜，还有中国葡萄酒和法国上布里尼翁城堡生产的酒。在祝酒时，大使说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不管将来会发生什么变化，至少，他和我都已完成了使命。我们使两国领导人建立了联系，因为我们过去都是当过兵的军人，这就使我们谈得更为顺利融洽。他还说：“我知道您要到中央情报局工作，如果我有什么话要奉告的话，那就是对苏联人要小心点。他们是危险人物。我们中国人对这点很了解。”

我在答词中谢谢大使在完成我前所未有的使命中给予的友好帮助。我说，他们也该知道，在我担任新的职务期间，我也将忠诚地为我的国家服务，但是我也不会忘记他们对我的友情和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重要性。大使回答

说，如果不是因为看到我忠诚地为祖国服务，他也就不会这样地赞赏我。他再次提出，他认为随同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的记者团惊人地庞大。他说任何一个访问中国的国家元首所带的记者不超过八个或十个人。

他还说我们的会谈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只有少数人知道这个秘密。我们又回忆起我们开始建立关系时的情景，他认为我决定到他的官邸找他这件事干得很出色。我说如果他们的武官在四月份就接受我递交的信件，会谈会开始得更早一些。他笑着耸耸肩说：“当时时机还未成熟。以后情况就变了。”他还说我们已会面四十五次了，他为我们将来第四十六次会面而干杯！他还欢迎我去中国访问，因为我曾经为促进中美两国在没有敌意的情况下进行谈判而出过力，而多年来两国关系一直是敌对的。

这是一段令人神往的经历，特别是使基辛格多次秘密来到法国，对我来说也确非易事。基辛格来巴黎时住在我的寓所，总是怕被别人发现或遇到熟人。幸好我的在地下室的汽车间，可以一直把汽车开进去，并立刻把门锁上，别人也无法跟随我们了。直到基辛格在法国电视台会见电视记者前，我使我的女管家一直相信，我的这位客人是基尔斯曼将军。在会见电视记者后的次日，我的女管家告诉我她已知道我家的客人是谁。我对她说她一定认为是基辛格博士。但基辛格是一个重要人物，尼克松总统的特别顾问。如果他来巴黎，一定住在美国大使豪华的官邸，而决不会住在我这小小的寓所里。我承认我的朋友基尔斯曼将军的确很像基辛格，如果他俩不在一起，看起来十分相象，如果他们俩在一起，他们确实是不同的。她终于相信了。至于我的勤务兵霍尔上士和后来接替他的约翰·索耶，他们每天侍候基辛格早餐，当然知道他是谁，但他们的审慎是堪为典范的。

这些会谈是令人十分满意的。会谈从零开始，直到尼克松总统成功地访华。几年以后，当时尼克松总统已经辞职，他从圣克利门蒂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将再次到中国去，他让我第一个知道这个消息，因为我过去打开了这个国家的门户，他也想在毛主席在世时再见到他。他引用了上次访华时毛主席对他说的话：“我是世界上头号共产党人，而您是世界上头号反共分子，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了。”

我相信会谈的机密一直保守得很好。在巴黎许多招待会上，我和中国大使曾经多次见面，但都假装互不认识，即使在公开场合一起渡过二、三小时也是如此。事后证明，蓬皮杜总统也是忠实遵守诺言的，只有法国情报机构最高级人士才知晓此事。当会谈公诸于众，只有少数人了解内情。在只有很少内勤支持和在很薄弱的基础上，在只有我的女秘书知道的情况下，我竟能坚持进行如此旷日持久的会谈，我对此感到骄傲。当然，这对我说来是一个长期的困难时期，我得自己收发电报，我常说我是美国政府支付最高薪金的译电员了。但是我能为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在新的基础上建立中美关系的这种勇敢行动添砖加瓦感到满意。我赞赏亨利·基辛格的魄力和想象力。他自己不知疲倦地工作，对别人颇为苛求，有时甚至是傲慢和不讲道理。但是，他懂得权力和权力的用途。

他和尼克松总统一样，要和对他们的做法抱不友好的、甚至是敌对态度的国会作斗争。

我对基辛格是尊重的，虽然对他的做法并不是完全同意。但是，我不能想象，谁能干得象他那样出色。我与中国共产党人打交道的使命，就此结束。

十二、陪同尼克松总统出访

——支持美国的越南政策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尼克松当选为总统。我当时还在巴黎任驻法武官。他当选后不久，我奉命在他出国访问时给他当翻译，因为我曾在前几任总统出访时担任过翻译。

一九六九年二月初，一个由罗伯特·霍尔曼、约翰·埃利希曼以及其他一些人组成的白宫先遣小组抵达巴黎，为总统来访进行安排。我被指定参与他们的工作，并得知我将在总统出访期间担任总统的翻译。我对此决定感到奇怪，因为我那时的军衔已经是少将了，作为翻译，我的身份是稍高了一点儿。

这是我第一次同这些人见面，我同他们一起与法国当局有关人士共同商议安排总统访法期间的日程和安全事务。由于我陪同过前几任总统访法，他们当中不少人我都认识。

肯尼迪总统的妹夫施赖弗大使和他们密切配合。这位大使是林顿·约翰逊任命的，但尼克松把他留任了相当长的时间。我很感兴趣地注意到在霍尔曼与埃利希曼之间似乎并不存在什么个人之间的竞争。一般说来，据我过去多年的观察，在其他类似的白宫小组里都有这种竞争。这个小组在与法国人打交道时，态度坚决，但不盛气凌人，特别是埃利希曼看起来态度相当从容。我们在巴黎完成任务后，又到布鲁塞尔和伦敦去作同样的安排，然后再乘机去波恩、柏林和罗马。先遣小组回到巴黎后就飞回美国。

罗马这一站使我们感到有些棘手，因为这里是将要访问的两个政府的所在地，即意大利和梵蒂冈。美国与梵蒂冈教廷之间没有外交关系，事情会复杂些。然而，艾森豪威尔总统和约翰逊总统过去都曾访问过梵蒂冈，有前例可循。

欧洲很急于见见这位新总统，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要打量打量他，因而在安排日程时没有碰到真正的困难或复杂的情况。当时决定分两个阶段访问罗马。首先访问意大利政府，到法国去后再回来访问梵蒂冈。当时讲得很清楚，这次访问结束后，我将返回我的任所，继续当驻法武官。我曾在前几届政府中同先遣小组打过一些交道，虽然人员有所变动，他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点——即想方设法限制别人接近总统，并使尽可能少的外界人士见到总统。他们似乎都认为白宫的权利和权威只有那么多的量，如果别人插进来，他们的一份就要分掉一些。为了这个缘故，我总是向当地政府声明，我不是该组的正式成员，总统访问结束后，我就要回到我原来的工作岗位上去。我这样说总是使与我一起工作的先遣小组明显地松了一口气。我常常精心地指出，“他们”是从白宫来的，而我是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常设小组、从驻巴黎使馆或是从我当时工作的什么单位来的。事实上，在我整个的经历中，我只在白宫里工作过一次，那是同哈里曼先生一起在杜鲁门总统手下工作。我这个策略很成功，使我避免了许多摩擦。但有一次没有起作用，那是在塞林杰和

奥唐奈到巴黎来为肯尼迪总统安排访问事宜那一次。他们所看到的是我曾为艾森豪威尔总统工作过，却忘记了我也曾为杜鲁门总统和哈里曼先生工作过。

和往常一样，一个首要的问题是特工人员出入当地国家元首的住宅问题。由于关系友好，这个问题也好解决。

一九六九年二月十五日，我飞回华盛顿去与总统一行会合。二月十七日我到沃尔特·里德陆军医院去看望前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他还是那样热情和精神愉快，尽管他的身上已插上一架控制心脏跳动的起搏器。二月二十日，我到白宫去见尼克松先生时，谈论到他即将会见的某些人物的情况。我告诉他我对这些人的印象，以及他们可能会向他提出的问题。他对于他任职期间的工作，有许多计划，如：创造一种有可能同苏联人对话的气氛，采取某些主动措施，松动一下同中国共产党人的关系，寻求一个体面地结束越南战争，而又不抛弃我们盟国的办法。我后来参加了后面两项工作。

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三日，我乘直升飞机从白宫草坪起飞，到离华盛顿不远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再从那里乘“空军一号”飞机到布鲁塞尔。我们这次航行很平稳，顺利地到达了比利时首都。我曾对尼克松先生说过，博杜安国王讲一口非常漂亮的英语，他在与这位比利时国王交谈时，不需要我作翻译。我们到达布鲁塞尔时，博杜安国王用英语致欢迎词，这样他就不必同时用法语和荷兰语这两种比利时官方语言来致词了。

尼克松先生及其一行在希尔顿旅馆下榻。这种做法，显然是违反由东道国提供的住所下榻的惯例。尼克松先生与加斯东·伊斯更斯首相进行了会谈。伊斯更斯首相曾上过美国大学，英语讲得很流利。然而我还是在场，事后还写了与比利时首相会谈的备忘录。

在与皮埃尔·阿麦尔外交大臣会见时，我担任翻译。博杜安国王和法比拉王后在王宫为总统举办了国宴。我当时知道这位王后是西班牙血统，会讲法语和荷兰语，但完全没有料到她还精通英语。她非常迷人，很有风度，她的一言一行都很得体，恰到好处，完全符合一个王后的身份。宴会前，我们站在一个大接待厅里谈话。国王问我在哪里学的法语，我告诉他我小时候从十岁到十六岁，曾在法国居住过十年。这时，从大门口到宴会厅站了一排人迎接来宾，所有来宾都正式被介绍给比利时国王夫妇和美国总统。由于比利时有使用两种语言的特点，所以介绍每个客人时都使用他（或她）自己的语言。例如，有人用法语介绍外交大臣时，我即向总统耳语翻译，因为我就站在总统身后。而介绍外交部秘书长时用的是荷兰语，我也小声地翻译给尼克松先生听。博杜安国王以惊奇的目光看着我，并用荷兰语对我说：“将军，你还能用荷兰语翻译吗？”我用荷兰语回答说，我的荷兰语不如法语好，但是在这种场合还能对付。他对总统说，他过去还没有遇见过会讲荷兰语的美国将级军官。这是一次盛大的宴会，气氛也非常活跃。我们同比利时人之间没有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或者纠纷。尼克松先生对国王说，这是他第一次访问比利时。在过去，他总是被派到要解决问题的地方去，因为我们同比利时之间没有发生过什么问题，所以他以前从未到过比利时。

总统在比利时无名烈士墓前献了花圈，并访问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洲经济共同体。这两个组织的总部都设在布鲁塞尔。总统在这两个组织都发表了演说，阐明美国政府对它们的政策。后来，我们离开布鲁塞尔到英国。飞往伦敦的途中很顺利，英国人在伦敦的欢迎很热烈。在英国的正式日程中，

我没有任务，也就是说我可以抽出些时间去看看朋友，或买些东西。第二天我们乘飞机到德国，总统又受到德国人的热烈欢迎。

德国一直非常关注美国对德国以及对保卫德国故都柏林所承担的义务是否有所削弱的迹象。总统的日程包括访问柏林，所以他们大为放心。

在这以前，我一直尽量避免担任高级谈判的德文翻译。我德语说得相当流利，但是我认为我不能象讲其它我谙熟的语言那样理解和转达德文语意上的各种细微的差异。我从来没有在德国生活过或任过职。因此，如果要我为一位非常高级的官员当翻译，我自己也不能完全放心；因为我对这一语言不能运用自如，很可能引起误解。我从来没有拒绝为一般性谈话当翻译，在这次访问中，情况迫使我撇开了这条原则。

德国当时是由基督教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联合执政。基督教民主党人库尔特·基辛格博士任总理，社会民主党人维利·勃兰特任副总理。总统拜会了德国总统和外长，并举行了一次时间很长的记者招待会，这次招待会不是我当翻译。会见后，总理在他莱茵河畔的官邸举行午宴。我注意到亨利·基辛格在尼克松总统这次访问期间，尽量避免讲德语，只有两次主要的会谈场合是例外。午宴后，总理用德语向总统进行了一次长篇的、很幽默的、有时又很动感情的讲话。他讲话一结束，大家都四处观望，寻找译员把这篇讲话译成英语，但译员不在场，因此，德国驻美大使罗尔夫·保尔斯说他愿意试试用英语重复总理刚才的讲话。他刚译了几句，那位能讲一点英语的总理就打断他说：“不对，不对，我刚才没这么说。”当时引起了一些混乱。我问总理他是否允许我试一试。他同意了，我就开始把他的话译成英语。我一边译，一边注意观察总理的表情，我看到他连连点头表示赞许，我想我译的大概没有问题。他讲话中说尼克松先生的职务由第二号人物一跃而成为头号人物，这使他有些担心。他生怕这种情况也在德国发生。他说这话的时候对副总理看了一眼。大家都笑了，勃兰特也笑了，勃兰特后来也确实当了总理。宴会后，尼克松先生问我为什么总是说不愿翻译德文，我解释说在这样高级的谈话中，一个小错误，或者一句话说走了嘴都会引起严重的问题。再没有比看一个议员试图做他实际能力达不到的事情更痛苦的了，我不希望我处于那种境地。

在赴柏林的途中，有人告诉尼克松先生说前方天气不好，驻柏林的美国陆军卫戍部队将在滕珀尔霍夫机场集合接受检阅，总统可以坐着吉普车通过队列。尼克松先生说他宁愿步行，人们又告诉他可能有雨。他说，“如果下雨的话，我愿和士兵一样淋湿。”后来雨没有下，他步行走过了整个队列。经常受到威胁的柏林人对能见到美国总统，并听他重申美国对该城市所承担的义务，感到非常高兴。我们在夏洛滕堡宫与市长共进午餐，总统还参观了那堵将该城分成东西两边的臭名昭著的柏林墙。那天下午我们离开了人数众多的、心情愉快的柏林人，然后启程飞往意大利。

在飞往罗马途中，一路都很平安。瑞士人和奥地利人都为载有总统的美国空军飞机发了特别飞行许可证，准许该机飞越他们的中立地区。到罗马机场后，我翻译了欢迎词和总统的答词。然后我们乘车通过人数不多、但态度友好的人群进入罗马市。离高里塞 不远的地方，我们碰到了共产党搞的小型示威。我们驱车到宽广的奎里纳尔宫，准备在此下榻。这幢楼一度是教皇、后来又是意大利历代国王的住所，现在是共和国总统的官邸。这个建筑产分宏伟，我站在里面感到不知往哪里走是好。总统与意大利政府领导人和

非官方人士会面时，我都在场，而且担任了翻译。有一次，萨拉盖特总统在回答尼克松先生关于意大利共产党到底真正忠于谁的问题时，阐明了这样一个看法，即共产党人忠于莫斯科和世界共产主义的利益的程度，超过他们对纯属意大利人利益的忠诚。萨拉盖特总统竭力宣扬欧洲的统一，并且希望欧洲人在这一方面能得到友好的美国的支持。

总统向他保证，他一定会支持他们。接着，萨拉盖特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在希特勒掌权之前，他曾在德国访问一个当时的工会领袖。那时，萨拉盖特是在墨索里尼统治下被意大利放逐的一个流亡者。这个德国人训斥萨拉盖特说，意大利人没有起来捍卫自己的自由和反对独裁，而这种情况在德国是决不会发生的。接着萨拉盖特说：“很多年以后，我前往巴黎访问，那时我已是意大利总统。我在拉雪兹公墓那位德国工会领袖的墓前献了花圈，这个工会领袖是从希特勒德国逃亡出来后在巴黎去世的。”尼克松总统对萨拉盖特谈到了加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的重要性，并且要求意大利对美国为确保和平，可能在必要时进行一些双边会谈予以谅解。他向意大利领导人保证，他将定期与他们协商，并随时向他们通报情况。

高里塞（Colosseum），是公元一世纪蒂都斯皇帝修建的大斗兽场。

随后我们飞往巴黎去访问戴高乐将军。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已经向报界分发了尼克松先生准备在奥利机场发表的讲话稿。我们的飞机着陆时，戴高乐将军前来迎接，他和往常一样，神态严肃，器宇轩昂。可是在他对总统致的欢迎词中谈到尼克松先生的时候，却异乎寻常地非常热情和友好。他说：“我们对阁下来访感到高兴和荣幸，因为我国人民对美国人民刚刚选出来管理他们事务的政治家十分尊敬，除了这种尊敬之外，还有我与阁下的长远和久经考验的友谊。”尼克松总统听了戴高乐的发言，非常激动，小声对我说，不要管那篇已向报界散发的发言稿，他要说些另外的话。他然后就以他个人对戴高乐将军的高度热情和崇敬心情发表讲话。后来，一个事先拿到散发的发言稿的人说我篡改了总统的发言。我说不论他拿到的发言稿上写了些什么，我翻译的就是总统实际上讲的话。尽管与戴高乐将军和他的部长们的会谈没有什么惊人的突破，但是会谈进行得很好，法美关系中增添了新的热烈气氛。戴高乐在凡尔赛的特里亚农宫接待了尼克松先生。他在评论特里亚农的庭园时说：“如果我们从前没有那些国王；共和国又如何能接待它的客人呢？”

在美国使馆为戴高乐将军举行的招待会上，尼克松先生热情地谈到，上一次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盛会，当时年轻而孚众望的约翰·肯尼迪总统曾为法国总统举行了一次类似的招待会。施赖弗大使夫人是肯尼迪的妹妹，她听到这话后很激动。尼克松先生在巴黎期间还会见了许多法国政界人士和商界领袖。他在凯旋门无名烈士墓前献了花圈，在回爱丽舍宫的途中，还多次停车与聚集在那里欢迎他的群众握手。他回到住所后，发现丢失了一个袖扣，这副袖扣是尼克松夫人在他就职前夕送给他的生日礼物，因而这一丢失似乎使他感到难过。袖扣后来是找到了，并且还给了他。在巴黎时，总统会见了南越的副总统阮高其，那时他正率领代表团在巴黎进行和平谈判。我们准备离巴黎回罗马去见教皇时，戴高乐前来为尼克松先生送行，并说这次访问无论对两国关系，还是对总统本人都是一次成功的访问。

我们飞越风景幽美的阿尔卑斯山，来到罗马。我们到达罗马机场后立刻换乘美国直升飞机到梵蒂冈，并在圣彼得广场着陆。直升飞机着陆的地点

差不多恰好是我在一九四四年罗马解放那天停放吉普车的地方。总统在机场受到梵蒂冈高级主教们的欢迎，还检阅了瑞士仪仗队，仪仗队身穿的制服是画家米开朗琪罗设计的。然后，我们被引进教皇的办公室。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教皇保罗第六，他的身材比他的几位前任都小得多。天主教徒接近教皇时，都会产生一种敬畏的心理，我这时也不例外。两位领导人在凭临大广场的教皇办公室里会谈。加拿大主教卡罗阁下把教皇的话译成英语，而我则把尼克松先生的话译成意大利语。

会谈涉及许多内容，有东西方的紧张局势，中东的敌对行动，以及有必要保证三个大的一神论宗教圣地不受侵犯等问题。他们也谈到了欧洲统一的问题，以及远东，特别是越南问题。教皇热情支持美国努力拯救南越人民，使之不受共产主义的控制。他对总统说，“你们做得对。你们不能放弃那些基督教徒，否则他们就会被消灭。”后来我经常纳闷，为什么在公开场合他不讲这类似的话呢。教皇接着又对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局势表示关切，并指出这两个国家的情况会对欧洲产生怎样巨大的影响。他也以关切的心情谈到智利的局势，以及智利日益增长的共产主义力量，这种力量已经渗透到基督教民主运动，甚至渗透到圣地亚哥的天主教大学。他说他有时觉得那里的天主教大学只是徒有其名而已。他要尼克松先生密切注意那里的形势。双方互赠了礼品，教皇授与我一枚小小的银质奖章。之后我们就离开了他的办公室。总统向罗马的北美学院学生发表了简短的讲话。那是一批在神学院学习、准备担任神职的研究生。学生向他热烈欢呼，他说这个学校可能是他可以在学生面前讲话而不致发生问题的唯一的一所学校。当然他指的是那些综合性大学校园里举行的反对越南战争的示威活动。

尼克松总统从北美学院乘直升飞机到机场，然后启程回美国。我没有随行，而是回我原来在巴黎的工作岗位。哥伦比亚广播系统委派我的弟弟文森特来罗马采访总统访问的消息，因而我有机会同他一起进行访问，并到阿弗莱多饭馆去吃意大利细面条。我们一起飞巴黎，我弟弟再从那里回纽约。

在离开罗马之前，我要拜会三位意大利的高级官员，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二年我在那里当武官时同他们有过接触。一个是当时的国防部长G·安德雷奥蒂，另一个是乔瓦尼·德·罗伦佐将军。我访问罗马时，他是情报机关的头子，我访意后不久，德·罗伦佐当上了参谋长，但因与各种各样的争论和纠纷有所牵连被撤职了，后来又被选为国会议员。我问使馆是否可以去看他们，使馆没有表示异议。我和德·罗伦佐将军通了电话，他派车接我。我们谈了些往事，也谈了一些现实的问题。我在罗马任武官期间，他给予我优厚的礼遇，我向他表示了感谢。他看上去还和过去一样精力充沛。我从他那里回到旅馆时遇到了阿罗依亚将军，我在意大利任职时他是参谋长，那时已退休，是德·罗伦佐的死敌，我对他们两人不偏不倚。在我访问意大利期间，这些人对我都非常礼貌和友好，据我看来，我去拜会他们是应该的。可是我离开意大利不久，意大利的左翼报纸就大肆渲染我去看望德·罗伦佐的消息，并且把这事说成是某种阴谋，也有的说我是在为尼克松传递消息，还散布了不少类似谬论。甚至在国会中也有人提出质问，我对提问的人谈了有关我在意大利逗留的情况，说明没有任何阴谋。但是由于这些报纸有意不提我也见过国防部长安德雷奥蒂和阿罗依亚，我的这次访问被说成是阴谋活动。美国大使馆不能抱怨，因为我去拜会这些人，他们都是同意的。

我飞回巴黎，又走上我原来的工作岗位。回去不久，就接到一位旅法

的葡萄牙工人的电话。他在爱丽舍宫的地上拣到了尼克松先生的袖扣。因为袖扣上刻有总统的印玺，同时报纸上发表过一篇关于遗失袖扣的报道，所以他找了美国大使馆。他只会讲葡萄牙语，因此，使馆人员叫他来找我。我和他见了面，拿回了袖扣，并且造了他一些东西表示谢意。他的名字叫诺夫雷，葡语的意思是“高尚”。我对他说他把袖扣送回来的行动用事实说明了他的为人同他名字一样高尚。

一年半之后，到一九七〇年九、十月间，我又一次为尼克松总统当翻译。那次我从巴黎到远东，参观大阪世界博览会后前往西贡，在美军司令克赖顿·艾布拉姆斯将军的家里住了几天。在那里我接到通知，要我务必于九月二十七日到巴黎会见基辛格博士，因为他要在那天与北越人会谈。会谈后我和他一起前往罗马与总统一行会合，准备在访问意大利和西班牙期间当总统的翻译，但我不陪同他去南斯拉夫和访问地中海第六舰队。

我于九月二十六日抵达巴黎，第二天和基辛格博士一起去会见北越人。会谈和过去一样毫无成果，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对我们进行宣传性的指责。当天下午，我同基辛格博士一起飞罗马。和往常一样，我翻译了总统到达罗马时的讲话。然后我们驱车往奎里纳尔宫会见萨拉盖特总统。看得出来，他不太高兴见我，因为我十八个月前拜访德·罗伦佐曾引起过一场风波。有一次他曾企图不让我参加他和总统的一次会见。他做得很隐蔽，但是我注意到了，他没有达到目的。萨拉盖特总统在奎里纳尔宫为尼克松总统举行了一次丰盛的午宴。两国首脑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在宴会上，尼克松先生一口气发表了一段非常长的祝酒词。当中没有为翻译间断。这段话讲了大约七八分钟，我还是把它翻译下来了，尽管我没有做笔记。饭后总统问我那段话是否太长了，我回答说：“不长，先生，但是再长就不行了。”

正当总统驱车在罗马大街上行驶时，有一个人突然冲过摩托车警卫队，一手抓住汽车门，一手摇晃一张纸，跟着汽车跑，显然想把那张纸交给总统。他绊了一下，摔倒了，我以为他会被压在车轮下边，但他爬了起来，继续跟着汽车跑，那时骑摩托车的警察极力想把他撵走。开始时，总统曾想摇下车窗玻璃，把那张纸接下来，但是窗子打不开。

后来他又想打开车门，但车门也锁上了。他随即说：“谁去把那张纸接过来，不然那个人要摔到汽车底下去了。”那些特工人员不听，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人是否是刺客。总统随后大声说：“见鬼！我是美国的总统，把车停下，打开车门。”汽车停了，总统打开车门，接受了那个人的申诉书。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欢呼声。在他们看来，尼克松先生并不害怕这个有可能是刺客的人。尼克松先生随即把那份申诉书交给了我，并问：“这上面说些什么？”这份申诉书是一位退伍军人写的，声称他没有得到全部应该得到的待遇。当时国防部长也在我们的车上。我把申诉书内容报告总统之后，总统把申诉书给了他，并且说：“这实际上是要交给你的。”申诉人确实是个意大利的退伍军人，他要尼克松总统向意大利国防部施加压力，满足他的要求。

我们然后驱车去梵蒂冈拜会教皇保罗第六。总统被引进教皇的私人办公室，仍然是卡罗大主教阁下担任教皇的译员，而由我将总统的话译成意大利语。这次，教皇又表示关心中东的局势，并表示希望能够做出某种安排，使各种宗教信仰徒都能到他们的圣地去。

在讨论了一些其它的国际问题之后，我们就告辞，总统前往那不勒斯

视察第六舰队。我在罗马又呆了两天。这次我比较谨慎，没有再去拜访老朋友。

一九七一年十月一日，我乘一架班机到马德里去等候总统来临。佛朗哥将军到机场迎接他，照例有欢迎仪式和致词。我把佛朗哥将军的话小声向总统翻译，在扩音器前将总统的话翻译成西班牙文。

总统和佛朗哥将军乘车经过马德里繁华地区，沿途聚集了大批热情的群众。欢迎的规模没有欢迎艾森豪威尔将军时那么盛大，但却是尼克松总统两次访问欧洲时，欢迎人群最多的一次。__我们驱车到总统下榻的蒙克洛亚宾馆。抵达那里时，由一名年轻西班牙上尉指挥的仪仗队列队欢迎。这位上尉手执指挥刀。总统检阅完仪仗队后，把手伸向这位年轻的上尉，他显然很尴尬。随之他对总统说，他能够和总统握手是莫大的荣幸，但根据西班牙军队的规定，手持指挥刀时，是不准握手的。总统对于他敢于这样讲出来，对于仪仗队的雄姿都大加称赞。进入宾馆后，总统说，他在马德里受到如此盛大和热情的欢迎，感到非常高兴。他说：“西班牙人确实是我们的朋友。”稍后，西班牙的年轻王子唐胡安·卡洛斯来访，并同尼克松先生谈话。王子的英语讲得很好，所以他们谈话时我没有参加，只是在他来的时候出去迎接，走的时候送他上汽车。后来又有政府首脑卡雷罗·布兰科海军上将来访，他同总统长谈时我当翻译。这位海军上将后来遭巴斯克恐怖主义分子暗杀。卡雷罗·布兰科认为共产党人正在有步骤地通过宣传破坏西方进行抵抗的意志，并在散布色情的东西和毒品，以破坏西方的传统道德。他把当代的道德败坏情况与罗马帝国衰亡时的情况相提并论。他说：“那些野蛮人正在城墙外等待着呢。”有多次社交活动，西班牙人都安排得非常好，其中有一场音乐会，演奏用的提琴全都是斯特拉迪瓦里当年制作的。

第二天早晨我同总统和总统夫人一道乘车去机场。途中，夫人问我是否有去巴黎和谈的任务。我曾经得到指示，要对此事严格保密，总统抢在我答话之前换了话题，因此我就没有必要回答尼克松夫人的问题了。我们先飞伦敦。我乘坐的是后备飞机，非常舒适。总统回美国，我就飞回巴黎，重新当我的驻法武官。

我另一次陪同尼克松先生出国是去参加戴高乐将军的葬礼。我们抵达巴黎时发现该市异乎寻常的寂静和沉默。只听到电台和电视台播放的哀乐。总统住在大使馆，我住在克里荣饭店。当总统被引进蓬皮杜总统在爱丽舍宫的办公室时，这位法国总统赞颂了戴高乐将军，但同时也对他做了一番有趣的分析。蓬皮杜说，戴高乐将军从来没有真正信任过任何人，正因为如此，他最后下了台。蓬皮杜自己就是这种不信任的受害者。

蓬皮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从未见他对别人作出轻率的回答，他总给人以非常自信的感觉。据我看来，他自己的为人似乎就象他说戴高乐那样，对别人缺乏信任。

他实际上并不真正喜欢美国人，但是他懂得我们在世界上所代表的力量。他访问美国时遇到的敌对性示威，曾使他大为震动。他一直没法理解，如果美国政府真想制止这种示威活动的话，为什么不加以制止。但是他非常善于利用他曾经受过委屈的地位。他反复向尼克松总统表示，任何社会，如果不能保卫自己，就不能生存，也不配生存。

总统同世界各国的领袖们一起在巴黎圣母院参加了悼念戴高乐将军的弥撒。这是一次给人留下极深印象的仪式。当晚，蓬皮杜举行小型招待会，

宴请参加葬礼的各国代表团。我遇见了英国的查尔斯亲王，不同时期的四位首相围坐在他的四周，他显得十分从容。葬礼结束后，总统飞回美国，我则留在巴黎继续履行职务。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二日至十四日，我前往大西洋中部参加蓬皮杜、尼克松两总统在亚速尔群岛举行的会谈。我曾多次陪同总统参加与蓬皮杜的会晤，并陪同基辛格博士拜会法国总统。这几次会谈，谈的都是非常棘手的财政问题。在法国人看来，这些财政问题似乎往往比政治问题更重要。美国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同后来继蓬皮杜任总统的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之间交锋十分激烈，最后美国终于同意美元贬值。尼克松在与蓬皮杜交谈中，非常感兴趣地听着这位法国总统对苏联的观点和人物的评价。蓬皮杜认为，波德戈尔内虽然从理论上说是苏联的国家元首，但没有实权。柯西金很会说话，具有特别强的反德情绪。无疑勃列日涅夫是真正的首领。他曾向蓬皮杜夸耀过他的 SS9 型导弹，自吹说这种导弹是世界上最大、威力最强的导弹。他认为苏联现在同美国谈判处于有利地位。蓬皮杜说他不一定同意这些看法，但勃列日涅夫是这样认为的。这位苏联领导人还反复向法国总统炫耀苏联的力量，他说苏联要和平，但永远不会“后退”。蓬皮杜不太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说，苏联确实十分关切中国问题。波德戈尔内说过，他认为毛的去世不会改变中苏之间的关系，两个共产党大国之间的敌对不会消除。俄国不仅要对付西方，而且还要对付怀有敌意的中国。

同我过去看到蓬皮杜参加会谈时的情况相比，他在亚速尔群岛会晤尼克松时，似乎显得比较紧张。这或许应归诸于最后致他于死命的疾病已经开始对他袭击。尼克松对蓬皮杜说了不少恭维话，还说他非常重视法国总统的意见。我不记得蓬皮杜是否曾经也恭维了尼克松。经常跟随蓬皮杜的是他的一位很出色的能够讲三国语言的翻译安德罗尼科夫亲王。这位亲王除法语外，还能完全掌握英俄两种语言，而且对于所谈的问题十分熟悉，并具有惊人的记忆力。

我还两次陪同基辛格去见蓬皮杜。我必须承认，亨利对于复杂的经济事务几乎同政治问题一样熟悉和在行。会晤前他总是把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充分。

十二月十三日晚，葡萄牙总理马尔塞洛·卡埃塔诺在安格拉杜伊鲁伊兹穆请吃了一顿十分丰盛的晚餐。蓬皮杜发现我还能讲葡萄牙语，能把祝酒词译成葡文、法文和英文三种文字，表示十分惊讶。他事先一定忘了看关于我的材料，法国情报当局肯定给过他这种材料。十四日会议结束后，我飞回华盛顿去整理我参加过的历次谈话的备忘录。在华盛顿期间，总统接见巴西总统埃米略·梅迪西时，我曾为他翻译。就是在这次接见时，我知道我将被任命为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因此我就回巴黎去办理我调回华盛顿工作之前的未了事宜。我在国外已呆了十二年，虽然曾多次返回美国，但实际上我从一九六〇年起一直派驻国外工作。

我再次陪同尼克松总统出国访问，那是去参加蓬皮杜总统的葬礼。这一次葬礼在许多方面几乎是戴高乐葬礼的重演。蓬皮杜非常英勇，直到他临去世那天早晨还在办公室工作。

当时水门事件正达到高潮，总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紧张。他这次仍住在巴黎大使馆官邸，并步行一百五十码到爱丽舍宫去拜会法国代总统阿兰·波埃。他走过圣奥诺雷区时，那里站满了群众，他们都对他十分友好，这显然

使他精神为之一振。后来他出席了波埃为前来参加葬礼的各国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招待会。他同许多国家的元首进行了长谈。

当他见到摩洛哥王储时，他赞扬说王储是一位伟大国王的儿子，将来王储本人也要成为伟大的国玉。如果说摩洛哥人听了很高兴，那并非言过其实。他还同墨西哥外长拉瓦萨谈了一会儿，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插进来说：“他是你南面的邻居。”后来瑞典的首相奥洛夫·帕尔梅也向总统的跟前挤。他过去曾把尼克松先生在越南问题上的作为和阿道夫·希特勒当年的作为相比。当我告诉尼克松先生说这位首相正在向他走过来时，他在嗓子里做出一种猎猎的声音作为对我的回答。接着瑞典大使对我说，瑞典首相想见总统。

瑞典大使是我在巴黎工作时认识的。使我大为诧异的是尼克松先生对瑞典首相居然十分亲切。次日，一九七四年四月七日，尼克松先生飞返华盛顿，这是他辞职之前的最后一次出国旅行。

尼克松总统很喜欢这几次出访，以及与外国领导人的接触。他认为这种接触有很多好处，如果领导人之间建立了个人关系，那么当一方采取了某种行动，另一方不大可能作出鲁莽的反应。他觉得他在外交政策方面干得最漂亮。而他的这种感觉是对的。如果他在国内事务上也能做出同样好的判断，那么国家就不会发生水门事件这种悲剧了。

一九七〇年六月发生了一件很怪的事情，当时我已回华盛顿。我去见基辛格博士，在他的办公室里，有人通知我说总统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先生要见我。我真想不出他究竟要同我谈什么问题。我到他的办公室之后，他告诉我说，尼克松对于我有本事不记任何笔记而整理出详尽的备忘录，印象很深刻。他问我是否有兴趣回白宫，而且出席总统参加的各种会议，不仅为了陪同接见外宾，还要记录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把本届政府的历史写下来。我口答说，给我提供这样一个职务我很感激，但我对于这一项工作实在不感兴趣。如果真要命令我去干，那我就请求退休。他对于我没有欣然接受这职务，似乎很惊奇。后来我把这次谈话情况报告了基辛格，他只是摇摇头，没有发表意见。

我相信在我同霍尔德曼进行那次谈话之后不久，白宫开始安置了录音设备。

十三、半夜营救基辛格

——“告诉他们，这件事涉及一个女人！”

带引亨利·基辛格进入巴黎与中国人和北越人进行秘密谈判这件事，通常总会遇到种种困难和复杂的情况。他一般带领两个助手。我必须用各种不同的办法使基辛格的未来去去躲避开爱打听的新闻界。在巴黎知道我的秘密使命的唯一的美国人是我的女秘书南希·乌莱特。”

基辛格常坐美国总统的专机“空军一号”来巴黎。他这一行人出国的名单是不通过正常渠道的。这种秘密谈判连美国国务卿和国防部长都不知道。在开始进行秘密旅行时，基辛格问我，他进入法国是否能不让法国人察

觉。我回答说，这不大可能。法国有高度熟练的情报机构，他们只要觉察到我的活动或中国人、北越人的活动，就会发现你在巴黎。基辛格问我怎样才能使这件事不在法国新闻界扩散开去。我说，照我看来，只有直接去找蓬皮杜总统，将我们的会谈之事告诉他，并要求他把这件事高度保密在法国情报机构的上层范围之内，这样也许可以避免走漏风声。蓬皮杜给予了全面的协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七〇年四月三日那一次。那天，我接到通知，基辛格要来与北越人会见。

我安排让他的飞机在法国中部布尔日机场着陆，我到那里去接他。

我接到通知，他将于黄昏时分到达布尔日。大约在下午五点钟左右，我在大使馆接到华盛顿发来的电报，说飞机发生技术故障，因而有可能要改变着陆的目的地，不能在布尔日机场着陆。随后，我继续接到白宫令人不安的电报，不能确定在哪里着陆。如果飞机在别的机场着陆，基辛格的抵达必然会引人注目，而我们为他准备的极端秘密的会谈的一切努力都将付之东流。华盛顿的紧急电报也越来越令人不安，他们要求我作些准备。

最后，我也确实有点火了。我回答说，我只有一个人，我也照顾不到西欧的所有机场，如果华盛顿能够格外开恩地告诉我飞机着陆的地点，那我还有可能使基辛格摆脱困境。晚上八点左右，我接到现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最高司令、当时担任基辛格助手的黑格将军的电话，告诉我飞机的液压系统和操纵装置出了问题，制动器和减速装置很有可能失灵。因而决定飞机在靠近（西德）法兰克福的莱茵—美因机场着陆。这个机场跑道的终端备有拦机网设备，这种专门设施是为飞机发生类似上述故障而准备的。黑格将军说，这是一个很糟糕的地方，因为在那里基辛格被别人认出来的可能性比任何其它地方都要大。他急迫地催促我设法使基辛格摆脱这种局面。。我对他说我将设法解决这个问题，虽然我当时对他说，我也拿不出什么好主意。挂上电话后，我呆坐了一会儿。那天是星期六下午，我的办公室已锁上门，我的女秘书也已经回家，只剩我一个人。最后，我想唯一行得通的办法是去找蓬皮杜总统。

我从我的办公室步行到爱丽舍宫，告诉门警我是美国驻法大使馆武官沃尔特斯将军，我不久前曾陪同蓬皮杜总统访问美国。事实上，法国电视片和纪录片中曾经多次在不同场合出现过我陪同蓬皮杜总统访美的镜头。门警对我的要求颇为惊奇，但是他还、是给米歇尔·若贝尔先生的办公室打了电话。不多久，我被带进若贝尔先生的办公室，并向他叙述了当时的情况。他到隔壁房间找总统，不多会儿就回来对我说：“总统想跟您谈谈。”我走进了蓬皮杜总统办公室，用法语对他说：“总统先生，我向您致意！”他非常亲切地回答：“我亲爱的沃尔特斯，我向您致以友好的问候！”我向他说明了当时的情况。他随手拿起桌子上的电话，给巴黎南郊维拉库布莱机场的总统专机组打电话，总统的神秘式 20 飞机就停在这个机场。经过了一番简短的谈话，总统对我说：“您到维拉库布莱去。巴。他们等着您呢，他们将送您到法兰克福去把基辛格接到这里来！”

我对蓬皮杜总统友好的做法表示感谢，这样就帮助我解决了看来几乎是难以解决的问题。若贝尔先生和我一起走出总统办公室。我对他的协助表示感谢。这位平时颇为文质彬彬、甚至有点拘谨的法国人祝我一帆风顺。

回到大使馆后，我马上驾驶汽车奔赴维拉库布莱机场。在机场作业室里，专机组人员正在等我，一切都已准备就绪，我马上登上飞机。驾驶员是

法国空军的考尔德伦上校。

几分钟后，我们就起飞了。我看了看表，从离开总统办公室到现在，只花了一小时零六分钟。即使考虑到专机组人员住在维拉库布莱，对这种突如其来的飞行任务，准备如此地迅速，也确实是令人十分钦羡的。

虽然晴空万里，气候很好，但当飞行高度迅速上升，并离开巴黎向东飞行时，我开始产生某种忧虑：“万一飞机坠毁，我不仅命丧黄泉，而且名誉扫地。别人会说我乘坐法国军用飞机叛逃到苏联。”我很怀疑基辛格会公开站出来替我说话，证明我担负某种使命，尤其不会说我是为了使他摆脱在法兰克福遇到的尴尬局面。

幸好万事顺利。我们很快就看到了飞在我们前面的基辛格乘坐的飞机。我们紧跟它，直到进入法兰克福机场跑道。因为我们的飞机比基辛格的座机小得多，所以比它光滑出主要跑道。这样我们就停在平时为美国空军准备的停机场内，这里正在等待基辛格乘坐的美国总统飞机。无数耀眼的探照灯照亮了整个停机场。我穿着便衣走出机舱，带着命令的口吻竭力大声疾呼：“我是沃尔特斯将军。请立即熄灭探照灯！”探照灯马上熄灭了。美国总统座机停住不久，机舱门就打开了，一放下梯子，我就登上飞机。我找到了坐在座位上设精打彩的基辛格。他抬头看看我说：“老天爷！我是多么高兴地见到您呀。”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我说，“基辛格博士，摘下眼镜，把衣领翻上去，赶紧下飞机，登上那架停在您的飞机旁边的法国小飞机，等着我们把行李搬过去。”即使基辛格助手被人认出，这也无关大局，因为这不意味着基辛格跟他们在一起。基辛格博士急忙按我的吩咐行动。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基辛格如此听话和唯命是从。他走出飞机，登上法国总统的小飞机，在我们把行李搬运到神秘式 20 飞机时，一直老老实实地坐在座位上。我们的行动非常迅速。不久，我们的飞机就离开地面，掉转机头向巴黎飞去。

在我们飞向巴黎途中，考尔德伦上校把我叫到驾驶舱里，向我提出一个问题：“我的将军，我怎么向德国人交代呢？他们知道这是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飞机，也知道这架飞机深更半夜飞入德国领空，在法兰克福机场着陆，而且既无飞行许可证，又没有飞行计划。我们滑进为美国军用飞机准备的地段，并且只在地面停留了九分钟，又立刻飞回巴黎。这对我来说确实很尴尬，因为德国人必然会问我，我这是在干什么。那时我该怎么说好呢？”

当时，我由于搞到一架飞机把基辛格从莱茵 - 美茵“取走”而松了一口气，根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经他一提，也有点着慌了。我想了一会儿，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告诉他们，这件事涉及一个女人。德国人会相信法国人干这种事的，因而不会声张出去。”“那末，如果蓬皮杜夫人发现这件事，那又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说好呢？”“考尔德伦上校，如果蓬皮杜夫人谈及此事，我以美国军官的荣誉担保，告诉她事实真相，说这是基辛格。”这个回答使考尔德伦上校感到满意。

我们到达巴黎后，在维拉库布莱机场着陆，我把基辛格和他的二位助手领进我的汽车，汽车驶过梅东森林和塞弗尔桥，到达纳伊区我的寓所。当我们经过巴黎市郊时，已经是凌晨一点钟了。基辛格博士带点抱怨的口气对我说：“您为什么带我从这里走？别人可能认出我来。”经过一天一夜的折腾，我已经很疲乏了，说实在话，我确信已完成了一项奇迹，而他这样挑剔，我可有些火了。我说：“基辛格博士，您管您的世界大事吧，有关进出巴黎

的事让我来管。这方面我比您在行得多！”基辛格发起脾气来了，说：“谁也不敢用这种口气对我说话。”接着又改口说：“对，对，您干的这些事别人是办不到的。”我回答说：“这就对了，基辛格博士，您说的很对！”谁也没有认出基辛格，这就不必多费笔墨来描述了。我把基辛格带进我的寓所，并把他安置在我自己的卧室。

这个故事的结尾也是很有趣的。我在几个月后碰到了考尔德伦上校，我不禁问起情况是否象他预料那样，德国人是否问起过这件事。他说，在这次飞行后的第二天，他回到办公室不久，海国空军武官就来拜会他，一进门就要求说明这次飞行的目的。

“那末您怎么说的呢？”

“我照咱们商量好的话告诉他了。”考尔德伦上校面带笑容地说道。

“他们对这个回答满意吗？有没有提出其它问题？”

“他们提了一个问题，”他笑得更厉害了，“他问：‘这个女人是不是德国人？’”

我讲这段故事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基辛格博士多次秘密访问巴黎期间所遇到的重重困难。在发生这段插曲之后不久，基辛格为了我的努力写了一封感谢信，但是加了这么几句话：他说我为他做这些事而毫无怨言，我把他当作骗子或聋子来对待。最后又说：“但是，还是说正经的吧，我知道，您不但外表上相貌堂堂，而且还有一颗坚强的心。”

显然，正如以上所述，这些活动搅乱了我的个人生活和公务活动。因为这样就使我很难进行我作为武官应该在驻在国进行的正常的旅行。有时大使要我陪同他到某一个地方去，而这时恰巧基辛格要来，我不得不表示歉意或找个托词以摆脱这种活动。有一次，我的姐姐洛琳正住在我家，我得到通知，基辛格要来巴黎，我只好请求我姐姐离开我的寓所三天。

“为什么要我离开你家三天？”她问道。

“别问我这些问题，你就到别处呆三天吧。”

“你要干什么？你搞女人来了吗？”

“洛琳，这与你无关。只要离开三天，三天后再回来。”

基辛格在巴黎停留的时间从来不超过两天。

此外，在基辛格到巴黎的多次访问中，发生过一次有趣的小事。我有一个多疑的女管家。她经常琢磨着我为什么把卧室让给这个客人住。我向她解释这是来我家作客的美国将军。有天晚上，基辛格来了，他的衣服弄得很皱，需要熨一下。他问我谁能帮他干这件事，我说当然是我的女管家。那时，我还有一个难题，我不能用我私人的车辆或使馆的车辆供基辛格使用，因为所有外交使团或外国政府官员的车辆都有特别标志，这实际上等于告诉人们乘坐者来自哪个国家。我们不能坐着有这类汽车牌照的车子去中国或北越的外交官官邸。我要求我的助手以他的名义去租一辆车子。我驾驶这辆车子带着基辛格去和中国人或北越人进行会谈。然而，我也不能把此事告诉委派我来此担任公职的国防部情报局。要不然，他们会问我，使馆有六辆车供我使用，为什么还要去租汽车？基辛格最初二次秘密访问，我不得不自己掏腰包去付租车费。我曾想与基辛格谈这件事，但是他把话题又开了，说：“我是为保证和平而奔走，而您，您帮助我分担事务性工作。”我明白提这类问题并不恰当。

这天晚上，当基辛格问我能否熨烫衣服时，我刚拿起他的上衣，他急

忙说：“啊，这不行，里面有一个写着名字的标记！”我瞧了瞧，看见衣服夹里的衣兜上确有一个标记，几乎快掉下来了。我把它一撕，结果把夹里给撕破了。他看了看我说：“啊，您把我的衣眼夹里给撕破了，谁来付缝补费呢？”我回答说：“将来和租车费一起结账吧！”他明白了我的意思。在下次来巴黎时，他一下飞机就拿出一张支票，还说：“还您这笔债，您拿这笔钱去付租车费吧！”

基辛格的秘密访问对我来说确实是项艰巨任务，但是完成任务也确实使我感到很快慰。在结束本章时，我再次向蓬皮杜总统和米歇尔·若贝尔先生表示敬意，感谢他们谨慎和友好的帮助。他们两位严守秘密，这是进行谈判所非常必要的。

